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美国军事风云录 (下)

 **eBOOK**
内网资料 非卖品

美国军事风云录

第十一章 血战三年一场骗局

- 一、第一支美国地面部队踏上朝鲜国土
- 二、“山姆大叔”真刀实枪地干了
- 三、战争就是赌博
- 四、血腥大溃退
- 五、麦克阿瑟走向败将之路
- 六、一场大骗局
- 七、为两场战争而准备

一、第一支美国地面部队踏上朝鲜国土

1950年6月30日。

日本九州岛伍德兵营。

美国驻日本第24师21团1营营长查尔斯·布雷福德·史密斯中校被妻子从睡梦中唤醒。这些天来，驻日美军已处于戒备状态，史密斯连续几天通宵没睡，被妻子叫醒，一肚子不高兴，当妻子告诉他，团长理查德·斯蒂芬斯要他接电话时，他只好从床上爬起来。

斯蒂芬斯团长的话语简练明确：“穿上衣服，立即到指挥所。”史密斯瞥一眼手表，9时整。

34岁的史密斯一边套衣服，一边回想起上一次突然接到命令时的情景。那天是1941年11月7日，史密斯从西点军校毕业才两年，就指挥驻扎在夏威夷的斯科菲尔德兵营第35步兵团的D连。日本人袭击珍珠港之际，他接到紧急命令，在巴伯斯角构筑阵地，击退日本人可能发动的入侵。从此，史密斯作为第25师的一名步兵军官参加南太平洋作战直到战争结束。

在团指挥所里，斯蒂芬斯上校郑重其事地向史密斯下达了命令。由他率领首批美国作战部队进入朝鲜。他的B连和C连出发到75英里外的板付空军基地，然后乘飞机立刻进入朝鲜。师长威廉·迪安将军在板付迎候并向他们下达指令。

史密斯冷静地估计了部队的状况，他的几个步兵排还缺员。当他反映这一情况时，斯蒂芬斯说，可以从第3营抽调。

凌晨3时，史密斯和他的军官以及军士们从营房集合起443名士兵，全部人员携带枪支和野战装备，乘坐卡车，冒着滂沱大雨沿着漆黑的日本公路向板付隆隆驶去。

史密斯不知去朝鲜执行什么任务，但是他知道，他率领的这支部队小得可怜，武器落后。全营共辖两个缺员的步兵连，和主要由炊事员、文书、及参谋组成的约半个连人数的营部；一个拥有4门75毫米无后座力炮和4门4.2英寸迫击炮排。另外B连、C连还配有6门无后座力炮和6门60毫米迫击炮。每个士兵携带M—1型步枪一支，0.30口径的子弹120发和2天的听装日用口粮。

大约三分之一的军官曾参加过欧洲或太平洋作战，半数的军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兵，但是并非个个都经历过战斗。实际上，443名士兵中约75人曾在战场上见过敌人，大多数都是20上下没有实战经验的小伙子。

从伍德兵营到板付的75英里路程，史密斯的部队费了5个小时才走完。路上大雨不停，士兵们从车上爬下来时，个个都淋得透湿。迎候的威廉·迪安将军给史密斯下达了命令：

你到达釜山以后，就向大田进发。我们打算在釜山附近或较远的地方截住北朝鲜人。封锁主要公路，越靠北越好，与已在朝鲜的先遣队队长丘奇将军取得联系。如果找不到他，你就去大田，如果可以，就继续向北开进。很抱歉，我没有再多的情况可说。我就知道这么多。祝你走运，上帝保佑你和你的士6架C—54运输机供他们使用。史密斯到达后不到40分钟，第一架装载完毕，并立即升空。几分钟后第二架起飞，但这两架飞机飞临釜山时，因为雾太大，无法降落，只得返回日本。后来天空放晴，上午11时左右，第一支美国战斗部队踏上了朝鲜的土地。

此时是 1950 年 7 月 1 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的第 6 天。

7 月 2 日上午，疲惫不堪的史密斯特遣队到达了大田。他们手里提着沉甸甸的背囊走下列车，又奉命北上，在指定地点展开并阻止北朝鲜人民军的进攻。

正当史密斯特遣队向北运动之际，威廉·迪安将军在大田设立了自己的司令部，为他的部队到达作准备。

7 月 4 日，星期二，也就是史密斯特遣队开进的第四天，疲惫不堪的部队在乌山下火车，又坐上征集来的各式各样的朝鲜卡车。第 24 师第 52 野炮营的 108 名先遣队士兵，携带 6 门 105 毫米榴弹炮、73 辆车，乘坐海军的小型舰艇匆匆地赶到朝鲜，然后坐卡车和火车北进。他们的到来使史密斯异常惊喜，炮兵部队由乔治·巴恩准将率领，尽管他的军阶高出一级，但依然归史密斯中校指挥。

特遣队决定趁着黄昏向北进发，但是由于人生地不熟，遇到不少麻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整整花了 5 天时间才到达目的地。

7 月 5 日，星期三，天刚亮，540 名美军士兵已经在阻击阵地上就位。史密斯原来的特遣队得到炮兵部队的加强。大雨如注，士兵们或蜷缩在泥泞狭长的战壕里，或躲在树后，嘴里嚼着冰冷的口粮，等待着北朝鲜人的“光临”。7 时左右，史密斯首先发现北朝鲜人民军的坦克，从水原方向沿公路奔来，不到半小时，前方观察哨报来更为具体的情况，一支由 8 辆坦克组成的纵队正缓慢地向阵地逼近。

8 时左右，前方观察所用无线电向炮兵发出了开火命令，但头几发炮弹打偏了。

第一批坦克冲下公路，奔向炮兵阵地，履带碾断了连接榴弹炮阵地与步兵阵地的野战电话线。无线电台又由于受潮发生故障而无法使用，只能靠吉普车上的电台进行联系。4 辆一组的坦克接连不断地驶来，美军的任何火力都无法阻挡。到上午 9 时，已有 33 辆坦克越过步兵阵地，它们的火力毙伤美军 20 人。

到上午 10 时 15 分，最后一辆坦克越过炮兵阵地。至此，总共有 40 辆坦克通过，两小时之后，史密斯认识到，他的处境岌岌可危，固守阵地的结果将使他的士兵必死无疑。他后来说：“当时已是毫无希望，伤亡惨重，联络中断，缺乏交通工具，弹药耗尽，北朝鲜人的坦克就在背后。在这种情况下，我面临抉择，何去何从？是与阵地共存亡，还是设法带领余部突围？我至多还能坚持 1 个小时，然后就会全军覆没。我选择了突围，希望保全性命，来日再战。”

初步交手，史密斯特遣队差点全军覆没。

二、“山姆大叔”真刀实枪地干了

从6月25日星期日朝鲜内战爆发到6月30日星期五,短短的6天时间,美国采取了三大步骤。

第一,对朝鲜人民军实施海陆空袭击,直接支援南朝鲜李承晚部队作战。

第二,对朝鲜北部地区实施空袭。

第三,美军向战场投入地面作战部队。

杜鲁门宣布出兵朝鲜,使朝鲜内战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引起全世界的震惊。杜鲁门之所以这样做,是符合美国的世界战略的,他要把朝鲜战场作为推行美国新的世界战略的典型地区。

美国曾预测,到1954年,美国和苏联在核武器方面将形成僵持局面。而苏联人和中国人拥有巨大的常规兵力优势,并可随时使用。特别是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根本的胜利,使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遏制社会主义的发展,美国有3种选择:

(1)坐观世界各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美国退缩。

(2)向苏联发动一次核和常规结合的袭击,打击“共产党势力的根据地。”这冒险性极大。

(3)加强美国和西方的军事力量。遏制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第三种是最明智和可行的选择。美国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全速加强西方防务,加强美国和西方军事实力,特别是能够遏制向美国和西方发动进攻的军事力量。要建立一个国际社会,把同盟国和它以前附属国包括大小不一、自然资源不一、军事潜力不一的国家在内,并使之强大。实质是结成全球性的军事联盟体系。通过“冷战”来加速社会主义制度的衰败。为此,美国要担当起领导“自由世界”的责任。必要时亲自派兵,担当世界警察或宪兵,甚至不惜打一场“热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反对战争再起,反对制造紧张局势,反对扩大军队,要求医治战争创伤。美国人民普遍要求复员,要求缩减军备,国会也一直反对增加军事预算。为此,美国各界不少人反对美国推行遏制战略,但是也有坚决支持杜鲁门的世界战略的。

当得知美国出兵得到联合国的支持时,杜鲁门哈哈大笑,高兴地说:“现在大家都明白朝鲜的战略地位,都说山姆大叔该真枪实弹地去干了,这好么。要赶快召集国会领袖开会,设法迅速落实出兵朝鲜的措施。我们多年没打仗了,要加快准备。”

对于杜鲁门积极出兵朝鲜的动机,美国人约瑟夫·格登在他所著的《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一书中有中肯的分析:

“朝鲜战争——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事和外交战略的转折点,它标志着美国第一次试图通过诉诸武力来阻止共产主义军事扩张的冒险行动,而且是这类冒险行动的漫长路上的第一步。果不其然,就在朝鲜战争的刚开始两个月,美国就给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送去了第一批军事援助,以资助其与当地的起义者作战;后来这场起义演变成了越南战争。无论结果如何,美国在以后的10年中,把国家的资源,加上声望名誉,越来越多地投到东南亚、欧洲、非洲、拉丁美洲。这就是美国企图以强大军事力量来主宰世界的开端;为了保持这种力量,即使在‘和平年代’里,也要消耗美国联邦政府年度预算的一半,并使美国的无数儿女在世界最遥远的地方枕戈待旦。”

美国共和党称这是“本世纪对外政策的妄动蠢举”。有人称，“杜鲁门和艾奇逊是一对最不可思议的政治搭档，他们先行动起来，以后再论后果，就这样鲁莽轻率地作出了重大决策，把美国拖进了朝鲜战争。”

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美国指挥下的统一司令部使用参加干涉朝鲜的各国部队，由美国指派指挥这些部队的司令官，并授权该司令部使用联合国的旗帜。

7月7日，杜鲁门下达全国征兵令。

7月8日，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7月22日，美国派进朝鲜的兵力已达到与北朝鲜势均力敌的水平，双方兵力均约为10万人。美第8集团军已在一线部署了三个美国师，即第1骑兵师、步兵第24师、步兵第25师。美第1骑兵师是美国的王牌部队，在美军历史上屡建战功。另一个拥有2000人的美国海军陆战旅和英国旅正开赴战场。

美军进入朝鲜之初的战局是，北朝鲜军队一味地向前压，“联合国军”忙于固守釜山防御圈。因此，北朝鲜军队的后勤供应线，随着战线的南移而延伸，已长达300公里。而且，在美军的封锁下，当初计划的海上输送已不可能，所以不得不全部依赖陆上交通。可是，朝鲜半岛的交通网，在汉城形成蜂腰部，从平壤运出的补给品，和在清津、元山卸船的补给品都必须通过汉城。因此，汉江桥就成了美国空军的重要目标。结果是炸了再修，修了再炸。

美军掌握制空权，对战争的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将军回忆说：“釜山防御圈的固守成功，多亏了海空军的支援。”据美国军方披露，1950年7月，“直接支援”出动飞机为4346架次。而8月增加到7028架次，9月为6219架次。对每个师出动支援飞机的架次，比在誉为世纪大战役的诺曼底登陆作战中，布雷德利集团军的各师所得到的支援飞机架次还多。7月30日，美第5航空队拥有战斗机890架，其中F—80喷气战斗机626架，F—51野马式战斗机264架。

美国空军直接支援效果最显著的是对北朝鲜坦克的攻击。驾驶员通常使用130毫米火箭弹，根据他们的报告，用火箭弹击毁的坦克数相当于用凝固汽油弹烧毁的10倍。B—29和B—26等战略轰炸机从7月30日至9月19日共投下1761吨炸弹，基本上摧毁了北朝鲜的军工生产机构。

8月29日，英军第27旅登陆。8月30日，美军独立第五师团登陆。

从9月10日起，“联合国军”以飞机和坦克为前导，开始转入反攻。

三、战争就是赌博

麦克阿瑟不愧为美军五星上将，他对北朝鲜的反击，从 9 月 15 日成功地在仁川登陆开始，取得了出奇制胜的效果。

仁川登陆是麦克阿瑟得心应手的军事杰作之一。还在 6 月份，当他访问朝鲜并察觉到南朝鲜军队在全国撤退而有效的美国援军尚未到达时，就开始琢磨这次登陆了。他认识到，人民军向朝鲜半岛南部挺进，补给线拉长到危险程度，打击其后方，将使美国以较少的部队包围并消灭对方主力部队，置对方于腹背受敌的境地。

麦克阿瑟实施登陆作战的构思，曾考虑过登陆点选在元山、群山和仁川三个地方，但最终选定在仁川。

仁川登陆计划一出现，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就炸开了锅。仁川港条件之恶劣是军官们深为发怵的，通向港口的海上通道是条海流速度很高的狭窄海峡，经过之处遍布礁石和浅滩，潮水涨落范围大，落潮时，港口就变为一大片泥滩。

7 月 10 日，麦克阿瑟指派参谋人员拟定一项“兰心行动”计划。有人反对说，两栖登陆不同于把一些船只驶进一个港口，然后登上码头。如果缺乏充分准备，美军会尸横滩头。

7 月 21 日，麦克阿瑟的参谋人员又提出了一个称为“铬铁矿行动”的计划。许多人怀疑它的可行性。

这场争论从 7 月继续到 8 月。

8 月 23 日下午，美国军界首脑在第一大厦六层会议室开会，这是朝鲜内战爆发以来美国最为壮观的一次高级军官会议。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有谢尔曼海军上将、柯林斯将军、空军副参谋长伊德沃尔、爱德华兹将军，代表海军的有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特纳·乔伊海军上将和多伊尔海军上将。麦克阿瑟方面的人有阿尔蒙德将军、多伊尔·希基将军、克拉克·拉夫纳将军、埃德温·怀特将军。

柯林斯对在面对优势之敌的分散使用的地面部队的作法表示担心。多伊尔海军上将详述了海军的顾虑，其中包括登陆的航行危险。

麦克阿瑟抽着他那时刻不离开的玉米芯烟斗，听他们把意见讲完，然后以不容置疑的语调说：“你们提出了有关登陆行不通的种种论据，然而恰恰是这些论据有助于我做到攻其不备。因为敌方指挥官会认为，没有人敢贸然作这些尝试。”

8 月 30 日，麦克阿瑟将仁川登陆作战计划报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后，又急忙在远东司令部分发了仁川登陆作战计划，并告诉华盛顿，他将派特使把计划和作战命令副本以及有关文件于 9 月 11 日送交参谋长联席会议。

这个被称为“作战计划（50—9.50108 号）”的计划包括美军登陆作战的指导思想、组织实施、指挥关系和各种保障，共有一个主件和 13 个附件，定为绝密级军事行动计划。

9 月 7 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发电说，他们支持尽可能早地实施登陆作战。

9 月 9 日深夜，麦克阿瑟派人动身前往华盛顿，把作战计划和其他文件共 11 卷，重 35 磅的文件带到五角大楼。

9 月 13 日，麦克阿瑟对指挥部的参谋人员说：“如果说仁川登陆是个大

赌注，我认为这是往盒子里投 5 个美元，然后打开将捞到 5 万美元。5 个美元就是仁川登陆。这个巨大的赌博，就是华盛顿将美军投向亚洲大陆的决策。”

9 月 15 日凌晨，美军由 19 艘舰只组成的舰队，以旗舰“麦金利山号”为首，下辖巡洋舰、驱逐舰和三艘火箭发射船，在夜幕的掩护下，偷偷驶往飞鱼峡的航道，巡洋舰、驱逐舰和火箭发射船进入发射阵地，瞄准月尾岛及其他目标。

麦克阿瑟穿过一堆头戴铜盔，身着救生衣，配戴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服饰的将军服，登上“麦金利山号”的舰桥观战。和往常一样，麦克阿瑟戴着那顶汗渍斑斑的军帽。海军军官出于对他的高级官阶的尊重，让他坐在舰桥上海军上将的椅子上。

凌晨 5 时，美舰开始火力准备，将约 2800 余发炮弹倾泻到月尾岛，接着又发射了 1000 发火箭弹，美军飞机又用机关炮、火箭和炸弹袭击月尾岛。

6 时整，美海军陆战队发起进攻。上午 8 时，美海军陆战队攻占通往仁川的咽喉要地月尾岛。下午 5 时许，陆战队向仁川港发起主攻，遭到人民军顽强抗击，损失惨重。但因人民军兵力不足，美军登上仁川海岸。黑夜来临时，大约 1.8 万美军登上仁川港岸边滩头。

这时，仁川港湾，大量美军军舰在游动。一批批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向码头运动、集结。美军士兵伴随着嘈杂的咒骂声，从运输舰上卸下火炮、坦克以及各种装备。

旗舰“麦金利山号”在几艘护卫舰的保护下，驶近仁川港。坐在椅子上的麦克阿瑟，身着棕色飞行装，胸前缀着两排显赫的勋表，鼻梁上架着一副大得出奇的墨镜，手中的烟斗不时地送到嘴边用力吸着，发出丝丝的声响，缕缕青烟向四外飘散。脸上浮现着得意的表情，一双隐没在墨镜后面的眼睛，注视着仁川港湾。那里的登陆战已经接近尾声……

港湾附近的舰载轰炸机频繁地起落着，一批批向着汉城方向飞去。

舰炮的射击逐渐稀落，更多的登陆艇运送着陆战队蚂蚁般拥上岸去。

美海军特遣队司令多伊尔海军上将快步跑上前，向麦克阿瑟送上一份电报，转身退在一旁。

电报称：“仁川港已全部占领，主力正在集结。”

美第 10 军军长阿尔蒙德少将兴奋他说：“打开仁川这扇大门，明天我们就可以在汉城为将军祝酒了。”

麦克阿瑟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站起身来说道：“不，将军，到新义州喝也不迟，那不更有味吗！”同时伸手接过惠特尼送过来的望远镜，向仁川方向观察。

惠特尼走近麦克阿瑟，声音不大地说：“危险是很大的，但我们成功了。”麦克阿瑟点头，表示同意。

阿尔蒙德说：“祝贺将军的成功，您的勇气为我们带来了好运。”

麦克阿瑟说：“有人说这次登陆作战是‘冒险行动’。我认为战争，可以说就是赌博。三分可能，加上七分冒险，这就是我在战争中创造奇迹的公式。运用这个公式的唯一秘诀，就是冷静的头脑，加上百倍的勇气。”

惠特尼说：“登陆成功，迅速北进的态势已经形成，不过华盛顿方面疑虑重重，他们担心中共和苏俄会实施武装干涉，局势会复杂起来。”

麦克阿瑟的脸立即阴沉下来，愤愤地说：

“如果中国人真的进行干涉，那么我们的空军就会使鸭绿江血流成河。中共不会那么冒险，不要庸人自扰！”同时把手中的望远镜递给秘书哈特中校，转身对着大家继续说：

“我不相信中共的国际主义。中共虚张声势的宣传，只能使华盛顿那些神经脆弱的先生们睡不着觉，对于我们军人来说，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就是一切。”

麦克阿瑟赌赢了，仁川以比较轻微的伤亡被攻克。他开始考虑不仅要夺取南朝鲜首都汉城，而且要横扫整个朝鲜半岛，把北朝鲜军队困在南方。

9月27日，“联合国”攻克汉城。麦克阿瑟赌赢了一次大赌注，他认为这是他战胜美军内部反对者的胜利，和战场的胜利加在一起，是一次双重胜利，他要“凯旋”入城。

两天后，即9月29日，一架轻型海军飞机徐徐降落在金浦机场。空旷的机场四周是被炮火摧毁和烧焦了的树林，一些地方还在冒着缕缕青烟。

麦克阿瑟和他的随员们走下飞机，立即登上早已准备好的五星小轿车，在警卫车的护送下，向汉城方向驰去。

在汉城李承晚政府大厦前，李承晚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看到热烈欢迎的场面，麦克阿瑟轻声风趣地对他的秘书说：

“胜利者是爷爷，失败者是孙子。我们现在受宠了。”

环视着发狂般的人群，麦克阿瑟傲然站在话筒前，说道：

“我高兴地把汉城重新交给你，总统先生（向李承晚挥手致意），我热切地希望，仁慈的上帝将给你和你的韩国政府所有官员们以智慧和力量。我建议，我们大家一起朗诵‘上帝的祈祷’”。

随后，麦克阿瑟在李承晚及其要员的陪同下走进一个大厅，排列整齐的餐桌上已摆好了美酒佳肴。

麦克阿瑟在李承晚及其要员的陪同下走进大厅。

麦克阿瑟说：“在战地有如此丰盛的晚餐，感谢总统的盛情。”

晚宴正在进行时，惠特尼将一封电报递到麦克阿瑟手中，并耳语说：“总统贺电，宣读吧。”

麦克阿瑟挥了挥手说：“好”。把电报又交给了惠特尼。

惠特尼：“现在我来宣读总统发来的贺电：“在世界军事史上没有任何军事行动可以与你们空间换取的时间延迟行动相比拟。你们切断了北朝鲜军队的退路，敌军正在溃退，你们取得了胜利，我向你们致敬。”

一阵乱哄哄的掌声和嗡嗡声之后，惠特尼高声喊叫：

“请诸位安静。”然后又从衣袋里取出一封电报，高声说道：

“英国朋友也发来了贺电，他们认为仁川的胜利超越了诺曼底登陆，是个奇迹，指挥果断，战绩辉煌。”

李承晚走过来请麦克阿瑟讲话。

麦克阿瑟微微点头，从嘴边取下烟斗，微微的摇动了几下，开口道：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仁川登陆和收复汉城算不上什么伟大胜利，只是个序幕，更辉煌的胜利还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军人的追求，莫过于打败我们的对手，我们的信念是挥动战刀获取荣誉。朝鲜的三八线，不应当有任何的约束力。上帝赋予我们的使命就是战斗和胜利。”

麦克阿瑟挥师北上，越过三八线。

中国政府发出警告，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出兵参战。然而，麦克阿

瑟执迷不悟，无视中国政府的警告。

1950年10月15日，杜鲁门偕同一批高级军政官员，从华盛顿飞到太平洋中部的威克岛，同麦克阿瑟举行秘密会议，主要议题是两个：一是决定美军在朝鲜作战的“最后阶段”应采取什么战略。二是研究中国出兵的参战的可能性。会议的结论是中国不会参战，授命麦克阿瑟加紧进攻，结束朝鲜战争。

威克岛会议之后，“联合国军”加快了进攻速度。10月19日占领平壤，并继续向北推进。在此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中美两国军队开始了现代历史上第一次交锋。

四、血腥大溃退

正当麦克阿瑟以傲慢情绪鼓吹胜利在望的时候，北朝鲜地面开始神奇地出现大量中国军队。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首次出战就狠狠打击了孤军深入的美军和南朝鲜军队。

美军和南朝鲜军北进途中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突然打击，西线从鸭绿江退到清川江以南，东线受阻于长津湖以南。赶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彻底破产了。这一出乎意料的情况，使得美军及派兵参战的英法等国惴惴不安。

杜鲁门及麦克阿瑟和他手下的指挥官们如堕云雾之中：在北朝鲜究竟有多少中国军队？这次出兵干涉是麦克阿瑟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为了挽救溃不成军的北朝鲜军队，保住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呢？还是说，他是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前奏？

麦克阿瑟被过于自信的乐观情绪所蒙蔽，凭借他手里既不充分也欠准确的情报，他迟迟摸不准中国军队的数量。11月1日的情报估计，在北朝鲜的中国军队有6万人。而实际上的人数是18万人左右。

麦克阿瑟一如既往，大言不惭地宣称：“中国人从满洲那得天独厚的庇护所渡过鸭绿江进行的攻击是有史以来最粗暴地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之一。”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受命摧毁鸭绿江上连接新义州和丹东的两座桥梁。麦克阿瑟认为，补给品是通过两座桥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朝鲜的中国军队的。

这道命令加速了麦克阿瑟同他的华盛顿上司之间的又一场意志较量。当政府获悉麦克阿瑟给斯特拉特迈耶下的炸桥命令后，就下令撤销这道命令并禁止在边境五英里范围内进行任何轰炸袭击。这引起了麦克阿瑟的强烈反对，他大发雷霆说：“桥上的运输使我统率的部队遭到全军覆灭的危险。”

华盛顿让步了。11月8日，鸭绿江两岸的桥梁和城镇受到79架B—29飞机和300架战斗轰炸机的空袭。

在此期间，麦克阿瑟开头沉着自信，告诫说在情况没有全面了解清楚以前不要草率作出判断。可是到了11月6日，他又敲钟报警，宣称大批的中国军队涌入朝鲜，其势锐不可挡，到了11月9日，他又重新树立信心，表示要遏制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增援并一举歼灭之。

麦克阿瑟马上想向鸭绿江发动一场新的攻势。对此沃克未敢苟同。

麦克阿瑟催促沃克于11月15日发动进攻，沃克把这道命令给顶了回去，因为直到11月20日后，后勤供给部队才能每日交付4000吨物资，而这是发动进攻最起码要具备的条件。

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美军由进攻转入大溃退，麦克阿瑟发动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变成了圣诞节总退却。消息传到了华盛顿，美国朝野震惊，杜鲁门总统忧心忡忡。华盛顿开始认识到麦克阿瑟给美国军队带来的巨大灾难。

麦克阿瑟也在一封电报中承认攻势失败，他抱怨说：“委派给他的部队的任务已经超出了其能力。目前，由于鸭绿江封冻，中国人开辟了越来越多的增援和补给通道，这使我们的空中力量无法实施封锁。显然，我们目前的军力不足以应付中国人的这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天时地利对他们更为有利。由此而产生的形势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局面，这种局面扩大了从全世界范

围来考虑问题的可能性，超出了本地战区司令的决定权限的范围。本司令部已在其职权范围内作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但它目前所面临的局势却超出了它的控制和力量。”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将军收到前方的电报后，立即打电话给杜鲁门报告说：“前方遭到灾难性的失败，中国人已经把两只脚都踏进来了！”

杜鲁门接到电话后，立即在当天召开国家安全特别会议，布雷德利首先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局势严重，而且还要继续发展。当前，他主要担忧的是“共产党可能要充分使用他们的空中力量。”

国防部长马歇尔警告说，美国无论是单独的，或是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成员，都不应卷入与共产党中国的全面战争，“否则就会陷入苏联人精心布置的陷阱之中。”他说美国必须和联合国一致行动来解决朝鲜问题。他要总统注意“国内倒有一些人主张采取全面行动反对中国。”

布雷德利说：“这也反映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看法。如果我们让自己卷入对中国的一场大战，那末我们在欧洲的兵力就不能继续壮大。”

对于美军的惨败，美国舆论界惊呼：这是一项“美国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美国政府内部的互相埋怨和攻讦更加激烈，矛盾尖锐。麦克阿瑟、艾奇逊、杜鲁门成了众矢之的。有人说麦克阿瑟被仁川登陆的胜利冲昏了头脑，错误地估计中共的兵力和意图，发动总攻势过于轻率，指挥笨拙，“一个由于事实与情况的混乱而造成这样严重错误的总司令部的军事能力”，“愈来愈难以信任”，要求撤掉麦克阿瑟的职务。有人直接抨击美国当局的政策，说美国的政策是干“有勇无谋的事，然后这正是我国政策一直趋向的方向，这种政策是自杀政策”，“今天我们所陷入的一场战争，正是我们永远不能打胜的战争。美国参众两院还以举手投票的方式，以绝对多数通过决议，要求“彻底打扫国务院”，要求撤换艾奇逊。当杜鲁门不得不亲自出马为艾奇逊辩护时，又有人建议干脆连杜鲁门一起撤。美国的主要盟国忧虑加深，他们深怕把力量陷在朝鲜战争的泥潭里，使美国在欧洲的力量受到削弱，要求美国政府作出“朝鲜事件不至于把世界搅进一场大战”的保证。

怎样才能摆脱被动局面呢？是撤出朝鲜还是下决心在朝鲜坚守，杜鲁门面临抉择。

11月30日，杜鲁门举行记者招待会，在宣读完事先准备好的声明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一时不慎”引发了对核武器的讨论，触及了欧洲盟国以及很多美国人最为敏感的神经。

记者：“总统先生，您对朝鲜的事态打算如何应付？”

杜鲁门：“同以往一样，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以应付军事局势。”

记者：“这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

杜鲁门：“这包括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

记者：“总统先生，您说的‘包括所有的武器’是否意味着正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

杜鲁门：“我们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原子弹，可是我不希望看到使用原子弹，它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不应用来对付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可是原子弹一经使用，这种情况就无法避免了。”

记者招待会结束后，记者们纷纷离去。几分钟后，合众社就播发了下列新闻：“杜鲁门总统今天说，美国已在考虑同朝鲜战争相联系的使用原子弹

问题。”美联社播发的新闻是：“杜鲁门总统今天说，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对付中国共产党人，如果有必要采取这一步骤的话。”

人们为就要遭受原子弹袭击而感到惶惶不安，谴责的矛头集中指向华盛顿。因此，杜鲁门总统正式声明“不使用原子弹”，舆论才大体上平静下来。

12月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收复平壤。

12月16日，西线美军全部撤至三八线以南。

12月23日，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在败逃的路上因车祸身亡。沃尔顿·沃克在美国陆军中素有最优秀将军之一的盛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师长、军长，以凶猛强悍出名。他除了佩戴一支0.45口径自动步枪外，还携带一支连发手枪，坐着吉普车在战场上到处奔走。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曾为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作出过有益的贡献。乔治·巴顿将军常称他为“我那个最棒的杂种小子”。但是这样一位反法西斯英雄，却死在朝鲜战场上，令人悲叹。

五、麦克阿瑟走向败将之路

面对日益恶化的朝鲜战局，杜鲁门于12月15日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加快了预备役部队的动员，并通过第四次追加军费来执行重新武装的计划。由于杜鲁门手中仅有一个可以随时投入战斗的战略预备队师，所以无法给麦克阿瑟增加多少部队，而只能对损失的部队进行补充。此外，杜鲁门还发现，他的盟国尤其是英国不愿把战争扩大到中国。联合国虽然决定继续打下去，但已回到了原来的战争目标，即维持一个自由的南朝鲜，这一决定是麦克阿瑟无法接受的。

尽管麦克阿瑟对形势作了悲观的预测，美国第8集团军终于在1951年1月稳住了“三八线以南的战线。在新的指挥官马修·李奇微的指挥下，第8集团军重整了旗鼓。不久以后，李奇微手下有了一支真正的国际部队，它由来自英国、土耳其、希腊、哥伦比亚、菲律宾、埃塞俄比亚、法国、荷兰和泰国的职业军队所组成。由于遭到联合国军的空中打击，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供应线遭到很大破坏，一时难以组织大规模进攻。

针对杜鲁门的“在朝鲜进行有限的战争”的政策，麦克阿瑟深表不满，他不甘心败在中国人手里，便对政府施加压力，他表示“为夺取胜利可以不择手段”。

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之间矛盾激化，杜鲁门考虑必须对麦克阿瑟采取坚决措施。他已感到作为美国总统已不能对战场指挥官行使职权，他的权威受到了挑战。

1951年4月11日下午，美国首都白宫总统办公室。

杜鲁门拿着一封信阅读，随手拿起电话筒，按了一下键盘，接通了布莱德雷的电话：“请到我办公室来。”

布莱德雷走进总统办公室，杜鲁门立即把一封麦克阿瑟的信交给布莱德雷，气愤地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猛回转身指着布莱德雷手中的那封信，极其严肃地说：“这是一颗政治炸弹。我决不能容忍他这种放肆行为，一再违背最高统帅的意志，我行我素，把形势弄得一团糟。”

布莱德雷看了信中的内容后说：“麦克阿瑟太固执，等于违抗命令。他坚持要扩大战争，要用国民党军队。他说什么亚洲输给共产主义，欧洲也就完蛋。这是在鼓吹亚洲第一，现在每个月美国人在朝鲜都要伤亡600多人，要扩大战争美国将落入深渊。不能让他再干下去了。”

杜鲁门说：“朝鲜问题只靠军事手段已无法解决，我认为我们那位‘可爱的英雄’该休息一下了，他太累了！”

布莱德雷说：“主要盟国已经动摇，看来谈判停战已势在必行。”

杜鲁门说：“得先去掉这个捣蛋鬼。”

布莱德雷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意见，应撤掉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该下决心了，总统先生。”随后送上撤掉麦克阿瑟的书面命令。

这时，艾奇逊走进总统办公室，对总统说：

“我们需要一位可以信赖的战场司令官，麦克阿瑟应该滚蛋。马歇尔和哈里曼都和我看法一致。”

杜鲁门立即在命令上签字，然后交给艾奇逊说：“那么谁来接替麦克阿瑟呢？”

布莱德雷说，他和柯林斯已经推荐李奇微为接替这一职务的必然人选。

他们认为，詹姆斯·范佛里特将军应接任第8集团军司令官。杜鲁门对这两个人选表示赞同。

次日下午3时，杜鲁门同意让当时呆在朝鲜的国防部长佩斯立即回到东京，当面向麦克阿瑟转达解职命令的建议。这样做，可以使得麦克阿瑟避免由军方渠道直接传达命令而带来的难堪，让穆乔大使转给佩斯的第8743号电报已经拟好，并拍发出去了。

不凑巧的是，《芝加哥论坛报》驻远东电台的一位记者给该报社拍回电报，说根据权威渠道的秘密消息，麦克阿瑟将要被解职。艾奇逊对《芝加哥论坛报》得到秘密消息一事不以为然，但是布莱德雷等人却对此事极为关注，担心麦克阿瑟会对杜鲁门反击，并提出辞职。他们决定立即向麦克阿瑟传达这一项命令，同时决定于星期一凌晨1时召开记者招待会。

4月11日下午，美国新闻广播播放撤掉麦克阿瑟职务的消息时，麦克阿瑟正在日本。

这时，在美国驻日本东京大使馆内的客厅里，麦克阿瑟同夫人正在请两位美国客人吃饭，一位是华盛顿州的麦钮逊参议员，另一位是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斯特恩士。他们正在进行平静而愉快的交谈。

突然，麦克阿瑟的夫人珍妮从她丈夫的肩侧看到门口一人走进厅内，这是麦克阿瑟的随员哈夫上校，他满脸痛苦的表情说明似乎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珍妮起身走到哈夫面前，哈夫简短而迅速地低声说：“我从收音机中听到司令被免职了……”

“啊？！”麦克阿瑟的夫人被这突然来临的坏消息弄得惊慌失措，但她还是克制着自己，走到麦克阿瑟身旁，用手轻轻放在麦克阿瑟的肩上。麦克阿瑟这时正为客人的一句话而放声大笑。麦克阿瑟回过头来，珍妮俯身把消息告诉他，声音之低，对面的客人都无法听到。

麦克阿瑟的脸阴沉起来，毫无表情。他的客人们不知出了什么事，都停下来看着麦克阿瑟，麦克阿瑟沉默得像尊石像。他抬起头来望着夫人，用大家都能听得到的声音，温和地对夫人说：“珍妮，别难过，这也是好事，我们终于回家了。”

两位客人告退，麦克阿瑟不失礼貌地送走了客人。

哈夫上校走进室内，呈给麦克阿瑟一封电文，麦克阿瑟接过阅读。

“我深感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尽我作为总统和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之职，撤销你盟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美军总司令和远东美军陆军总司令的职务。

你的指挥权将交给马修·B·李奇微中将，立即生效。”

杜鲁门接着，大使馆工作人员将一份白宫发布的新闻记录送交麦克阿瑟。上写内容为：

“我深表遗憾地宣布，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已不能在涉及他所担任职责的问题上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政府和联合国的政策。根据美国宪法赋予我的特殊责任和联合国赋予我的责任，我决定变更远东的指挥。因此，我解除了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权，并任命马修·B·李奇微中将为他的继任者。

对有关国家政策进行的全面而激烈的辩论是我们自由民主宪法制度的至关重要的因素。然而，军事指挥官们必须按照我们的法律和宪法规定的方式服从颁发给他们的政策和命令，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在危机时，这一因素

尤其不能忽视。”

麦克阿瑟苦恼地走进卧室，他已支持不下去了。

李奇微求见，勤务兵把他领进客厅，然后去向麦克阿瑟报告：“李奇微将军求见。”麦克阿瑟正在脱上衣，听到报告，他气恼地一挥手说：“等候。”

过了好一阵，李奇微等得不耐烦了，麦克阿瑟才以十分镇静的表情，缓步走进客厅，笑容可掬地向李奇微打招呼：“老朋友，请坐。”

李奇微说：“我奉命前来报到，希望得到您最诚恳的忠告。在西点军校您是我的校长，现在您依然是我的尊师，我需要您在战场上的帮助。”

麦克阿瑟说：“我无能为力，要根本扭转朝鲜战场的败局，我认为必须突破杜鲁门政府的限制，接受我的建议。”

麦克阿瑟最后说：“听医生说，总统患了恶性高血压症，脑子糊涂了。悲剧，听说他活不到6个月。”

李奇微一言不发，他静静地听着麦克阿瑟在发泄私愤，他知道社鲁门身体健康。麦克阿瑟最后收场时，为了缓和气愤，提醒他的学生说：“对付中国人要特别小心，不能大意，他们是打仗的高手，地面作战优势在他们那里。”

六、一场大骗局

1951年5月2日至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再次坐下来对美国在朝鲜所追求的政治和军事目标进行研究，向杜鲁门提出了在恢复战前状态的三八线上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以达到结束朝鲜战争的政策建议。

5月17日，杜鲁门迅速批准了这项建议。杜鲁门认为，美国的主要敌人是苏联，只要这个敌人还没有卷入战场而在幕后操纵，美国就决不能在朝鲜浪费自己的力量。

美国《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一书说，1951年4月，麦克阿瑟被撤销总司令职务后，朝鲜战场上的美军企图获胜的信心大大减少了。经费开支越来越高，联合国军的冒险行动越来越多。这促使美国领导的思想开始转变，考虑同共产党人进行谈判的问题。朝鲜停战似乎会给美国带来美好的希望和前途，能使美国取消在朝鲜战场承担的义务，从而平衡美国的对外军援，有利于加强欧洲的防务和重建美国国内的战略预备队。

美国现役陆军共有18个正规师，投入朝鲜战场即达7个半师，占陆军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在美国国内仅剩6个半师。美国战略重点在欧洲，要再往朝鲜增兵很困难。其他国家从各自利益考虑，更不愿意再往朝鲜增兵。而对步兵占巨大优势的中朝军队，也无力再像战争初期那样发动进攻了。

而且，美国在朝鲜战场上连遭失败。一年中美军损失了10万余人，耗资达100亿美元。这两项损耗都比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头一年的损耗多一倍。1951年度美国军费增加到600亿美元，平均使每一个美国人负担307美元，加重了美国人民的经济负担，引起美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反战情绪日益高涨。

美国首脑开始考虑：朝鲜事态的发展，同介入这场战争的原来的目的离得太远。为推进到鸭绿江而造成10多万人的牺牲，到底是否符合建立统一的朝鲜的政治目的呢？还有，这种政治目的就是不惜冒着发展成力长期战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去追求的目的吗？他们认为，在这场战争中要取得全面胜利，从战争的性质上来看，是不可能的，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止境的战场。在这种无止境的战争中浪费国力，就会失去世界的平衡。总之，美国已为前进不利后退不行的进退维谷的窘境而感到苦恼。

美国应该作出新的抉择。

杜鲁门经过多方考虑，选择了谋求谈判争取结束战争的方案。

1951年7月，双方开始谈判。

谈判桌外硝烟依旧，战事不断，双方战斗中的伤亡人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谈开始时，美国部队的伤亡人数为7.5万人，6个月之后，美国的阵亡人数已超过10万。平均和谈每推迟一个月，美国便要付出4666名伤亡士兵的代价。

比地面部队失利更糟的是，美国空军部队在一次重要空战中失利，而突然面临着朝鲜失去制空权的危险。那天，当他们动用8架B-29轰炸机和大约100架战斗机对北朝鲜正在建设中的南市简易机场进行空袭时，遭到了150架米格式飞机的截击。结果8架轰炸机全部击中。战后美国不得不承认，“几乎在一夜之间中国便成了世界上空军力量中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我们过去所一直依赖的空中优势，现在已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10月23日空战所带来的最大变化是，美国空军部队不得不将白天空袭

改成夜间空袭，这实际上已经意味着承认了中国在空中占据了统治地位。美国终于看到，用于施放原子弹的战略亚音速轰炸机已经过时了。

1951年11月28日，停火协议达成，但以后小规模的战斗一直不断，美国人恼羞成怒。杜鲁门在1952年1月的日记中写道：

我认为，现在的正确办法应是一项限期10天的最后通牒，告诉莫斯科我们准备封锁从朝鲜边界到印度支那的中国海岸，我们准备用各种手段摧毁满洲的每个军事基地。如果还有进一步的干涉，我们将在必要时摧毁任何港口或城市，以实现我们的和平目标。

杜鲁门总统这样焦躁是有理由的，他限制朝鲜战争的政策当时受到共和党人的猛烈抨击，明显削弱了他的政治地位，共和党人一直要求让朝鲜战争打得更积极些。另外，这个“民主”国家对战场人员伤亡的数字比什么都感到揪心。

5个月之后，杜鲁门又一次向苏联官方表示：“现在，你们是愿意结束在朝鲜的行动，还是准备让中国和西伯利亚被摧毁？两者随你们选择，要么你们接受我们公正合理的建议。”

在1952年秋季至1953年春季之间，朝鲜战争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为停火铺平了道路，在1952年的总统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轻而易举地赢得了选举，部分原因就是 he 许诺要找到结束朝鲜战争的方法。艾森豪威尔上台后暗示，他可能使用国民党部队和部署在冲绳岛上可携带核武器的飞机来扩大战争。1952年5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了如果共产党不接受合情合理的和平条件，决定针对中国东北采取海上和空中行动，包括战略上和战术上广泛使用原子弹。其目的是为了造成心理影响，以完全结束战争。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可能也使得苏联的战斗热情有所下降，因为此时其他的苏联领导人要忙于勾心斗角和解决国内问题；从政治上讲，美国的主要问题是说明强硬的李承晚政府接受和平条件，因为李承晚担心被出卖。在美国作出保证增加军事援助、在南朝鲜留驻美军以及同南朝鲜签订共同安全条约之后，李承晚便放松了强硬态度。

1953年7月23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进行了三年之久的朝鲜战争终于划上了句号。精疲力尽的“联合国军如释重负，执行了停火，但他们还是荷枪实弹地守卫在阵地上。”

这场战争本是南北朝鲜都希望有的，他们都互相仇视，其中不乏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政治仇视。从朝鲜战争过去40多年后的今天所公布的资料看，始终没有发现苏联积极参与战争的证据，而美国操纵联合国干预朝鲜的矛头恰恰都是指向苏联的。

难怪有历史学家称朝鲜战争是人类战争史上最大的骗局。“老实说，这是一场军事上的奇灾大祸，”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后来总结说，“这是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七、为两场战争而准备

历史是无情的，历史又常常愚弄人。

50年代初期，东西方两种政治制度对抗的结果是，彼此都把对方当作假想敌。在朝鲜战争开始时，美国要为两场战争而准备，远东发生的真正战争需要迅速增加大批的人力物力，但美国人更担心的是同苏联发生战争。据美国政府的军事、外交和情报顾问们估计，1954年是苏联对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发动全面战争的最佳时机。届时，苏联可能拥有足够的核武器（包括氢弹在内）和运载这些核武器对美国本土发生攻击的飞机。

尽管这只是一种可能，但却足以使美国不能使用核武器去对付苏联对西欧进行的常规攻击，在那里，苏联军队在兵力和武器上占有三比一的优势。即使苏联并不真的发动进攻，这种进攻的威胁也可能迫使大部分欧洲国家采取偏向苏联的中立立场。

杜鲁门接受了关于1954年是“最大危险年”的思想。

事实上当朝鲜战争最初失利时，杜鲁门政府就发誓要重整美国军备，以北约组织为基础发展集体安全联盟，使用核武器和常规力量以加强对苏联的威慑，同时，美国政府又推论，如果威慑失灵，那么同苏联进行的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核武器也许可能引发战争，但却不能结束战争。最终的较量还要回到常规力量上来。

朝鲜战争进行到一半时，美国政府意识到在战争结束后，他还应保持一支更大规模的常备军和预备役部队。于是政府逐渐采取某些应付长期冷战的长远政策。

一直主张实行普遍军训的杜鲁门、马歇尔等人又提出了他们原来的建议，要求实行短期义务现役军训，然后进入强制性预备役。虽然国会于1951年通过了一项《普遍军训与服役法》，但这项法案远远没有提出一项系统的计划。该法案重新确立了普遍强制性义务兵役制度，并将18周岁的人也列入兵役范围。

国会审查了关于实行普遍军训的建议，结果没有通过，随后却在1952年通过了《武装部队预备役法》

在物力上，政府将其战略物资的采购从1946—1950年的10亿美元增加到1950—1953年的70亿美元，根据1950年9月的《国防生产法》，国会规定，如果按正常合同程序不能满足需要，总统有权根据军事需要来安排工业生产。

美国政策制定了为矿产开发提供补助的政策，使美国生产了大量可制造核武器的铀。随着用于核武器研制费用的增加，美国核武器的数量和种类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1951年，美国在埃尼威托克进行了代号为“温室行动”的两次小型热核武器试验，第二年又进行了代号为“常春藤行动”的两次核试验。其中代号为“微型爆破”的一次试验用的是爱德华·特勒设计的实验型热核弹，产生的爆炸力为100万吨当量。第二次试验爆炸了一枚核裂变武器，产生的爆炸力为50万吨当量，这充分显示了美国的核力量。尽管苏联于1953年进行了第一次聚变武器试验，但它在核军备竞争中落后于美国。

在重整军备计划中受益最大的是空军，特别是战略空军，因为它们被作为对苏联的主要威慑力量和在全方位战争中进行打击的进攻力量。在1952年财

政年度中，空军所得的拨款人(206亿美元)比陆军(132亿美元)和海军(126亿美元)要多出三分之一。空军已突破建立70个联队的原定计划，发展到95个联队，并在理论上获准最终可扩大到143个联队。这些联队中的三分之一属于战略空军司令部，它此时已将其所拥有的兵力和飞机数量在2年内翻了一番。

1952年，战略空军司令部的第一种全喷气式轰炸机B—47型投入了使用。为了用好这支庞大的力量，并使苏联难于摧毁，战略空军司令部将其部队分散部署，在美国本土上的基地从19个增加到30个，海外基地也从1个增至11个。由于B—47型轰炸机的航程有限，加之需要有前沿基地来部署加油机，美国又在英国、摩洛哥、西班牙和利比亚建立了海外基地，从而进一步使美国承担起前沿集体防御的义务。

起初，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重点是打击与苏联战争潜力有关的军事目标，到1953年，其任务又包括了打击苏联核力量和武器设施以及对北约构成威胁的空中和地面部队，随着苏联核力量的增长使战略空军司令部需要打击的目标成倍增长，战略空军司令部还需要拥有更多的飞机和原子弹，才能使报复不仅成为一种可靠的威胁，而且也是一种切实可行的作战手段。

美国一份代号为“维斯塔计划”的高级研究报告曾指出：为了保卫欧洲，北约必须拥有1万架战术飞机，其中有些要具有携带核武器的能力，这样就能弥补地面部队的劣势。为此，到1953年空军计划将联队数增加到106个。

为了对付苏联轰炸机的威胁，美国必须发展自己真正的防空系统。1951年，美国空军成立了防空司令部，负责建立一个由截击、高射炮、防空导弹和雷达预警系统组成的统一防空系统。

1952年，杜鲁门又命令空军建立一条横跨北美大陆北端的远程预警雷达线。保卫北约也好，建立空军防空系统也好，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保护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

为了发展战略空军，将其保护伞扩大到欧洲，杜鲁门政府在1950—1952年间做了大量努力，迅速地将北约变成一个坚强的军事联盟。

重整北约军备的目的有5个：一是任命一名美国人为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官，并赋予其为统一的北约力量制订计划的权力；二是将更多的美军派驻欧洲；三是加快对北约国家的军事援助；四是力保卫分隔东、西德的分界线而采取前沿防御战略；五是在西德建立起一支由12个师组成的北约部队，这是一项庞大的安排，就连美国人有时也不赞同实施该计划的方法与时间方面的安排。尽管重新武装德国的问题已使该计划于1953年暂时停止实行，但北约还是经过18个月的紧张努力，完成了计划。

1950年9月—12月，杜鲁门提名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首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因其在二战中立下不朽战功，有崇高的国际威望，由他担任这一职务，欧洲盟国自然热烈欢迎，杜鲁门还表示要将更多的军队派驻欧洲。

向海外派驻更多部队的问题在美国国会内引起了一场争论，共和党人持反对态度，但最终却未能阻止这一计划的实施。1952年2月，美国陆军开始将4个师派驻海外，这就使得驻德国的美国第7集团军增加到6个师。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扩大了对法国驻远东军队的援助，目的之一是要在亚洲进行两线作战，对付共产主义者；另一目的也是为取悦法国以建立一支更大规模的法国驻北约军队，并使法国不要反对重新武装德国。

与此同时，美国对欧洲的政策开始同军事援助紧密结合在一起。1951年，杜鲁门政府制定了《共同安全法》使经济援助与军援脱钩，而且还将负责军事援助的权力交给了一个独立的共同安全处，后来负责军事援助的大权又落入国防部之手，国防部又利用共同防御援助计划来对外交政策施加影响。

1951—1953年，用于共同防御援助计划的费用为200多亿美元。利用这一计划，美国于1951年将希腊和土耳其拉进了北约，又改善了西班牙和南斯拉夫的外交关系。这4个国家都不是军事强国，但他们可以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并构成北约的南翼。

杜鲁门政府组建北约军队的目标在步步增高。1951年9月，大西洋理事会批准了到1954年建立一支43个师的北约军队的计划。

5个月后，北约的这项计划又升级了，根据1952年2月的《里斯本协定》，到1954年北约军队要拥有9000架飞机和90个师，其中半数部队可随时投入战斗，到1953年，北约（不含德国）已部署了25个现役师（其中15个部署在中欧）和5.2万架飞机（部署在约100个机场）。短短两年内，北约军队的实力至少与驻东德的苏军旗鼓相当了。

朝鲜战争标志着1945年以后美国军事政策的转折。它为美国重整军备和北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气候，它还促使美国在亚洲发挥积极的军事作用。现在，亚洲已同欧洲一起成为“自由世界”前沿防御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战争期间和战后不久，美国同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订了共同安全条件。

美国为这场战争共花了大约400亿美元，动用了200多万人开赴战区，这当中有33629人阵亡，20617人死于事故和疾病。虽然按全球的观点看这场战争是有限的，但它波及了北亚大部分地区。

第十二章 美国出兵古巴内幕

- 一、美军人侵古巴本土
- 二、古巴“导弹危机”

一、美国入侵古巴本

古巴共和国的历史充满了曲折和艰难。1511年，西班牙殖民者开始侵入古巴，从而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1868年至1878年古巴人民进行第一次独立战争。1898年美国——西班牙战争后，美国占领了古巴。1901年美国强迫古巴宪法会议把美国议员普拉特提出的“修正案”纳入古巴宪法，规定美国有出兵干涉古巴内政的“权利”。1902年5月20日成立古巴共和国。1903年美国强租古巴海军基地两处（其中关塔那摩基地迄今仍被美国占领）以后，美国分别在1906年、1912年、1917年派兵进驻古巴，干涉古巴内政。1934年5月，美、古缔结条约，美国被迫取消了普拉特“修正案”。1940年至1944年巴蒂斯塔任总统，1952年3月10日，巴蒂斯塔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再次夺取政权，巴蒂斯塔第二次上台后更加变本加厉，解散了国会，取缔各政党和民主团体，残杀爱国志士和进步人士，实行白色恐怖政策，对外积极投靠屈膝于美国。他曾多次露言，美国人是“上帝”，人民则是“刁民”。

巴蒂斯塔政府的残酷统治引起了古巴人民一次又一次的反抗和起义。1953年7月26日，古巴人民第一次发起反抗巴蒂斯塔的起义。100多名古巴爱国青年在贫苦人出身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当时在哈瓦那大学学生、律师、人民党党员）率领下，在圣地亚哥对巴蒂斯塔的蒙卡达兵营发动了突然袭击。青年们手持棍棒、镰刀、土枪冲进兵营，同政府军展开了殊死的短兵搏斗，在最初敌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曾缴获了一部分守军武器并一度占领了兵营。但终于因许多学生不会使用武器和缺乏弹药，在敌人枪炮的轰击和反复冲击下，起义队伍被冲散，最后20多人牺牲，30多人被俘。这是战后古巴人民武装斗争的开始。这次起义虽被巴蒂斯塔反动政府镇压下去，但是，它推动了群众斗争的进一步开展。卡斯特罗在国内成立了名为“七·二六运动”的新的组织。后来卡斯特罗流亡到墨西哥，他又组织一批爱国青年提出了以武装斗争反对暴政的战斗纲领。从1956年底开始，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建立了民族民主反帝阵线，开始了反对巴蒂斯塔的国内战争。

1956年12月，流亡在墨西哥的一批古巴爱国青年组成远征军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率领下，乘“格拉玛”号汽艇，在古巴东部奥连特省的海岸登陆。远征军一上岸，就遭到巴蒂斯塔军队的围剿，经过三天血战，只有12人突出重围，后来，进入马埃斯特腊山区创建了游击运动基地。不久，又以这批起义者为基础，吸收当地居民组建起一支游击队。他们在当地居民的支援下，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在5月底一连打了两个胜仗，粉碎了由美国武器装备的巴蒂斯塔的围剿，站稳了脚跟，士气大振。1957年3月13日，哈瓦那的大学生袭击总统府失败后组成“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进行武装斗争。9月5日，西恩富戈斯也爆发了人民起义。这两次起义，虽然遭到了残酷镇压，但是，参加起义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纷纷参加卡斯特罗领导的游击队，许多政党和派别都积极支持起义。卡斯特罗宣布了《土改宣言》和《农民土地权》法令，在解放区没收所谓的国有土地，分给农民，扩大了武装斗争的社会基础。1957年底至1958年初，游击队发展为有充足武器和良好供应的2000多人的队伍，改编为起义军，马埃斯特腊山区成为联合一切反政府力量的中心。

为了解放全国，起义军积极作战。1958年初，起义军的一部转移到克里

斯塔尔山区，在那里开辟了“第二东方战线”，不久即控制了奥连特省东北部地区。与此同时，在圣地亚哥斯地区又开辟了“第三战线”。同年二月，“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的一个游击小队在努埃维塔斯地区登陆，进入奥连特省西北部的山区开始游击活动。到1958年上半年，起义军活动在奥连特省的地区。其他几个省区也爆发了此伏彼起的武装起义。

1958年下半年，起义军转入反攻，古巴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7月，巴蒂斯塔政府扬言要消灭卡斯特罗等一批“乌合之众”，此次出动1万名配备有飞机、坦克和大炮的军队，向马埃斯特腊山区革命根据地发起“总进攻”，驻关塔那摩基地的美国军队也提供10多架飞机对起义军基地进行轰炸。只装备步枪和冲锋枪的起义军，与优势的敌人展开了艰苦的持久战斗。他们在山村基地实施巧妙机动作战，疲惫敌军，给予敌军一系列歼灭性打击。在当地群众的支援下，经过一个多月的作战，敌人损失惨重。7月底，在圣多明各的战斗中，歼灭了最强大的一股敌军后，起义军转入反攻。

他们首先迫使敌军退却，解放了全部马埃斯特腊山区。这时，卡斯特罗认为，革命如要取得决定性胜利，必须从山上走下来。8月底，起义军的两支部队开出马埃斯特腊山区，虎奥连特省和卡马圭省南部沼泽地。在古巴西部地区展开进攻。他们与在拉斯维利亚省的“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及其他党派的武装部队配合作战，控制了大片地区，加速了军事行动的进程。1959年1月1日，起义军攻克省会圣克拉拉，歼灭了得到20余辆坦克、一列装甲列车和航空兵支援的近3000名政府军。同一天，卡斯特罗指挥的部队占领了东部省会圣地亚哥。巴蒂斯塔慌忙携带3亿美元的财富逃往多米尼加。1月2日起义军的队伍开进哈瓦那。人民革命取得了胜利。

1959年1月3日，在圣地亚哥成立了革命临时政府。由美国回来的乌鲁亚蒂任临时总统，卡斯特罗任武装部队司令。同年2月，卡斯特罗担任总理，7月撤换了乌鲁亚蒂，由多尔蒂科斯担任总统。临时政府主要是以卡斯特罗为首的“7月26日运动”所领导的力量为中心的政权，包括不同倾向的反对巴蒂斯塔的各派系人物。临时政府宣布保证民主自由、实行土地改革和发展工业的政纲，执行反对美国干涉、维护国家独立的政策。

古巴革命的胜利，在美国的“后院”建立了第一个摆脱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在拉美地区燃起了第一颗独立革命的神圣火种。

1961年7月25日，中国的毛泽东应古巴《革命报》的要求，写了对“七·二六”古巴人民武装起义八周年的祝词，祝词中说：“古巴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并且大大地鼓舞了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

1959年1月，古巴人民在卡斯特的领导下，推翻了美国长期扶持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建立了革命临时政府。美国于1月7日承认新政府，其他国家也相继承认。古巴革命胜利后，新政府进行了肃反和镇反。逐步改组国家机器和军事机器，不断削弱敌对势力，加强革命力量。但是，古巴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仍然没有改变。卡斯特罗为了寻求美国的贷款，于同年4月访问美国。他的要求遭到美国的拒绝。在5月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经济委员会会议上，卡斯特罗要求美国给予拉丁美洲国家300亿美元的贷款，10年内还清。但美国政府根本不予理睬，美国的目的是企图在经济上卡古巴的脖子，迫使古巴再度屈服和依赖于美国。

1959年5月，古巴制定了土地改革法令。法令规定，废除大庄园制度，

征收本国和美国大庄园主的土地，废除一切新租让地，并把大批美资企业收归国有。美、古两国关系由此进一步严重恶化。1959年底，美国政府威胁要削减从古巴进口食糖定额。美国是古巴食糖的主要进口国，此时又正值古巴糖大量过剩，世界糖价下跌，这无疑是对卡斯特罗政权的一个极大威胁，卡斯特罗只得寻找新的出路，这也给苏联插足古巴提供了良机。1960年2月苏联副总理米高扬在访问美国、墨西哥后到达古巴，双方签订了第一项贸易和援助协议，苏联同意以当时每磅达3美分的世界市场价格，5年内向古巴购500万吨食糖。此外，古巴还获得1亿美元信用贷款，年息2.5厘，在12年内还清，信贷形式大部分是供给重机器。这项协议使美国大为恐慌。6月，美国国会授权艾森豪威尔总统削减古巴食糖的进口定额：7月7日，美国国会正式砍掉了从古巴进口食糖的定额。

美国不仅企图从经济上搞垮古巴，而且利用武装干涉等手段企图扼杀古巴革命。早在1959年4月，当时任副总统的尼克松就主张招募古巴流亡分子，武装入侵古巴。随后，便在佛罗里达州和多米尼加、尼加拉瓜、危地马拉等国领土上加强组织和训练雇佣军，并连续在加勒比海举行威胁性的军事演习。1960年2月和3月，古巴流亡分子在美国政府操纵下，从佛罗里达州机场驾机起义，一再轰炸古巴首都哈瓦那和甘蔗种植场。这项有计划地招募古巴流亡者进行训练，用于入侵古巴的建议，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提出来的。这一建议被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接受，并在1960年初获得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批准。中央情报局招募古巴流亡者的工作开始于1960年春夏两季，招募到的人被送到危地马拉一个偏僻的山谷，接受美国顾问的训练，由这批古巴流亡者组成的入侵队伍被称力“古巴旅”。代号为二506旅，该旅有4个步兵营、一个摩托化营、一个空降营和一个重武器营，此外，该旅还辖一个坦克连、一个装甲支队和若干辅助分队。入侵时间原定1960年11月进行，但由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下台而延期了。

1961年1月，肯尼迪政府上台后，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和美三军参谋长，向肯尼迪和其他新政府成员详细汇报了入侵古巴的计划——“暴怒行动”。这个计划准备使用由1600名古巴流亡者组成的“古巴旅”，动用C—46运输机8架，C—54运输机6架，B—26轰炸机24架，武装运输船5艘，登陆船3艘，登陆驳船7艘。从西已南海岸的猪湾（吉隆滩）登陆，里应外合，企图推翻卡斯特罗政府。杜勒斯等人强调实施该计划必须赶在当年6月1日以前，理由是：

（一）危地马拉总统伊迪哥拉斯来信说，“古巴旅”在4月以后就不能在危地马拉呆下去了，因为那时雨季一来，训练基地成为一片沼泽地，根本没法训练；

（二）卡斯特罗即将从苏联得到一批喷气式飞机，在6月1日以前就能编入现役，如果那样，将给“古巴旅”登陆造成极大的困难；

（三）现在“古巴旅”斗志高昂，渴望战斗。最后，肯尼迪批准了中央情报局拟定的入侵古巴的计划。

1961年4月10日，美国雇佣军“古巴旅”开始由危地马拉基地乘车前往尼加拉瓜卡贝萨斯港的上船地点。13日，入侵者开始上船。14日黄昏前，由7条小船组成的船队等候在瞳贝萨斯港外。尼加拉瓜独裁者路易斯·索摩查出现在码头上，他对入侵者吼叫着说，“把卡斯特罗的胡子给我拔几根来”。4月17日，“古巴旅”乘船到达古巴南海岸猪湾。在这1600人当中，大约

只有 135 人过去是军人，其他的人是律师、医生、地主和一些农民。平均年龄 29 岁，最大的 61 岁，有几个则不满 16 岁。很多人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有些人甚至连枪都不会打。他们的行动目标直到几天前（14 日）美国顾问才透露：在猪湾占领 3 个滩头阵地，同时由“古巴旅”的伞兵夺取位于古巴本岛和大海之间的萨帕塔大沼泽地上的几个据点。为了配合这次行动，中央情报局还在 4 月 15 日，派 8 名古巴流亡者驾驶美国飞机于登陆前轰炸了古巴 3 个主要飞机场。美国中央情报局本来就看不起古巴的空军，通过这次轰炸，更加相信古巴的空军力量已“完全被摧毁”。实际上，在这次轰炸后，古巴空军还剩下各种作战飞机 10 架，具有一定的实力。后来事实证明，古巴空军在这次作战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美中央情报局还组织突击队，准备在古巴东省发动佯攻，企图扰乱卡斯特罗对猪湾的注意力。

4 月 17 日，1600 名雇佣军入侵者到达猪湾海滩后，夜间 2 时，由美国特种兵编成的潜水破坏人员首先在巴拉尔滩地区登陆。在岸上同古巴一支民兵巡逻队发生遭遇战，5 名古巴民兵英勇战斗，最后全部牺牲。枪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中央情报局原先计划实行战术奇袭的希望破灭了，开始在吉隆滩地区登陆。4 月 17 日晨 6 时，美军雇佣军登陆后又空投了一批伞兵，这些空降兵主要是用以切断由猪湾沿岸经沼泽地通往岛上腹地的道路，以配合旅主力向科隆以及亚瓜拉马斯和奥斯特拉利亚方向推进。雇佣军利用兵力优势，于 17 日中午进至亚瓜拉马斯以南地区，受到古巴武装力量有组织的抵抗。17 日下午，古巴武装力量转入反攻，并开始逐步使敌人退却。17 日晚，美国军舰企图以火力阻止古巴各部队的推进，以改善被迫后退的 2506 旅各营态势。但并未奏效。古巴岸防分队和海军分队在关塔那摩以西等地击退了敌人的袭击，使敌人无法向雇佣军陆上地点运送弹药和装备。古巴国内并没有人响应这次入侵行动。中央情报局曾估计，只要“古巴旅”一登陆，就会有 2500 名参加者，2 万名同情者，至少有占人口总数 25% 的人给予各种形式的支持。这项估计的破产，注定入侵要遭到惨败。

卡斯特罗是 4 月 18 日凌晨 3 点 15 分得知入侵消息的。18 日拂晓古巴武装力量从奥斯特拉利亚、卡瓦东加、西瓜拉马斯地域向敌展开进攻。敌军伤亡惨重，被迫向吉隆滩退却。太阳出来的时候，卡斯特罗命令 6 架 B—26 轰炸机，由一架战斗机护航，炸沉停泊在猪湾的入侵者的船只。上午 9 点 30 分古巴空军的飞机再次轰炸了几艘入侵者的船只，击落了为入侵者进行空中掩护的 4 架 B—26 轰炸机。到 18 日夜，雇佣军几个营已被压迫到拉莫纳、圣布拉斯和吉隆滩三角地区。古巴武装部队在此遇到敌人的激烈抵抗。

4 月 19 日，6 架 B—26 飞机前往轰炸古巴政府的机场，但机场上乌云密布，古巴空军没有受到任何损失。而在猪湾的海滩上，卡斯特罗命令使用苏制 T—34 坦克，密密地排成一行，猛烈轰击入侵者的滩头阵地。入侵者由于没有空中掩护，滩头阵地越来越窄，最后连撤退也来不及了。

为了使入侵者不至于全军覆灭，当天晚上，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中央情报官员理杰德·比斯尔向肯尼迪总统建议，出动美国空军，救出“古巴旅”。肯尼迪采纳了这一建议，命令在加勒比海湾值勤的航空母舰“埃塞克斯”号出动 6 架无标记的喷气式飞机，掩护从尼加拉瓜起飞的 B—26 型轰炸机对古巴的攻击，但不直接参与空中作战和地面轰炸。美国政府这一计划不仅没有挽救“古巴旅”全军覆灭的命运，反而使 4 名美国顾问因此而丧生。19 日 17 时 30 分，古巴军队进行强攻，夺取了武装干涉者

最后一个抵抗据点吉隆滩，被包围的美国雇佣军终于全军覆灭。

卡斯特罗政府用了不到 72 个小时，就彻底粉碎了这次入侵。此后，美国政府立即撤换了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

胜利者的笑，有时也包含着无比的尴尬与难堪。

当然，此时远在哈瓦那的卡斯特罗，就更没有心情做出任何笑容了。美军的“暴怒行动”开始后，他连连收到了自格岛拍来的一封封告急电报。他的弟弟、古巴武装部队司令劳尔·卡斯特罗问他，是否需要派部队增援。他长叹一声说：“不，没有必要了。”

他不能不面对现实，不能让美国人的炮火吞噬更多古巴优秀儿女的生命。

他失去够多的了。3 天的战斗，他派往那个海岛的古巴人被击毙 69 名，击伤 56 名，俘 642 名。而且，他从此失去了一个亲密的盟友和与美国抗衡的战略要地。

他觉得他并没有失败，至少，他还拥有忠于他的 960 万人民。

为了抗击美国的威胁，古巴急需苏联的武器装备。卡斯特罗不得不向苏联求援，赫鲁晓夫趁机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控制古巴，把古巴作为同美国进行政治交易的筹码。1962 年 7 月，赫鲁晓夫采取冒险主义政策，以保卫古巴为名，开始向古巴运送导弹。然而，祸起萧墙。在这一行动开始不久，即在美苏之间引发了一场唇枪舌战、箭拔音张的政治和军事上的争斗。斗争的结果竟是赫鲁晓夫让步妥协，卡斯特罗有苦难言。而肯尼迪则似乎没受到什么伤害。

二、古巴“导弹危机”

1962年夏，一艘美国海军电子侦察船“玛拉”号正在加勒比海巡逻。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从古巴难民口中获悉了古巴港口比较繁忙的情报后而进行的侦察。

电子侦察船的甲板上安装着密密麻麻的天线，驾驶室的下面布置有上间很大的电子情报工作房，里面装有能够检测到无线电及雷达信号的大型接收机，其效能距离甚远。这天，接收机突然从古巴岛附近侦收到一种不寻常的辐射信号，这些被自动记录在磁带上的辐射信号立即送到了华盛顿进行分析和评估。中央情报局的电子战专家在数据处理中心进行专门的技术处理之后，惊讶地发现，这种辐射信号竟是苏联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制导雷达的辐射信号，难道苏联人在古巴部署了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

一个更严密的侦察网撒开了。美国驻巴的情报人员，奉命不断汇报那里的军事设施情况；那些来到佛罗里达州的古巴难民，也不断受到审查和询问。海上巡逻机飞往加勒比海执行电子侦察任务；沿佛罗里达南部海滨架起高灵敏度地面侦察设备，接收天线全部指向古巴，严密侦收古巴与外界所有的无线通讯；U-2高空侦察机在古巴上空进行侦察。

1962年8月29日U-2高空侦察机终于侦察到了苏联在古巴援建的萨姆型地对空导弹发射基地。9月初，美国司法部长、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在办公室里会见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时强调指出：美国政府对于苏联正在频繁运往古巴的军事装备甚为关切。大使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司法部长不必担心，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已指示他要肯尼迪总统放心，决不会在古巴安置地对地导弹或其他进攻性武器。在美国进行总统选举以前的这段期间内，赫鲁晓夫决不会做任何破坏我们两国关系的事情。看来这一次只能理解是一场骗局了。

9月4日下午，肯尼迪总统发出警告：美国不会容忍进攻性武器进入古巴，如果发现苏联把进攻性导弹运进古巴的确实证据，就要发生严重问题。一周后，9月11日，苏联公开否认有采取这种行动的任何意向，苏联不需要把核导弹移入包括古巴在内的苏联国土以外的任何国家。同时，赫鲁晓夫写给肯尼迪一封亲笔信，态度诚恳地说他希望总统放心，苏联决不会把地对地导弹运进古巴。

当时，美国认为萨姆！型导弹还不是进攻性武器，而是防御性武器，因而对苏联的行动捉摸不定。

10月14日清晨，天空晴朗无云，两名空军少校驾驶U—2飞机起飞，前往古巴西部。按照美中央情报局长约翰·麦康下的命令他们将对整个古巴岛屿进行拍照。行程中竟没有遭到苏联萨姆导弹射手的射击，一路平安无事。回来后，他们的底片盒立即送往华盛顿，在五角大楼的分析中心，熟练的专家们开始研究每一张放大的照片。

照片中看不到弹道导弹，然而分析人员却能认出有导弹转运、装配和发射装置。事不宜迟，应该立即报告最高当局予以注意。10月15日下午7点许，情报局长通过热线告诉了国防部副部长查尔帕特里克，另外，给总统的报告将由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乔治·邦迪转呈。

10月16日早晨7点半，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看了那些照片，邦迪在8点钟也看到了。邦迪径直走进总统的卧室，向他报告：“总统先生，现

在根据一些确凿的照片证据，俄国人在古巴已设置了进攻性导弹。”肯尼迪听完报告后，立即召集政府主要成员于上午 11 点 3 刻到内阁会议厅开会。

参加当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简称“执委会”）会议及随后一系列续会的有正、副总统、正、副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长，司法部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等。会议室里，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们向在座的许多高级官员介绍最新情况。他们拿着指示棒，指着地图及照片一一加以说明，其中有一套照片显示了哈瓦那西南方靠近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坎德拉里亚村北部的一个地区。第一张照片显示了 1962 年 8 月这一地区的情况，当时这一地区只是一个平静的农村；第二张照片显示了同一地区，该地区已经有一些帐篷和车辆，可以看到一些新辟的支路，干道改进了；第三张照片，显示一个中程导弹营的装置已安装好了；有一些可容纳四五百人的帐篷，在那条新辟的支路末端，有 7 辆 1000 英里射程导弹的拖车。

耳闻目睹后，与会者不得不相信在古巴的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坎德拉里亚村的一块空地上正在构筑导弹基地。意外的震惊气氛笼罩了整个会议室，谁也没想到苏联会在古巴部署地对地的弹道导弹。在一阵愤慨激动之后，大多数人认为，对导弹基地应采取空中打击。在此后 10 天里美苏围绕着古巴导弹问题进行紧张剧烈的斗争，这就是当时闻名于世的“古巴导弹危机”。

10 月 16 日和 17 日“执委会”会议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主张。一部分人主张实行海军封锁，禁止苏联舰船驶往古巴；一部分人主张采取军事打击，摧毁苏联设在古巴的导弹基地。麦克纳马拉部队是封锁的最坚决的鼓吹者。他说：封锁是一种有限的压力，可根据情况需要而逐步增加起来。不仅如此，它又是一种引人注目而强有力的压力，这种压力能力对方所理解，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控制事态的发展。如果对导弹基地进行空中打击，必然会同古巴和苏联发生直接对抗。

一些主张采取军事打击，反对采取封锁的人指出，封锁实际上搞不掉导弹，甚至也无法使导弹基地停止继续工作。用封锁的方法，充其量只能做到“亡羊补牢”而已。

10 月 17 日“执委会”会议进行中间，麦康出示了当天拍摄的侦察照片，照片上展现了至少有 28 个可以发射中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的建筑基地，据专家们估计这可能是 32 枚射程超过 1000 英里的导弹。这些导弹可在一周内使用，其核弹头的威力比美国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威力大 4 倍，如果从该导弹基地一齐发射出一次导弹，将要死伤 8000 万美国人。此后，美国的高级官员围绕着这些照片提供的新的情况争论开了。

10 月 18 日上午，在肯尼迪总统出席的一次执委会会议上，空军参谋长柯蒂斯·李梅将军力主尽快进行空中打击。

“俄国人会作出怎样的反应？”总统问他。

李梅说，俄国人一点也不会会有什么反应。

“你真的这么想吗？”肯尼迪说，“即使他们在古巴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他们肯定也会在柏林搞点什么名堂。他们不会让我们去轰炸他们的导弹，杀害许多俄国人，而他们一点也不作出反应的。”

会后，总统对其弟弟罗伯特·肯尼迪说：“如果我们听从他们，那么，以后我们就没有一个会活下来对他们说他们错了。”

10 月 18 日下午 5 时，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在白宫谒见肯尼

迪总统。这次遇见是导弹基地被揭露前很久约定的。肯尼迪装作不知道古巴有导弹的情况，按照常规接见大使先生。

葛罗米柯开门见山地说，古巴所需要的是和平共处，古巴对向其他拉美国家输出自己的制度并不感兴趣。古巴像苏联一样，只要和平。美国应该停止对古巴进行威胁。葛罗米柯说，赫鲁晓夫主席指示他转告肯尼迪总统，苏联只是向古巴提供农业和土地开发的援助，使它的人民能够有东西吃，此外，还给他们少量的防御性武器。

肯尼迪总统听了这些话，一笑置之，说，制造不和的不是美国而是苏联。由于他已得到赫鲁晓夫的亲自保证，所以他一直公开表示，不必对古巴采取行动。苏联向古巴提供武器一事，对美国人民正在产生深刻的影响，也是他极其关切的来由。现在，局势变得越来越危险了。

葛罗米柯似乎听出一点弦外之音，又重复一遍说，苏联的唯一目的是“使古巴有饭吃，免得那个国家挨饿”。至于武器问题，苏联只是派了一些专家去训练古巴人掌握某些完全属于“防御性”的武器而已。他接着说，他想强调一下“防御性”这个词儿，这些武器决没有一件会构成对美国的威胁。肯尼迪总统答道，决不应该误解美国的立场，如果苏联在古巴国内放置导弹或进攻性武器，将由此会产生严重后果。

葛罗米柯向他保证，美国不必担心。接着寒暄了一番，葛罗米柯起身道别。

美国的决策机构——“执委会”成员继续在争论、思索、研究、论证，肯尼迪并没有出席所有的执委会会议，部分原因是在未作出正式反应前想要严守秘密，同时他还需要参加各地竞选活动。在总统不出席会议时，讨论得特别活跃。时光在流逝，导弹基地建设在加速，不能再延而不决了。于是，执委会分成小组，分头去草拟各自的建议，最后，让总统裁定。

10月19日，各组计划大纲草拟完成。主张封锁的一组的大纲，列举了采取行动的法律依据，为美洲国家组织召开会议制订一个议事日程，对联合国的作用提出了建议，列出了迫使船舶停航的军事程序，以及最后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动用军事力量。主张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组则提出另外一个大纲，它估计将要受到袭击的地区，提出怎样在联合国维护美国的立场，如何取得拉美国家的支持，并建议给赫鲁晓夫写一封信，使他相信苏联在加勒比、柏林或者世界的其他地区对美国采取军事行动将是不适当的。

10月20日上午10时，罗伯特·肯尼迪打电话到芝加哥谢拉顿——墨石饭店给总统，对他说，我们等待你回来作出决定。

下午1时40分，总统回到了白宫。此时，美国在全世界各地的武装力量都已处于戒备状态，麦克纳马拉部长尽管主张封锁，但命令4个战术空军中队处于随时进行空中打击的状态，以备总统决定采纳“立即袭击”建议。

下午2时30分，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会议在总统椭圆形办公室举行。麦克纳马拉陈述了主张封锁的论点，艾奇逊等人提出主张军事袭击的论点。会议持续到5时10分，总统做出了封锁的决定，并定于10月22日晚上发表电视演说。

几天来，美国“执委会”夜以继日闭门研讨确定对策以外，军事准备工作也在紧张进行中。导弹人员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军队开进了佛罗里达州和美国东南部。20日深夜，第一装甲师开始从得克萨斯州开进佐治亚州。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力量得到了加强。180艘舰只进入加勒比海。B-52轰

炸机队奉命载足原子武器进入空中，一架着陆，立即由另一架升空顶替。与此同时，白宫还展开了大量的外交活动，取得了法国总理戴高乐、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和加拿大总理迪芬贝的理解和支持。

22日6时，腊斯克国务卿会见了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把总统即将演说的事通知他。多勃雷宁听完以后，局促不安地离开国务卿办公室。总统广播之前，已把他的演说的一个副本让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福伊·科勒送到了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的办公室，还带了一封肯尼迪给赫鲁晓夫的私函。信中写道：“你的政府可能会不能正确理解美国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的意志和决心。因为我并没有认为，你或者任何其他神志清醒的人会在这个核时代故意要使这个世界陷入战争，而非常清楚的是，这种战争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取胜的，其结果只会给包括侵略者在内的整个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一小时后，总统坐在他的办公桌旁，凝神倾听广播员说：“先生们、女士们、美国总统……”而当肯尼迪的形象一出现在全国千百万架电视机屏幕上时，总统就开始说话了：

“晚安，公民同胞们：本政府按照规定，一直对苏联在古巴岛上的军事设施进行了最严密的监视，过去一周来，明白无误的证据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那个被禁锢的岛上目前正在准备设置一系列进攻性的导弹基地。设立这种基地的目的只能是配备向西半球进行核打击的能力，对所有美洲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明显的威胁……苏联人第一次突然秘密地决定在他们的领土以外安装这种战略武器，说明他们蓄意改变现状，我们决不能听任他们这样做。我们决不会过早地冒世界战争的危险……但是，在不得不面临这种危险的时候，我们决不会后退……”接着，肯尼迪总统又振振有词地发表了7点声明，他宣布：

第一，为了制止进攻性力量的增大，将开始严密封锁运往古巴的一切进攻性的军事装备。从任何国家或港口驶往古巴的不论什么种类的一切船只，如果发现载有进攻性武器，将迫使它们转向。这种封锁在必要时将扩及其他类型的货物和载运工具。但是我们不会像苏联人在1948年柏林封锁时企图所做的那样，不让生活必需品的进入。

第二，我已命令继续加紧严密监视古巴和古巴加强军事力量的做法。美洲国家组织外长在10月6日的公报中拒绝在涉及本半球的问题上保持缄默，如果这种进攻性的军事准备继续下去的话，那末对本半球的威胁也将不断增加，我们将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我已指示武装部队为任何紧急情况作出准备。我相信，为了古巴人民和在工地上的苏联技术人员的利益，这种威胁的继续给所有有关人员带来的危害将被人们所认识。

第三，本国的政策是把从古巴对西半球任何国家发射的任何核导弹看成是苏联对美国的进攻，需要对苏联作出充分的报复性的反应。

第四，作为一种必要的军事警戒措施，我已加强了我们在关塔那摩的基地，在今天撤退了我们在那里的人员的家属，并命令另外一些军事部队随时作好戒备。

第五，我们今晚要求美洲国家组织的磋商机构立即开会，考虑对本半球的安全和威胁。并援用里约热内卢条约第六条和第八条支持一切必要的行动。联合国宪章允许地区安全计划。本半球国家早已决定反对外来势力的军事存在。我们在全世界的其他盟国也已作了戒备。

第六，根据联合国宪章，我们今晚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

采取行动，反对苏联对世界和平构成的威胁，我们的提案是要求在联合国观察员的监视下迅速拆除和撤退在古巴的一切进攻性武器，然后才能解除封锁。

第七，也是最后一点，我呼吁赫鲁晓夫主席停止和取消对世界和平和我们两国稳定关系的这种秘密鲁莽并富有挑衅气味的威胁。我进一步要求他放弃世界霸权的计划，加入到历史性的努力中去，以结束危险的军备竞赛，改变人类的历史。使世界免入毁灭深渊的良机现在摆在他的面前。他应该恪守他的政府的声明，即没有必要在它自己领土以外的地方布置导弹，他应该把这些武器从古巴撤走，他应该克制，不做出任何扩大或加深目前这场危机的举动。还有，他应该投身于寻求和平永久的解决方案的努力中来。

演说结束了，电波将这些信息传播全球，人们在议论、忧虑、害怕。罗伯特·肯尼迪回忆道：“那天晚上我们就寝时，心里满怀忧虑和害怕。”

在这危急的夜晚，赫鲁晓夫在他的办公室中一条长沙发上，和衣而卧。他作好准备在任何时刻接到报警的消息，也作好准备立即应付突发事变。赫鲁晓夫为什么冒如此大的风险，将苏联核导弹悄悄地运进地处美国“后院”的古巴呢？

他有自己的思维逻辑。赫鲁晓夫于1960年5月14日—19日访问保加利亚的时候，将导弹布置在古巴的想法一直在他脑海里翻腾。他认为，这样既可以维持和扩大苏联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又可以借此改变不利于苏联的美苏力量对比关系，迫使美国在柏林问题上接受一项解决方案。他曾说过，既然“你们美国人用军事基地包围我们，用核武器威胁我们，那么，现在苏联的导弹也对准了你们，你们也尝尝核威胁是什么滋味”。

从保加利亚返国后，他继续思索着这个问题，最后党中央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作出了决定，把中程导弹发射装备和伊尔—28轰炸机布置在古巴。赫鲁晓夫还一厢情愿地认为，如果我们秘密地装置了导弹，以后美国在那儿发现这些导弹已经安装好准备发射时，美国人在使用军事手段试图摧毁我们的装置之前就得三思而后行了。

赫鲁晓夫的冒险行动遭到了严重的挑战。他没有想到导弹装置尚未完全安装好就被发现，美国总统还将此公布于世。

赫鲁晓夫准备再冒一次风险，下一次赌注。苏联政府和华沙条约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命令所属部队进入战备，苏联外交部也退回美国封锁古巴的照会。10月23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并宣称苏联决不会指示那些驶向古巴的苏联船只的船长服从美国海军的命令。“坚决拒绝”美国的“拦截”，对美国的威胁将“进行最强烈的回击”，同日，肯尼迪宣布从24日起将拦截可能前往古巴的舰船，并勒令这些舰船听候美国人的检查。与此同时，美国在古巴领海周围设置了警戒线，由90艘舰艇组成的美国舰队，在68个空军中队和8艘航空母舰的护卫下，驶入阵位，拦截和搜寻正在进入隔离区的船只。在佛罗里达州和邻近各州，美国也集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庞大的登陆部队，准备参战。

危机达到高潮。

在封锁生效几分钟后，海军向麦克纳马拉报告，在距离封锁线不出几海里之内，有两艘俄国船——“加加林”号和“科米莱斯”号正在快速驶往古巴的航道上。接着，又传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报告说，有一艘苏联潜艇正在为那两艘船护航。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总统问道。

麦克纳马拉回答说，现在让“埃塞克斯”号航空母舰用声纳信号通知该潜艇浮出水面以证明身份。如果它拒绝这样做，将使用小型的深水炸弹使之浮出水面。

此时此刻，箭在弦上，房间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这场核赌博的另一方——肯尼迪忧心忡忡，他的左手伸到脸上，蒙着嘴，他把右手张开接着又捏拢来，紧紧地握成一个拳头，他的脸好像拉长了，他的眼睛露出紧张的神情，简直变成灰色。

突然，一个信使给约翰·麦康送来了一张便条。“总统先生，我们得到了一个初步报告，该报告似乎表明几艘俄国船只都在海里停住不动了。”顿时，房间里的人们情绪活跃了，纷纷进一步提问：都在海里停住不动了？哪几艘船？他们可核对过这份报告的准确性？是真的吗？不久，一个海军情报官员举着一份完整的报告来到了会议室，报告说有20艘最靠近封锁线的俄国船只已经动也不动地停在那里，有的已掉头走了。

这时坐在总统身旁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悄悄地说：“我们是在眼珠对着眼珠，而我认为那个家伙刚刚眨了一下。”这句俏皮话道出了在场所有人感到如释重负的心情。此后，情况就急转直下了。

原来赫鲁晓夫完全没有料到肯尼迪会这么强硬，在美国的战争讹诈面前，他决定退却。24日，苏联去古巴的船只开始全部返回。26日，赫鲁晓夫致函肯尼迪，态度颇为诚恳，语言也缓和了许多，已缺少了最初那样的“刚性”，已经属娓娓道来：

尊敬的总统先生：

我很满意地了解了您给吴丹先生的关于采取措施这免我们两国船只接触，从而避免不可补救的严重后果的复信。

你们方面的这一明智步骤使我更加相信，您表现出对维护和平的关怀，我满意地指出这一点。

我已经说过，我国人民、我国政府和作为部长会议主席的我本人所关心的只是我国的发展和在经济竞赛，在发展文化、艺术，在提高人民福利等方面在世界各国人民中占有应有的地位。这是最崇高、必要的场地，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从中只能得到好处，因为这是和平，这会增加人们生活 and 享受的资料。

您在声明中主张，主要目的不仅是达成协议和采取措施来防止我们的船只接触和防止危机加深，而危机可能由于接触而触发军事冲突之火，到那时，任何谈判都将无济于事，因为将由另外的力量，另外的规律——战争的规律开始发生作用。我同意你的意见：这只是第一步。主要的是必须使国与国之间以及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和平局面正常化和稳定下来。

您对美国安全的焦虑我是理解的，总统先生，因为这是做总统的首要责任。然而，同样的问题也使我们感到不安，这些责任也落在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我的身上，使您感到不安的是：我们以武器帮助古巴加强防御能力——只是加强防御能力，因为古巴不论拥有什么武器，都不能同您们相比，因为两国大小就不同，尤其是从现代化歼灭手段来看，我们的目的过去和现在都是帮助古巴，谁敢不能否认我们希望古巴能根据其人民的愿望和平地生活和发展这种动机的人道性。

您希望自己的国家太平无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古巴也希望这样，所有国家都希望自己太平无事。但是您们用军事基地包围苏联，用军事基地包围我们的盟国，直接

在我国的四周布置军事基地，在那些基地上放置你们的火箭武器，你们这种表现出来的行动又叫我们苏联、我国政府怎样来评价呢。这不是什么秘密。美国的身负重任的活动家洋洋得意地宣布这点。你们的火箭设置在英国，设置在意大利，而矛头是针对我们的。你们的火箭设置在土耳其。

古巴使您感到不安。您说，古巴令人感到不安是因为它位于离开美国海岸 90 海里的地方。但是土耳其同我们毗邻，我们两国的哨兵踱来踱去互相可以望到。您怎么认为你们有权利要求保障贵国的安全和要求拆除您称之为进攻性的武器，但却不承认我们有这种权利？

要知道，你们在土耳其，在紧挨我们身边设置了你们叫作进攻性武器的火箭毁灭武器。那么，一方面承认我们两国在军事方面拥有相等的可能性，同时我们两大国之间却存在着这种不平等的关系，这两点怎么能吻合起来呢？这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吻合起来的。

总统先生，你同意我们的代表会晤和开始谈判，这是好的，看来，这要借助于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吴丹先生。从而，请他在某种程度上起中介人作用，而我们认为，他能应付这项重要使命，当然，要被卷入这项冲突的每一方都表现出诚意。

我想会有可能很快地结束冲突和使局势正常化，从而使人们能够松一大口气，因为我们认为，那些身居要职的国务活动家具有冷静的头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善于解决复杂的问题和不把事情搞到发生战争灾祸。

因此我提出建议如下：我们同意从古巴撤出您认为是进攻性的手段。同意实现这点并在联合国宣布这个保证。贵国代表要发表声明：美国方面考虑到苏联的安全和焦虑，将从土耳其撤出自己的这种手段。让我们达成协议：你们以及我们需要多少时间来实现这点。在这以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委托人就可以现场监督这种保证的执行情况。当然，古巴政府和土耳其政府必须允许这些全权到它们的国家去检查各方保证的执行情况。看来，全权代表最好既得安理会以及你们和我们——美国和苏联的信任，也得到土耳其和古巴的信任。我想，看来，要选择这种得到各有关方面的信任和尊敬的人不会有什么困难。

我们提出这种保证，目的是满足古巴人民和土耳其人民并给他们以希望，增强他们对本国安全的信念，我们将在安理会范围内声明，苏联政府将郑重允诺尊重土耳其边界的不可侵犯性及其主权，不干涉它的内政，不进犯土耳其，不让本国领土用作这种进犯的跳板，并且将制止那些想从苏联的领土，以及从土耳其毗邻的其它国家的领土对土耳其实行侵略的人。

美国政府也将在安理会范围内对古巴发表声明。它将声明美国将尊重古巴边界的不可侵犯性，尊重古巴的主权，保证不干涉其内政，美国自己不进犯、也不让本国领土用作进犯古巴的跳板以及将制止那些想从美国领土或者从同古巴毗邻的其他国家的领土对古巴实行侵略的人。

当然，为此我们必须同你们达成协议并给一个期限。让我们来商定给一个期限，但是不要拖延，给两三个星期，不超过一个月。

你们谈到的和你们说使你们不安的那些在古巴的手段掌握在苏联军官手中。因此不致有任何偶然动用这些武器危害美国的情况。这些武器是应古巴政府的请求设置在古巴的，而且仅仅是为了防御。因此，如果不进犯古巴，或者不进犯苏联或我们的其他盟国，那么，这些手段当然不会在现在、也不会将来威胁任何人。因为这些手段不是用于进攻目的的。

总统先生，如果您同意我的建议，那么我们将派我们的代表到纽约、到联合国去，并给他们详尽的指示以便尽快地达成协议。如果你们也派出自己的人和他们相应的指示，那么，这个问题将会很快地得到解决。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现在全世界都不安和期待我们采取明智的行动。宣布我们

的协议、宣布冲突已根本消除，这对各国人民来说将是最大的愉快。我认为这个协议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将会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特别是它将有助于达成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关于试验的问题可以平行地解决，而不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因为这是不同的问题。但是重要的是就这两个问题达成协议，作为给人们很好的礼物，如果能宣布已达成停止核武器试验的协议，从而不去再污染大气的消息，这也将使他们高兴。

而我们和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这些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动力，促使也就我们和你们正在交换意见的其他争执问题求得互相能够接受的协议。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解决，但是亟待解决以澄清国际气氛。我们准备这样做。

总统先生，这就是我的建议。

此致

敬意

尼·赫鲁晓夫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在这些外交辞令中，赫鲁晓夫已经明确表示，他愿意从古巴撤出导弹，只是又附加了一个条件，要求美国撤出其在土耳其的导弹。美国政府不理睬赫鲁晓夫的这个要求。当天下午，肯尼迪复信赫鲁晓夫，他要求苏联必须先撤出进攻性武器，美国才能同意解除对古巴的封锁和提供不再进攻古巴的保证。

10月28日，莫斯科电台广播了赫鲁晓夫给肯尼迪的回信，由于美为“保证”不再入侵古巴，“推动我们向古巴提供这种援助的动机，也随之消失。”于是，同意从古巴撤走导弹，并在海上接受美国的核查，还同意让联合国代表去古巴核查。

美、苏的相互妥协并没有征求古巴政府的意见，因此，引起古巴政府的不满。卡斯特罗开始拒绝撤走苏联的导弹和轰炸机，为此，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于10月30日至31日访问了古巴，劝卡斯特罗放弃这一要求。卡斯特罗最后接受了吴丹的劝说，但拒绝联合国观察员进入古巴，并提出了5个条件。至此，一场濒临核战争边缘的危机就这样避免了。

11月21日，赫鲁晓夫同意在30天内撤走伊尔-28轰炸机，随之美国终止了海上封锁。至此，“古巴导弹危机”也称“加勒比海危机”渐趋平息。

第十三章 冷战：军事与政治

- 一、冷战的序幕
- 二、德国的分裂
- 三、核战争的阴影
- 四、“灵活反应”战略使美国夺回了冷战主动权

一、冷战的序幕

1946年3月5日，正在美国作私人访问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来到杜鲁门家乡密苏里州富尔顿镇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威斯敏斯特学院，作了一次题为《和平的中流砥柱》的演讲，这就是战后历史上著名的“富尔顿演说”。在场的听众约有3000余人，由于电台进行了转播，据说成千上万的美、英听众也在收音机旁聆听了他的讲演。丘吉尔针对随着“伊朗危机”、“原子间谍案”等事件而出现的美苏之间的紧张局势，发表了他的看法。他恭维美国“此刻正高居于世界权力的顶峰”，“拥有最大的力量”，“对未来负有令人敬畏的责任”，建议“英语世界”和“英语民族的联合”，建立“以英联邦与帝国为一方和以美利坚合众国为另一方的特殊关系”，随即又把话锋一转，声称：“不久刚被盟国的胜利所照亮的大地，已经笼罩上了阴影”，“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亚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丘吉尔的演讲实际上是呼吁美英建立反共军事同盟，来对付以苏联为首的“铁幕”后的国家。

丘吉尔的演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美英苏三个同盟国在安排战后世界秩序上产生矛盾和冲突的结果，也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如何和平相处这一人类所面临的新问题在西方政治家身上的反映。丘吉尔虽然已非当时英国的首相，但毕竟仍是世界上极有影响的政治家，他的话反映了西方国家统治阶层中一部分人的想法，随即在世界各国引起强烈的反响。美国政府当然是暗中喝彩，丘吉尔的直言不讳说出了杜鲁门一直憋在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和不便说的话。而英美舆论对此则反应不一，毁誉不齐，有的表示同情和支持，有的认为其言词太过火，也有的指责他想把世界引入新的战争中去。反应最强烈的则是苏联，3月13日，斯大林针对丘吉尔的演说，对《真理报》记者表示，富尔顿演说是个危险的行动，其目的是要在盟国中散布不和，丘吉尔的方针是进行战争的方针。苏联《真理报》就此发表了题为《丘吉尔玩弄刀枪挑起反苏战争》的社论。许多亚非国家也从不同的角度抨击丘吉尔的这篇演说。

富尔顿演说揭开了“冷战”的序幕，标志着战时的盟友已成为彼此激烈竞争和对抗的对手。“冷战”局面的最终形成，则是与当时及以后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紧密关联的。

东西方“冷战”的最初焦点是东地中海区域和波斯湾地区，主要体现在苏土反目、伊朗危机和希腊内战等事件上。

首先是在土耳其问题上的争夺。由于土耳其地缘欧亚大陆交接之处，尤以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两海峡扼黑海与地中海之交通咽喉，历来是大国角逐之地。1923年凯末尔革命取得胜利后，苏土关系一度出现良好发展的势头。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不仅在大国之间搞平衡，而且随着战局的发展，其亲德反苏的倾向日益显露，迫使苏联屯兵苏土边境，以防土军突然进攻苏高加索地区。盟国希望土耳其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种种努力，均一一告挫。当苏军在苏德战场上节节取胜，美英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德国败局已定时，1944年7月15日，斯大林便明确表示：“逃避同德国进行战争的土耳其在解决战后的事务中，将自然没有资格提出对特殊权利的

要求。”8月2日，土宣布与德断交，1945年2月23日又先后对德、日宣战，但为时过晚，已改变不了苏联准备在战后对其惩罚的决心。

1945年3月19日，苏联照会土耳其，单方面宣布废除1925年订立的《苏土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此举引起土耳其政府的极大惊慌，经商讨后即于4月4日对苏复照，表示愿意认真研究对苏签订一项新约。然而，6月7日苏外长莫洛托夫在召见土驻苏大使夏帕尔时，提出了苏联方面签订新约的4项条件：

- （一）把土耳其东部卡尔斯、阿尔达汉地区交还苏联；
- （二）允许苏联参加对海峡地区的监管，苏联在海峡地区拥有建立海军基地的权利；
- （三）修改《蒙特勒海峡公约》；
- （四）土耳其应调整与保加利亚的边界。

苏方的条件显而易见是相当苛刻的。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原系土耳其帝国领土，19世纪时割让与沙俄，1921年苏俄与土订立的《苏土条约》及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3个苏维埃共和国与土耳其订立的《卡尔斯条约》中已明确解决该两地的归属问题，苏联此时翻出历史旧帐，显有惩罚土耳其之意。至于监管海峡与在海峡建立海军基地的要求则更侵犯了土耳其的切身利益，土政府断然拒绝了苏方的要求，此后双方均开动宣传机器，相互进行攻击。苏联直接支持土耳其境内的民族分离主义分子进行反政府的活动，而土耳其方面则由传统上的恐俄情绪转为激烈的反苏情绪，两国关系日趋恶化。

美英在此关键时刻也不再保持沉默，尽管在战争期间，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曾向斯大林表示过，苏联要求拥有地中海通道是“合乎情理的”。但到战争临近结束时，出于战略上的考虑，美英已决定不让苏联染指地中海区域，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美英改变了对黑海海峡的立场。针对6月7日苏联对土的照会，美国在11月2日就修改《蒙特勒海峡公约》，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其要点为：

1. 海峡应在任何时候对任何国家的商船都开放；
2. 在任何时候对黑海沿岸国家的军舰都开放；
3. 除非得到黑海沿岸国家或联合国的允许，否则海峡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对非黑海沿岸国家的军舰开放。

英国对此立即表示赞同，土耳其也认为原则上可以接受作为谈判的条件。

然而苏联却不予赞同，并于1946年8月8日再次照会土耳其、美国和英国，重申共管海峡和在海峡地区建立海军基地的要求。此后又以军事演习为由，在苏土边界集结重兵，试图迫使土耳其就范。苏联的举动引起美英诸国的强烈反响，土耳其政府发出求援的请求。美国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分别进行紧急磋商，并就此向杜鲁门提出了备忘录，一致认为苏联的意图在于控制土耳其，而“土耳其本身是东地中海和中东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如果苏联一旦得手，则美国必将难以阻止苏联向近中东地区渗透。经与英国磋商。美英两国决定采取强硬立场，共同支持土耳其抵制苏联的要求；美国军方还建议政府允许土耳其购买美国军火，对土进行军事技术援助。8月19日，美国对苏发出照会，重申1945年11月2日照会的立场，并指出，美国坚决认为土耳其应是海峡防御的主要承担者，任何对海峡的攻击都将受到联合国安

理会的过问。8月21日，英国也发出了一份类似的照会。美英的态度无疑撑起了土耳其的腰杆，8月22日，土耳其政储拒绝了苏联所提出的有关海峡的要求。9月，美国派遣“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率7艘战舰组成特遣舰队驶入东地中海水域，以示对土耳其的声援，随即又向土耳其提供了2500万美元的贷款，用于土耳其军队的装备建设。

由于美英的强硬态度，苏联对土耳其的压力遂被顶了回去。苏土之间的这一场危机，不仅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反而使美国趁机将伸入这一地区：不仅取代英国成为土耳其的头号“保护者”，而且在东西方冷战局面最终形成时，把土耳其纳入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之中，使它成为“巴格达条约组织”和北约的重要成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英苏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为了保障盟国间交通运输线的畅通，1941年8月25日，苏英联合决定，由苏军占领伊朗北部，英国占领伊朗南部。苏联方面声称此举系依据1921年苏伊条约第六条所采取的行动，即如果第三国企图把伊朗变成反苏军事基地，则苏军为了自卫可进驻伊朗境内。而实际上苏英双方所遵循的仍是1907年英俄协议对双方在伊朗势力范围的划定。1942年1月，苏英伊三国在德黑兰订立同盟条约，规定苏英两国军队应在战争结束后6个月内撤军。同年10月，美国成立“波斯湾后勤司令部”，也派遣后勤供应部队进驻伊朗。在1943年底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上，美英苏三大国首脑均对撤军问题和维护伊朗独立作了保证。1946年1月，伊朗政府正式向联合国提出控诉，指责苏联违背条约，制造伊朗内部分裂。苏联代表则辩解称，撤军问题可以谈判，而阿塞拜疆人和库尔德人的分离活动则纯属伊朗内政，与苏联无关。同时在苏联的压力下，伊朗也不再坚持其对联合国提出的申诉。美英方面自然不肯就此善罢甘休，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表示，如有必要，美国将动用军事手段。杜鲁门则致函斯大林，措词强硬地表达了美国的态度。美国政府还声称，美国在一旦需要的情况下，将到联合国去提出苏军撤出伊朗的问题。面对这样的形势，苏联才终于退却。1946年4月4

日，苏伊双方经过私下谈判，达成了苏军撤离的协议，条件是伊朗允诺将其北部的石油开采权长期租让给苏联。5月6日，苏军全部撤离后，伊朗政府在美英的支持下，完全控制了北部的局势。1947年，新选出的伊朗议会又否决了苏伊联合开采伊朗北部油田的协议。于是美国顾问和美国公司携带着武器与设备堂而皇之地开进伊朗，此时苏联除了表示抗议和警告外，已经无可奈何。在伊朗危机中，苏联遭到了失败，英国也没捞到多大的好处，只有美国后来居上，是最大的赢家。

二、德国的分裂

如何处置战败的德国是困扰着战后初期盟国关系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并最终导致东西方之间的激烈冲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按照三大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的协议，美英法苏对德实行分区占领，地处苏占区内的柏林，亦按此原则由四国分区占领。

德国问题是大国纷争的晴雨表。最初在盟国间引起分歧的是德国的赔偿问题。1945年7月，在波茨坦会议上，苏联重申了对德索赔的要求，即德国须支付20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苏联应得到其中的100亿美元。这项要求遭到美国的反对，最后波茨坦协定对赔偿问题只是确定了赔偿原则，而未作具体数额规定。据此，四国分区占领德国后都有权从各自的占领区内获取赔偿。苏联除了可从本占领区获得75%的赔偿之外，还可从西占区获取25%工业设备的赔偿。因此，苏联不仅从本占领区拆迁工业设备，还催促西占区如期向苏占区提供赔偿物资。西占区三国中，除法国仍然坚持对德索赔的态度之外，美英两国对德政策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尤其是美国，其对德国政策已从战时曾提出严厉宰割德的“摩根索计划”演变到扶植和振兴德国经济的政策，把复兴德国经济作为稳定西欧、争夺中欧的欧洲战略的重要环节。对英国而言，一个经济上比较繁荣稳定的德国无疑会有利于英国在欧洲大陆搞平衡的目标。

1946年初，美驻德副长官克莱将军曾派专人调查德国工业水平，得出的结论为，要提高德国的工业水平，首先必须减少或停止赔偿。因此，美国认为，苏联严厉的索赔政策乃是德国经济复兴的最大障碍，因而不能听任苏联为所欲为，遂于1946年5月3日中止自美占区支付对苏赔偿。政策与目标的分歧，使得美苏两家在德国问题上无法奉行一项共同的政策。根据波茨坦协定，美英苏三国外长将就德国问题定期举行会商，“负责准备对德和约，待符合此项目的之德国政府成立时，由该政府予以接受。”战后初期，从1945年9月战争结束至1946年6月，美英苏三国，后加上法国，四国外长先后在伦敦、巴黎和莫斯科举行了5次会议，以美英法为一方，和以苏联为一方，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和斗争，每次会议都难以达成共识，要么搁浅，要么失败。这是由于双方的立场存在着明显的分歧，美英认为，必须首先实行占领区的经济统一，反之，占领区的经济必将陷入混乱状态。苏主张，要解决包括经济在内的任何问题，唯有先实现“政治统一”，即首先建立全德中央政府。事实上，“经济统一”也好，“政治统一”也罢，孰先孰后，只是一个政策问题，其实质是对德国的控制和争夺。美国害怕“政治统一”后的德国，将会落在苏联控制之下，从而危及西欧的团结，因此，宁可让德国分裂，也要保住西欧的统一。而苏联则担心在对“经济统一”后的德国的争夺中，美英凭借经济优势而将处于有利地位，所以它不怕欧洲分裂，担心的倒是德国的分裂。

1946年3月6日，美国国务院将驻德军事长官的政治顾问墨菲的一份担心德国落入苏联手手中的电报转给苏联问题专家凯南，后者随即就此提出了当时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或是“依靠隔绝东部的渗透和依靠与国际化的西欧合为一体，而不是靠并入统一的德国来抢救德国的西部占领区。”为了长远的政治利益，美国当然选择后者。同年9月，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在德国的斯图加特的一次演说中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同意从德国索取多于波茨坦所

规定的赔偿，”声称“不能让德国成为任何一个强国的卫星国。”这一说法使美国在分裂德国方面大大地跨出了一步。同年12月，根据贝尔纳斯的建议，美英两国订立《德国美占区和英占区经济合并协定》，使两个占领区合并为一个经济单位。1947年5月，美英又策划成立了法兰克福经济委员会，该委员会名曰经济，而实际上具有一定的立法权和政府职能，美国已在单纯的“经济统一”的旗号下，悄悄地塞进了政治统一的内容。苏联方面亦非束手观望，他们针锋相对，于6月初在苏占区成立了德国经济委员会，该年年底还在柏林召开争取统一和公正和约的德国人民代表大会。1947年正是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出台之年，美苏冷战的局势趋于明朗，苏联在9月成立共产党情报局，并明确提出“两大阵营”的概念，此后德国便成为两大国角逐的主要场所。德国分裂的局势已不可逆转。

1948年2月至6月，美、英、法、荷、比、卢六国举行会谈，中心议题是协调西方各国对德政策，并准备筹组西德政府。苏联对此表示抗议，于3月20日宣布退出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4月，苏又决定对通过苏占区前往柏林的西方人员、车辆实施检查和其他交通限制，双方关系趋于紧张。6月7日，西方大国发表了《伦敦协议》，其中包括决定于1948年9月1日召开西占区制宪会议，1949年成立西德政府和国际管制鲁尔等12个文件。6月18日至27日，美英法占领当局先后颁布《货币法》、《发行法》和《兑换法》3个在西占区实行币制改革的法令，决定发行“B记马克”在西占区流通，《伦敦协议》和西占区币制改革标志着西方各国政治、经济诸方面完成了分裂德国的准备工作，同时也引发了战后历史上第一次柏林危机。

6月19日，苏联占领当局发布公告，明令禁止把西占区的新货币带进苏占区和柏林。22日，又宣布决定在东占区和柏林发行新币“D记马克”。23日，苏、波、捷、匈、南、保、阿八国外长与国防部长会商于华沙，发表联合国公报谴责西方违反雅尔塔和彼茨坦协定，分裂德国。当天，苏占领当局以技术性困难为由，关闭了柏林与西占区的铁路交通；8月4日，又停止了公路与水路交通。柏林西占区居住有250万居民，当时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瓦砾堆的柏林遭到全面的封锁。西方国家对此反应强烈，东西方关系处于空前紧张状态。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发表声明，表示西方国家是按盟国协议规定的权利留驻柏林的。美驻德军事副长官克莱将军认为柏林的局势影响美国的威信，在完全没有得到国务院和美国军方认可和支持的情况下，擅自采取行动，要求驻德美空军司令李梅将军利用“空中走廊”进行空运。6月25日，杜鲁门召集亲信紧急磋商。次日，杜鲁门命令“把临时的空运改成大规模、有组织的空运，而且把驻欧美军司令部手头掌握的每一架飞机都一定要投进去。”7月下旬，美又决定派60架B29型“超级空中堡垒”以执行例行飞行任务为由飞抵英国，在那里建立战略空军基地，以显示实力。7月底，美英当局宣布实施对东占区的反封锁，停止经西占区往返东占区的货运。另一方面，三国驻苏外交官又开展紧张的外交活动，与苏联领导人进行一系列会谈，寻求解决危机的途径，但未能取得任何结果。此后西方大国于9月将柏林危机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于是苏联便使用否决权，使安理会偏向西方观点的提案未获通过，事态遂更陷僵局。

10月15日，美英方面正式成立了联合空中补给线小组，由曾在二战期间指挥“驼峰”运输的特纳将军出任总指挥。参加空运的有美、英空军，英国民航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空军的数百架运输机，自1948年6月26

日第一架 C—47 型运输机飞抵柏林到 1949 年 5 月 12 日苏联宣布解除封锁，往返飞机 19.5 万架次，运送各类物资 158 万吨，成为世界航空史上规模最大和持续时间最长的空运。

在政治上，双方加紧了对柏林市政大权的争夺。1948 年 11 月 30 日，东柏林选出统一社会党人埃伯特为市长。12 月 5 日，西柏林选出社会民主党人路透为市长。柏林一分为二，东西柏林分别有了各自的市长、立法机构和货币。

1949 年初，苏联改变了方针。1 月 27 日，斯大林在回答美国记者史密斯提问时，首先发出了和解的信号，他声明苏联并无打算向他国作战，苏愿意谈判裁军；只要西方国家同意解除反封锁，并推迟成立西德政府，苏联准备解除柏林封锁。2 月 2 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通过新闻界对斯大林的谈话表示响应。于是美苏驻联合国代表杰塞普和马立克在各自政府的授意下，进行了秘密会谈，最终同意重开四国外长会议。5 月 5 日，四国同时发表了解除德国各占领区和东西柏林间封锁与反封锁的公报。5 月 13 日，封锁与反封锁结束。5 月 25 日，四国外长会议在巴黎召开。第一次柏林危机终告平息。然而东西两个德国的建立已势所必然。

1949 年 8 月 20 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宣告成立，接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于 10 月 7 日诞生，至此德国遂最终分裂。

三、核战争的阴影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的军事政策便从以应付危机为中心转向旨在同苏联进行长期竞争的思想和计划。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总统都采取了“细水长流”的政策。美国政策制定者们把美苏竞争看做是国际关系的核心事务，因此把自己的国防政策当作遏制共产主义与苏联扩张的主要工具。为了阻止苏联影响的扩大，美国千方百计减少苏联通过动用军事力量或以武力相威胁来作为扩大其国际影响的工具的机会。尽管对国防的手段与费用等问题有着各种分歧，美国的政策仍是建立在在对军事挑战的性质作出适当反应的共同认识的基础上。在国会中的一些积极分子的支持下，冷战时期的三位总统进一步明确了遏制、战略威慑和前沿集体防御的政策。

核武器仍是美国战略的核心。无论从政治上讲还是技术上讲，这个时代的核威慑的范围都扩大了，这是因为苏联的威胁发生了质的变化，而且对盟国进行支持的需要以及技术上的突飞猛进的进展也都使核力量的发展成为势在必行的了。到1965年，美国和苏联都基本建立起了“三位一体”的战略力量，即洲际轰炸机、洲陆弹道导弹和携带有中远程弹道导弹的潜艇，由于利用了热核反应技术，而且命中精度也有了提高，就使得这些运载系统携带的弹头具有更大的杀伤威力，从数量看，美国占有对苏联的核优势，主要是由于美国有一支庞大的轰炸机力量。为了对付这种潜在的威胁，苏联建立了由截击机和导弹组成的密集防空系统，并研制了自己的洲际弹道导弹，由战略火箭军来操纵。在这一时期，美国的核力量和城市新面临的威胁增加了。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清楚地认识到了自身日益扩大的脆弱性，因此谋求建立更复杂更强有力的威慑来减小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

战略威慑的另一个作用是将威慑扩大到美国的盟国。北约成立伊始，便享受到了美国核武器的完全保护。但是，随着苏联对美国核威胁的增长，人们开始怀疑一旦战争爆发，战略空军司令部能否立即派出飞机来拯救欧洲。为了保卫西欧及南朝鲜与日本，美国研制了用于前沿部署的核武器，包括部署在北约国家的中远程导弹、可投掷核武器的空军战斗轰炸机和舰载飞机。地区性核战争的选择有利也有弊。一方面，它表明了美国的核保护伞的不可分割，同时提供了一种低于总体战争的核选择余地。另一方面，这样做使得美国的战略同其盟国的行动联系在一起，这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当美国自身的生存都处于危险状态时，美国的保证是否还有意义。

错综复杂的核外交加剧了自由世界和共产党世界内部的紧张关系，在苏联和美国同各自的盟国之间造成了分裂。法国由于对美国拒绝帮助其发展少量核武器感到不满，便率先发展自己独立的“打击力量”，并于1960年爆炸了一颗核弹头，还在1966年退出了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然而苏联在亚洲却遇到了更大的难题。1950年就同苏联结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苏联帮助实施其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当苏联拒绝了中国的要求之后，中国于1964年爆炸了他们自己研制的核装置，核扩散为日益令人担忧的国际事务增添了新的内容。

核战争的可怕阴影促使美国和苏联将军备控制谈判作为其军事计划的补充手段。艾森豪威尔总统赞赏军备控制的作用，认为它可以防止有人“愚蠢地发动一场愚蠢的战争”。尼基塔·赫鲁晓夫则把美苏军备谈判当作苏联政策的一种武器，因为它可以为苏联的战略计划赢得时间，能使苏联军事力量

的强大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能起到分裂北约的作用，还能推动西方的和平运动。

好像还嫌战略威慑的政治意义不够复杂似的，美国又企图在欧洲以外地区建立区域性联盟，以防止苏联和中国的干涉或颠覆。朝鲜战争的经验教训给人们提供了可以采取什么行动和应该避免什么结果的实例，“不要再来一次朝鲜战争”，作为一条深入人心的口号，已简明地说明了美国应避免再次卷入一场目标有限的地面持久战争。而北约的前沿集体防御的模式——已通过“里约条约”扩大到拉丁美洲，并通过双边条约扩大到太平洋地区——则可能同样也适用于亚洲和中东。1954年，美国决定不使用核武器或常规力量去挽救法属印度支那，而试图通过建立“东南亚条约组织”保住东南亚的反共势力。它还把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军事义务扩大到了新成立的南越、老挝和柬埔寨等国。1955年，美国又在中东采取了同样的行动，成立了“巴格达条约组织”。通过加强联盟，美国对外政策获得了强大的发展动力。

美国并不仅仅依靠军事联盟去遏制共产主义颠覆。它还通过提供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和秘密行动来对付革命者发动的起义，并在希腊和菲律宾获得了成功。接着，美国政府又使用中央情报局分别推翻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伊朗政府（1953年）和危地马拉政府（1954年）。当1958年用同样的方法在黎巴嫩行不通时，艾森豪威尔政府便派遣了一支由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组成的特混部队去制止内战，并对叙利亚可能的干涉进行威慑。在60年代初期，在艾伦·勒斯的领导下，中央情报局的反颠覆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它进行了在古巴反对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刚果反对共产党游击队的秘密活动。在它进行秘密行动和提供军援的诸战场中，老挝和南越的局势形成了旷日持久的难题。

美国安全政策要求总统享有更大程度的行动自由。虽然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的政绩各有千秋，但他们都有相对的行动自由，除批准一年一度的预算方案之外，国会的干涉较少。这几位总统尽管属于不同党派，但都通过操纵国会中跨党派的国际主义者联盟（包括所有重要国会领导人和委员会成员），掌握了安全政策方面的主动权。每当总统们的实力受到考验时，他们都能以胜利而告终。艾森豪威尔就曾成功地挫败过国会限制他同外国政府签订行政协定的权力的企图，而在1954年，艾森豪威尔又在帮助中国国民党人保卫金门、马祖和澎湖列岛等近海岛屿的问题上得到了国会的支持。当时的表决结果是众议院410票对3票，参议院83票对3票。10年之后，约翰逊步艾森豪威尔的后尘，从国会获得了在东南亚使用军事力量的自由权。对《东京湾议案》的表决戏剧性地表现出了总统推动政治进程的能力。

国会对集体安全的热心来源于公众的支持。民意测验和选举不断告诉华盛顿，要警惕苏联人，并保住美国的军事优势，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60年代末。国防开支并未使公众感到苦恼，因为在朝鲜战争之后大复员以后的10年中，国防预算在联邦预算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了。实际上，某些国防开支的意义已超出了军事安全的范围，如修建洲际公路，改善对公众的教育，研究与开发高技术，支持航空、电子、造船与运输工业的发展等等。在某种程度上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茁壮发展的国家目的感在战后又持续了20年。约翰·肯尼迪在他的总统就职演说中信誓旦旦地说，美国将“为了自由的胜利……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负担”。他的话表达了1941年以来美国国民的共同心愿。

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当选为总统之后的一年中，他重新制定了美国的国防政策，使之适应朝鲜战争后那种不战不和的时代。艾森豪威尔的政策被称为“新面貌”，它要求重新估价苏联的威胁。简要地说，艾森豪威尔认为，象朝鲜战争那种代理人战争以及来自国防开支的压力会严重削弱美国的经济，所以，他保证在他执政后的头两年中要削减 140 亿美元的联邦预算。预算削减的主要对象是国防开支，因为国防部的开支最容易削减。

艾森豪威尔政府于 1952 年 12 月至 1953 年 10 月期间制定了它的“新面貌”政策，并宣布其目的是要获得“力所能及的安全”。新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承担了根据预算情况制定战略的任务。政府在 1954 年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拨款中削减了 50 亿美元，又在 1955 年财政年度提出了总额为 350 亿美元的数额。尽管政府从未完全达到其削减预算的财政目标，但还是将国防开支限制在 400 亿美元左右。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两个任期内，国防预算在联邦预算中所占的比例从 64% 下降到 47%，平均每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0% 左右，即使在 50 年代末通货膨胀以及高技术武器的实际价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政府也仍然坚持着“新面貌”政策规定的预算计划。

为了稳定国防开支，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再强调发展常规力量，而只强调核武器的威慑和实战潜力。上届政府留下的现役兵力为 350 万人，到 1960 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将其减到 247 万人，远远少于参谋长联席会议设想确保国家安全的必要数额。兵力的削减迫使各军种放弃了朝鲜战争时代的扩张计划，到 1960 年，陆军裁减了 6 个师，空军裁减了 15 个联队，海军裁减了 300 艘舰艇。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新面貌”政策深感不安，认为艾森豪威尔的战略思想缺乏远见。在一些特别研究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新成立的专门工作班子的协助下，艾森豪威尔于 1953 年 10 月组织起草了第 162/2 号国家安全委员会备忘录，要求国防部为各军种装备核武器。今后象朝鲜战争类型的局部战争应由美国的盟国动用各自的地面部队，在美国的空军和海军支援下去进行。

艾森豪威尔政府急干将“新面貌”政策与其对外政策的目标挂钩，将核技术的开发利用同推行对共产主义更富有进攻性的遏制政策紧密地联系起来。艾森豪威尔对小型核弹头的发展印象深刻，认为这种核弹头可用来更精确地对准军事目标，“就象使用子弹或别的武器一样”。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认为，核优势给了美国以对付苏联人的利器，他说：“我们今后不会让共产主义者在世界各地挑战型战争中把我们一口一口地吃掉，而是将依赖能按我们的意志，在我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去打击侵略策源地的机动报复力量。”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 1953 年对美国国防政策进行审查之后，于 1954 年 1 月声称，美国政府将依靠以核升级相威胁来威慑或阻止共产党发动的局部战争。俄国人的冒险主义必将以苏联的生存为代价，因为“美国将主要依赖其强大的报复力量，在我们自己选择的地点，用我们选择的方式，迅速进行……”。

“新面貌”政策反映在了政府的下述看法：苏联人将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千方百计削弱美国，分裂北约，把新独立的第二世界国家纳入共产主义的轨道。在估价苏联的军事力量方面，政府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在苏联 1953 年爆炸了一个聚变核装置后，收集情报方面遇到的困难变得更加举足轻重了，因为“新面貌”政策赖以存在的基础是要对苏联摧毁美战略空军轰炸机基地及美国主要城市的能力作出准确的判断。美国政府在情报搜集方面

已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批评者们则根据面临的问题指责艾森豪威尔过分乐观。到 1960 年，如何评价苏联威胁的性质已成为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冷战初期，美国的情报专家——主要是中央情报局——主要依赖于观察人员对苏联的科研与军事活动的报告。50 年代中期以前，大批难民和被遣返的德国战俘以及叛逃的苏联人都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情报。但无法无天的克格勃加强了苏联的国内保密工作后，由人提供的情报很快就差不多了。中央情报局力图通过在苏联安插间谍，利用西德控制的间谍网，以及同英国和法国的情报部门合作等手段来收集情报。但这样做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因为苏联间谍已渗透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情报部门。中央情报局将情报搜集工作和秘密活动都划归计划处统一负责后，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因为计划处的人对秘密活动的热情远胜于情报搜集。

美国政府转而依靠技术而不是间谍去搜集情报。艾森豪威尔政府增加了对上届政府 1952 年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局的拨款，并扩充了其工作人员。国家安全局的任务是窃听。它的监听站窃听别国的无线电通信和电话，试图破译和分析数以百万计的电报，但成功率有限。中央情报局对苏联在东欧的电话线进行搭线窃听则更成功一些。然而，通信情报也不能使中央情报局相信它已很好地掌握了苏联的军事发展情况。它在军队的同事们（尤其是空军的情报部门）也同样忧心忡忡。

美国情报部门又在寻找其他手段窃取苏联的情报。其中一种技术手段是沿苏联边境建立一系列雷达站，以监视苏联的飞机和导弹试验情况。到 50 年代末，从欧洲经土耳其、伊朗直到巴基斯坦，都建立起了这种雷达站。但没有任何手段可以代替穿越苏联领空进行直接观察，而这种飞行的实际问题是难以解决的。美国空军曾采取了代号为“天钩”的行动计划，释放高空气球飘到苏联境内，但飘忽不定的风向气流常常限制其作用。有人驾驶飞机更为可靠但也更加危险。1952—1953 年，苏联的截击机拦截过美国空军和英国后空军飞绕苏联边境和飞入苏联欧洲和亚洲领空内的飞机。中央情报局只有获得一种具有可以飞得高过苏联防空系统能力的飞机，才能进行穿越苏联领空的飞行。洛克希德公司的凯利，约翰逊设计的 U—2 型飞机满足了中央情报局的需要，因为这种机身细长，形似海鸥的飞机可以在 7 万英尺的高空横穿苏联全境。从 1956 年首次飞行开始，U—2 型飞机在随后的 4 年中，作过 20 至 30 次越境飞行，拍摄了许多照片，据中央情报局一名官员称，情报分析人员掌握的有关苏联军事发展情况的确切情报有 90% 左右来自这些照片。1960 年，被美机越境飞行所激怒的苏联人用他们最新的高空防空导弹击落了一架 U—2 型飞机。国际舆论为之哗然，艾森豪威尔只得停止了这种越境飞行。

美国政府手中很快就可得到另一种可取代 U—2 型飞机的其他手段。艾森豪威尔的科学顾问们（特别是小詹姆斯·基利安）和空军的研究与发展部门以及中央情报局同心协力，争取到了对侦察卫星的拨款。1955 年，侦察卫星计划获得了最高拨款优秀等级，结果研制出了一种装有波拉罗依德公司生产的高分辨力照相机的有效的卫星。但要为卫星找到一种合适的发射运输工具却困难重重，部分原因是由于在军队、中央情报局和航空工业部门的内部官僚主义横行，互相勾心斗角。为了指导卫星计划的进行过程，艾森豪威尔于 1959 年批准成立了“国家侦察办公室”，其工作受空军的全面监督。到 1960 年底，卫星已可投入使用。另外，中央情报局还于 1960 年通过英国情报部门策反了苏联情报部门的一名变节上校，名叫奥列格·彭科夫斯基，他

提供了有关苏联导弹发展情况的详细的重要情报。总之，政府通过技术手段和从彭科夫斯基得到的情报，对苏联的威胁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其程度远远多于它对批评者承认的程度，原因是怕透露了情报来源。

由于在 50 年代有关苏联航空兵作导弹发展的准确情报不多，空军因此夸大了苏联战略力量的增长情况。关于苏联威胁的争论本来应该属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中央情报局和空军之间的争论，但事实却是国家安全问题成了引人的党派之间的政治斗争。4 名有志问鼎总统的民主党参议员（林登·约翰逊、亨利·杰克逊、斯图尔特·赛明顿和约翰·肯尼迪）都竭力使“新面貌”政策成为总统选举中值得发难的问题。第一场斗争是 1954—1956 年的“轰炸机差距”事件。由于对苏联飞机生产能力估计过高，加之苏联举行一次耸人听闻的“空军节”轰炸机检阅，美国空军的专家们估计，到 1961 年，苏联的重型轰炸机将从 50 架左右增加到 800 架。尽管到 1957 年已对此预测作了更切合实际的修正（约 200 架），但“轰炸机差距”事件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美国面临着一种其防空系统无法对付的严重威胁。1957 年，收到的警情更加骇人听闻了，当时苏联用 SS-6 型固体燃料火箭发射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使美国情报专家们大吃一惊，因为他们原来估计 SS-6 型火箭在 1960 年之前不可能投入使用。在 1958 年，中央情报局做出的下一个估计是：到 1961 年苏联将可部署 500 枚洲际弹道导弹。“导弹差距”又引起了对“大规模报复”和“新面貌”政策的新的一轮指责和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自豪地把战略空军司令部视为美国防御力量的核心。在“新面貌”政策执行期间，战略空军司令部装备了新式的飞机和核武器，扩展了基地系统并改进了通信设备。1954 年，战略空军司令部拥有约 1000 架 B—36 型和 B—47 型轰炸机，到 1960 年增加到近 2000 架飞机。尽管射程有限的 B47 型轰炸机仍是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主力部队，但战略空军司令部又补充了 500 架新式的 B—52 型轰炸机。B—52 型轰炸机于 1955 年投入使用，由于性能可靠，操作方便，深受机组人员的欢迎，它给战略空军提供了其梦寐以求的喷气式洲际轰炸机。战略空军司令部还继续扩大其基地网，以蒙蔽苏联的计划人员。战略空军司令部在美国本土上的基地由 1954 年的 37 个增加到 1960 年的 46 个，同期的海外基地也由 14 个增加到 20 个。

然而，由于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压力，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在威慑方面的垄断地位被削弱了：第一种来自苏联的防空系统和洲际弹道导弹，第二种来自政府文职官员对战略威慑和部队结构所做的认真审查，第三种来自军种之争的竞争。结果，美国加快了自己的洲际导弹发展计划。虽然各军种自 1945 年以来都在研制各种导弹，但谁也没有把导弹计划放在首位。在空军内部，科学委员会的调查和兰德公司的研究都对轰炸机的前途表示了怀疑。进一步的研究结果建议将导弹（包括弹道导弹和飞航式导弹）纳入美国的威慑力量，这一立场得到了空军的两位著名科学顾问西奥多·冯·卡曼和约翰·冯·纽曼的大力支持。一批空军将领敦促采用更宏伟的导弹发展计划，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得知陆军组织了以顽强进取的韦恩黑尔·冯·布劳恩为首的导弹研究班子。这场推崇导弹的争论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如果美国期望自己的部分核武器在遭到苏联的第一次打击后仍能生存下来，它需要发展某种可以补充轰炸机力量的武器。

1955 年，艾森豪威尔将导弹研制置于整个军事研究与发展中的最优先地位。部分原因是总统接受了他手下的技术能力委员会（由基利安博士任主席）

的一份报告。该报告强调指出了苏联核威胁的增长，并建议美国作出重大努力。空军早已跟上了这种变化，成立起一个专门机构，负责研制两种洲际弹道导弹——“大力神”和“宇宙神”。这些导弹的主要性能是：具有 5500 英里的射程，可携带一颗百万吨级的弹头。经国防部批准后，空军还推进了中远程导弹和飞航式洲际导弹的研制，从技术上讲，这些导弹比洲际弹道导弹更先进，结果，空军研制成功了“雷神”式中远程弹道导弹和“鲨蛇”式飞航导弹，分别于 1957 年和 1958 年开始部署。陆军也在研制自己的“丘辟特”式中远程弹道导弹，并且也在同一时期内通过了试验。空军还开始了第二代洲际弹道导弹——“民兵”式导弹的研制。这种导弹设计采用固体燃料和全惯性制导技术，并且具有足够的强度，可以部署在抗毁的地下混凝土发射井中。第一代洲际弹道导弹、中远程弹道导弹和“鲨蛇”式飞航导弹却具有与轰炸机相同的不足之处：它们的发射准备时间过长，而且只能在地面发射，使之成为第一次打击目标。到 1960 年，空军已拥有 12 枚“宇宙神”式洲际弹道导弹、30 枚“鲨蛇”式飞航导弹（部署在美国本土）和 4 个“雷神”式导弹中队（部署在英国）。耗资巨大的“民兵”式导弹的研制工作仍在继续进行之中。

在 1955 年优先发展导弹的决定中，海军也获准重点研制自己的中远程弹道导弹，从而加中入了实施核威慑的任务。实际上，海军早在 40 年代末就要求拥有核武器，但当时主要是想用它装备其舰载飞机。海军在朝鲜战争后采购的 6 艘“福雷斯特级”航空母舰和“企业”号核动力航空母舰都设计了可供新式道格拉斯 A3D“空中武士”式飞机起落的飞行甲板，这是一种真正的核轰炸机。1954 年，海军部署的全部航空母舰全都装备了核武器，以便打击苏联的港口和海军力量。

在 50 年代中期，海军改变了航向。原因是海军拥有了生存能力很强的发射平台——核动力潜艇。在海曼·里科弗这位天才的急性子工程技术军官的推动下，海军建造了第 1 艘核动力潜艇“缸鱼”号，并于 1955 年开始服役。里科弗对于官僚政治十分在行，他组织了一个包括来自他所在的海军、原子能委员会（里科弗是其成员之一）、国会、威斯汀豪斯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的人在内的支持核动力的联盟。里科弗眼中的核潜艇是用来打击舰艇的利器。但新任海军作战部长阿莱·伯克却把核潜艇看成是可装备从水下打击地面目标的导弹的运载平台。但海军没有这样一种导弹，因为海军重点研制的是只能供水面舰艇和浮出水面的潜艇发射的“天狮”式飞航式导弹。1957 年，伯克下令海军的中远程弹道导弹计划要朝着研制一种可供潜艇从水下发射的固体燃料导弹方向。为此，他仿照空军的做法，成立了由他的参谋班子、原子能委员会和洛克希德公司人员组成的特别计划处，于 1960 年制造了射程为 1500 英里的“北极星”导弹。由于这种导弹有效载荷有限，精度不高，所以它的弹头只能摧毁面状目标。尽管如此，早于它的发射平台生存能力较强，所以舰队弹道导弹成了一种很有吸引力的战略威慑补充力量。

白宫和苏联人都帮了伯克的大忙。为了审查美国的核力量状况，国防动员局科学顾问委员会于 1957 年 4 月专门成立了一个“安全资源小组”。该小组又称盖瑟委员会，当它于 11 月提交报告时，苏联的“人造卫星危机”使得该报告有了特殊的重要意义。盖瑟委员会的报告强调指出了美国在核攻击面前的脆弱性和美国防空系统与民防计划的落后状况。横在美国与核毁灭之间的唯一屏障是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而盖瑟委员会认为，战略空军司令

部不应独力承担这一重担。1957年，海军要求研制3艘导弹潜艇，政府却批准了5艘，并把投入使用的日期从1962年提前至1960年。里科弗支持了舰队弹道导弹潜艇的研制工作，因为只要它们是核动力的，他便一视同仁。1960年，第1艘“乔治·华盛顿”级舰队弹道导弹潜艇载着16枚“北极星”海射弹道导弹开始了巡航。

原子能委员会所属的劳伦斯·科弗摩尔实验室和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又创造了更多的军事奇迹。在第一次聚变核爆炸后的不到10年的时间里，核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找到了大幅度缩小核武器体积的方法。第一个聚变核装置长达22英尺；而陆军的“大卫·克罗克特”迫击炮使用的核炮弹只有2英尺长，直径12英寸。氢弹的设计也发生了变化，利用枪机式引爆装置和高密度合金，就可以用更少的放射性材料来实现链式反应爆炸。在一段时间内当新闻报道还在说放射性材料最少需要50磅左右时，实际的最低限度已经到了制造一枚武器只需12磅钚和22磅浓缩铀的水平了。弹头体积缩小就意味着弹头数量随之增加，发射装置的种类也更多了——有了地面发射和空中发射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深水炸弹、鱼雷、炮弹，火箭和地雷等多种核武器。在“大规模报复”这个概念模糊的术语后面，存在着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美国简直可为其武装部队制造数以千计的核弹头。

美国核武库的急剧扩大并不是美国力图削弱苏联威胁的全部军事努力内容。空军和陆军都在想方设法建立一种有效的防空系统。这一做法既耗资巨大，结果又令人失望。一位空军参谋长若有所思地说：“实用的防空系统就象是一团乱麻……”没有人能确切地说出国防部在防空系统方面到底花了多少钱，但估计在整个50年代中，其数目高达400亿美元。当苏联的办法似乎是来自其轰炸机力量时，美国的防空计划人员设法获得了足够的经费，以建立一种切实可行的防空系统，但各军种的官僚机构对此任务的争夺，使防空系统平添了一股酸味。1956年，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规定，空军负责区域防空，陆军负责要点防御。这一规定实际上恰恰颠倒了双方的利益，因为空军要对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基地实施要点防御，而陆军却认为它拥有足够的装有常规弹头和核弹头的“奈基”系列地对空导弹，如果能获得空军超音速截击机的支援，就能执行有效的区域防空任务。空军自己的“波马克”式防空导弹计划的发展，已使问题复杂化了，而当形势日益明显——威胁是来自洲际弹道导弹而非轰炸机时，问题就更加混乱不堪了。陆军坚持认为，新式导弹——“奈基—宙斯”式导弹可以用来拦截弹道的弹头。而空军却想赶快研制一种以卫星为基地的防空系统。争论中唯一的共同认识是，美国需要拥有一种更好的顶警系统，于是，政府于1957年开始研制弹道导弹预警系统。

随着核部队的类型逐步增多，美国国防计划人员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并没有一个在威慑失灵时使用这些核力量的统一计划。更重要的是，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和导弹同海军的舰载飞机与潜射导弹相比，在威胁敌人目标以确保威慑效果的相对作用方面优劣难分。国防计划分析人员总被一种多余而又重复开销的感觉折磨着。1960年，国防部长托马斯·盖茨成立了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处，并责成它根据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应急作战计划”和海军的有关文件制定一个计划。从某种程度上讲，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处必须协调两种不同的核威慑观。海军强调把苏联的城市当作人质的重要性；空军则认为，主要打击目标应该是苏联的战略力量。应根据苏联军事目标数量

的不断增加而相应增加美国弹头的数量，并提高其命中精度，当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处于 1961 年制定出第一个“统一综合作战计划”时，它沿用空军的观点，强调打击苏联的核力量。苏联的军事工业和华约的地面与空中力量被置于较次要的地位。实际上，根据“统一综合作战计划”，苏联的许多主要城市也将遭到摧毁，因此，该计划也可以设想成以“有限地”或“对等补偿地”打击城市相威胁来确保威慑。但计划人员都无法预测到底采取何种威胁程度才能真正威慑住苏联。

艾森豪威尔政府并不认为“新面貌”政策中的威慑政策是确保美国安全的唯一方法，因为达成国际军备控制协议也可能会对美国有利。美国政府关心的主要问题是核扩散、核突袭和核试验等。1953 年 12 月，艾森豪威尔建议通过国际合作在一个国际组织的监督下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此建议产中了国际原子能署（1957 年），这样的安排一方面可以推动核电站的建造，另一方面也可禁止核武器的扩散。美国政府相信利用核能的计划将消耗世界上的大量铀矿产品，但新铀矿的发现使美国的计划落空了。由于害怕国际核查，苏联故意拖延联合国出面组织的会议。上述问题又促使艾森豪威尔提出了第二个军备控制倡议，即于 1955 年 7 月提出的“天空开故”的建议。艾森豪威尔担心有人会突然发动第一次打击，建以缔结一项国际协定来保护越境侦察飞行。联合国对此不感兴趣，美国和苏联便开始进行双边会谈，双方在允许飞机越境飞行的问题上没有达成任何协定，但默认了将来侦察卫星的部署。

由于可能出现核扩散，加之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气层的核试验对人体健康有害，这就促使美国政府要求联合国就限制核试验举行会谈。美国和苏联再次在核查时间和程度的程序上各执己见。到 1958 年，谈判已转入就探测核爆炸方面的技术问题举行国际科学会议。这些会议提出的结论是，除在地下深处进行的核试验外，其他形式的核试验都可以被准确无误地探测到。地震检测专家相信，他们不久就可以区别出地震与哪怕是小型的（2 万吨）核爆炸。由于对联合国谈判的繁琐程度大失所望，美国、英国和苏联便于 1959 年举行三边会谈，并在一年之内草签了一项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和水中进行核试验的条约。1960 年的 U—2 飞机事件使会谈半途搁浅，但美苏已站在了它们的第一项重要军控协定的门槛上。正如法国和中国立即指出的，禁止核试验对非核国家的限制比对美国和苏联的限制更大，但有限地禁止核试验就算不能消除世界各国之间的互不信任，至少也可以消除大气层中的放射性污染。这些谈判表明，核战争的危险可以通过协议来削弱，从而给美苏军备竞赛带来了新的气象。

美苏战略力量的增长和多样化，加上美国政府谨慎的军备控制倡议使威慑理论深入人心，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间人士提出的。民间人士的各种分析对“大规模报复”战略中的以威胁城市进行报复的威慑观点提出了质疑。盖瑟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只不过是对此质疑的一系列报告中的一份。兰德公司应邀对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基地情况作了审查之后，对轰炸机的生存能力提出了怀疑，并强调指出了不易受攻击，又不带挑衅性的第二次打击能力的重要性，必要时可用它来摧毁苏联的战略力量。兰德公司在作了进一步研究之后提出了“只打击军事力量而不打击城市”的思想，国防部长手下的武器系统评估小组提交的一份报告、空军的一些研究结果、洛克菲勒基金会组织撰写的一份关于国防政策的公开报告也都体现了这一理论。总统科学顾问

委员会也是主张修改战略的同盟者。在军队内部，陆军参谋长马克斯韦尔·泰勒和一些科学家、工程师、社会科学家等理论工作者也都持有同样看法。在这些主要理论家中有伯纳德·布罗迪、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威廉·考夫曼、保罗·尼采、亨利·基辛格、查尔斯·希契、亨利·罗恩和赫尔曼·康恩。

50年代的这批民间“国防专家”提出了一整套思想，对参议院批评“新面貌”政策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对威慑理论的研究热情部分是来自基础理论工作者的学术需要，特别是对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哲学博士来说更是如此。另一个原因是源于经济理论的令人信服的分析方法，数字胜于文字，这种研究还产生了一种额外的影响，就是人们越来越相信职业军人提出的传统战略思想在核武器的世界中已不再适用了。一些新的威慑理论的确使传统的军事思想显得过时了。有一种观点认为，要使威慑切实有效，只有将生存也考虑在内，而且必须使苏联也正视这种生存能力。第一次打击力量不应体现出威胁性，否则会招致对手先发制人的打击。至于如何才能使核力量一方面具有足够大的力量能确保其生存能力又能打击苏联的军事目标，而另一方面又不显得那么具有威胁性，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如果威慑失灵，战略部队的目标应该是限制战争，为谈判赢得时间。于是战略用语中不久便出现了“控制升级”、“限制毁伤”等词汇。利用博弈论、心理模拟和边缘效用计算等分析手段更使得战略研究一门高深的艺术。这也为60年代美国战略力量的大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伊始便认为，可以通过国防体制改革来克服部分国防问题，甚至连共和党温和派人士也认为，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之所以“失败”是与其“组织不当”的领导作风有关。另一种观点认为，妨碍经济地制定国防计划的最大障碍是军种之间的相互竞争。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支持杜鲁门的朝鲜战争政策感到很恼火，便逼迫艾森豪威尔把“属于民主党的参谋长们”消除出去。艾森豪威尔总统采取的对策是，当这些军官的任期一满，就不再委任新职。“新面貌”政策改革国防体制的努力，使得权力进一步集中到了总统办公室、国防部长办公室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联合参谋部。但在这些改革尚未同国防计划发生革命性变化时，就又停滞不前了，因为国会不愿放弃宪法赋予它的权力。艾森豪威尔的头两轮改革并未能简化决策工作，只是增加了决策过程中的部门和人员。

艾森豪威尔对国防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并不陌生，他于1953年大力加强了国家安全计划过程中的统一协调。尽管总统没有将其所有的目标都公诸于众，但他正在极力限制国会对他认为属于总统负责的事务进行干涉。艾森豪威尔首先通过每周例会使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度化。更重要的是，他授权其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特别助理组织了一个工作班子。该工作班子的部分任务是，安排好每周的具体活动日程，然后通过政策计划委员会和行动协调委员会这两个跨局机构来管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事务。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工作班子实际上成了一个融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为一体的非正式机构，并且由于与总统关系密切而胆大妄为。

艾森豪威尔从其任杜鲁门政府时期充当陆军中的政治元老的经验出发，断定各军种都是妨碍有效的进行国防计划和管理的主要障碍。洛克菲勒委员会的一份研究报告也证实了他的看法。这份报告于是便成了“第6号改组计划”的依据，这一计划中囊括了政府和国会在1953年间采取的各种改革行

动。洛克菲勒委员会的报告要求本着“以最小的代价确保最大的安全，同时不得危及自由制度”的精神，去改组国防体制。对于参谋长联席会议来说，改革意味着加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权力，授予他对扩大了联合参谋部以任命控制权。国防部长办公室也戏剧性地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改组后的国防部长办公室在原有的副部长和3名助理部长的基础上又新增设了6名助理部长和一名法律总顾问。这样，国防部长就有了一个在各种防务职能上都不弱于各军种部的工作班子。

经过5年的实践，艾森豪威尔政府发现1953年的改革还不尽如人意，于是在1958年又在洛克菲勒委员会的一份研究报告的支持下，提议进一步实行权力集中。这次改革的重点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改革后，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获得了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事务的表决权，而各军种的参谋长们则发现自己被排除在作战指挥程序之外了，现在的程序是从总统到国防部队再到各主要司令部的司令官（这些司令官是指按地理划分的“联合司令部”和诸如战略空军司令部那样的“特种”司令部的首长）。然而国会却不同意指定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为总统和国防部长的首席军事顾问，还允许各军种参谋长继续保留会晤总统和在国会作证的权利。艾森豪威尔把这种权利称为“法定抗上权”。另一方面，国防部长增加了变更与确定各军种职能与任务的新权力（“重大”作战任务除外），他的助理部长们也随之受益，因为他们可以在各自权限内发布有效力的命令。

现在，国防部长可以设立新的分管全部范围各种任务的局级机构了。在很大程度上，1953年改革中被撤消的许多跨军种委员会都被这些新的局级机构取代了。改组的第一个命令——扩大横向协调——防止了战略计划方面的竞争，而这正是各军种利益竞争最为激烈的舞台。《国家安全法》1958年修正案设立了国防研究与工程局局长一职，其主要任务是指导高技术计划的发展。托马斯·盖茨这位尽职尽责的国防部长还设立了一个高级计划研究局，负责研制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和其他的超前计划，诚如所料，改革进一步驯服了各军种部队，使之甘居下属，但由于它既没有压缩各军种的预算要求又没有对武器采购和物资管理施行更严格的控制，所以它并没有省钱。

由于国防部长没有采取强硬措施，加之问题太多，经费太少，改革并没能取得更大程度上的一致。1960年，国防部长盖茨开始每周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会晤，以给予更及时的指导。密切的个人关系有助于减少分歧，但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建议有时仍背道而驰，迫使国防部长和总统要违背自己的初衷而作出决定。据统计，1955—1959年间，各军种参谋长提出的建议有99%是与总统相一致的，只有1%是不一致的。从这些数字看来他们是与总统达成了更大程度的一致，但在那1%的分歧中就包括一些重大的问题。改组未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参谋长联席会议（空军参谋长除外）并不认为“新面貌”政策已回答了国家的军事问题。

国防决策程序的改革没能解决诸如怎样协调前沿集体防御与美国军队的核武器化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对北约来说比对任何其他地区都更为复杂。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继续了上届政府就在北约重新武装西德的问题进行的谈判。由于法国在关于建立德国国家军队的问题上拒不让步，使得第一项计划——即建立欧洲事务共同体的计划胎死腹中。谈判目的则是要确保同意德国建立一支12个师、50万人的部队。到1954年底，法国政府中发生的一个新变化为西德的重新武装提供了机会，法国国民议会于1954年12月

批准一项修订后的计划，允许德国在北约现行体制内建立自己的军队。联邦德国对其国内外事务有了充分的控制权，并在许诺未经北约同意不得装备核武器之后软化了自己的新形象。

1955年，西德开始组建国防军。在50年代，以康拉德·阿登纳为首的基督教民主党政府的政治战略是，确保西德的重新武装不影响经济的恢复，不分裂西德，也不削弱北约对美国核威慑力量的依赖。阿登纳无意命名军队的实力超过12个师，这一立场就使《里斯本协定》所确定的常规力量目标更加可望而不可及了。西德不坚持要将其军队沿整个边界部署，以使任何苏联的进攻都不能只打击西德本国的军队。

西德在北约登场的同时，美国“新面貌”政策的新重点强调要以核武器取代常规地面力量，北约于1954年底接受了这一政策。北约理事会要求制定在战争初期首先使用核武器对付苏联入侵的计划，而北约军事计划人员发现打核战争的想法需要承担重大的责任。1955年，北约进行了一次全面核战争模拟演习，发现要想拯救西德，使它遭到摧毁。在代号为“白纸”的作战模拟演习中，演习人员“使用”了335枚核武器，其中268枚打在进入西德的苏联军队之中，这种核手段的反闪击战虽然挡住了苏联人，但也造成了500多万人的“伤亡”。尽管如此，1957年，北约的政治领导人还是接受了北约版的“新面貌”政策，批准了一份军事计划文件（第MC14/2号文件），要求利用核武器对付任何威胁。他们计划使北约的30个师的常备军装备上核武器。这一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北约的战术飞机。北约理事会同意在欧洲贮备核弹头（那里已有了许多运载系统），到50年代末，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已拥有了约7000枚核武器。

北约“新面貌”政策的优点是明确地将美国的核威慑扩大到了欧洲，因为美国要同盟国共同承担战争升级的危险。然而，降低北约常规力量的水平可能会招致敌人的进攻，这些常规力量与其说是作战用的部队，还不如说是象“挡风玻璃”和“绊索”一样的“人质”部队。实际上，由于北约计划人员置之不利的地理条件于不顾而把东西德边界作为主要防线，因此计划使用核武器将会增大战争初期的易受攻击性，这种前沿防御的战略须确保将战术核武器打在东德境内的苏军头上，但这种战略使得在西德的北约部队无法打一场常规的持久战，因为这就要求在西德西部边境和莱茵河之间实施机动作战。

美国和欧洲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北约战略存在的两难问题。因为它们遇到的一系列危机使北约不得不考虑其军事方面的选择。1956年，东德和匈牙利发生了反对苏联占领者和本国共产党政府的未遂暴动。在匈牙利，战斗有越过奥地利边界的危险。1958年，苏联人又对同盟国占领西柏林的权利进行了挑战。艾尔弗雷德·格仑瑟将军和劳坦克斯·诺斯塔德将军这两位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都就加强北约常规力量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因为英国军队的裁减和法国的一些师被派驻阿尔及利亚使北约的常规力量变得更为有限，西德的一些颇有影响的政治家也对依赖战术核武器是否明智的问题提出过怀疑。在美国，北约的核战略受到了亨利·基格和罗伯特·奥斯（有限战争理论的两任祖师）等学者和詹姆斯·加将军与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等陆军领导人的坚决反对。1959年国务卿杜勒斯去世之后，国务院放弃了对“大规模报复”政策和北约政策的控制权。战区核武器的出现不仅没有加强北约的实力，反而引起了新的政治问题。

当“新面貌”政策扩大到亚洲时，战略核威慑与前沿集体防御之间的协调也同样困难重重。为了遏制苏联与中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创建了一个同盟国的网络。这样就可以保护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基地，加强亚洲盟国的常规力量。政府很快同南朝鲜（1953年）和台湾（1955年）这两个天生的反共独裁政府缔结了双边条约。两个条约都指出，双方认为“在太平洋地区对任何一方的武装攻击……都会被另一方看作是对自己的和平与安全的侵害”，并保证各方采取共同行动来应付危险。重新武装日本这个问题则更加困难。虽然同意将其国家警察改建成自卫队，但除保持一支23.1万人的最低限度的空、海和陆军部队外，将不承担任何其他经济与政治义务。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政府拒绝充当地区的军事领袖。在1960年日本同美国签订普遍安全条约之前，它争得了美国不将核武器运进日本的承诺。

美国将防务扩大到东南亚是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因为南朝鲜和台湾都不反对美国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也不反对同其共产党邻居作战。当中共军队同国民党军队在中国沿海发生交战时，一些在野人士开始指责艾森豪威尔政府同南朝鲜与台湾缔结条约是不明智的举动。1953—1954年，国民党军队从金马、马祖和澎湖列岛出发，对大陆发动了海上袭击，并向那里派遣了特务。共产党军队进行了报复，威胁要发动入侵，并且用远程火炮进行了轰击。美国政府一面说服蒋介石放弃那些最不易防守的岛屿，并限制其行动；一面又增加对蒋的援助以维持对它的影响，并将第7舰队的部分力量部署在台湾海峡。美国还在台湾部署了可携带核武器的飞机和可发射核炮弹的火炮。1958年，金门—马祖危机再起，美国又承担了同样的义务，尽管美国在南朝鲜部署了军队和战术核武器，但保卫南朝鲜也不是毫无风险的，因为非军事区沿线的边界事件层出不穷。如同与台湾国民党的结盟一样，同南朝鲜结盟也使美国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即无论是其敌人还是其盟友都可以将政治行动乃至军事行动强加给美国。

艾森豪威尔政府深知亚洲的危险，因为它在1954年遇到了最大的一次危机，当时法国军队在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一败涂地，艾森豪威尔考虑过采取军事行动（包括使用核武器）打击包围奠边府的越盟军队的可能性，但发现他的文职和军人顾问及北约盟国都对“大规模报复”不感兴趣。尽管雷德福海军上将主张采取军事行动，但陆军参谋长马修·李奇微担心只有动用地面部队才能阻止越盟军队。由于无法肯定仅仅通过空中打击是否可以扭转法军的败局，所以艾森豪威尔敦促法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1954年7月，法国和越南共产党在日内瓦一致同意对越南进行暂时分治，并同意老挝和柬埔寨获得独立。由于越南的前途尚吉凶难卜，美国政府便匆匆忙忙加强了东南亚的非共产党势力。它一方面为越南（南越）提供援助，并从事反共秘密活动；另一方面又于1954年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中只有巴基斯坦和泰国是新的盟国，因为美国早已同英国、法国、菲律宾、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缔结过条约。该组织不同于北约，没有规定集体采取军事行动的保证。1954年9月的附加议定书将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范围扩大到老挝、柬埔寨和南越，翌年2月参议院以82对1票通过了条约，附加议定书也开始生效。

杜勒斯也注意了同中东国家缔结条约。1955年，美国一面施加压力，一面许诺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使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加入了土耳其和英国的《巴格达条约》。这个条约的主要目的是阻止苏联对盛产石油但政局

不稳定的中东施加军事压力，而英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已今不如昔了。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它可以利用代理人（包括以色列在内）来限制苏联的影响和阿拉伯的民族主义。但到第二年它便发现核武器、结盟政治和石油这三者不能融为一体。当激进的埃及总统加马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收回了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后，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一起策划入侵埃及，以夺回运河。尽管以色列的陆军和空军部队在西奈半岛大败埃及军队，但美国却对其北约盟国施加压力，要求它们放弃对运河的远征，美国甚至让第6舰队进入阵位，作好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艾森豪威尔之所以如此担心，部分原因是莫斯科方面含糊地暗示要卷入中东战争，从而出现了核冲突的幽灵。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对巴格达条约组织的作用不甚满意，于是又在1957年宣布美国将承担新的义务，即凡受到任何由“国际共产主义控制”的国家入侵威胁的中东国家，美国都要为之提供援助。总统得到了国会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认可，国会还批准了总统提出的要求提供2亿美元援助的申请。除巴格达条约组织成员国外，只有黎巴嫩和以色列赞同国的政策。1957—1958年，美国政府在中东的遏制政策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一批激进的陆军军官推翻了伊拉克的君主制度，而另一些激进的泛阿拉伯主义者在叙利亚和埃及的支持下威胁着约旦的君主制度和黎巴嫩软弱的联合政府。艾森豪威尔府发现了这背后有苏联插手，因为苏联扩大了向埃及和叙利亚提供的军事援助。虽然美国的财政援助和英国的军事存在帮助于国王侯赛因稳定了政权，但黎巴嫩的局势却演变成了一场内战。为了防止发生政变并安排谈判来解决问题，美国于1958年7月出兵1.5万人占领了贝鲁特。这再一次证明核威慑对地区性冲突和美国的地区性利益基本不起作用。另外，光靠军事援助（1950—1963年为中东提供的军事援助为43亿美元）并不能取代美国的军事存在。

在50年代，尽管美国拥有核力量，但拉丁美洲的反共形势却每况愈下。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军事专制政权被推翻后，共产党并没有马上从中捞到好处，却同激进分子一起搞农村起义和恐怖主义活动。在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领导的游击队发动宣传和军事攻势，同一支不属他们控制城市游击队遥相呼应。由于受到国内压力，加之美国又暂时中断了军援，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于1959年1月被废黜。翌年，卡斯特的革命政府投靠了苏联，迫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古巴实行经济制裁，并命令中央情报局组织反卡斯特的流亡分子发动了一场入侵。卡斯特罗在美国的大门口取得的胜利，使“大规模报复”战略破产了，未能慑止住西半球的共产党颠覆活动。

艾森豪威尔政府并没有因外交政策出现危机而改变其“新面貌”政策，因为总统要坚决维持既定的国防开支限额。面对经济萧条、国外问题日益严重、预算不平衡、国会难以控制、预算不断增长、国防预算压力增大的情况，艾森豪威尔在他的第二任期中强迫各军种压缩其重点发展计划。海军制造第二艘核动力航空母舰的费用被砍掉了，新的造船计划只能满足原计划的2/3。倍受宠爱的空军保住了其137个联队的计划（50年代制定的目标），但也只有通过削减兵力才能维持其开支。强调了战略空军司令部就得从战术空军司令部、防空司令部和军事空运司令部中裁减一些联队。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也削减了兵力，砍掉了旨在增加火力和机动能力的计划。

四、“灵活反应”战略使美国夺回了冷战主动权

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建设一支强大的预备役部队可以应付任何可能发生的常规战争，而且可以减轻经费负担，因为10名预备役人员所需的费用大体只相当于1名全训军人。顺理成章的是国防部强调要提高预备役部队的战备程度，但发现预备役人员严重不足。虽然1952年的法案规定预备役部队的兵力限额为250万，但实际只有70万人在部队中受训。政府建议预备役部队实行征兵制，并将老兵强制编入国民警卫队。但国会也企图插手预备役部队的改革。在《1956年预备役部队法案》中，国会将预备役部队的兵力限额提高到290万并放宽了服预备役的条件。一些人可直接加入各军种预备役单位，然后服2年的现役，再转到预备役部队受训3年。其他一些人可直接进入部队，服3—6个月现役，再转到预备役部队服8年的义务预备役。1957年，陆军要求国民警卫队的人员要先进行现役训练。由于实行了征兵制，这项计划得以顺利执行，到1960年，领取训练费的预备役人数增加到将近100万人。

依靠预备役部队并未命名陆军出现预期的“新面貌”，因为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在其战斗人员减少的情况下努力寻求更大的战场机动能力和火力。在核条件下作战，分散与机动的能力至关重要，陆军通过命名其装甲师现代化，并使步兵乘坐装甲人员输送车作战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难题。另一个办法是装备部队运输用直升飞机。在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航空兵中，固定翼飞机驾驶员占据了主导地位，主张利用直升飞机的先驱者们批评部队的组织结构不合理，在利用直升飞机运送部队这一点上各方都没有引起多大争议，只是在发展经费上众说不一。1956年以后，海军陆战队对步兵营进行了改编，使之可用直升飞机运送。到1960年，陆军已组建了12个直升机营。

主张使用直升飞机的人还看到直升飞机作为一种近距离火力支援武器的潜在前途，特别是用来反坦克。海军陆战队中的固定翼飞机驾驶员认为没有理由命名用直升飞机去取代现有飞机的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扼杀了武装直升飞机的研制。然而陆军中主张使用直升飞机的人却使其上级相信空军将不会给予运输直升飞机以足够的支援，到50年代中期，陆军的步兵与航空兵训练中心成立了号称“空中骑兵”的直升飞机部队。1956年，国防部长办公室作出决定，陆军将不研制固定翼运输机和攻击机，空军也没有提作战理论的问题。该委员会的报告认为，陆军应对直升飞机（包括武装直升飞机）进行垂直进攻的理论进行一次大试验。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都坚决要求为研制直升飞机拨款，因为直升飞机的发展越来越肯定空中机动部队将成为常规部队的先头突击部队。

50年代的外交政策危机和军队的内部建设经起了学术界对有限战争理论的极大兴趣。起初，分析家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问题上，但到了50年代末，他们提出的主要建议已集中到了加强常规部队的水平，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泰勒将军1960年写的《音调不定的号角》和罗伯特·奥斯特古德写的《有限战争》。从理论上讲，美国避免任何规模的核冲突的最佳办法是，加强非核的空中和地面部队的部署能力，使之随时都能对付共产党对盟国发动的入侵。1960年的战略热点是“灵活反应”战略，它引起了新闻记者和政治权威们与日俱增的热情。

约翰·肯尼迪入主白宫后，主张摒弃“新面貌”政策，制定更加合理有

效的国防政策。在 1960 年同理查德·尼克松竞选总统时，国防改革就是肯尼迪的一个主要观点，他坚持认为需要有一种更有力、更富创新精神的方法来落实遏制政策。新政府把“灵活反应”当作其国防政策的基础，要求美国以相应的力量去对付各种程度的共产主义的军事威胁。只要能在不升级到核战争的前提下，保持地缘政治结构的稳定，就将取得胜利。在肯尼迪的个人魅力、冷峻的幽默感和旺盛的求知欲的外表掩盖下，他有着一种强烈的自由主义浪漫思想色彩，因此，他的主要兴趣都在那些非白人的发展中国家。肯尼迪的那种传教士般的冲动更加强了政府的这一信念，即认为由于存在着核威慑和北约与华约的力量大体均衡的因素，使得军事竞争的方式和地点都发生了变化。最可能出现的威胁是“人民战争”或以乡村为根据地的左派革命。这种共产党暴乱可能发生在拉丁美洲、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肯尼迪并没有忽视北约，但他认为由于中苏分歧日益扩大，未来的主要冲突将会发生在欧洲以外的地区。

总统的个人素质和政治倾向也是他采取“灵活反应”战略的基础之一。1960 年选举之后，共和党人继续攻击他缺乏经验，继承了大笔财富，信奉天主教，以及机会主义等。肯尼迪不愿被人指责为对共产主义采取绥靖政策（他不同于尼克松，确实认为共产主义不是铁板一块），便满腔热情地支持遏制政策。另外，肯尼迪采取“灵活反应”战略还出于他对美国经济关误解的乐观估计。肯尼迪的经济顾问们认为，美国可以负担得起 500 亿美元的国防开支，而不会加剧通货膨胀或引起其他经济弊病。实际上，政府认为，增加国防开支同减少税收是一个道理，可以通过将政府投资投入公众舆论都十分关注的国防建设的做法，促进停滞不前的经济的发展。增加国防开支还可使国内的保守派支持“新边疆”政策。

肯尼迪政府断定，通过使国防决策权更加集中和加强文官在国防决策中的权力，可以加速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参议院由亨利·杰克逊牵头，对国家安全决策作了一次调查，要求政府进一步限制军种之间的竞争，总统选举过后，另一位民主党国防问题专家、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也作了一次研究，要求进一步集中进行国防管理。在詹姆斯·加文和马克斯韦尔·泰勒等退役将领的指导下，总统认为各军种部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支持下，成为妨碍有效地制定国防计划的主要障碍。在国家安全部门供职的文职人员也持同样的看法。在东部一些大学、基金会、银行、法律机构和西部一些实验室以及兰德公司的支持下，一些“国防精英”相信自己可以使行政部门的组织体制发生一次革命性的变化。

国防部既是改革的对象，又是改革的工具。肯尼迪的顾问人员鼓励他为五角大楼注入新的活力，于是，他便任命了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裁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为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是一个靠自我奋斗起家的百万富翁，对国内问题持温和态度，他与其“新面貌”时间的前任截然不同，因为他在公司工作时，已经养成了与众不同的对国际事务的兴趣。从他的国防部长办公室工作班子的组就可以看出，他对文官控制下的集中化国防决策充满了信心。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赛勒斯·万斯、威廉·邦迪和保尼·尼采等人继承了其先贤迪安·艾奇逊和罗伯特·洛维特的行动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传统，而来自劳伦·利弗莫尔实验室的哈罗德·布朗领导着一个由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负责军事研究与发展工作的小组，查尔斯·希契、威廉·考夫曼和阿兰·思索文等人则来自兰德公司，准备发挥其作为经济分析家的一技之长。

麦克纳马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是陆军航空兵中的管理专家，后来又在福特公司工作了 15 年，他利用这些经验，组织起国防部长办公室的这个强有力的工作班子，这个班子被支持称赞为真正的“国防精英”，而批评者则谤之为“狡童”。麦克纳马拉实力雄厚，能说会道，善于说服人，很快就成为白宫的“灵活反应”战略的主要制定者。

麦克纳马拉在确信能得到肯尼迪的全力支持后，便采取了一系列决策方面的改革措施。他改变了原有的预算程序，要求各军种采用东部商业管理学校新近流行的计划规划预算制（PPBS）。麦克纳马拉要求按职能（如战略威慑）而不能按“输入”（如拥有的人力）来编制国防预算。他制定了“国防五年计划”，按 5 年通盘考虑而不一一年一度的估算费用，并将国防开支按任务划分为战略部队、一般任务部队、战略空军与海上机动部队以及更小的类别，从而打破了各军种间的界限。通过改革预算程序，麦克纳马拉使其分析人员更容易采用系统分析方法，这是一种高度量化的技术，可用来分析“投资效益”，即预测不同规模的投资与军事力量增长的关系。

系统分析的方法使得希契、布朗、思索文及其同事们可以（至少可以根据和情况）比较出执行相同或类似任务的武器计划的相对价值。此外，这一程序迫使各军种必须调查各项武器计划的费用情况，重视分析一种武器在其全寿命期间（可能延续到今后的 20 年）的各种费用（人员、保养、改进、部署等费用）。在新设立的负责系统分析的助理国防部长办公室的苦心努力下，这种新技术得到了多方面应用。利用这种方法可以拒绝各军种的要求，驳斥职业军人所作的无法量化的判断。它还有助于运用“通用性”来作为提高效率的手段。这就要求成立一些新的机构，如国防情报局（1961 年）和国防供应局（1961 年），还要求研制一种空军和海军通用的 TFX 型战斗机及各军种共同使用的野战服和作战国防部长办公室综合利用系统分析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技术（如博弈心理理论），甚至可涉及战略理论领域。

麦克纳马拉在五角大楼的“革命”使“灵活反应”战略一直持续到肯尼迪死后。这场“革命”使军队和国会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以至要经过一场战争和为期 10 年的教训与政治斗争，才使其设想黯然失色。计划规划预算制和系统分析等国防管理方法获得的成功（这种成功一靠总统的支持，二靠国会的混乱）使利用这些方法的人手中的权力从发展军事力量扩大到使用军事力量。实际上，国防部长办公室和国防安全委员会已对国务院构成了挑战，成为决定美国政策（只要该政策带有军事意义）的主要机构。在近 10 年的时间中，在麦克纳马拉旗帜下前进的文官和军官成了最有势力的“卡米洛”骑士。

麦克纳马拉的工作重点是改进国家的战略核力量，保持一支具有生存能力的第二次打击力量。麦克纳马拉很快就了解到了核战略的残酷现实，但他难以找到在经济和战略上都合理的方法来制定部队发展计划。1961 至 1966 年间，国防部长办公室对战略威慑作了一系列复杂的量化研究，包括模拟威慑失灵时可能发生的核战争的情况。麦克纳马拉一面考虑各军种的计划，一面有自己的盘算，他竭尽全力想的一种切实合理的制定部队发展计划的办法。但他一无所获。起初，他认为美国应重点发展打击苏联战略力量和其他军事目标的能力。他在 1962 年的安阿伯学中解释其“不打城市”的理论时，认为它可以确保威慑，一旦发生战争也可以限制损伤并控制战争的升级。当麦克纳马拉仔细地审查了这种打击军事力量的战略之后，他又从这种战略上

后退了。核武器的数量并不能带来经济和战略的保证。如果美国计划在苏联对美国的战略力量实施第一次打击之后再对苏联剩余的力量进行报复，那么美国所需的发射数量将达到天文数字——而且会被视为美国的第一次打击力量而对苏联构成潜在威胁。正如麦克纳马拉对空军所说的：“活见鬼，如果你们坚持大谈成千上万枚导弹，就是在大谈先发制人的攻击。”如果美国这样一支力量，就可能使苏联人因恐惧而发动一场双方都想避免的那种战争。

麦克纳马拉又朝“新面貌”时代的那种有限威慑战略上退缩了。此举激怒了军事计划人员，同时也因承认“大规模报复”战略并非一无是处而冒政治上的风险。麦克纳马拉深知，现在要保持一支具有生存能力的威慑力量远比苏联开始部署洲际弹道导弹以前更加困难了。他竭力想找到一种可以接受的部队结构，既要能在最坏的情况下“确保摧毁”，又要具有有限的打击军事力量的能力。为了便于制定计划，他提出美国的力量应能摧毁苏联 25% 的人口和 50% 的工业。后来，他又承认到 60 年代末美国的力量将可摧毁苏联 50% 的人口和 80% 的工业。可是，谁知道是多大摧毁的威胁慑止了苏联？或是这种威胁力量是否真的对苏联起到了作用呢？

由于这些问题得不到回答，麦克纳马拉便接受了这样一种力量指标，即保有的发射装置为艾森豪威尔计划在 60 年代应有水平的 3 倍。尽管如此，该计划仍未能满足军方的要求，军方仍固执地坚持“统一综合作战计划”的设想。到 1963 的底，麦克纳马拉的计划已基本就序。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将增至 1000 枚左右，介于“新面貌”计划中 600 枚和空军要求的 1450 至 2000 枚之间。洲际弹道导弹力量的核心是两种新型号的“民兵”式固体燃料导弹。潜艇将从 29 艘跃增至 41 艘，携带 656 枚导弹。轰炸机将从 1500 架的高峰减至原来的一半，但其能力将进一步加强。

麦克纳马拉对“确保摧毁”所需力量进行的分析，部分依照了对苏联洲际弹道导弹计划在 60 年代的前景所作预测。这种分析命名麦克纳马拉更加深信，苏联有朝一日会同美国达成核均势。这个结论既不能改善部队发展计划，也不能巩固肯尼迪的政治前途。麦克纳马拉审查了空军的轰炸机方案，重新制定了战略部队发展计划。他砍掉了 B—70 型超音速高空轰炸机和机载的“空中闪电”式导弹。美国现在可以通过提高弹头的命中精度，来减小弹头的当量，这一新的发展将使美国可以在发射井中部署的和潜艇动载的下一代导弹上安置更多的核弹头，在麦克纳马拉限定了发射装置的数量后，很快就批准研制可打击不同目标的分导式多弹头再入飞行器，作为对付苏联第一次打击的又一种赌注。麦克纳马拉热衷于发展由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轰炸机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战略力量，因为他所进行的研究表明，这样一种力量的组合可以制止对方发动旨在解除美国核武装的第一次打击，确保以打击城市作为报复的最终威慑。尽管批评者们认为，“确保摧毁”战略仅仅是“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旧瓶装新酒，但麦克纳马拉的计划中已包括了强大的打击军事力量的潜力，而且到 1967 年已完成了这个计划。

麦克纳马拉不肯接受建立积极与消极防御系统对付苏联导弹攻击的方案，因为他认为，无论从战略、经济和公众的无知程度看，这种防御都是不得要领的。虽然为国防部长办公室改善了轰炸机防御系统，而且支持对卫星与地面雷达监视系统进行重大改进，但麦克纳马拉驳回了军种提出的发展反弹道导弹的计划，直到 1967 年，国会和林登·约翰逊总统才迫使他同意最低限度地发展反弹道导弹。麦克纳马拉决不认为陆军不能击中一枚来袭的弹

头，他只是认为苏联只要略微增加弹头数量就可以对付要地防御或地区防御系统。麦克纳马拉还将同样的逻辑推理延伸到保护城市居民免遭核武器效应的危害方面上。从技术上讲，如果发生战争，防御放射性微粒的掩蔽部无疑可以保护一些生命，但建立一些这样的公共掩蔽部需耗资约 400 亿美元，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的估计费用也大体相当。麦克纳马拉的战略顾问人员还担心，民防系统会使苏联人判断美国人以为他们可以打一场核战争并生存下来。1961—1962 年，政府关于建立最低限度的掩蔽部的计划得到了公众的狂热欢迎，麦克纳马拉又依靠“确保摧毁”战略找到了一个借口。

肯尼迪政府还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不愉快的事实，既没有哪种简单易行的技术手段可以消除核战争的风险。肯尼迪政府继承了艾森豪威尔政府进行的军备控制谈判的做法，尤其是关于限制核试验的谈判，因为大气层中核试验的放射性效应促使公众要求禁止核试验。与此同时，美国和苏联都一致断定，限制核试验可以将其他国家排除在核国家之外。1963 年 10 月，美国、英国和苏联同意今后只进行地下核试验。后来，其他一些国家也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了字。在核时代，军备控制第一次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

核威慑面临的诸多难题进一步促使肯尼迪努力改善美国的一般任务部队。“灵活反应”理论的核心就是，设想使用非核部队去进行威慑和作战，可以减小核升级的可能性。麦克纳马拉满腔热情地接受了这种看法，认为美国需要拥有能打“两个半战争”的常规力量使美国既可以成功地保卫北亚和欧洲，又可以保卫盟国范围内的任何受到暴乱威胁的国家。虽然美国并没有真正达到这样一种战备水平，但政府将武装部队增加了 25 万人，还将新增加的国防开支（每年约 100 亿美元）的 80% 用于发展常规力量。

“灵活反应”战略给北约带来了多方面的后果，因为其目标本身就是多方面的。首先，麦克纳马拉的专家们通过经济分析和传统的作战序列分析的方法，仔细研究了苏联的武装力量，断言苏联的真正威胁是 46 个师，而不是“新面貌”战略的计划人员估计的超出此数一倍的力量。常规防御似乎是真正的选择。在美国的倡议下，北约在中欧的军队从 21 个师增至 27 个师，飞机从 3000 架增至 3500 架，武器的现代化也继续加速进行，使盟国的战斗力得到了加强。1963 年，北约的年度军事演习中包括了从美国向德国增调部队的行动。随后，陆军便加快了为增援部队预贮武器、车辆和全部物资。然而，北约的核武器及争议很大的美国诚略威慑的可靠性等问题给联盟带来了一些混乱。北约防务计划人员于 1967 年在第 MC14/3 号文件中正式批准了“灵活反应”战略，这就意味着美国可能不会为西欧去冒核战争之风险。饶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北约的部队发展和战略减少了对战术核武器的依赖时，联盟内部发生了另一次重大变化，使战争初期出现核升级的可能性再度死灰复燃了。

在北约通过第 MC14/3 号文件之前，肯尼迪政府就已尽一切努力向北约国家的领导人保证，“灵活反应”并不意味着抛弃了北约。但它同时又发出与此自相矛盾的信号。1962 年，美国砍掉了一项耗资巨大的空射导弹研制计划，而这原是准备使英国的战略轰炸机现代化的方法。美国还坚持自己不帮助法国发展核武器的决定。戴高乐总统之所以坚持发展核武器，有其国内的原因，但其主要目的是削弱英、美对欧洲的影响，并使苏联对法国的政策更难作出估算。法国的核理论家们不赞同麦克纳马拉关于法国核力量会破坏威

慑稳定性的观点。法国反而是坚持说，它的核力量还可以弥补“灵活反应”战略造成的信誉差。为了加强法国在军事上的独立性，戴高乐于1966年宣布，法国将退出北约的军事一体化组织。这一决定使北约失去了其后勤保障的地理纵深，并对北约飞机关闭了法国空军基地。法国部分退出北约使苏联意识到，北约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可以用高明的外交手段来利用这种分歧。此外，法国此举使西德成了欧洲大陆的北约重要盟国，使北约屈从于西德提出的采取前沿防御并尽早使用核武器的要求。

麦克纳马拉竭力加强军队在下使用核武器情况下的机动能力和作战能力，反映了“灵活反应”战略的实质。尽管麦克纳马拉怀疑建造动力航空母舰是否明智，但他允许海军航空兵实现现代化，并允许海军保持24艘航空母舰。他还批准了一项两栖部队的建设计划，允许海军陆战队保留2个师或飞机联队的力量。麦克纳马拉还敦促陆军加强野战部队的火力与机动能力。虽然陆军增加了2个师，但其改革主要是体制上的。办法之一是陆军改编了其装甲师和机械化步兵师，使之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装甲部队，具有灵活的编制体制和战术思想。另一方法是，将陆军航空兵的发展计划置于最优先的地位。1962年，麦克纳马拉作出了两项重大决策，开创了空中机动时代。他成立了一个由陆、空军联合编成的“打击司令部”，将陆军中机动能力最强的部队（2个空降师）与战术空军司令部和军事空运司令部合为一体。麦克纳马拉还批准大大扩充战术空军司令部和军事空运司令部，特别是采购了一些大型战略运输机。他还组织陆军对空中战术机动问题进行了一次内部研究，建议组建一个完整的空中突击师。该师不仅可以运送步兵作战，而且武装直升飞机组成的“空中骑兵”部队可以不采取地面行动便独立地攻击敌军。此外，陆军还加强了每个师的直升飞机力量。与此同时，陆军限制了固定翼飞机的发展，以缓解空军对于陆军不久将可以全部承担其自身的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的担心态度。

麦克纳马拉还审查了“新面貌”政策下的预备役部队，对其结果不甚满意。1961年6月，肯尼迪在维也纳同赫鲁晓夫会晤，就国际政治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肯尼迪回国时感到灰心丧气，因为他给苏联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位软弱的领导人。8月，赫鲁晓夫建立了柏林墙，不许避难者逃往西柏林，接着又对盟国在该城西部的控制权进行威胁，此举更加深了肯尼迪的担心。麦克纳马拉将14.8万名预备役人员征召到现役部队，一方面是为了加强战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发出外交信号。征召的结果喜忧参半。空军的国民警卫队和后备役部队以及海军的空中和水面部队的战备水平尚佳，但陆军后备队和陆军国民警卫队在训练、人力、装备和热情方面都严重不足。翌年解除动员后，麦克纳马拉建议合并陆军和空军的后备队与国民警卫队，在国会引起了轩然大波。麦克纳马拉转而采取了一种较温和的办法，规定空军和陆军国民警卫队的主要任务是提供作战部队，空军和陆军后备队的任务是提供支援。他还为“精选”预备役部队增加了训练经费，并支持预备役部队内部的改革，将领取训练费的预备役人员从93.7万减至87.1万，但却提高了部队的战备水平。

“灵活反应”战略遇到的一个重大考验来自古巴，卡拉特罗在那里已对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统治构成了威胁。卡斯特罗使古巴成为输出革命的堡垒，这种威胁激怒了美国政府。它还使共产主义的颠覆活动扩展到全球。1961年1月，赫鲁晓夫在一次重要演说中强调指出，苏联将支持“民族解放

战争”，保护在这种战争中建立起来的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堡垒。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和中国的国防部长林彪也都讲过类似的话，这些言论使肯尼迪政府认识到，美国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阻止共产主义颠覆。正如肯尼迪对其最亲密的顾问人员所说的，美国将不得不更加注重于反暴乱作战的能力。1961年4月，肯尼迪决定秘密组织古巴流亡分子入侵猪湾，这次拙劣的行动证明了肯尼迪自己和美国的无能。这次代号为“萨帕塔方案”的行动既非真正的秘密行动，也非常规入侵，而是寄希望于古巴内部根本没有发生的暴乱，而且空中掩护不足，部门之间的协调极差。经过对这次行动的一系列事后分析——其中最重要的是由肯尼迪的私人军事顾问马克斯韦尔·泰勒组织的，美国政府责成中央情报局、国际开发署、美国新闻署和武装部队把反暴乱置于最优先的地位。肯尼迪还亲自插手了反暴乱活动，成立了由其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以及泰勒和麦乔治·邦迪把持的反暴乱特种部队。

正如一句古老的格言所说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肯尼迪于1962年批准了一次联合演习，检验一项入侵古巴的紧急计划。经中央情报局行动处审查后，肯尼迪同意了这项代号为“猫鼬行动”的计划，其中包括了一系列由古巴流亡者和中央情报局联合推翻卡斯特的方案。肯尼迪还亲自过问陆军特种部队的发展和改革情况，这是2000人的不为人知的精锐部队，其任务是发生全面地在亚洲和东欧组织从事破坏活动的小分队。麦克纳马拉在国防部长办公室之下也组建了自己的特遣部队，并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类似组织协调一致。为了使陆军率先发展反暴乱部队并研究其作战理论，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增加了陆军的军事援助，增建了民事训练班，并为高级文职官员和军民举办关于反暴乱作战的学术座谈会。然而，首当其冲的是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部队及其他各种特种部队），因为总统赋予他们任务是帮助当地村民、民兵和外国的别动部队去同共产党游击队作战。1961年11月，第一批特种部队被派至越南中部高原地区投入作战。但美国政府反暴乱作战的主要地区仍是拉丁美洲。

无论对美国还是苏联来说，卡斯特的生存都经历了一个非同寻常的阶段，因为苏联已开始向古巴提供大批顾问人员、地面武器、飞机和防空导弹。1962年夏天，来自古巴的情报说发现了新的导弹，但对此进行的进一步调查却认为这些导弹设施只是防空系统的一部分。然而在9月，空中越界侦察飞机发现了警报信息，苏联正在为SS—4型和SS—5型中程核导弹修建各种设施（包括萨姆导弹连）。10月中旬，肯尼迪及其顾问人员得到结论，苏联不久即将在离美国南海岸不远处完成40枚导弹的部署。在分析了苏联此举的国际政治影响之后，肯尼迪决定迫使苏联撤出这些导弹。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和平解决表明，“灵活反应”战略及其加强战备的计划是明智的。严阵以待的美国战略力量，尤其是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对苏联构成了如此巨大的威胁（当时苏联仅有的30枚洲际弹道导弹），以至于双方不可能发生核交锋。北约的常规力量（及其战术核武器）也可确保苏联会在中欧作出反应。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和反潜部队保持了海上力量均势，肯尼迪利用这一点宣布对古巴实行了有限的海上封锁。当肯尼迪同赫鲁晓夫互通既有威胁也有让步的信息时，麦克纳马拉已在加勒比海的南部集结了一支准备入侵古巴的部队，其规模可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组织的特遣部队相提并论。11月初，苏联同意撤出其导弹，作为交换条件，肯尼迪答应不再入侵古巴，危机就此结束，肯尼迪政府总结这次危机中的外交胜利的经验

时得出的结论是，政治意志、战略核优势和常规部队的高度戒备状态相结合，才迫使赫鲁晓夫除了撤退之外别无选择。“灵活反应”战略同有节制的升级威胁结合使用，使得美国夺回了冷战的主动权。1965年4月，林登·约翰逊总统派出了一个海军陆战旅和第82空降师的部分部队，平息了多米尼加的内战，再一次证明了上述结论。但至此为止，“灵活反应”战略在东南亚经受的考验尚未导致对美国国防政策重做出重大评估。

第十四章 十年恶梦的开始

- 一、“山姆大叔”亲自出马
- 二、独裁南越的“基督徒”
- 三、新上任的年轻总统的困惑
- 四、“绿色贝雷帽”进入南越
- 五、血腥政变使政局更加动荡
- 六、将战争推向北方的秘密行动

一、“山姆大叔”亲自出马

1954年3月13日17时，越南的奠边府炮声轰鸣，经久不息，震耳欲聋，大有天崩地陷、排山倒海之势。这轰鸣的炮声宣告了法国殖民主义者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的统治的彻底结束。

1954年5月份，旨在结束法国殖民主义势力同胡志明的共产党领导的越南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战争的日内瓦会议如期召开。美国、法国、英国、苏联和中国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越南总理范文同到会。

这时候，越南人赢得奠边府大捷，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领导的法国新政府也准备妥协。法国采取和解政策是现实主义的和实用主义的。越南仍然能够体现法国的全球影响。法国在越南南北方有巨额的煤矿、水泥和重工业投资，在南方有橡胶和其它种植场投资。这些投资在经济上还能获得利润，但在一个统一的、和平的越南则是可能获得利润的。如果政治上的合作失败，但只要法国仍然保持在越的工业和技术人员，情况依然不致十分糟糕，因为北方需要法国的工业和技术力量以进行战后重建。因此，孟戴斯——弗朗斯总理在奠边府之战后立即着手寻求与越盟和解的途径，从日内瓦派让·圣特奈少校去河内以建立新的文化与经济关系。深受长期战争折磨的法国人最重要的事是要在家医治好伤口，与越南取得谅解便是治伤的途径之一。法国不希望在奠边府失败以后，又在日内瓦蒙受耻辱：它是和平的保证人，必须表现出诚意。法国甚至选择胡志明作为未来全国大选的既定获胜者。

美国对法国人在奠边府惨败后争取胜利的意志一蹶不振感到不可理解。美国认识到胡志明将成为选举的既定获胜者，与此同时，又决心阻止这一局面出现。他们害怕胡志明的胜利将使东南亚一系列小国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接二连三地倒掉。在国务卿杜勒斯看来，法国人在日内瓦的表现无异于“投降”，更为糟糕的是，他们积极与河内交善的行为无异于是在加速胡志明一统天下的到来。

美国躲在幕后策划已经不可能，民族独立的汹涌浪潮已使老牌殖民主义法国低头认输，于是，“山姆大叔”决定亲自出马，从幕后径自走到台前，在越南寻找代理人，直接发号施令了。

经过与会各国的共同努力，7月21日，日内瓦会议在越南问题上终于达成协议，《日内瓦协定》规定，沿越南17度线划一条临时军事分界线，正式把越南分为两部分，越南人民军和法军分别在此南北地区集结实行停火；法国承认越南的独立，法国撤出印度支那地区；越南全国在1956年7月举行全国自由选举等。同时，在协定中还规定了不准外国在印度支那建立军事基地。虽然当时美国也参加了日内瓦会议，但它拒绝在协定上签字。后来怕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美国代表被迫发表了一项声明，说美国不使用武力威胁来妨碍日内瓦协定的实施，什么叫“不使用武力”威胁？从这项声明中就可以看出美国很想插手印度支那问题，美国为自己今后进行武装干涉留下了余地。

就在协议签订不久，美国就背弃了自己的诺言。

1954年9月6日到9月8日，美国召集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七国外长在马尼拉开会，共同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马尼拉条约）。该条约规定：在东南亚或西南太平洋地区任何缔约国或条约保护国若遭武力侵略，各缔约国将按照本国的宪法程序采取行动来对付共同危险；在同一地区内，任何缔约国或条约保护国若受到“武装

进攻以外的任何方式的威胁”，各缔约国将立即磋商，以达成采取共同防御行动所需的协议等。该条约将越南（即南越）、老挝和柬埔寨指定为条约保护国，从而使印度支那三国纳入了美国的防御体系，为其进一步干涉提供了借口。

《马尼拉条约》是对《日内瓦协定》的公然践踏。把南越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来看待，并把它与老挝和柬埔寨纳入条约的保护范围，完全违背了《日内瓦协定》的内容和精神。

美国总统在日内瓦会议结束后曾强调，美国必须同南越既反共也反法的“民族主义”者合作，使他们把美国当作必须依靠的朋友。

二、独裁南越的“基督徒”

为了进一步控制南越，美国必须找一个符合美国人意志的人，来充当美国的代言人。1954年7月7日，长期寓居巴黎以及对腐败现象软弱无力而失尽民心的南越国家首脑保太突然指定吴庭艳为他的首相。吴庭艳何许人也？能中美国人的意愿吗？

吴庭艳，1901年1月出生在南越顺化一个贵族家庭，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父亲吴廷国，是一代文人，曾任职于安南朝廷的礼仪和宫监大臣，后来成为首相。1921年，吴庭艳从法国行政学院毕业后，即进入越南殖民政府工作。一度飞黄腾达，1929—1933年任首长，1933年5月，任保太王朝宫廷内阁部长，后辞职隐居。

吴庭艳是作为一名民族主义者而闻名的，既反抗法国人，也反对越盟，做过20多年的高级公职人员。法国人在日本投降后重新占领越南后，他自动选择了流亡国外的生活。他起初定居比利时，后来则定居美国。吴庭艳和美国上层人物早有瓜葛。他在美国的保护人中有最高法院的比尔·道格拉斯和参议院的迈克·曼斯菲尔德，后来成为总统的肯尼迪与之过从甚密，是他最大的支持者之一。

在日内瓦会议后，他利用法国撤军的大好时机，在南越组织自己的武装，准备与北越进行抗衡。

美国为了支持吴庭艳建立一个亲美的政府，不惜花大量资金安置从北越经他的煽动迁往南越的人。在几个星期之内，便有85万人移居南方，有8万人左右移居北方，其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曾经抵抗过法国人的游击队干部。与此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四处散布谣言，留在北方继续进行经营活动的企业都将被列入黑名单。结果巴黎和河内关系出现大倒退：到10月11日止，当两个越南形成之时，河内只剩下114名法国商人。

法国认为，当它继续执行日内瓦协定，从北方无条件撤出其最后一批军队时，它的战后和解政策遭到了严重破坏。然而。撤军仪式是友好的。记者威尔弗雷德·贝却迪回忆道，“法国人一段一段地撤离，他们撤离一段以后，越盟便接收一段。有时你可以看到双方的部队——法国人在挥手，越南人在挥手，然后街上便顿时充满了生机和色彩。”

如前面议定的那样，法国人撤离后，胡志明和圣特奈少校便在11月签署经济和文化协定。尽管这一协定的实际价值被大大打了折扣，但胡志明仍然认为与法国的联系是实施日内瓦协议的最佳保障；法国也仍然在极力劝说美国不要卷入越南事端，吴庭艳并不能代表南方，如果胡志明不能够指望法国和西方，他将被迫转向共产党阵营。法国人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试图支持南方反对吴庭艳的一些组织，希望一次政变使吴庭艳和美国方面的兴趣寿终正寝。《五角大楼文件》中引述的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直接总结了法国的反对立场：“法国反对任何可能延缓或导致1956年选举流产的行动”，因此杜勒斯决定直接插手。美国宣布，从今以后，美国的援助将不再通过法国人之手，而将直接交给吴庭艳的西贡政府。

这时候，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方面出现了新的麻烦，同样要依靠美国人的钱包。在经济压力下，法国同意放弃在越南南方的一切政治权威，1955年1月1日，它宣布印度支那退出法联邦，将南越的统治权交给了吴庭艳。在与这一行动完全相反的另一端，法国继续发展它与北方的外交关系，希望能

够以此避免越南的一场新战争。与此同时，美国军事顾问接过了对吴庭艳部队进行训练任务。

1955年1月7日起，根据《日内瓦协议》，越南南北双方之间应进行协商，共同决定普选程序及筹备事宜。

越南北方曾表示，全国同胞，从南到北，不论阶级、宗教和党派，都希望国家统一，期望协商会议早日举行并且获得良好的结果。7月19日，胡志明致函南越政府，就协商提出明确的建议。

吴庭艳集团从一开始就决心阻止普选。他们不仅加紧招兵买马，扩充军队，而且对南越统治区内的抗战有功人员和要求和平统一的人员肆意迫害。

1955年8月9日，吴庭艳政府再次通过西贡电台发表声明，继续否认《日内瓦协定》，拒绝进行任何协商来讨论自由普选以用和平方式统一越南。

越南国际监察和监察委员会对吴庭艳集团破坏《日内瓦协议》的行为进行谴责。

然而能够迫使南越尊重《日内瓦协议》的只有美国，但美国的立场和吴庭艳的基本一致。

美国不仅从政治上支持吴庭艳违反《日内瓦协议》，而且还偷运作战物资到南越。据南越政府内部透露，美国给南越运飞机零件，装备L—19型飞机30架以替代法国的莫兰式飞机，使原来装备缺乏的南越军队装备完善，还扩展了海军和空军。

在《日内瓦协定》生效时，南越政府军原有21万人，到1954年底，由于士兵的大量逃亡和一部分部队的解散，最后只剩下14.5万人，这些部队缺乏训练，士气低落。

那么，美国为了扶植吴庭艳政权，首先想到的是加强他的军队。1955年1月，一个由奥丹尼尔领导的美法联合训练教导团建立起来，主要是总管南越陆军的改组和训练事宜。美军为南越建立了南越民警部队和村级民兵。

在1955年1月后，美国向南越派遣军事人员，将“美驻印度支那军事援助顾问”改为“美驻南越军事援助顾问团”，控制了南越政治、军事、经济和行政权力，取代了法国殖民者的地位，同时积极扶植南越的吴庭艳集团。

随着法军逐渐撤离南越，美国感到驻南越的美国军事顾问团现有人数越来越难以适应加强南越军队的需要。为此，美国采取秘密方式扩大驻南越军事顾问团。

1955年10月，吴庭艳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授意下举行所眉的总统选举。结果，他以百分之九十八的票数获胜。“在那次选举中他根本没有必要作弊的”，中央情报局的兰斯代尔上校说，“我想是他的弟弟将他的组织调出去塞满了一些投票箱，又破毁了一些投票箱。”

吴庭艳同胡志明一样，终身未婚，在国外流亡的岁月里，他也思索着权力的方式问题。他在布鲁日的一个修道院里渡过了一段时间，在修道院的孤独之中他曾思考过一种被称之为“个人主义”的哲学。现在他开始实行个人主义的统治了。他任命他的弟弟吴庭如作为他的高级顾问，他的弟媳为官方第一夫人，他的父亲为驻美大使，他的母亲为驻联合国观察员，他的哥哥为顺化大主教，另外两个兄弟为地方大员——各种各样的亲戚充斥着内阁和高级职位。

他的高级顾问吴庭如建立了一个秘密警察系统，被称为芹老——兰斯代尔怀疑就是这个组织控制了公民投票——吴庭如这时通知兰斯代尔说，他将

在南方举行议会选举，而不是与北方举行联合选举。

吴庭艳上台后，废除了越法货币和通商协商，同时关闭或接管了法国各文化机构。从此，在南越除暂留少数从事训练的法国军官外，法军全部撤走。

1956年1月，由印度、波兰、加拿大等国观察员组成的国际监察委员会报告说，南北双方都没有遵守停战协定。国际监察委员会的发现成了双方互相进行攻击的弹药。当时的加拿大观察员克里斯托夫·达格说，由于双方都缺乏缓和的诚意，致使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从开始就无法有效进行。

1956年春天，随着法国驻越南军队的撤出和印度支那法兰西联邦部队总司令部的解散，美国对印支问题的干涉更加赤裸裸了。

6月1日，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逊竟公开宣布美国将继续给予南越军事援助，并坚决支持南越政权拒绝参加有关越南统一问题的协商。由此，美国妄图长期分割南越，把南越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的意图愈加明显。

越南民主共和国对美国粗暴干涉《日内瓦协定》的行为感到震惊，再次向越南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提出反对南越这一行径，谴责南方政权日益加紧增强军事力量，和美国进行军事勾结，违反了旨在防止越南战争重演的《日内瓦协定》各条款。

美国除了对南越加强援助外，早在1955年3月成立了另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称为“组织、训练、检查代表团”，简称“TRIM”。1956年5月，美国又成立负责对南方军队进行作战训练的军事组织“作战训练机关”，简称“CATO”。1956年6月，美国的一个所谓“临时装备更新团”，代字“TERM”的军事组织开进了越南，总人数达到400多名军官，其中有80名是校级以上军官。

1956年，吴庭艳在美国顾问团的指使下，改组行政机构和重新划分省界，在各省、县建立起军事组织体制。在美国的支持下，南越政权发动大规模“诉共”、“灭共”运动，对赤手空拳的南越民主人士和共产党进行血腥镇压。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大力支持吴庭艳反共，毫不掩饰地说：“南越需要一个拥有警察和宪兵的强有力政府来肃清叛乱分子”，“必须帮助吴庭艳政府组织一些机关枪和小型坦克装备起来的武装部队，来肃清共产党的领导者。”

吴庭艳为了达到“反共”目的，在南方的各省不断进行所谓“诉共战役”，使用公安、警察、国民卫队配合军队开展像战争时期那样的大规模扫荡。先后进行：阮惠战役、瑞玉侯战役、张进宝战役等，造成1224人死亡，4000多人被捕。

许多地方的寺庙、教堂、学校、旧碉堡等都变成了监牢和拷打人的地方。据统计，仅富安省，全省只有52个乡，25万人口，就曾有109个监牢和拘留所。

更令人震惊的是富利集中营事件。

富利集中营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它位于土龙木省，距西贡市33公里。那里实际上是一个偏僻的山村地区。关押着大约6000多名政治犯。1958年12月1日，南越当局在犯人饭里放毒药，致使1000多名政治犯死亡。

这一集体屠杀事件，引起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这也是美国对南越进行干涉的恶果。越南民主共和国揭露了南越政府及美国残酷迫害爱国人士，阻挠南北统一，制造出大量屠杀惨案的罪行。

从1954年下半年到1960年底，被杀害的达7万多人，被监禁的达数十

万人。

1959年5月，吴庭艳颁布1959年10号法令，其中规定是：任何人，凡犯有或企图犯有侵犯“国家安全”罪，或者凡属旨在帮助或犯下此等罪行的组织，一经被控，即由特别军事法庭在3天内判处死刑，不得上诉。在这一法令实施后，1960年秋估计，每月政治逮捕近5000起，比一年前增加了7倍。

在1960年4月，有18名曾任高级官员的不同政见者，在西贡卡拉弗勒旅发表了致吴庭艳的公开信。在信中谴责了政府专制、腐败、否决公民权，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吴庭艳将这些人称为共产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把这些人统统抓起来，关进了监狱。

三、新上任的年轻总统的困惑

美国政府加紧控制南越，阻挠南北统一的同时，又把手伸向老挝。老挝国家并不大，跟英国差不多。但人口稀少，地形复杂，地势北高南低，有“印度支那屋脊”之称。老挝在战略上地位十分重要。

由于老挝与泰国、缅甸、中国、柬埔寨和越南毗连，意味着老挝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和社会主义中国有着共同疆界，便于美国利用这块地方去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老挝还有一个在战略上吸引美国人的查尔平原，因为在那里可以驻扎足够的空军，来控制南中国和东南亚的大陆国家。

美国的设想是，以泰国和南越为基础，完全控制老挝，颠覆柬埔寨王国政府，包括越南民主共和国，以便霸占整个印度支那半岛，威胁东南亚和平中立国家，并进逼中国的南部边疆。

1958年8月，培·萨纳尼空上台之后，执行了投靠美国和公然背弃《日内瓦协议》的政策，迫害爱国民主人士，破坏国内和平团结的政治协议。

从此，美国对老挝进行大量援助，运入了大量武器，建立了美国的军事基地。

与此同时，萨纳尼空政府在万象把苏发努冯亲王和老挝爱国战线党的其他领导人都关进了监狱。并对前寮国战斗部队成员和爱国人士实行疯狂镇压和政治迫害。

面对美国逐步把老挝变成它的军事基地和萨纳尼空集团疯狂挑起内战的形势，老挝爱国阵线党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书，反对美国干涉、反对萨纳尼空集团的卖国殃民政策，遵守《日内瓦协议》，建立和平、中立、民主、民族和睦、统一的国家。

1959年12月30日，老挝极右势力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强迫老挝国王萨旺·瓦达纳把权力交给右派军队。自老挝内战爆发，老挝人民又开始了反对美国干涉，反对右派势力，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

1961年1月20日，约翰·肯尼迪在白宫宣誓继任美国总统。

在就职仪式那一天，卸职的总统艾森豪威尔把他叫到一边，向他紧急提出建议。这位自己一直避免美国卷入东南亚的任何战事的前任总统，此时，认为应当对共产主义采取一种更加强硬的政策。希尔斯曼透露，“艾森豪威尔对他说了两件事情。首先，‘老挝是你的大问题’；其次，——这是非常重要的——艾森豪威尔说，我认为你必须派出军队。如果你这样做，我将从盖地斯堡赶来站在你的身边支持你。”

因为在这之前的几天里，老挝的皇家军队与共产党的巴特寮突然进入战争状态。

肯尼迪总统受到艾森豪威尔的巨大影响，从上任的那天起就扮演起世界警察头子的角色，极力要阻止迫在眼前的极权恐怖的威胁。

4个月以后的5月5日，肯尼迪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称，如果必要，他将考虑动用美国军队“帮助南越抵抗共产党的压力”。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将立即前去与吴庭艳进行会谈。

尽管肯尼迪总统对吴庭艳政权给予充分支持，但他对吴庭艳独裁统治可能带来的结果忧心忡忡。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美国将支持吴庭艳当作“捍卫自由，捍卫美国”的代价，但是，在越南的美国人——尤其是新闻界——却报告说是吴庭艳的统治下根本没有自由。

越南问题自始至终困扰着这位新上任的年轻总统。

在一次和法国戴高乐总统的会谈中，戴高乐总统告诉他说：

“你所求助的那种意识形态将不会使任何事情得到改变……你们美国人在昨天想取代我们在印度支那的位置，你们今天又想重新点燃我们已经结束的战争。我敢预言，你们将一步一步地陷入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无底泥潭。”

1961年的古巴（猪湾）入侵的彻底失败使肯尼迪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美国似乎应该缓和它的政策。

肯尼迪对其助理罗杰·希尔斯曼说过多次，“猪湾教了我许多事情。其一是不可相信将军们或者中央情报局，其二是，如果美国人民不想动用美国军队去除掉一个离我们的海岸只有90英里的共产党体制国家，我又怎么能要求他们动用部队去除掉一个9000英里以外的共产党体制国家呢？”另一方面，肯尼迪也显然认识到他强硬的对外政策在国内政治中所具有的价值。

肯尼迪对古巴危机和老挝危机的反应，被美国一些人认为是“某种意义上的投降”。肯尼迪在越南问题上从1961年开始便处于相互冲突的关于军事和政治形势的建议之中，在如何处理越南问题上，肯尼迪及其政府处于自相矛盾的困境之中。到1962年初，美国到越南的军事顾问已达到4000人。

美国明白，要使越南不成为包袱，要使美国脱离困境，最终还得靠那位9000英里以外拥有1700万人民的总统——全靠吴庭艳许诺的彻底的改革了。关于吴庭艳的目的以及他的农村战略，肯尼迪得到的是彼此相互冲突的报告。

1962年，西贡政府报告说，它预计建立的1.1万个战略村已经完成了4000个，南越39%的人口已在这4000个战略村里重新定居下来。

美驻南越大使诺尔汀在遍访了南越44个省份的四分之三以后，相信了吴庭艳是一个“很受尊敬的领袖”，他认为吴庭艳是一个“非常诚实的贵族”，拒绝对他的家庭作任何批评。诺尔汀认为，“在我看来，他的兄弟们的影响总的来看不坏，在许多情况下还相当好。比如，吴庭艳便是农村战略计划的一个推动力量；我认为这个战略是保卫农民不受越共骚扰的成功之法。”

肯尼迪不得不在他的大使的话和北越总理以及美国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如出一辙的话之间作出判断。

范文同总理的话说：“他们组织了加以伪装的集中营，给它们冠以‘繁荣地’、‘农业拓居地’和‘战略村’的美名。”

希尔斯曼的话说：“吴庭艳和他的弟弟吴庭如积极抵制反暴行动，他们把本来是用于保护人民的战略村变成集中营。那里同我们所阐明的政策完全背道而驰。”

肯尼迪总统的私人顾问、政治及军事顾问，他的大使和前线总司令、国务院的人员、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等在谁取咎问题上争论不休。到1962年底，他有1.2万名军事顾问在越南，施行一套谁也不能赞同、谁也不能反对的策略。

1963年初，当“肯尼迪仍被这种相互矛盾的建议所困扰的时候，他觉得不能再等待了，他派出了一个两人调查组赴越南——一个是反暴专家维克多·克鲁拉克将军，一个是具有越南经历的国务院官员约瑟夫·A·门登霍尔。不久，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听取调查组的意见。克鲁拉克说，越南的一切都进展顺利，吴庭艳是一位受人爱戴的领袖人物，士气普遍很高，我们所需做的一切便是支持他到底，他将赢得这场战争。门登霍尔的报告则截然相反，

他说吴庭艳极不得人心，他的政体处在一种很不稳定的状态之中，佛教徒不喜欢他，自由民主派人士不喜欢他，对于成功地实行一项美国政策，他不可能提供任何可行的基础。肯尼迪总统非常仔细听了这些观点，惊讶地问道：

“你们两位先生是去的同一个国家吗？”

作为美国的反共前哨的南越已经成为美国政府深感困惑的严重问题，作为这个前哨的吴庭艳总统又成为这个严重问题中最让美国政府苦恼的一环。

肯尼迪政府必须在困惑中作出最后的选择。

四、“绿色贝雷帽”进入南越

1961年5月，美国派遣100名“特种部队”（代号为“绿色贝雷帽”）的官兵进入南越，准备进行美国出枪、出顾问，由南越伪军打头阵的“特殊战争”。从此，美国掉进了越南战争的泥潭，不能自拔。开始了历时14年的侵略战争。

1961年5月，美国副总统约翰逊访问西贡，签署了所谓“约翰逊——吴庭艳联合公报”。之后，美军制定了在18个月内“平定”南越游击队的“斯特利计划”。

同年10月，美国泰勒又赴南越进行实地考察，抛出了“斯特利——泰勒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争取农民，控制人民，枯竭革命武装力量发生和发展的源泉。破坏南越党的组织，动摇或瓦解党对人民武装斗争的领导；封锁南越革命与外界的联系，尤其是切断越南北方的支援。

为了实施这一计划，美国于1962年2月8日在西贡设立了由保罗·哈金斯将军指挥的军事司令部，把美国军队、军事人员和作战物资大规模地运往南越。到1962年7月美军人员增加到8500人，到11月份猛增到1.1万人。

1962年，西贡政权按照美军哈金斯将军的建议，首先对西贡市周围10个省进行“三角洲扫荡计划”。在美国飞机、军舰和大炮的支援下，先后实施了“日出”战役、“海燕”战役、“平西”战役、“晨星”战役、“美德”战役、“必胜”战役等大规模“扫荡”。在1962年一年中，除较小规模的“扫荡”不计外，1个营以上参加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就有将近1000次。由此可见美军的疯狂程度。美军哈金斯将军在总结时曾透露，美吴联军在1962年杀死居民3万，损失兵员1万。

1963年，美国除了3000名军事人员充当吴庭艳军队的“顾问”以外，在南越大约有1.2万名美国军人和13名将官。其中包括陆军4500人，主要是特种部队和突击队，海军和海军陆战队1500人，空军6000人。另外，还有1200名美军教士和蒋军的残余部队。

美伪联合的“扫荡”行为主要有两种，一是以消灭人民武装的部队和机关为目的的扫荡，兵力较集中，持续时间较短；另一种是以配合建立“战略村”为目的而进行的“清剿”扫荡，兵力较分散，持续时间较长。美伪军在强化“军事围剿”的同时，加紧推行农村“绥靖”政策，大力建立“战略村”和无人地带。

美伪搞的所谓“战略村”，就是以自然村为单位，把居民用工事围起来，实行严密的控制，以断绝他们和人民武装的联系，进而把各村联成一片，形成封锁地带，分割解放区，把“无战线”的战争变成为有战线的战争。

南越报上描述的“战略村”是：四周有好几道围障，包括用竹子和木头制成的尖桩，地上埋上地雷，只留下由哨兵守卫的出入口。四周还挖有壕沟和土墙，每隔一段就有地堡和瞭望塔。到1962年底，已建立了4077个“战略村”。南越人民武装根据南越的斗争形势，采取全民、全面、长期的游击战争，“小打稳吃”、“打有实无名的仗”，不打有名无实的仗，积小胜为大胜，逐渐改变力量对比，为向游击运动战发展直至最后消灭敌人创造条件。

1963年，南越人民武装在阿巴村成功地伏击了美直升飞机，并大量歼灭伪军，这不仅使美国政府大力震惊，也激化了美吴之间的矛盾。到1963年3月，美军人员死亡达到87人。更为严重的是1963年5月8日，在顺化有近

万名佛教徒上街游行，抗议政府禁止他们上街游行示威和不准他们在佛祖誕生日悬挂佛教旗帜的命令。军队向示威群众开枪，当场打死9人。抗议示威游行波及大学，后来中学也卷入了。吴庭艳政权大肆逮捕政府雇员、军官和企业家等有关人员。这一行动激起人们对傀儡政权的痛苦。

美国朝野对吴庭艳的行为深感震惊，肯尼迪总统对吴庭艳总统失望了，诺尔汀大使很快从公共广播中听到了撤换他大使职务的决定，因为他已被认为与吴庭艳的关系过于紧密。

肯尼迪任命“波士顿文雅之士”亨利·卡波特·洛奇为驻越大使。行前，肯尼迪对洛奇说，“我对你有信心，我希望你去看看我们是否能使那个政府的行动变得好一点。”

洛奇被授予了各种特殊的权力，包括对援助活动的控制权。这意味着他对南越掌握着生死大权，它可以被用来反对吴庭艳——或者支持吴庭艳。统治权必须掌握在接受美国援助的人手中。

在西贡，洛奇开始作出象征性的援助削弱——他通过拖延惯常的外交性巡访来做到这点。他是晚上到达的，第二天早晨他便出现在街上，用法语询问人们对佛教徒危机和吴庭艳统治的看法。他指定参观了佛教圣地舍利寺。美国的不悦如今已非常明显。

两天以后，洛奇发出第一封紧急电报给他建立起来的渠道罗杰·希尔斯曼。电报上说，一些越南将军同大使馆的联系增多了，将军们得到消息说，由吴庭艳的弟弟吴庭如控制的特别警察正在计划对军方进行清洗。这些将军“可能要控制事态，进行一次政变。”

希尔斯曼将这份电报视为需要特别优先处理的文件。华盛顿当时是星期六早晨，肯尼迪总统，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都出城度周末了，但他们的助理埃夫里尔·哈里曼和詹姆斯·弗莱斯特尔尚在。在他们的帮助下，希尔斯曼开始起草一项紧急反应，清楚表明华盛顿不会再容忍吴庭如对吴庭艳的影响，总统必须免去他弟弟的权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将军们被告知，所有的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都将终止。

这项工作完成以后，希尔斯曼打电话给肯尼迪总统和腊斯克国务卿，迅速对他们作了情况介绍。他们赞同他作出的反应——于是希尔斯曼向西贡发出了著名的“绿灯”电报。

希尔斯曼认为，“电报的精义总括是说，我们希望政府继续在吴庭艳的掌握之下，但如果他们（将军们）感到别无选择的话，那么我们将以其自身的功过去审视他们将建立的政府。当然，这种话以其所有的模糊不清的含义毫无疑问给予了他们以鼓励。”

洛奇大使召来美军司令保罗·哈金斯将军以及其他高级人员，仔细研究了华盛顿的来电。第二天，8月25日，大使馆向华盛顿回电，表示接受“来自华盛顿的基本决策”。

华盛顿在无奈之中对南越将军们的政变开了“绿灯”。

五、血腥政变使政局更加动荡

南越的将军们明白，倘若吴庭艳继续实行独裁统治，丧失民心，美国政府无疑会削减对南越的援助，肯尼迪总统对吴庭艳政权所持含混不清、左右摇晃的政策表明了这一点。没有美援吴庭艳完了，南越也完了，将军们决定行动，然而，他们必须知道，美国人在多大程度上容忍并支持他们。

美中央情报局和将军们频繁接触，一切都在悄然无声然而快速地进行着。将军们向美国人提供了这次政变参与者的名单。

计划参加者：总统府军事顾问杨文明中将、国防部长阮延淳、武装部队代理参谋长阮文敦少将、武装部队副参谋长黎文金少将、联合总参谋部总长陈善谦准将。

计划支持者：第一军区司令阮正诗少将、第二军区司令阮庆少将。

计划同情者：第三军区司令兼西贡军事长官孙室汀少将。

洛奇和哈金斯将军再度进行商量，然后洛奇强烈建议华盛顿采取行动。他的电文包括下列几点内容：

一、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义无反顾的道路：推翻吴庭艳政府。

二、促发将军们进行政变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自己，但也同样取决于我们。

三、我们应全面行动，促成将军们尽快举事。

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华盛顿迅速开会，激烈的争论持续了一整天，最后作出的决定是给予洛奇大使以决定政策的权力。

9月2日，肯尼迪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评论员瓦尔特·克朗凯特的采访时说，美国将继续对南越予以支持，但他补充道：“我认为，除非有人民的支持，否则这战争决不会打赢。在我看来，在前两个月，政府已经与人民失去了联系。”

美国政府对吴庭艳失去耐心和信心已昭然若揭，南越的将军们深感鼓舞。

10月2日，肯尼迪总统又同意了一项经过重大修改的政策——这一政策是一个月以来激烈争论的结果。给予吴庭艳的援助只持续到年底。那时，美国将宣布撤离1000名美国顾问，军事援助只给予反对吴庭艳的将军们。与此同时，肯尼迪指示洛奇不要进一步采取行动支持政变，但要继续物色接替的领导人。

随着时间一天天的逼进，华盛顿却陷入了紧张混乱之中。10月30日，美军司令哈金斯将军向华盛顿发回一份激烈的电文，表明他既不相信将军们，也不相信洛奇。电文说：“陈文同将军不是在撒谎，就是脚踏两只船，希望从中渔利。他告诉科内，政变将于11月2日以前进行，他又告诉我说他根本没有策划什么政变。”

哈金斯说，如果真有一次政变在进行之中，大使也并没有告诉他获得过任何这类计划的情报。洛奇大使则争辩说、“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严守秘密，对此我表示敬意。直到头天晚上，我才被完全告知了整个计划。”

白宫极为担心国防部和国务院之间出现的分歧。洛奇在哈金斯向华盛顿去电的同一天，接到了一封电报，要他劝阻将军们，除非他有绝对把握政变会成功。第二封急电说：“我们不能接受这种结果：我们没有力量推迟或取消一次政变。”但洛奇回答说已为时太晚，它取决于越南人。洛奇说，“他

们不希望我们插手，他们不需要我们帮助策划，更不用说提供武器和装备了。他们想让它自然进行，想让越南人来控制它。华盛顿说他们将不会插手，那么就让他们置身局外吧。”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南越的将军们在11月1日下午1点30分按预定计划发动了旨在推翻吴庭艳总统的军事政变。

3个小时以内，除总统府外，所有的抵抗都被击溃。下午4点，在吴庭艳两次拒绝投降后，兵变部队开始炮击总统府。吴庭艳此刻拨通了洛奇的电话，他想知道美国人对她窗外发生的事件持什么态度。洛奇的回答使他大为失望，“我没有接到指示，这时是华盛顿的早晨4点钟，我无法与华盛顿取得联系。”

吴庭艳问道：“你总应该知道你们的政策是什么吧。”洛奇回答说：“我并不知道我们在每一种情况下的政策，再说，我很担心你的安全，我已作好安排把你带出这个国家以保证你的安全。如果你不想这样的，我还做好另一种安排，可以使你成为名誉上的首脑，你可以在这里保留一个名誉地位，这样相对来说也很安全，”吴庭艳说：“我不想那样做，我想恢复秩序，我现在就回去恢复秩序。”

在晚间还没有过去之前，吴庭艳总统和他的兄弟吴庭如从暗道逃出了被围困的总统府。第二天的下午，他们在城里中国人居住的地区堤岸被兵变部队逮捕，随即在隆隆驶过西贡街道的装甲人员运输车上遭到枪杀。

华盛顿，肯尼迪总统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一起开会时，总统的一个助理拿进来了刚从西贡发回的电报，总统得知了吴庭艳的死讯。会议桌旁一片沉默肃静。肯尼迪显然受到了极深的震撼，他站起来，没对任何人说一句话就走出了会议室，在室外呆了好几分钟。

“吴庭艳——他与共产主义进行了9年的斗争：他应该得到一个比遭暗杀更好的结局。”肯尼迪重新走进会议室时，对他的沉默无言的助理们这样说。

没有美国人的挟持，吴庭艳不可能坐上总统的宝座，没有美国人的暗许，吴庭艳也不可能这么快就丧权丧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傀儡的可悲下场事实上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美国人选择吴庭艳后又抛弃他，这样的结局对吴庭艳个人来说也许是不公正的，但美国人选择吴庭艳目的在于通过他控制南越，把南越当作反对民族独立的铁板，吴庭艳独裁的野心和美国人世界警察的野心不谋而合，互相利用，只能导致如此的结局。

白宫导演的血腥政变结束了，但越南问题仍像恶魔一样缠着美国人的心魂。

吴庭艳兄弟之死，并没有给西贡政权带来新的气象，相反，西贡的政局变得更加动荡不安。

六、将战争推向北方的秘密行动

1963年11月22日，约翰·F·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副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匆忙宣誓就任美国的第36届总统。

林登·约翰逊出生于德克萨斯州一个贫瘠的小农场。他坚信他能改变美国的底层，受这一信念的支配，他从师范学院升上了总统的位置。

越南并不是约翰逊改革计划的一部分，但却最终成了他的首要问题：成了实现他的梦想之前必须消除的恶梦。于是，几乎从约翰逊宣誓就职的那一刻起，越南就像瘟疫一样笼罩着他。他发现越南问题不再是以前自己脑子里想象的一个抽象问题，自己不得不在军事上卷入的利弊。像肯尼迪一样，约翰逊也不断描绘出共产主义阵营咄咄逼人向前推进的形势，同时将越南作为自由世界表达其对抗决心的手段。但约翰逊前几年曾激烈反对美国直接卷入战争，只是建议第三国去予以遏制。可是现在他的位置不同了，在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及国务卿腊斯克的坚决要求之下，就职48小时之后，约翰逊总统宣布，美国对西贡军政府——推翻吴庭艳之后建立起来的统治集团继续实行军事援助。约翰逊的决策时代以及决策方式从此开始了。

西贡军事政变以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发表声明，重申南越人民在解放越南南方，实现民族独立，自由、民主、和平、中立，改善人民生活的斗争中，永远不放下武器和改变斗争的目标。

1964年1月，伪军第一军军长阮庆发动了南越第2次政变，并自封为“革命军事委员会”。美国针对“斯特利——泰勒计划”的破产，美国麦克纳马拉于3月8日又飞往南越，与阮庆拟定了一项所谓“重点清剿”的“麦克纳马拉——阮庆计划”。在这项计划中，要求在强化军事“清剿”的同时，适时收缩据点，大力建立“战略村”和无人地带。

1964年2月，阮庆在接受新闻采访时狂妄地提出，如果有美国的全力支持，南方应该入侵北方。他的讲话在华盛顿竟然没有遭到驳斥。在以后的几周内，南越的共产党游击队扩大了攻势，更接近西贡，并开始袭击美国设施和人员。

越南问题引起全球的关注。法国总统戴高乐强烈呼吁像解决老挝问题一样，在越南也应寻求中立主义的解决方案。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也声明，如果柬埔寨的中立态度受到尊敬，他将继续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以保障这一地区的稳定。对此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公开作出反应说，“南越的情况不同，它的形势是严峻的，因为它关系自由世界的平衡。南越对东南亚的安全以及对自由世界的安全是如此重要，除了尽我们所能地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阻止共产党的胜利外，我认为没有其它选择。”当麦克纳马拉说这番话的时候，法国宣布它正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美国负责东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负责筛选实地情报，这些情报认为，“北越在开始将致力于建立其对南越的控制，最终以达到对整个印度支那的控制。中立政策除非可以明确阻止北越重新采取军事行动，否则它只会成为海市蜃楼式的幻想。”邦迪的情报还认为，从1964年初，北越就开始向南运送武器和干部，那时就已清楚，他们正在赢得这场战争。

3月中旬，从越南返回的麦克纳马拉称，南越处于彻底崩溃的边缘。在3月17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上，麦克纳马拉建议肯尼迪的分期撤军计划应彻底放弃；南越应开始进行总动员，新的军队接受最现代化的美式装备；必须增

加对北方的秘密行动。最后，麦克纳马拉建议制定出战争推向北方的具体计划，所有这些建议得到了支持。

五角大楼订出了两个阶段的轰炸计划。在第一个阶段，美国空军将连续72小时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对北越军事设施以及老挝和柬埔寨边境内的游击营发起“报复性的”攻击。在第二阶段，戒备状态为30天，美国将开始进行一项“逐步公开化的军事压力计划”——或者说对北方的深度轰炸。约翰逊总统毫不迟疑地授权轰炸战略进入计划阶段。五角大楼的首脑人员对此深受鼓舞，他们不仅认为轰炸北越是必要的，而且应该更早些时候就采取这一行动。

约翰逊的命令下达后的60天内，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拟出了一份庞大的攻击名单”。这是与在檀香山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合作进行的。太平洋指挥部在30天内也分别提出了后勤和战略计划。行动计划32——64计算了轰炸计划每一联合会所需的飞机数量及吨数；行动计划32——64分析了共产党阵营可能会作出的反应。对于这是否将成为影响因素它未作评论：它仅仅只针对美国可能会需要的军需数量。极有意义的是，美国的这些需要中包括了地面部队的使用。檀香山已比华盛顿先行了一步。在檀香山，参谋长联席会议最后修改了先行攻击的目标，将第一步打击集中在北越所有支撑向南方进行渗透的军事设施上。据计算，在炮火轰炸和西太平洋第七舰队的轰击下，北越所有为在南方进行战争而建立的设施都将在12天内被摧毁。

5月中旬，完成了的计划被交到了总统手中。约翰逊要对它进行考虑。考虑的问题包括如何应付国会，公众舆论，盟国舆论，河内对计划中已开始实施部分的反应。

在战场上，即将进行的两步行动向河内和美国公众显示了美国坚定的决心。美国在越军队有了一名厉害的新司令，威廉·威斯特莫兰将军。不合时宜的洛奇大使则被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替换下来了。在海上，34——A行动得到了加强。这是南越巡逻水雷艇对北越海岸进行秘密袭击的代号——一项5个月前应已开始的行动。

第十五章 自己打败自己的战争

- 一、事态不可避免地朝战争边缘发展
- 二、空中打击倒计时
- 三、“外科手术”式的轰炸
- 四、海军陆战队登陆岷港
- 五、一手拿剑一手拿橄榄枝
- 六、尼克松为战争划了一个沉重的句号
- 七、走向衰落的美国军事力量

一、事态不可避免地朝战争边缘发展

1964年初，南越陆军有19.2万人，组成九个师、一个空降旅和四个别动营，还有一个海军陆战队独立旅。它和空降旅一起，是总参谋部直接掌握的总预备队，而每个别动营则分别作为一个军的预备队。南越空军有190架飞机和248架直升飞机。南越海军有少数登陆艇、巡逻艇和扫雷艇。另外还有地方武装18.1万人，包括自卫团和民防团两个部分。美国驻越司令部最初向南越省和团以上单位提供顾问，其任务不仅包括战斗行动，而且包括军队的其它工作，如编制预算、训练，学校、后勤等等。到这个时候即1964年起，美军顾问已派到县和营级单位，除了咨询、训练、装备和发展当地的军队外，还提供主要是直升飞机的战斗支援。

在加紧战备的同时，美国五角大楼、国务院吵吵嚷嚷一通之后，又向约翰逊总统提出，与空战计划实施同时，与河内进行对话则是有益无害的，第一，如果通过显示实力而不是使用实力就能达到遏制共产主义的目的，这是求之不得的事；第二，通过对话，对北越的战争能力进行评估。约翰逊总统5月28日在与加拿大首相皮尔逊的会晤中，希望加拿大能充当华盛顿和河内之间信使。皮尔逊首相应允照计行事。于是加拿大新任国际监察委员会高级代表、负有定期在河内与西贡之间斡旋任务的詹姆斯·布莱尔。西波恩秉承美国人的意志，风尘仆仆赶往河内，让河内在“山姆大叔”出示的“胡萝卜”和“大棒”之中选择。

1964年6月18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在前法国总督府的一间极大的屋子里接见了西波恩。在清楚地转达了美国国务院的态度以后，西波恩说道：“美国的雄心是有限的，但美国的耐心也并非没有限度。”他担心出现升级，他认为这种升级与任何一方的利益都不相符。但如果这种局面真的出现，北方将遭受“最后的摧残”。西波恩问：“有什么我可以传达给美国的信息吗？”

“没有，”范文同回答道，“现在没有。”两人又继续交换了一个小时。西波恩曾在莫斯科见过许多共产党的高级人士，但他认为，范文同用任何标准来衡量，都是一位出色的领导人。范文同已经58岁，头发呈铁灰色，早年在法国人监狱中度过的岁月使他的眼睛深陷了下去，但眼神中的温文尔雅的那种隐约的笑意使他看起来年轻了10岁。在越南人中间，他被称作“胡大叔最喜爱的侄子。”从40年前开始，他就一直在胡志明的鞍前马后，他作为他的国家的国际谈判者和政府发言人几乎达20年之久。他告诉西波恩，他将“对提出的问题进行解释。”现在轮到西波恩来作听众了。

总理阐述了河内的总的观点，我们必须学会共存，必须学会为这一困扰我们如此之久的这个问题找到一个解决方法，但这一解决方法必须是公正的。”他继续说道：“我来告诉您，我们所谓的公正的解决方法是什么。首先，它需要美国撤军。第二，它意味着南方的事情应该由南方的人民来安排。它必须提供解放阵线参与的机会，没有任何一个团体能够如此广泛地代表人民的意愿。南越必须享有和平中立，柬埔寨式的中立。第三，一个公开的解放方法意味着国家的统一，这是根本性的。

“但是，我们需要的是没有军事压力的和平统一。我们希望举行圆桌谈判，为了使这一谈判不致于夭折，双方都必须对这一安排诚心地感到满意。我们不急于求成，我们愿意谈判，但我们将等到南越准备的谈判的时候。我

知道美国是不易接受这些的。”范文同告诉这位加拿大使者，“美国可以继续增加对南越的援助，也可以增加自己军队。我痛心地看着战争继续、发展、深化。然而我们的人民是决心要斗争的。”范文同俯身向前说道：“请原谅我这样说，你们西方人是不可能、决不能理解人民的抵抗意志以及继续战斗的意志所具有的力量。我们的人民所进行的斗争是难以想象的，就连我们也感到吃惊。”

总理要西波恩考虑一下南越近期的状况。自吴庭艳总统被杀以来，情形便每况愈下。美国在此的前景是黯淡的，加强阮庆的军队不会有任何帮助。人民已经受够了。应该有一个全国性的联合政府，老挝原有的那种联合政府应被作为榜样。北越并没有向巴特寮派送部队，但美国军方却在从中干预。越南的问题是一场要坚持到最后的战争的问题，在这场战争中美国无论如何是赢不了的。

范文同露出感到有趣的神情说：“让我引用美国的沃尔特·李普曼的话：‘在隧道的尽头看不到光明’。我的政府还没有具体的建议可以提供，但这就是我们的想法。”

“谢谢您，总理先生，”西波恩说，“谢谢您具体陈述了您的政府的观点，我将如实地转达这些观点。”范文同回答说：“你可能不会相信我说的所有的话，但我保证我说的一切都是真诚的，坦率的。”

西波恩问范文同，他是否可以提出“几个人的问题”，他说，“我对您的这一说法很感兴趣，即作为恢复和平的条件，南越应该中立，以此作为通向统一的第一步。”范文同很快打断道，“我并没有说唯有中立才是通向统一的第一步，南越是否中立应该取决于南越的人民，我无法作预先的判断。”西波恩说，“解放阵线代表南越的某种势力，但并非所有的人民，甚至并非大多数。”范文同对此没有说话，西波恩接着说，“如果联合政府形成，解放阵线应该参与其间，对此我表示欣赏。但令人担心的是联合政府很快就会被解放阵线所取代，在其它国家里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范文同回答说，“这种担心是毫无理由的。”

“总理先生，您是否完全理解美国在南越的责任远远不只关系到东南亚，它还关系到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游击颠覆？”“是的，我们理解这点。”总理回答道，“我们意识到，对于美国人来说，失掉南越将会导致连锁反映。但请您理解，对于在南越的解放阵线及其支持者来说，情况也同样如此。”

“西波恩先生，”范文同继续说道，“我们高兴地听到美国不打算对我们的国家予以袭击。”西波恩连忙打断说，美国只是“不希望将战争推向北方，但是如果被逼太甚，将不得不这样做。”西波恩再次重复说，“美国的忍耐不是没有限度的”。

范文同语气不改地回答说，如果战争被推向北方，那么北方也有朋友：“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众多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一个，您知道，人民是不会袖手旁观的。”范文同总理最后说：“我们不会逼迫美国采取这样的行动，我们不会刺激美国。”他告诉西波恩，“我期待着更进一步的对话。下次您将会见胡志明。主席现在在休假，但他要我代他向您转达他的致意。”

两天以后，6月20日，西波恩回到西贡。他发给渥太华两份很长的电报，通过渥太华转给美国国务院。第一封概述了他同范文同的90分钟的会谈，第二份从他的纪录中几乎一字不漏地引述了范文同的话。

6月22日，他发回了另一份报告，分析了北方的精神状态，并提出了他个人对此的评估。他认为扩大战争将是危险的和不合成功的。西波恩在他的第一封电报中报告了这次会谈的基调和内容，指出范文同“自始至终尽力表现出平静的真诚，表现出理解所讨论的问题的严重性，表现出毫无交战的意图”。西波恩在这封电报的最后说道：“我欢迎你们（外交部）以及美国国务院对下次访问河内时的进一步会谈的讨论点作出任何建议。”西波恩的这些电报都经美国国务院及时转给了美国驻西贡大使馆。美国国务院因此有几乎三个星期的时间对西波恩的电报予以考虑，从而决定是否进一步会谈时提出具体的和平建议。然而三个星期以后，华盛顿没有公开提出任何进一步和平谈判的建议来。

事态不可避免地继续朝着战争的边缘发展。

二、空中打击倒计时

约翰逊政府为了挽救它的侵略政策和在南越的惨重失败，同时，也为了给美国的军火工业寻找出路，刺激国内经济，早就想进一步扩大在印度支那的战争了。1964年6月1日，美国召开了第10次檀香山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计划。

可是，要想进一步扩大战争，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借口呢？

约翰逊政府编造了一个历史上罕见的弥天大谎——“北部湾事件”。

1964年7月31日午夜时分，一群南越人的炮艇在北部湾C形地南缘快速驶出岬港，其目标是离19度线60海里的两座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占据的岛屿。东南方100海里是美国驱逐舰“马多克斯”号，它正朝北部湾驶去，奉命停泊在离海岸至少8海里的地方。“马多克斯”号拥有先进的雷达和监视设备，是檀香山太平洋海军部队的眼睛。南越炮艇攻击了两个小岛，这次行动被说成是一项例行任务。几分钟之内，猛烈的炮火照亮了凌晨3点的夜空，飞驰的鱼雷快艇扫射了守岛部队，然后撤退。

36小时后的8月2日，美舰“马多克斯”号驶近海岸，它紧急向檀香山报告，接着从檀香山向华盛顿火速发出了处于战备状态的报告：“马多克斯”号正在同3艘鱼雷快艇交火，其方位在离海岸30海里的“国际”水域内。在华盛顿，尽管时辰将近午夜，但约翰逊总统还在主持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五角大楼和国务院正忙于制定重大的、然而简短的应急计划。威廉·邦迪将为约翰逊翻译文件，提供意见，他毫不怀疑美国和北越这回在北部湾第一次交火，邦迪说：“8月2日，一艘美国驱逐舰肯定遭到了攻击，对这次攻击不存在任何怀疑。有弹洞在，以及其它一切。”

“马多克斯”号报告说，它已击退并重创所有3艘快艇。约翰逊命令另一艘驱逐舰“特纳·乔伊”号支援“马多克斯”号，到8月4日早晨，这两艘美国战舰又开始执行代号叫作“德索托”的搜集情报的任务，两舰会合时，它们位于离海岸50—76海里的地方。与此同时，当美国驱逐舰返回到北部湾时，更多的南越“34—A”舰艇正在袭击海岸设施。

当海军司令部又一次发送出“北越人正在进攻”的“德索托”红色警报时，又是太平洋时间午夜（比华盛顿时间早12个小时）邦迪说，“在夜里，一艘驱逐舰报告它又受到袭击，它看到鱼雷快艇的航迹，等等，等等。”几分钟之内召开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约翰逊总统批准，会议决定立即实施轰炸方案的第一阶段——一对一的“报复性”打击。第七舰队的战斗轰炸机发起对事先选定的第一个目标的打击。

华盛顿向檀香山发去一份预定的电报：准备射出突击之箭。

时间正是北太平洋的凌晨3时，舰载飞机开始为攻击而装载弹药。

太平洋时间拂晓，檀香山再次发电，海面依然波涛汹涌，妨碍着对驱逐舰再次受到袭击的确证。在所有电报中，都不清楚驱逐舰是否真的看到了北越的舰只，但华盛顿却相信早些时候“马多克斯”号偷听到的无线电情报，这些情报被译出来后，约翰逊把国会领导人召集到椭圆形办公室，将攻击计划通知他们。

4个小时的倒数计时仍在进行。

白宫告知国家电视网，准备一次总统可能向全国发表的演说，在五角大楼，麦克纳马拉文雅地命名的“研究小组”正在根据目标名单分程传送目标

的座标。威廉·邦迪负责同国务院联络，对无线电情报作出估价；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没有来自受暴风雨困扰的驱逐舰的进一步消息。倒计时剩下30分钟时，约翰逊被叫去为电视演播化妆。

红绿灯不断亮着，一道电讯穿越太平洋上空：“射出突击之箭。”

轰炸机升入空中，约翰逊告诉全国：“在东京湾（北部湾）公海上重新开始的对美国舰只的敌对行动，迫使我今天下令美国武装力量采取报复行动。”约翰逊告诉美国公民，他已命令美军轰炸越南北方，对那些美军的敌对行动，“不但要以戒备、防御来对付，而且必须给予积极的回答，在我向你们说话的时候，正在作这种回答，现在正在对北越的这些敌对行动中使用的炮艇的某些辅助设备采取空中行动。”

约翰逊似乎环视了一下面前的听众，这次事件使“全体美国人，深深认识到了在东南亚为自由和安全而进行的斗争的重要性，”“将使全体美国人加紧努力履行我们对南越人民和政府所承担的义务。”

约翰逊讲完后，64架轰炸机分批从“提康德罗加”号和“星座”号航空母舰起飞，首次轰炸了参谋长联席会议选定的4个鱼雷基地和一座油库。

在美国轰炸北越的同时，一个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麦克纳马拉：“你知道有涉及南越船只和北越人的任何事件的情况吗？”这位曾当过哈佛大学教授的国防部长回答说，“没有，我不知道任何事件。”就在第二天他又宣布了向西太平洋增兵的6点措施：

“一、把第一舰队的攻击航空母舰待混群调到西太平洋；二、把截击机和战斗轰炸机调到南越；三、把战斗轰炸机调到泰国；四、从美国调遣截击机和战斗轰炸机的中队到太平洋前进基地；五、把反潜艇的特种部队调到南中国海；六、使经过挑选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进入警戒状态，准备随时出动。”

8月6日，美参议两院举行了秘密的意见听证会，并起草了一项决议案，第二天，众议院以400票对零票，参议院以81票对2票通过。该决议不仅批准约翰逊采取旨在保护美国军队的有限战争，而且授权把可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使用武装部队去援助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中的任何一个为保卫其自由而请求支援的成员国或条约签字国。”

三、“外科手术”式的轰炸

1964年8月10日，约翰逊收到驻南越大使泰勒的电报，建议继续进行第二阶段：连续轰炸。大使向总统提议，到1965年1月7日他“将做好充分准备实施对付北越的应急计划。”

现在约翰逊不得自行决定进一步升级的问题。在他的参议院顾问中没有人劝说反对升级。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桌上，泰勒大使电报的旁边有另一个富有戏剧性的观点，即美国公众观点，约翰逊读了一遍又一遍。一项哈里斯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全国赞赏地坚决地处理了北部湾“危机”；他个人的声望一夜间从42%上升到72%。

现在约翰逊的内阁已变得强硬起来，内阁在秘密打算逐步升级，并积极寻求使升级加速的途径。总统核心圈子的顾问们不再遮遮掩掩，遮掩成了羁绊。麦克纳马拉、泰勒、威斯特莫兰都在告诉他：升动（逐步升级）绝对必要，泰勒8月10日的电报极力主张对付北越的最佳行动的最后期限。

美国加紧战争准备，肆意扩大战火，这引起全世界爱好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义愤。

就在8月5日轰炸北越以后的第二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发表声明：“美国点起了侵略战火，越南民主共和国就取得了反侵略的行动权力，一切维护《日内瓦协议》的国家也取得了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国反侵略的行动权力。越南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坐视它遭受侵略。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

在越南河内，广大军民也严阵以待，准备美国的南越军队的进犯。

8月中旬，加拿大高级代表西波恩第二次到了河内。西波恩感受到了值得注意的变化：人们正在进行防空袭训练，在街上挖堑壕和掩体，还准备疏散妇女和儿童。范文同总理在三天之后接见了西波恩，范文同强烈谴责美国对越南的挑衅，认为美国“把战争推向北方，以便为在南方的绝境寻找出路。”

范文同以强烈的语气告诉西波恩，倘若把战争进行到北方，美国将造成“一种非常危险的局面——我再再说一遍，非常危险”，那将是“真正打错了算盘”。“迄今为止，我们在努力避免严重的麻烦”，总理说，“但我们的努力现在变得更加困难，因为战争已经进行到了我们的领土。”“如果战争打到越南北方，那么最终将打到整个东南亚，后果将不堪设想，”

美国轰炸北越，加强对南越的援助，但这些都无法改变南越政权的腐朽和衰弱。

从8月起，南越的情况就呈现出一种快速新闻短片的面貌。华盛顿的代表团在来回奔波，大使和前线指挥官再度发现很难取得一致意见，越南共和军被说成是“名符其实的胆小鬼”，佛教徒又一次骚乱，袭击和政变谣传已司空见惯，在走马灯似的政府更选中将军们抛弃了政治改革。

8月16日，阮庆将军成了总统，把杨文明赶下了台，并许诺制定新宪法。11天后宪法被废除，杨文明重任国家首脑，阮庆复任总理，2天后阮庆以“精力衰竭”为由下台，5天后他再度当上总理，10天后他在一次不流血政变中下台，第二天他又在政变中上台，如此继续下去，而泰勒大使则力图控制自己的力量和当时政府。

泰勒说：“在我任大使的一年期间，我应付过5个政权，5批高级将领，

5 批统治着 44 个省的省级首脑。换言之，在人们可以想象的混乱中，政府机构在 5 个不同的时候被扫除了，被颠了个个儿，而且从一开始就没有在任何时候建立过稳定的政府。”

8 月 18 日，当西波恩河内之行的报告从渥太华传到华盛顿，再传到西贡时，泰勒大使劝说白宫，认为对北方的轰炸还不够：成斯特莫兰将军预见到南越需要美国海军陆战队。

军方的压力和那些军事介入态势迫使约翰逊总统一步步把美国推向战争的灾难之中。

11 月 1 日，南越游击队用迫击炮袭击西贡附近的边和空军基地时，4 名美国人被打死，5 架 B—52 轰炸机被毁。两天之后，约翰逊作为温和的候选人在选举中取得了压倒优势的胜利。

在美国人投票选举之时，约翰逊会见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商讨美国对袭击边和的反应问题。主席告诉总统，“地面统治已经发生了有利于共产党的变化”，意思是说由于美国军队呆在越南，因此没有理由攻击他们。主席强烈要求立即袭击河内附近的空军基地，约翰逊却提出 3 套现代化的轰炸方案，并派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去同五角大楼联络。11 月 5 日，邦迪提交了计划小组的备忘录，邦迪写道：“边和事件随时可能再次发生，这将迫使我们行动，但也将为我们作出更强有力的行动提供一个很好的跳板。总统显然正在考虑最大限度地运用东京湾事件的基本原理。”

11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威廉·邦迪向总统提交了修改好的方案，这是“外科手术式的”轰炸——美国在亚洲进行了上千次的一种轰炸形式。目标 A 被去掉了，要是这不够产生作用，然后就是目标 B 及其他，并加快破坏程度。

从 1965 年一开始，“自由世界”就加入了极大依赖于美国的保护伞的行列。南朝鲜派出了 2000 名军事顾问，泰国和菲律宾在准备类似的部队，澳大利亚成了应急基地。

1965 年 1 月 1 日，美国采取了卷入地面战争的一个重要的准备步骤。派遣美国作战部队的应急计划进入了代号为“32—64”的第一阶段的“作战状态”。这一天也是泰勒大使提议轰炸北越的最后期限，但威斯特莫兰坚持派地面部队，而泰勒坚持进行“逐步”轰炸，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力谏轰炸附近的空军基地。约翰逊在考虑这些不同建议时正在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理事会的马拉松式会议，他得抉择是进行空中战争还是地面战争，或者是二者同时进行。现在不再是应急，而是要作出选择。结果，华盛顿在采纳河内的分析：美国盟友的极端虚弱迫使美国扩大战争。到 1 月底，选择的结果是：空中战争会取得最大效果，最少引起争论。

1965 年 2 月 7 日，南越人民武装猛烈袭击了位于中部嘉莱省的美军波莱 b 基地，击毙美军 8 名，打伤 124 名，摧毁美机 10 架。当晚，约翰逊当即下令执行早已制定的报复性轰炸计划——“火箭计划”计划。在这之后的两天内，美国舰载战斗轰炸机对北越境内的几个兵营和军事通讯中心进行了 70 余架次的轰炸。同时，事先安排好的疏散美国人的计划也在南方立即进行。同一天，数万名妇女和儿童乘飞机撤离。

2 月 10 日，南越人民武装又对中部平定省归仁美军基地实施攻击，打死美军 23 名。约翰逊又命令执行“火箭行动”计划。160 架美国和西贡政府飞机轰炸了北越境内的兵营。

2 月 13 日，美总统同意对北纬 19 度线以南的北越军事目标进行持续轰

炸。3月2日，美军开始实施“雷鸣行动”计划。104架美国空军喷气式飞机轰炸了广溪弹药库，19架西贡空军螺旋桨飞机轰炸了邦林海军基地。从此开始到年底，美国在北越上空总共进行了5.5万架次轰炸飞行，投弹3.3万吨。

美国对北越突然发动空中轰炸后，激起了越南人民的愤怒，举国上下积极响应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劳动党的号召，武装起来，全民皆兵，积极准备和美国的侵略作殊死的斗争。在河内掀起了随时准备参军，随时准备战斗，随时准备任何地方去战胜任何敌人的运动，越南北方已有200万青年，要求参加抗美救国的战斗。

美国对北越进行的轰炸，并没有压倒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人民发动全民打飞机。军人打，老百姓也打。既用高炮打，也用轻武器打。在1965年4月3日和4日两天，就取得了击落美机47架，生俘2名飞行员的辉煌战果，使美国遭受自开始以来的最惨重的一次损失。

在越南人民抗击美军空袭期间也出现一些动人的故事。其中用卡宾枪击落4架飞机的阮越凯就是其中一个。

那是在美伪扫荡全叻地区时，新兴西乡的游击队做了作战准备。有一天，有6架敌机飞得特别低，差不多快碰到树梢了。接着，又飞来了23架直升机。不久，美机开始轮番扫射。这时阮越凯跑到一片番薯地里隐蔽起来。一会儿，23架直升飞机飞到了他头顶上空，当一架直升飞机正在下降时，阮越凯举起卡宾枪就是一阵扫射，敌机就飘着掉到附近的水沟里。接着，另一架敌机又冲过来，并对着阮越凯射击。

阮越凯毫不示弱，拿起枪扣动扳机，又打掉了一架敌机。这时一部分敌人已经着陆，正向他逼来。他立即开火打退了敌军。一架敌机又一次准备降落，又被阮越凯击中，在金瓯市附近坠毁。紧接着阮越凯继续向空中敌机射击，终于击落了第4架敌机。

越南军民对付美国空袭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去袭击美军的空军基地和机场，把美国飞机大批报销在机窝里。例如，自1963年9月至1965年5月，南越人民武装先后对美军机场进行了9次大袭击。最大的有这么几次：1963年9月9日的朔庄大捷，击毁美直升机50多架，消灭敌人100多名；1964年10月31日的边和大捷，炸毁炸伤美机59架；1965年2月7日的波来古大捷，击毁美机42架。仅从1965年6月至1966年4月的10个月中，人民武装又对边和、朱星、富利等8个机场进行了袭击，共击毁敌机806架。

美国持续轰炸北越的目的，是想迫使北越让步，停止对南越人民武装的援助，以此来扭转在南越的局势。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像美国所期望的那样，北越不仅没有屈服，反而全民皆兵，准备与美国抗战到底。这是美国人没有想到的。

四、海军陆战队登陆岷港

美国的官员沮丧地看到，轰炸非但未摧垮北越的意志，反而更坚定了它支持南方斗争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考虑把地面部队投入到越南战场。

1965年春，北越的325师的2个团（第32、101团）到达南越。5月至6月间，美国军方又发现人民军305师一部出现于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到1965年底，在南方已有约10个团的人民军。北越军队的进入和解放武装力量的进一步壮大，使得当时在南方的革命武装已达到近14万人。

对此，美国政府感到极度不安。

参谋长联席会议首先建议派海军陆战队去岷港，作为对特别安全问题的一次性反应，正如五角大楼所表明的，需要部队“去阻止对空中打击的公开报复”。换言之，有必要用军队去支持空中行动，以避免动用地面部队。

泰勒大使对此表示惊讶，他打电报警告约翰逊说如果海军陆战队接过了越南共和军的保安任务，就将进一步使西贡“推卸更大的责任”。他极力主张依靠空中战争使更多的越南共和军得到训练，泰勒批评了对空中行动不必要的胆怯，建议制定“更强有力的空袭方案”。尽管轰炸方案已由五角大楼制定出来了，但泰勒认为西方的和平努力有赖于空中战争。

邦迪说：“在那个舞台上似乎只有输入美国战斗部队，才能断然阻止四分五裂和腐败的继续，并使之进步。”西贡新的政治力量阮文绍将军也支持威斯特莫兰。阮文绍说：“共产党人控制了75%的农村，我们只控制着主要城镇。我们感到难以扩展力量，迫切需要美国军队。”

最后，泰勒大使“同意”海军陆战队登陆。泰勒把威斯特莫兰说成是一位“密友”，并说：“威斯特莫兰和我们都经常检查我们的想法”。这两位将军都是朝鲜战场的老兵，都是西点军校的负责人。泰勒说：“当威斯特莫兰获得了岷港地区南越军队的腐败和不断增加的北越渗透的威胁的证据时，我终于肯定了岷港处于危险中。”泰勒提出派一营部队，威斯特莫兰提出派两营。

1965年3月1日，泰勒大使在西贡拜访了临时总理潘辉桔，透露了这一完全令人吃惊的信息：美国海军陆战队即将到来。

仅仅上任才10天的潘辉桔对此一无所知，毫无心理准备。3天之后，泰勒大使正式代表华盛顿询问潘辉桔，南越政府可“邀请”美国海军陆战队来吗？

当时在南越作为顾问的美国军事人员已超过2000人。

潘辉桔自然无法决定是否要“邀请”，他对泰勒表示感谢后，说他将同武装力量委员会领导人阮文绍将军磋商。

泰勒离去后，潘辉桔把参谋长裴艳叫来，将消息告诉了他。他们认为最棘手的问题在于，谁将统治这个国家？裴艳感到这是确定胜利目标中的致命之点：美国一心要控制，对西贡感到永无机会分担的负担已经厌倦。

他说，“我认为，大多数时候都是美国人作出决定后南越政府才得到通知。”

在讨论了泰勒大使关于3500名海军陆战队员即将到来的简短通知后，裴艳和潘辉桔总理除海军陆战队将在6日启程，8日在岷港登陆外，仍然什么都不知道。

裴艳说：“这时我们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是坐下来撰写公报。”将军们已注意到南方将受侵扰，他们毫不犹豫地发出了“邀请”。在批准海军陆战队登陆时，阮文绍将军担心南方第二大城市岘港的佛教徒和学生会有反应，他请求海军陆战队尽可能以不易发现的方式登陆。

1965年3月8日上午9时，美国海军陆战队两个营（3500人）在岘港登陆，开始的任务是保卫岘港的机场、通信设施和港口设施等。

在登陆过程中，挥舞着M—14步枪的士兵们遇到了所有战争中最奇怪的开端，沙滩上有一个正式的欢迎委员会，棕榈树前挂着“你应该在这里”的横幅，到处是最漂亮的姑娘。她们有着琥珀色的肌肤，调皮的杏红大眼，齐腰的黑发，身着沙沙作响的丝裤，姑娘们在年轻的士兵群中移动，用白色和粉红色的兰花花环装点着他们。她们穿着细瘦、紧身、五彩缤纷的束腰外衣，如梦如幻地飘动着，羞怯地对着目瞪口呆的士兵们微笑，在这天堂般的沙滩上弥漫着半是现实、半是梦景的氛围。

威斯特莫兰将军把这次登陆描绘成“一次‘爱娃·吉玛’的演出”。他的确有理由作这种浪漫的联想，作为军事指挥官，他的投入地面部队的建议在这一刻变成了现实，他雄心勃勃，企图在战争背后重振公众信心的愿望正在实施之中。历时10年的越南战争从此拉开了序幕。

针对美军不断增兵的势头，在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登·西哈努克亲王的提议下，于3月初在金边召开了印度支那人民会议。前来参加会议的有印度支那三国的38个政党和人民团体，共商谋求和平、独立和三国人民团结战斗，对付共同敌人的大计。这次会议显示了印度支那人民面对帝国主义的干涉和侵略，团结一致的坚强决心。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于3月22日发表声明，号召南方军民发扬决战决胜的精神，坚决消灭美军有生力量，争取民族解放的最后胜利。

面对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形势，1965年3月底，美陆军在西贡成立作战指挥机构。4月8日，美国在西贡成立所谓国际军事援助局，参加的有南越集团、泰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菲律宾、南朝鲜和台湾当局。

1965年4月，美举行第11次檀香山会议，决定在继续轰炸越南北方的同时，重点将放在对南越人民武装的军事进攻上，以保证美国能在南越站稳脚跟。会议还决定增加对南越政府的财政援助，把南越军队从55万人扩充到71万人。

美军为下一步作战制定了一个“墨渍”战略。主要意图是以北纬17度线至西贡的岘港、朱莱、归仁、芽庄、金兰湾、欧嘎、西贡等7个沿海基地为据点，构成环形防御圈的战役布局，逐步向解放区“渗透”，诱导人民武装的主力进行决战。为实现这一战略，美军准备发动第一次“旱季攻势”，重点指向南部东区、中部平原和西原地区。另外，大量使用空中力量轰炸南越解放区，配合美军地面部队的“攻势”行动。

为了挫败美军的“墨渍”战略，南越人民武装愈战愈重，愈战愈强，积极开展广泛的机动战，主要采取奇袭、伏击、攻点打援等灵活的战术。1965年5月底，南越人民武装在广义省巴嘉地区，3天时间内歼灭美军部队4个营3个连，共1700余人。8月，又在广义省北部的平山县文相地区，消灭美军919名，击落多架飞机。在文相大捷两个月后，人民武装又在嘉莱省波来梅地区打了胜仗，采取围点打援，消灭敌军2500名，其中美军第1骑兵师1000多名。10月，又给美军在越南中部的两个大型军事基地岘港和朱莱以沉

重打击。南越军民一年来还捣毁了很多“战略村”，1965年上半年就捣毁了近2000个。解放区面积已占南越部队总面积的五分之四，人口达1000万，占南越总人数的四分之三。

这时候，约翰逊惊呼：“越共在南方势力发展之快，真叫人难以置信，但已是事实。如果不迅速切断它的后援，西贡政权就危在旦夕，美国的长期军援就将毁于一旦。”总统的惊呼，也让麦克纳马拉大伤脑筋。空中轰炸只能减缓北越的支援，而不能切断这种支援。

那到底怎么办呢？

麦克纳马拉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当年在朝鲜战场的危急关头，麦克阿瑟将军大胆地派兵从仁川登陆。一举切断了北朝鲜部队的后勤补给，南北夹击，迅速扭转了朝鲜的局势。为什么这时候不来一个出兵在北越登陆，占领河内，彻底摧毁北越的基地，扭转目前不利局势的招术呢？

正当美国五角大楼对此计划争论不休的时候，这项计划被伦敦《每日快报》给透露出来了，并说明该登陆计划已提交约翰逊总统。真是一条爆炸性新闻。这使麦克纳马拉十分恼火。

同时，胡志明秘密访华，要求中国提供更好的援助。在这种情况下，麦克纳马拉只得放弃他那“异想天开”的计划。

1965年6月9日，在中国西南边境凭祥市至友谊关的大道上，中国一支庞大的援越抗美的队伍正在向越南境内进发。

当时中国为了统一组织支援越南和统一处理有关援越事宜，由外交部、铁道部、交通部、总政、总后、海军、空军、铁道兵，工程兵、总参作战部等21个单位的有关负责人组成协调小组，由杨成武任组长，李天佑为副组长。以后，中国的援越部队分批开赴越南战场。

越南战争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美国工人、学生开始进行反越游行。特别是美国全国学生协调委员会带头抵制征兵，并在白宫前示威游行，高呼“我们决不到越南去作战”等口号，抗议约翰逊政府的战争升级决定。

到1965年底，侵越美军总兵力已达18万人，其中地面部队3个师、3个旅、1个团。在第一个旱季攻势中，南越人民武装共歼敌军11万人，其中美军及联合部队4万多人。迫使美军的第一个旱季攻势彻底破产。

第一个旱季攻势的失败，也意味着“墨渍”战略基本失去意义。美国不甘心，1966年2月美军联合举行了3军13次檀香山会议。美国决心强化“南打”，加强“北炸”，再次准备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这次会议后，美军再次向南越增兵。并将“墨渍”战略改变为“搜剿与摧毁”战略。也就是以南越军队和联合军守点保线，美军则集中主力部队和优势装备，深入越柬、越老边境，对南越人民武装力量的根据地进行长时间的反复“扫荡”。进而摧毁民族解放阵线的军队及其在西贡地区、南越中部和北部的根据地，前进到西贡西北和波莱古以西的越柬边境一行，并把南越人民武装力量分割成三个部分，切断越南北方通过老挝和柬埔寨向南越爱国力量输送物资的交通线。

至1966年10月，在南越美军总兵力达32.8万人，其中地面部队6个师、3个旅、2个团。

1966年，美军的作战活动主要在西贡和沿海的大型基地及大城市，以求在沿海一带建立统一的、连成一片的基地，将人民武装驱赶到山林和人烟稀少的地区去。但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为对付美军的扫荡，北越也不断向南越增加兵力。1966年1月到3月，又增派了7个团。使在南越的北越人民军增至9.2万人。与此同时，为了保证大量兵员和物资进入南方，北越对胡志明小道实行严密的防卫，并加强抢修力量。到1966年，在老挝境内沿这条通道设置的防空系统已击落约25%前来袭击的美国武装直升机，迫使美军不得不停止使用直升机摧毁北越的运输卡车。

在南越南方的解放区，每家每户都是一个战斗单位。屋内挖有防炮洞，野外挖有防空洞、藏粮洞和藏牛洞。每村每乡都是一个战斗堡垒，村有民兵，乡有游击队。

村里处处都搞了防御工事，地道口通八达，大路口，小路边。草坪里，布设了各种各样的陷阱。

解放区的游击队能主动把伏击、围歼、攻点等战术结合起来，使美军一进入解放区就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欲战不得，欲逃不得。

据不完全统计，1966年至1967年旱季的6个月中，美军进行旅（团）以上“扫荡”达105次，其中师以上规模13次，对南越解放区的破坏程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南越军民开展人民战争，进行反扫荡作战，歼敌约16.7万人，其中美军5万余人。美军的第二个旱季攻势又以失败告终。

五、一手拿剑，一手拿橄榄枝

由于为战争升级的前景深深烦忧，约翰逊色厉内荏，他不想成为战争总统。他急于要利用选举胜利、国会合作和良好的经济来建设“伟大的社会”和“对贫困宣战”，他不愿让这场战争来毁坏他的政治声誉，然而，他也不甘心输掉这场越南战争，因为他担心放弃这场战争将会使共和党东山再起。

约翰逊不信任他的军事领导人以及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里的职业专家。用他的话说，将军们只知道两件事：“花钱和轰炸”。他倾向于听取他的文职顾问的意见，特别是麦克纳马拉和腊斯克的建议，麦克纳马拉告诉约翰逊，逐步施加压力的战略有可能把60万美国地面部队投入南越，并造成每月1000人的死亡，而且在1968年以前不会有真正的胜利。

泰勒大使和威斯特莫兰从西贡向约翰逊报告说，总统已没有多少时间来调拨地面部队了，因为“越共”正规军和北越军队正在对南越军队造成重大损失。泰勒对于使用美国地面部队热情不高，但他还是同意威斯特莫兰的意见，要求使用最低数量的美军去保卫盟友的空军基地。另一方面，威斯特莫兰则要求美国部队对北越军队作战，这一建议也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支持。在从10月到7月间所作的一系列决定中，约翰逊批准了威斯特莫兰把相当于5个美军师（44个作战营）的兵力投入战斗的建议，正式把美国的地面部队派到了南越战场。

威斯特莫兰发现，随着战争步伐的加快，他对部队的需要也随之升级，因为北越有能力同他进行战斗营对战斗营的较量。1966年，美驻南越军援司令部要求到1967年把战斗部队从79个营增加到124个营。美国政府没有满足他的这些要求，而是批准了一个较为有限的增兵方案，将美国远征军增加到45万人。如同美军在其他战争中一样，美国地面部队在总体上的增长远比战场上的实力增加得快，因为军援司令部需要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空中和后勤基地系统，占用了成千上万的部队。西贡、新山一、金兰、归仁、岷港、隆平以及芽庄都变成了庞大的美军基地，并在美元和美国军人各种胃口的刺激下成为新兴的南越城镇。

对于美国军人来说，由于参战时间、地点和任务不同，这场战争有可能大相径庭。对于一半的美国军人而言，越南并不比任何其他海外服役地区更加危险或令人害怕。这些人在管理和支援部队里服役，可以长时间地在相对安全的条件下工作。但对于作战部队尤其是步兵单位里的“猪仔”和直升飞机驾驶员来说，这场战争就是长时间的无聊和高度的身心紧张。对于步兵来讲，作战可分为两大类：在人烟稀少的山间丛林中作战或从湄公河三角洲和西贡直到边境地区的大片茂密的森林中行动，“猪仔们”要搜索共产党的正规军。力求发现、定位并使用空军、炮兵和步兵近战等方式加以歼灭。越共军队显然更喜欢后一种方式，他们通过伏击和从既设堡垒工事同美军交战。这种捉迷藏式的冲突同其他战争有着许多共同之处。通过阻击、设伏，布设陷阱以及使用火箭和突击队进行夜袭的方式使美军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在1967年，每月的阵亡人数在800人。

尽管美国在南越损失了8000多架直升飞机。但损失率仅为出动7000架次才损失一架。空中支援方面的王牌是“弧光行动”。即由B—52型轰炸机对人烟稀少地区的可疑“共军”阵地实施轰炸。这种行动通常由3架飞机编队进行，一次“弧光”轰炸可以把100吨高爆炸药投在一平方英里的地域内，

因为轰炸机是从7英里的高空投弹，对方无法及时发出警报，因而“弧光”轰炸行动产生了可怕的效果。

随着轰炸的升级，反战运动风起云涌。反战运动已从大学校园内的政治辩论会和抗议性摇滚音乐会走向街头。继1965年的和平进军之后，1967年10月又有万名群众包围了五角大楼反战积极分子袭击了征兵单位和募兵站，并为青年男子躲避兵役或逃在加拿大积极安排。美国各大电视网和报纸也以大量充满同情的新闻报道鼓励反战运动。

约翰逊竭力寻求一种方案来平息对他的批评，他又玩出新把戏，一手拿剑，一手拿橄榄枝，准备边打边谈。

1966年10月，约翰逊飞越太平洋同西贡领导人会谈，并视察了金兰湾的部队。

1967年初，约翰逊认为“也许通向和平之路的唯一办法就是同胡志明接触”，他决定给胡志明写信，建议美越双方代表举行秘密会谈，以努力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解决方案。约翰逊在信中对胡志明说，他对北越军队可能会利用暂停轰炸来加强它的军事地位表示关注。约翰逊说：“要是我得到保证——无论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北越停止派遣军队，停止向南方提供物资装备，那么我准备停上一切轰炸并采取进一步措施和把美国驻越武装力量冻结在现有水平上。”

这是一种真正的军事讹诈！

胡志明对美国的回答是：谴责美国对北方的轰炸是强盗行为，坚持越方的“四点计划”——包括撤出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作为唯一的争取和平的基础；强调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必须是南越人民的唯一的真正代表。

和谈不成，约翰逊又举起了利剑。

1967年7月底以前，西贡头目阮高其称，南越的武装力量将增加6.5万人，总数将超过100多万，同时考虑把征兵年龄降低到18岁。在此期间，泰国的“志愿军团”开始抵达越南，并预定9月份进入阵地。在8月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约翰逊公开宣布，赞同把布防人数增加到4.5万到5万人，在下一年，1968年，各兵种新的最高限额将达到52.5万人。

1967年至1968年旱季，美军为巩固已夺取的重要地区和继续扩大战果，采取了“固守与清剿”相结合的战略。企图通过这次攻势，集中更大的机动兵力“摧毁越共主力”，进而“基本解决”越南战争问题。其清剿行动基本采取搜索围剿的战术手段，以小股兵力在不远离阵地（主要是基地）或驻地的情况下，实施小规模攻势作战，而在广大农村，美军则主要是以空军支援南越军队进行作战。

南越人民武装斗争这时正式开始由农村向城市发展，实行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一旦时机成熟，集中兵力，主动出击。在1968年1月30日至2月7日，人民武装在南越全境发动了大规模的“新春攻势”，重点袭击了包括总统府和美国大使馆在内的美军、政府首脑机关、重要机场、电台、仓库等要害目标，给美军以空前沉重的打击，歼灭美军15万人。粉碎了美军组织的第三个旱季攻势。

美军经过三年的地面作战，不仅没有消灭南越人民武装，反而被人民武装打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1968年美国总统一约翰逊宣布撤销侵越美军司令威斯特莫兰的职务，由副司令艾布拉姆斯上将接任。

1968年2月底，美国从根本上紧急空运82空降师第3旅和陆5师第27

团共 1.05 万人到南越，同年 7 月，又将第 5 机械化步兵师 1 旅调入南越。至此，侵越美军地面部队达到 9 个师、4 个旅、2 个团，总兵员达 54.35 万人，随后，美军主要采取将主力部队撤回内线，同时放弃一些边远难守的据点，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守住 17 度线大门和西贡、岘港等大城市及其他战略要点，以 80% 的军队用于外线，加强“绥靖”活动。

美国把南越战场上不能取胜的原因，主要归于没有切断越南北方对南方的支援以及中国对越南的大量援助。因此，美国决定除在地面、空中和海上对越南南北通道进行封锁外，还对北越实施不断的轰炸。从 1965 年 8 月 5 日对北越大规模空袭开始，至 1966 年 10 月 31 日，约翰逊宣布全面停止轰炸时止，历时 3 年零 8 个月。从 1965 年 4 月初开始，美军主要集中海空军的作战飞机，把对北越的轰炸范围由军事基地等目标扩大到桥梁、铁路和主要公路等通往南方的运输补给线。到 1966 年 6 月，美军突破 20 度线，将空袭扩大到河（内）——老（街）和河（内）——友（谊关）铁路线以及河内、海防周围地区，一直到中越边境地区。

美军还于 1966 年 12 月 14 日和 1967 年 5 月 19 日，向中国驻河内大使馆发射空对地导弹，并于 8 月 13 日至 14 日，连续两天轰炸凉山、守化间铁路公路及其桥梁，突破了所谓中越边境 25 英里的轰炸“禁区”。

在美国迫于内外压力的情况下，抛出“部分停炸”方案后，又集中兵力轰炸 19 度以南到非军事区的狭长地带，同时保持对整个北越的空中侦察。1968 年 4 月以后，美军曾一度集中力量重点对“胡志明小道”实施遮断轰炸，时而对北越的纵深目标进行报复性轰炸。直到 1968 年 10 月 31 日，美国才宣布全面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和炮击。

自 1965 年 2 月到 1968 年 11 月，美军对北越的空袭共达 10.77 万架次（平均每天出动 3 至 4 架次），投掷弹药 258 万余吨。

越南战场上的形势，越来越使美国公众感到不安，反战情绪日盛，美国国家战争意志在衰退。1968 年上半年，全美爆发了约 200 次学生反战示威，还导致示威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

1968 年 5 月，北越与美国进行秘密会谈，但事情很快就陷入僵局。

六、尼克松为战争划了一个沉重的句号

就在越南战争处于关键时期的时候，美国大选来临了。人民的反战情绪逼得美国侵越战争的主要发动者约翰逊走向反面，用缩小战争规模的许诺来帮助自己的民主党拉选票，但这一切都没有显示出多大效果，不得不带着美国侵越战争的政治伤疤和大选中失败者的耻辱，退出美国的政治舞台。

1969年1月20日，美国新当选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天气阴沉、寒风袭入的气氛下进入白宫。新任总统上台伊始，面临着许多难题；但是，最仗他感到棘手的问题是如何从侵越战争的泥淖中拔出腿来。

尼克松上台后，在就职演说中指出：我们陷入了战争，需要和平；我们陷入了分裂，需要团结。

虽然尼克松为了争取人心，口口声声讲和平，但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并非易事。

就在尼克松口喊和平的时候。3月18日，他下达了第一道扩大战争的命令。美军开始出动B—52轰炸机轰炸柬埔寨。

尼克松政府上任4个月后，来自侵越美军司令部的报告说。又有4000多人在南越丧命，平均每月大约被打死1000多人。不得已，尼克松在中途岛宣布：在当年8月底以前，从越南撤出美军2.5万人。这是尼克松政府第一次从越南撤军。

尼克松为自己宣布撤军的依据是“战争的‘美国化’破坏了越南人的士气；战争的长期化又破坏了美国人的士气。”

1969年7月以后，尼克松改变了侵越战争的方针，采取一面鼓吹和谈、一面增加军事压力，大力推行战争“越南化”政策，改变约翰逊时期以美军为主体“替亚洲人打仗”的做法，加强南越集团的作战能力，以实现以“当地人打当地人”的企图。

美越双方打了多年的仗，积怨很深。因此参加即将在巴黎举行的越美会谈并非是件轻松的差事。新任总统所以选中基辛格，与其说是出于对他的信任，勿宁说是出于对他的能力的了解。

1967年8月至10月间，基辛格参加了旨在结束越南战争的秘密谈判。

基辛格甚至进入政府的最初几个月里，他后来那种智囊人物、头面人物、秘密使者的形象便已露端倪了。在共和党的高层人物中，能同他竞争的人寥寥无几。唯一可以较量一下的要算是马撒·米切尔了。基辛格一跃则成为超级明星，米切尔公开地把他称为“自命不凡的狂人”。基辛格却满不在乎，他干脆把这个评语转而当作一种恭维后来看待。

越南问题是外交难题的核心，基辛格和尼克松都决心让新政府免受造成林登·约翰逊1966年以后日子难熬的那种地位衰落之苦。巴黎和谈必须取得明显进展，军队必须撤出，伤亡必须减少，盟国必须和好，国内“和平运动”必须平息，与此同时，必须让南越政府“确信华盛顿在战争中仍支持它。”

被称为来无影去无踪、善于玩弄遁身术的基辛格，在越美和谈中，充当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他的旋风式的穿梭往来，多方运筹，为解决越南问题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

1969年3月底至4月初，南越人民武装趁美军将要撤离之机，在非军事区到湄公河三角洲一带发动了一次战略进攻，袭击了美军100多个基地和军事据点。

1969年6月，越南南方共和国成立，并建立了临时革命政府。

1970年3月18日，美国策动柬埔寨朗诺——施里玛达政变，并于4月30日悍然出兵侵略柬埔寨，妄图以“短期决战”一举摧毁柬埔寨人民武装主力和补给基地，结果2个月后就不得不将美军撤出柬埔寨。

1970年4月24日，印度支那人民高级会议在老挝、越南和中国边境地区某地举行。会议谴责美国侵略柬埔寨，最后发表了联合声明，印支三国要加强团结，共同反对美国的侵略，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为了粉碎美军的进攻，人民武装发动了著名的“九号公路战役”。1971年2月8日，美军采取坦克、装甲车突击与直升机机降相结合的战术，以九号公路为轴线，向南越人民武装发动进攻，越南人民武装集中5万亲人的兵力，在老挝人民武装的配合下，歼灭了公路北侧的美军，粉碎了美军进攻孟农和占领本邦的企图。战役历时43天，歼灭美军2.1万余人，击落击伤美军飞机500余架。

为了配合巴黎谈判，尼克松于1972年12月又下令对北越的军事目标进行狂轰滥炸。美军出动了100架B—52轰炸机和400余架其他战斗轰炸机，不分昼夜对北越的河内地区实施轰炸，企图迫使北越在谈判桌上作出让步。

1972年春天，印支三国武装部队联合对美军发动了规模宏大的春季攻势。3月21日，北越人民军4个整师，在大批坦克和大炮的掩护下，突然冲过了非军事区。这一次进攻的规模令尼克松政府吃惊。这次战略反攻，粉碎了美国的战争讹诈政策。从而促使交战各方于1973年1月27日在“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巴黎协定”上签字。

“巴黎协定”生效后，美国被迫于1973年3月将美国地面部队撤离越南，但以“文职人员”的名义在南越留下2.5万余名军事人员，并在南越附近地区保持相当规模的海空军部队。继续推行其战争“越南化”政策。

此时，南越西贡当局还拥有110万人的军队，又有美国海军的支援，仍不甘心失败，准备继续蚕食解放区。

越南劳动党南方局、南方军委和地方各级组织，面对西贡当局的进攻，进行坚决还击，阻止并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经过一年多的“蚕食”和反“蚕食”斗争，南越军队从1974年旱季就开始衰败，不断遭到打击。

1975年3月至4月，越南北方将主力部队大部分投入到南方战场，发动了著名的春季攻势，经过两原战役、顺化—岷战役、西贡战役三大战役，解放了越南南方，完成了统一祖国的任务。

在海军陆战队的掩护下，美国大使馆的人员在4月30日清晨撤出了西贡。海军陆战队的最后一次行动是运走两具美国人的尸体并降下国旗。当直升飞机向东飞向航空母舰时，北越的装甲部队开进了西贡商业区。到中午时分，曾废黜吴庭艳的杨文明代总统命令剩下的南越军队停止战斗。一位在河内执行外交任务的美军上校对他的北越谈判对手说：“你们都清楚，你们决不会在战场上打败我们。”对方稍停片刻，然后回答说：“也许如此，但这又何必！”

美国这场入侵印度支那的战争，由肯尼迪总统发动，约翰逊总统升级，尼克松总统了结，历时14年，花费1650亿美元。再加上死伤几十万人，真是得不偿失，美国人称之为“最肮脏的战争”。

七、走向衰落的美国军事力量

在越南战争接近尾声之时，美国修订了它的国家安全政策。战争削弱了美国的前沿集体防御战略。自 1950 年以后，国际形势的发展超越了美国军事能力的控制，尼克松政府为平息国内反战运动而设计的政治调停计划，在尼克松卷入“北方事件”并于 1974 年辞职之后，已酿成一次修改对外政策的大潮，留给尼克松的继任者杰拉尔德·福特的是一个削弱的总统职位和捉襟见肘的国防政策。

美国军事力量的衰落反映出公众对战略威慑和前沿集体防御的失望情绪以及公众对总统处理外交事务权力的怀疑。

尼克松和福特先后任命了四位国防部长，只有两位（梅尔文·莱尔德：1969—1973 和詹姆斯·施莱辛格：1973—1975）任职时间较长，是可产生较大的影响。莱尔德根据自己在国会长期工作的经验，把自己的主要使命确定为恢复他领导下的国防部在政治上的合法地位。在内部，他革除了麦克纳马拉制定的许多采购政策，并限制了文职系统分析人员和外交政策专家们的作用，以此来取悦各军种。施莱辛格则深信“没有国防的缓和只是幻想”，因此，他努力扭转军事力量的颓势。

国会利用公众对越南问题的幻灭情绪来维护自己对国家安全政策的影响，它通过与白宫合作将国防开支控制在 700 亿美元的水平，从而使 1968 年——1974 年这 5 年内的实际军费开支减少了 37%。

在一种动荡不定的政治环境中，尼克松政府特别重视通过部队现代化和军备控制谈判来维系同苏联的核战略稳定态势。苏联研制出了 SS—9 型和 SS—11 型两种新型导弹，表明它已具备了部署具有重型弹头载运能力的、精度更高的洲际导弹则新能力。专家们警告说，如果苏联研制出可打击不同目标的分导式多弹头导弹，这将使它们获得至少同美国均衡的地位。

美国政府密切注视着苏联在反弹道导弹防御方面的进展。实际上，美国 1967 年加速进行的反导计划取得的进展更大，但苏联却已拥有由超高速导弹和相控阵雷达组成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尼克松政府对此作出反应，批准了已在执行中的下列计划：发展可重新瞄准目标的洲际弹道导弹，将分导式多弹头导弹装备到两种新型导弹（“民兵”式洲际弹道导弹和“海神”式潜射弹道导弹）上，以及为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部队研制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1971 年，国防计划人员报告，分导式多弹头导弹计划将保证使美国在整个 70 年代都占有 3：1 的弹头优势。

尼克松政府努力通过 1972 年所签订的两项条约来限制同苏联的核军备竞赛，这两项条约是“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关于洲际运载工具的“临时协议书”，“反弹道导弹条约”没有时间限制，它限定美苏两国只能在两处部署不超过 100 枚导弹的反导系统。“临时协议书”有效期为 5 年，它对双方所能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规定了数量上的限制。

美国将把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保持在 1054 枚，而苏联则有 1618 枚。美国接受了部署在 44 艘潜艇上的 710 枚潜射导弹的限额，苏联则可以有 62 艘潜艇和 950 枚导弹。由于美国的弹道导弹潜艇拥有技术优势和具备较高的战备水平，这种潜射导弹数量上的不均等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况且，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部队避开了条约限制，而且分导式多弹头这一更为重要的问题也不在限制之列。

这些条约的缩语称为“SALT I”（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一阶段条约），它们只不过是军备竞赛受到暂时的限制而已。由于坚信雷达和卫星监测将这些条约的执行提供适当的核查手段，因此双方都没有表现出信任对方的意向，两国都在条约限制之外的项目上下功夫。

1974年，福特总统和勃列日涅夫达成了“海参威协定”，该协定将各种运载工具（包括轰炸机）的总数限定为2400件，其中1300件为分导式多弹头运载工具（包括装备巡航导弹的轰炸机）。

在越南战争恶化的政治环境下，尼克松重新确定了国家防备的轻重缓急。在1969年，尼克松宣称，美国将致力于履行它对北约的义务并保持同日本和南朝鲜之间的军事联盟。其他所有的地区性冲突将主要由美国的盟国来对付，而美国将只限于提供空中支援、技术援助和武器。这一宣言掩饰了美国常规能力的下降。美国在越南撤出地面部队使美武装部队的规模从340万（1968年）减少到210万（1975年）。

为平息国内的反战运动，美国废除了征兵制，而实行“全志愿兵”制，但结果并不理想，服役人员素质普遍下降，服役的黑人和女性人数的增加也造成了新的内部问题，并且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与吸毒和种族问题相关的暴力行为，使军营生活成了青少年文化中最坏的同义语，军队的士气低落。

在兵员费用和采购效益的双重夹击之下，军界除削减其作战和保养开支外，别无他法。

尼克松和福特政府在美国军事力量显露出力不从心的迹象时，就试图将集体防御的负担推卸到其盟国身上，但结果同样令人失望，因为绝大多数盟国都同样混乱不堪。

国会还使政府在对共产党支持的起义者进行作战的问题上遇到了障碍。政府这类行动中的最后一次成果是在1967年，当时美国训练的玻利维亚别动队杀死了切·格瓦拉并消灭了他的游击队。但它在智利的另一次行动（1970年发动一场军事政变把阿连德政府赶下了台）却遭到非议，因为智利军方杀害了阿连德，并宣称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中央情报局内部的秘密行动组织在减少了它在东南亚的活动之外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清理。1974年1月，国会对秘密行动进行了立法限制。总之，对越战的政治反响已遍及全球。美国不仅没能在越南实现其政治目标，反而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以致于将其在世界其他地方使用军事力量的意志和能力也一同抵押进去了。

这场战争没有结束冷战，却使美国保持了25年之久的军事优势荡然无存。正如一位老兵所言：“我们自己打败了自己。”

第十六章 美军人侵格林纳达

- 一、加勒比海诱人的石榴
- 二、岛国总理倒在血泊中
- 三、凌晨的电话铃声惊醒里根总统
- 四、里根总统口述三点出兵理由
- 五、“铁女人”态度强硬要求取消行动
- 六、“暴怒行动”开始
- 七、“海豹”突击队直扑圣乔治

一、加勒比海诱人的石榴

格林纳达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在常见的世界地图上，它小得甚至不足以标下它的国名。但在世界政治家、军事家的眼中，它的份量决不低于世界战略要冲马六甲、直布罗陀、福克兰。它处于加勒比海东部向风群岛的最南端，西濒加勒比海，东临大西洋，南和委内瑞拉、特立尼达及多巴哥隔海相望，东近巴巴多斯，它扼守着加勒比海出入大西洋的门户。试想如果某一天这扇门户突然轰地闭上，那世界战略家们将会变得何等惊惶！

也许就因为这个原因，17世纪中叶，一伙白人从海上登上了小岛，用了把斧头、两瓶白兰地和几颗玻璃球，从无比强悍但同时又无比纯朴的印第安酋长手中，换取了这个岛屿的所有权。从此，这里的统治者便变成了欧洲人。

格林纳达由主岛格林纳达和卡里亚库，小马提尼克等一些小岛组成。主岛上多山多水，河川数以百计，还有一批火山口湖。这个弹丸小国共344平方公里，10多万人口，风景秀丽，气候宜人。

格林纳达这个词，在西班牙语中是石榴的意思，这个美丽而又富于想象力的名字，据说是1498年哥伦布登上该岛时取的。几百年来，这颗石榴太具诱惑力了，法国人、英国人来来回回在争夺，直到1974年2月，才独立为“英联邦”成员，由英国女王派去了一位总督——72岁的保罗·戈德温·斯库恩。

几百年来，沧桑演变，风云激荡。但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却没有演出惊世骇俗的故事。如果不是因为那一场突然的事变，如果没有那一片惊动世界的枪声，小岛似乎会永远地沉默下去，世界上大多数人也不会知道格林纳达这个美丽的名字。

1972年，莫里斯·毕晓普领导成立了“新宝石运动”，主张建立“人民参政”国家。新宝石运动，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影响较大，对外同古巴有着密切的联系。

自70年代以来，这个弹丸岛国的政局一直处于动荡之中。罢工、示威、游行、骚乱、冲突，接连不断，国家生活陷于瘫痪。独立后，局势趋于缓和，但矛盾仍很尖锐。以新宝石运动为骨干的反对派力量继续在国内猛烈抨击埃里克·盖里政府侵犯人权，维持高压统治。1976年大选时，这个运动和其他两个反对党组成人民联盟，提出了保持物价稳定、增加生产、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政纲。1979年3月13日，新宝石运动领导人莫里斯、毕晓普乘埃里克·盖里访问纽约之际发动政变，推翻了埃里克·盖里政府，并于3月25日成立新政府，取得国家统治权。

毕晓普上台后，格林纳达开始同苏联，尤其是古巴，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关系。毕晓普从卡斯特罗那里得到了粮食、机械和一批格林纳达急缺的物资。毕晓普兴冲冲地宣称：“对于亲爱的古巴兄弟。格林纳达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1980年1月，格林纳达和古巴投票反对联合国关于谴责苏联侵略阿富汗的一项决议。1980年10月27日，格林纳达国防部长与苏联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签署了一项主要军事武器援助协议。另一项协议于1982年6月27日签订。后来，格林纳达与苏联、保加利亚、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贸易协议。在1982年的联合国大会上，92%的格林纳达选票赞成苏联集团。

美国人对格林纳达日益和苏联人接近深感不安。美国人常充当“世界警

察”，在全球范围内对他国事务指手划脚，横加干涉，以自己的利益和价值原则作为衡量别国的标准。

在古巴和苏联的援助下，格林纳达成立了“人民革命军”，建立了民兵队伍，并由古巴派工程兵和建筑工程人员在主岛西南端的萨林斯角修建一座大型现代化国际机场，在美国入侵前，这个机场已大部竣工，机场跑道长达4000米，造成后，可降落大型飞机，一旦改为军用，苏联、古巴各型作战飞机就可进驻，届时必将扩大苏、古在该地区的影响，威胁到美国在加勒比地区海上运输线的安全。

这下格岛的地位在苏、美全球争霸中就十分重要了。美国向来认为加勒比海是它的“内海”，尤其不能容忍苏联插手这一地区，不能容忍眼皮底下的格林纳达不按自己的笛音跳舞。

当里根总统听说格林纳达正在修筑一条4000米的机场跑道时，着实吃了一惊。“我真不明白，这么个小岛修近4000米的机场干什么？”

美国密切注视着这个岛国上发生的一切，为了稳定它的所谓“后院”，遏制苏、古的影响，摆脱自己的被动局面，一直在寻找机会除掉这一“隐患”。

美国总统在一次广播讲话中说：“格林纳达已成为苏、古的殖民地，准备用来作为输送恐怖和破坏民主的重要军事堡垒。”并曾多次声称，美国准备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来教训”格林纳达，以收杀鸡儆猴之效。

区区一个弹丸小国，如何禁得住美国的恫吓？在美国的压力下，毕晓普不得不开始调整对外政策，在继续同苏联、古巴保持密切关系的同时，努力同欧洲共同体和加拿大等国发展经济合作关系。1983年初，毕晓普亲赴华盛顿会见里根，试图缓和与改善关系。

这对里根和毕晓普来说，都是一次机会，但它过于短暂。从华盛顿回到圣乔治，毕晓普打算在改善同西方和美国关系方面来点实质性举动，并召集几位亲信进行彻夜商谈。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最大愿望，莫过于在比较充分的国际援助下，使自己国家落后面貌有较大的改善，让格林纳达像宝石一样，在大西洋上放射出璀璨的光芒。

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处境确实太难了！平衡木太窄太险，稍有不慎，就会落入莫名其妙的狂潮之中。

毕晓普不得不踮起脚尖，每一步都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但即使如此，他也躲避不开攻击与恫吓。政府内的强硬派公开对毕晓普谋求改善同西方和美国关系的政策表示反对，苏联和古巴对毕晓普的猜忌日渐加深，有人扬言，如果毕晓普不行，那就换掉他。

二、岛国总理倒在血泊中

1983年10月，格林纳达发生了旨在推翻现任总理毕晓普的政变。小岛之国风雨飘摇，人心惶惶。

毕晓普在格林纳达面临着副总理科尔德的政治挑战。科尔德是新宝石运动激进领导人，被看作是持强硬路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试图削弱毕晓普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权力，指控毕晓普没有对国家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巩固革命，并使用独裁专横手段。1983年夏季，新宝石运动中央委员会一直在争论这个问题。9月27日，毕晓普离开格林纳达访问莫斯科、东欧和古巴，10月8日返回格林纳达，并试图重新掌握新宝石运动领导权。但10月12日，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软禁毕晓普。清脆的枪声打破了加勒比海这个岛国的宁静，以政府军司令奥斯汀为首的军官，领导了格林纳达的军事政变，叛军攻占了总理府。奥斯汀宣布，成立以他为首的革命委员会。叛军的公告通过电台播出后，全国立即陷入恐慌，局势动荡不定。拥护毕晓普的人紧急行动起来，举行抗议示威，要求恢复毕晓普的总理地位，严惩政变组织者。

毕晓普曾经宣称，他是个共产主义者。但在格林纳达人看来，他还是比较温和的，上台几年来，也确实为民众办过不少事情。出于对毕晓普和其政策的同情，人民纷纷起来，对毕晓普进行声援。

10月19日凌晨，几千名群众聚集在圣乔治市。一大群人登上通往总理官邸的小山，高喊：“我们需要莫里斯！”“没有毕晓普，就没有革命”。守卫在官邸的士兵开了几枪，但显得犹豫不决。人群推一辆装甲车，从后门涌进官邸，发现毕晓普和他的夫人杰奎琳·克里夫特被绑在床上。毕晓普因监禁和精神混乱显得体态虚弱、憔悴不堪。激动的人群开着一长列小型汽车将毕晓普和克里夫特载走。中心广场的人群正在等待毕晓普出现，而小车却驶向了临港的鲁帕特要塞。经过一阵短时间的混战以后，要塞里的小股守备队被驱散了。毕晓普走进了一楼的作战室。

自由了的毕晓普站到追随者们的中间，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演说，然后率领队伍继续上街游行。他相信，他的存在就是一种力量，他的声音可以唤起整个国家，他要用自己的方式击败对手，重新夺回政权。

作为政治家，毕晓普过于天真了。既然毕晓普的存在足以危及到新政权的存亡，那么解决办法只有两条：或者是叛军投降，携手交还政权；或者是清除毕晓普，一劳永逸地铲掉这个对手。

奥斯汀自然选择了后者。

中午过后，3艘受革命政府指挥的BTR—60型战舰在圣乔治市东部的弗勒德里克要塞出现。一接受鲁帕特要塞，便用重机枪和RPG—7型火箭开火，工会领导人维斯特·洛尔死在要塞前沿。至少有4名士兵在和毕晓普支持者的战斗中被打死，一大群人在逃跑中被打死或打伤。毕晓普大声叫：“天哪！他们竟然向群众开枪！”士兵们停止射击，命令毕晓普和他的追随者离开要塞。当他们出来时，士兵又强迫一些人返回要塞，其中包括莫里斯·毕晓普。显然，士兵要在要塞里用自动武器处决他们。

仅仅10分钟后，这位前总理便倒在血泊中。与他同时被枪决的，还有几个最坚定的支持者。

格林纳达的历史，被枪子击开了一个染血的窟窿。

以科尔德为首的激进派枪决了毕晓普，是因为毕晓普德高望重，威胁着他们的势力。第二天，武装部队政治部宣布在平息“反革命分子”、“人民叛徒”、“反对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事实上，派别斗争仍在以各种方式继续。10月19日晚，奥斯汀发布了24小时戒严令，凡是不遵守戒严令的人将遭到枪击。动荡在继续。

三、凌晨的电话铃声惊醒了里根总统

美国极其密切地注视着格林纳事态的发展。事实上，早在毕晓普上台之后，美国情报机构和军方就高度注视着这个不安分的邻居了。国防部长温伯格是美国有名的鹰派人物，他强烈反对共产主义，认为只能用军事上的制衡才能换取世界和平。他把格林纳达的所作所为看作是对美国利益的极大挑战。他时常收到有关格林纳达局势的情报摘要，其中包括那个大型机场，温伯格向里根总统提供了机场的照片。

1983年3月23日，在一次全国电视讲话中，里根总统向美国公布出示了这些照片，并毫不掩饰地谈到了格林纳达问题。他说：

格林纳达这座小岛处于加勒比海链条的南端。古巴人在苏联的财政援助和支持下，在这里修筑了一座跑道有一万英尺长的飞机场。格林纳达连一支空军部队都没有，修这么大的机场用来做什么？加勒比海是美国国际贸易和军事运输的最重要的通道，美国石油输入现在有一半以上通过加勒比海。在格林纳达这个只有10万人口的岛国，这种迅速发展的军事潜力，与它想要抗衡可能受到的威胁这一目的是不相称的，而且，对周围其它加勒比地区的国家来说，也是不适当的，因为这些国家大部分没有军队。总之，由苏联和古巴武装起来的格林纳达完全可以看成是霸权主义在这一地区的渗透。

在这次谈话的两个星期以前，3月10日，里根总统也曾谈到格林纳达明显成为一个军事基地，应引起美国的注意。

美国每年有大量军费开支，掌握着世界最先进、最有威力的核武器，拥有庞大的、精锐的军事力量，然而，它却不能容忍别国——那些不按它的旨意行事的国家发展、武装自己。美国这个所谓的“地球家长”总是这么咄咄逼人，不可一世。如今，格林纳达被认为是苏联古巴支持下的，被用来作为极左政权强加于人民的实验室，美国照例是不会不问不闻，隔岸观火的。

10月21日，星期五，里根及其夫人乘飞机到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国家高尔夫球场度周末，打高尔夫球。同去的还有国务卿舒尔茨、白宫办公厅主任唐·里甘、前美国参议员尼古拉斯·布雷迪和他们的夫人。里根总统希望能有一两天休息放松的时间。

星期六清晨四时过后不久，里根和南希被巴德·麦克法兰来的电话吵醒。巴德是作为白宫旅行后勤小组的成员来奥古斯塔的。

“总统先生吗？我是巴德·麦克法兰。”电话里传来这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声音。

“什么事？”

“总统先生，乔治·舒尔茨和我得马上见您。”

几分钟后，里根在他下榻的艾森豪威尔别墅起居室里见到了舒尔茨和麦克法兰。两人虽都穿戴整齐，但从他们脸上的倦意可以看出，他们也是刚刚从酣睡中被叫醒。“总统先生，我们不得打扰您。”麦克法兰手里拿着一份电话记录，声音有些紧张，“刚刚接到华盛顿的电话，格林纳达发生政变之后，前总理莫里斯·毕晓普曾请求美国援助，但是前天，毕晓普已被叛军枪杀。与格林纳达相邻的几个国家都开始感到不安，联合敦请美国进行干预。正式要求已于昨晚提出。”

听到这里，身着睡衣的里根睡意全消，从麦克法兰手中拿过电话记录本。

舒尔茨向前略略欠了欠身子，向里根报告说，他已指示国务院同几个西

方主要国家联系，了解他们对格林纳达政变和毕晓普被杀事件的反应。

当时，还有 800 名美国学生在格林纳达的一所医学院上学，这也成为美国出兵的借口——他们可能成为人质，美国政府不能坐视这一危险。

里根以及助手们很快在心中打定主意：满足东加勒比国家的要求，为营救美国学生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行动。

东加勒比国家组织的正式邀请是在 10 月 23 日发出的。但据美国总统发言人拉里·斯皮克斯说，美国政府事先就派了前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里卜·弗兰克·麦克内尔去巴巴多斯的布里奇敦，一再叮嘱正在那里开会的东加勒比国家的 5 国领导人，发邀请电时务必不要把收报人的地址写错。东加勒比国家组织者未正式发出邀请，美国就急不可耐地表示接受了。

美国人总是这样，在善意和公理的旗帜下行事，把自己打扮成扶危救困的正义事业的主持者，但人们都完全有理由怀疑，里根总统在一个睡眼惺忪的凌晨所作出的“应邀”入侵的决定，实质上只不过是一出自编自导的傀儡戏而已。

就在美国政府秘密制定入侵计划的时候，设在格林纳达布鲁克林区的医学院办公室宣布说，在格林纳达的美国学生没有受到什么威胁，那些要求美国出兵的提议是不会受欢迎的。医学院院长查尔斯·莫德卡发表谈话，期待医学院能继续与格林纳达政府保持友好关系。

尽管如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仍在讨论入侵计划。而且就在 10 月 20 日，毕晓普被枪杀的第二天，温伯格同意了维塞将军的建议，命令“独立”号航空母舰以及去黎巴嫩接防美军的海军陆战队补充舰队改航朝南行进，到达格林纳达附近后，随机待命。

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拉格要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卡姆伯尔要塞，还部署了警戒部队和警戒空降师，这些军队随时听从里根总统的召唤。

参谋长联席会议修改、补充了打算出兵格林纳达的方案，其入侵的目的是不仅要关闭小岛东站的珠珍机场，而且要尽快关闭萨林斯角的新机场，同时，要安全护送小岛西南部医学院的美国学生，救出监狱里的原格林纳达总督和其他政治犯。

里根总统在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期间，副总统布什便于 10 月 20 日星期四凌晨 4 点 45 分，主持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特殊情况小组会议，决定按原计划命令军队处于战备状态。

维塞将军立即通知大西洋舰队总司令做好准备，以确定战时怎样在敌对形势下撤走格林纳达的美国公民。

这个计划方案包括海军陆战队将在珠珍机场附近的贸易港口的东北部登陆，而突击队将空袭到格林纳东南部一座有 1 万英尺跑道的的新机场，这两支部队会合后，迅速向北、向西引进，去营救美国学生，然后，与特种部队一道救出总督，占领电台，释放关押在鲁帕特要塞和利奇蒙德山的其他政治犯。

无疑，这样一次行动要做大量的后勤准备工作。10 月 22 日（星期六）凌晨 2 点，温伯格和维塞将军与佐治亚州奥古斯塔的总统通了话，商谈了来不及收集那里的情报等问题。为了不引起外界过分注意，里根没有马上离开奥古斯塔。

星期六上午 9 点，副总统布什在情况室主持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计划小组会议。会议同意派遣海陆空特混队去获取登陆时所需要的情报，以便继续修改出兵格林纳达的详细方案。这支特混队是用来执行登陆前的侦察任务，完

成各项特别艰难的行动计划，并经过严格的专门训练，能承担起各种危险而又重要的任务的。这时，里根总统还同意会议通过的一项对格林纳达的援助计划，还考虑帮助格林纳达恢复一个所谓的“民主”政府。

国家安全委员会计划会议之后，国防部长温伯格返回五角大楼“坦克”会议厅’，会见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大家又重新审阅了整个方案。温伯格要求计划增派一倍的兵力，陆军指挥官认为这是必要的。

四、里根总统口述三点出兵理由

10月份对里根总统来说真是一个多事之秋。10月23日凌晨2点半，里根又一次被电话叫醒，他得到报告说，一个与车同尽的投弹手开着满载炸药的汽车绕过美军岗哨，冲进贝鲁特机场海军陆战队营房，制造了一起罕见的爆炸事件。后来统计表明这次共炸死美国海军陆战队241人。

里根再也无法入睡了。他给五角大楼订电话，要求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确保贝鲁特其余的海军陆战队员的安全，接着，里根同随行的舒尔茨、麦克法兰紧急会晤谈了几小时。天慢慢亮起来的时候，贝鲁特传来消息越来越使里根沮丧。清晨6点30分，里根一行前往机场，登上空军一号飞机，飞往华盛顿。

回到华盛顿，里根总统立即在象征美国最高权力的椭圆形办公室里，召开了关于格林纳达局势的秘密会议。

这是里根就任总统以来保密程度最高的一次会议，参加者除了总统、国务卿和国会领导人外，只有里根的几位高级助手。这次会议上没有军方负责人，甚至连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斯皮克斯也毫不知情。事后，当有人问起白宫这次会议的情况时，斯皮克斯大吃一惊：“怎么，白宫开过讨论格林纳达的会议了吗？”

之所以如此谨慎小心、如此秘而不宣，就在于里根将作出任职以来最为严峻，从而也会使国际社会舆论大哗的一项决定：出兵格林纳达！

靠墙的地方挂了一张南加勒比海地图。即使是在这张放大了250万倍的地图上，格林纳达仍然显得那么渺小。似有若无。在地图的下方，有一行提示性的文字：格林纳达，距美国3000公里。

“外界对这件事有什么反应？”里根问国务卿舒尔茨。

“欧洲国家对毕晓普被杀一事普遍感到震惊。”舒尔茨说。这位里根政府中最大的富翁看上去有些疲倦，但讲话声仍然十分清晰，“毕晓普被处决的第二天，牙买加总理爱德华·西加就公开警告说，格林纳达新的统治者，是古巴训练的马克思主义者。东加勒比海各国都发表声明，对政变一事表示谴责。安提瓜、巴巴多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多米尼加和牙买加这6个国家，早就对古巴在格林纳达的活动感到不安。他们经过磋商后，已正式向我国提出，请我们对格林纳达直接进行干预。”

“是请我国出兵吗？”国会领导人问。

“是的，”舒尔茨望了望里根，说，“我认为应当这么理解。”

屋内顿时陷入了沉默。

动用军队对别国进行武装干涉，这在美国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但它所引起的种种内政外交问题，以及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问题，不能不引起决策人士深深的忧虑。

这时候，有人顾虑重重他说，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世界上最弱小的国家动用武力，胜利了，不会给美国增添光彩，而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无论胜败，都会招致国际间严峻的政治反应。

有位助手怯生生地说，古巴人已在格林纳达营造了好些年，万一美国军队开进去没能取得决定性成果，拖下去怎么办？

持强硬立场的舒尔茨和麦克法兰强调说，对格林纳达的处置方案必须从以下几点加以考虑：一、在格林纳达的圣·乔治医科大学内，有好几百名美

国学生，要是他们发生意外或是被扣作人质，政府无法向全国人民交待；二、美国不能坐视古巴人把格林纳达建成一个反美堡垒；三、格林纳达局势的变化，已经危及了加勒比地区的安全，从而威胁到了美国在加勒比的利益。如果在6国政府敦请美国出面干预后美国毫无作为，那势必会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威信。“再说，”舒尔茨望着格林纳达地图，加重了语气，“在毕晓普被枪杀之前，也曾经代表合法政府，呼吁美国进行援助。”

国务卿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立场，在相当程度上也代表了总统的立场。两人话刚完，里根便对出兵的后果申明了态度：“我知道后果如何，我心里有数。作为美国总统，我个人愿意承担任何后果。”

里根总统之所以态度如此坚决，主要基于对所谓美国“后院”出现问题，向来极端敏感，稍有火垦闪烁，就要立即扑灭，决不允许大火燃起。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先后出兵镇压了多米尼加、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的人民武装斗争，镇压了巴拿马学生爱国运动，出兵进攻古巴，企图镇压那里的人民革命。古巴导弹危机时，美逼迫苏联撤出了援助古巴的导弹。1970年，美国又出兵镇压了特立尼达——多巴哥军队起义。

经过一阵磋商，里根口述了以下三点出兵理由：一、保护在格林纳达圣乔治大学的几百名美国学生；二、保护在岛上的英国总督保罗·戈德温·斯库恩；三、根据原总理莫里斯·毕晓普合法政府的请求和加勒比6国政府的紧急要求。

里根还决定，由国务卿舒尔茨向西方盟国讲明情况，取得谅解，并保持同加勒比海国家的联系。为了使出兵一事在政治上具有合法性，敦请美国干预的加勒比6国也应派出军队，哪怕是几名警察。

最后，里根站起身来，望着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卡斯珀，具体行动就委托您了。从现在起，我每时每刻都在这间办公室里等候您的消息。”

“明白了，总统先生。”温伯格严峻地点了点头。“具体行动时间——”里根拖长声调，望了望日历，“定于10月25日，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的立场。”

格林纳达的命运就这么被3000公里以外的几个人决定了。此时是1983年10月23日下午5时30分。圣乔治的奥斯汀将军和他的古巴顾问们正忙着应付国内的动荡和接管政权，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毫无察觉。

温伯格再一次会见了维塞将军，温伯格充满信心，对维塞将军说：“相信我们有足够力量。”并授权维塞，如果遇到比预料中更强大的抵抗劲敌，可动用82空降师进行增援。

然后，他俩又一起去会见里根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里根分别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都担心时间太紧，得不到更多的情报，也不能进行事前演习，这样，就给行动带来一定的困难。从里根总统的提问和讲话中，很清楚他早已决定出兵格林纳达，除非他们采取有力措施，保证美国学生的安全。

后来，总统在那天下午正式通知温伯格他决定采取行动，营救美国学生，拯救这个岛国。实际上军方早已下令做好准备，包括下令改变军队原来的任务，如：推迟了轮换在黎巴嫩的海军陆战队；让接防部队从前往黎巴嫩的途中改航格林纳达，着手准备后勤支援工作。

里根总统最后说，通知国会领导人和盟国一定要在登陆前才能透露这一情况。

温伯格认识到，总统的做法是对的，因为这一行动需要绝对保密。一尾所有的盟国会对此大吃一惊；二是要尽快救出学生，不可能预先进行登陆侦察活动，也不敢透露出任何消息或迹象表明开往中东的海军陆战队已改航，以免使苏联、古巴和其他国家的军队进入战略状态；三是出于同一原因，也不能使警戒部队登机采取行动。尽管尽量保密，美国电视台还是报道了前往中东的海军陆战队分遣舰队已改航南下。

温伯格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实施作战计划时，应尽力考虑到最大限度保证安全，保证这次行动成功所需的兵力和军用物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维塞将军建议，总统一下达命令就开始行动。

海军中将约瑟夫·麦特卡夫在他的直接上司、大西洋舰队司令麦克唐纳上将的支援下，提出一项强烈要求：在格林纳达登陆时，不允许任何新闻记者和其他类似人员尾随。通常，在到达登陆地点后，就应允许新闻记者采访。温伯格等人也意识到不允许记者随行的决定会引起不快，但他认为应该支持指挥这次行动的司令，所以同意了他的请求，尽力让记者于第一天行动结束后再进行采访。温伯格说，我们相信这位指挥官能取得这次行动的成功。在他看来，如果拒绝指挥官请求，就意味着一个不好的开端，指挥官这样做一定有自己的正当理由。

里根总统决定将格林纳达行动计划在星期一晚上通知国会领导人。出于多种原因，他要他们到楼上家用客厅去，尽量避免在这个非常时刻召集国会和军队的领导人开会而引起谣言。这样，大家聚集在白宫楼上这间客厅里。这是一间装潢漂亮，以金色为主的房子。大家坐在壁炉对面的两条长沙发上。穿过房子，从阳台上可以看到华盛顿纪念馆和下面的林荫大道。这是华盛顿十月的寒夜，壁炉里的火是最受欢迎的。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防部长都在那里等候国会领导人的到来。温伯格简明扼要地又一次谈论预定第二天出兵的计划方案，提到军队可能会取胜和遇到危险的一些事。

温伯格向总统报告说已派海军特遣队在选定的海岸登陆进行事先侦察，并特别嘱咐他们尽量不让人发觉或觉察到他们的意图。实际上，他们此刻正在行动，只不过要在几小时后才能得知他们行动的情况。里根总统对此很感兴趣。

过了一会儿，一些国会领导人进来了。他们至少觉察到正在讨论重大问题——晚上聚集在白宫家用客厅里决不是寻常事情。

里根总统简要而又全面地谈了谈形势，强调美国学生的危险处境，担心可能会被扣为人质或发生比这更坏的事情。总统谈到了来自东加勒比邻岛国家的强烈呼吁，他说：“我认为我们只有答应这项请求，别无选择。不行动比采取行动更为冒险。”

然后，他让温伯格简要讲述了一下军事计划。维塞将军详细而又干脆有力地描述了这一行动方案。总统告诉了国会领导人第二天登陆的时间，自然也要求他们严守机密。

这些国会领导人很少发表意见，众议院议长奥尼尔沉思了一会儿才说：“总统先生，我只说一句话，上帝与你同在，祝我们大家好运气。”参议院民主党领导人比尔德对出兵方案提出了几个问题，诸如派多少部队？我们将遇到多少格林纳达兵和古巴兵？苏联是否在那里？一一作了回答后，其他人没说什么。

五、“铁女人”态度强硬要求取消行动

10月24日晚，当国会领导人走出白宫二楼家用客厅时，里根总统抬腕看看表，他刚刚接到撒切尔夫人打来的电报，撒切尔夫人对迫在眉睫的行动“深表关切”。里根总统想：他应该与撒切尔夫人协商一下，虽然这时伦敦也很晚了。

里根总统走进隔壁一间房子。从伦敦传来的是撒切尔夫人不满的声音。里根总统认真叙述了计划方案的详细内容和那些惹人恼火的事情，提到格林纳达没有一个能控制局势的政府，英王的代表保罗·斯库恩总督本人也被囚禁起来了（他本人也请求援助）。里根总统强调地说，面对邻国的请求和美国公民前途未卜的命运，他没有别的选择。

撒切尔夫人十分生气，她说，她刚刚听到就要采取的这次行动（大概是从格林纳达的英国军官那里听到的），她最强烈地要求取消这次行动。她毫不客气地提醒里根说，格林纳达是英联邦一部分，美国无权干涉它的事务。

撒切尔夫人的强硬态度使里根很为难，他知道，撒切尔夫人取消这次行动的要求不可能得到满足，因为此时，行动已经开始。

那么此时此刻古巴和格林纳达岛上的人又在于什么呢？

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曾经领导过光荣的“7.26”运动，靠7条步枪攻打过反对政府的兵营。到1959年，他终于推翻旧政府。从那时起，他便一直担任古巴武装部队总司令，后来又将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60年代初，他领导古巴同美国的侵略、封锁、干涉进行坚决斗争，沉重打击了美国及其走狗的势力。他曾向世界宣称“古巴正在建设共产主义”。在他眼里，古巴已不是过去的古巴，古巴是要为整个世界做事的。

曾有人奉劝卡斯特罗，要他在格林纳达小心从事，“美国可能会进行干预的。”卡斯特罗对此报以冷笑。

美国？美国算什么？20年前，拉丁美洲只有古巴，他们尚不敢碰我们一下。今天不仅有古巴，而且有尼加拉瓜、格林纳达！实际上，美国人对他的所作所为的态度，卡斯特罗心中早已有数。

就在10月23日晚，卡斯特罗还向其部下打气说：“别担心美国人会干预我们格林纳达的革命，那不可能。美国人没有那个胆量，也没有那个力量！”

可是到了深夜，一个加勒比国家组织的成员告诉他：美国即将出兵格林纳达！整个夜晚，卡斯特罗在屋内走来走去，毫无睡意。

尤其值得玩味的是，此时给卡斯特罗打电话的这个国家，恰恰是对格林纳达政变深感不安，并于两天前同东加勒比国家组织的另外几个成员国一道，敦请美国武装干涉的国家！

一个弱小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举步维艰、战战兢兢的苦状，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美国进行了严格的新闻封锁，但其即将出兵的消息还是传到了格林纳达。政变之后，格林纳达的新统治者曾警告说，所有人都必须服从政变当局颁发的戒严令，若有人违令擅自外出，一律惩处。实际上，政变当局并没有对圣·乔治医学院的美国学生有过任何威胁或伤害之举。对于一个几乎完全依靠旅游业为其外汇来源的岛国来说，医学院是个主要收入来源。政变领导人并不想在自己执政后给经济上带来灾难。因此，即使是在局势最为动荡的时候，政变军队也没敢动医学院一个手指头。

慑于美国的威力，格林纳达的政变领导人给美国政府发了一封电报，表

示任何愿意离开格岛的美国公民都可以自由离开，既可以坐正常航班，也可以包机。

政变领导人奥斯汀一点不想，或者说一点不敢得罪美国。

此时离美国计划入侵时间还有 12 个小时。 10 月 24 日晚 10 时 15 分，这时离入侵只有 8 个小时的时间了，舒尔茨这才发了一封电报给距格林纳达最近的巴巴多斯美国大使馆，让大使通知格林纳达的军事领导人：美国拒绝接受他们的电报，因为美国怀疑这个政府的合法性。舒尔茨还向政变领导人发出了含蓄的警告：“我们将与他们的邻国接触，而且十分重视他们的意见。”

实际上，当天下午 5 点，作为美国总统的美国三军统帅的里根，已在那份批准入侵行动的文件上庄重快捷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罗纳德·里根。

进攻时间： 10 月 25 日清晨 5 时。

代号“暴怒行动”。

六、“暴怒行动”开始

根据里根总统的命令，美国武装部队开始正式受命进攻格林纳达。

美国的企图是，利用格岛的动乱形势，以优势兵力，迅速展开，速战速决，力求尽快控制格岛局势；通过武力“教训”格林纳达，慑服受苏联，古巴影响的其他中美洲国家。美军设想用一天时间完成主要作战任务，5—7天内结束整个岛上的军事行动。

在制定具体的作战计划中，海军大西洋总部司令、海军上将麦克唐纳认为，这次作战兵力只限于海军部队和陆战队来完成。这也就是说这次没有陆军和空军的任务了。对这一方案，陆军参谋长和空军参谋长表示反对。陆军认为格林纳达虽是岛国，但岛上满布丛林，没有陆军的参与，很难保证陆上进攻的顺利进行。

美空军参谋长不甘落后，充分强调了空军的行动快、纵深大、杀伤力强的优势，坚决要求空军应该参战。

经过激烈辩论后，不得不决定重新制定作战计划，把陆、海、空和陆战队的部队都编入作战序列，并把这次作战定名为“暴怒行动”。这次作战的总指挥为大西洋总部司令韦斯利·麦克唐纳，位于华盛顿；登陆部队指挥官为第二舰队司令梅特卡夫中将，位于海上。

具体的参战部队有：一个约1900人的海军陆战队加强营和“海豹”特种分队，搭乘5艘两栖舰船（包括万吨级的两栖攻击舰“关岛”号），配有CH—46、CH—53、UH—1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等30多架。空降登陆部队是驻美国本土布雷格堡的第82空降师5000多人和驻佐治亚州、华盛顿州的陆军特种部队第75团两个别动营700人。

担任掩护和支援任务的是第22航空母舰战斗群，其编成内有排水量7.8万吨，且载有A—6、A—7、A—10舰载攻击机和眼镜蛇式武装直升机等85架飞机的“独立”号航空母舰以及另外5艘战斗舰艇。所有入侵登陆部队总人数达8000人左右，舰上人员约1万人；各型舰船15艘，总排水量在12万吨以上；三军各型飞机和直升机总架数约230架以上。

同时，为了表示入侵部队的国际性，美国纠集安提瓜、巴巴多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多米尼加、牙买加、圣克罗斯托弗——尼维斯等7个加勒比小国，组成约300人的所谓联军，其实有些国家只派了12名警察凑数。

10月24日，美运输机和直升机将部分陆军别动队员和军事装备运往距格林纳达只有250多公里的巴巴多斯。当天，牙买加、多米尼加、巴巴多斯、安提瓜、圣文森特、圣卢西亚、圣克罗斯托弗——尼维斯7个加勒比国家的警察部队也在演习的名义下调往巴巴多斯集结。

一切战争准备工作都在悄悄地、紧张地进行着。

格林纳达的清晨却沉浸在生活和寂静中，一切还象往常一样。

但在这个岛上，有两个人一直在为这个小岛的未来担忧。一个是奥斯汀，另一个是古巴军官托尔托洛上校。

托尔托洛是古巴在格林纳达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他被派到这里的原来任务是指挥他的战斗工兵营训练格国的士兵，同时紧急修建萨林斯角的军用机场。但政变后，他就几乎接管了格林纳达的对外防务。

格林纳达政府军总共只有2个步兵营，一个野战炮连和1个高炮连。没有空军，没有海军，也没有坦克，只有少量已经落后的装甲运输车。仅靠手

中的步枪怎能抵御美军的入侵？

格林纳达的主力主要部署在首都圣·乔治周围和格岛西南海岸地区，一部在东北部珠珍机场附近，总部设在首都附近的弗雷德里克堡。古巴人主要部署在萨林机场和附近营地以及从机场到首都的主要公路线上的一些据点。

格岛是一个石榴状的小岛。岛上中部地形起伏，多山地，山峰海拔多在500—700米之间；最高峰为北半部的圣凯瑟琳山，海拔达840米。全岛地势中间向四周逐渐低平，沿海为平原，南北比较平坦。主要城镇和居民地均在四周海滨地区。陆、海、空交通发达。

虽然格岛地形复杂，但缺乏战场准备，设防薄弱。

面对这样一个局面，作为战地指挥官的托尔托洛上校，越想心里越没底，连连向国内请示增派部队。但卡斯特罗口气却十分强硬：一、坚决地勇敢地抵御美国人的入侵；二、不派任何增援部队。

看来只能背水一战了。整整一夜，托尔托洛站在作战地图前，盯着上面标出的每一处山头，每一片海滩。他相信这将是一场登陆与反登陆的战斗。

10月25日，天色渐明。

当守卫海滩的士兵一觉醒来，看见朦胧的海面上，十几艘大型军舰像鲨鱼一样渐渐向海滩逼近，其中一艘庞大无比，像是一座移动的岛屿。

5时许，格林纳达东北面的海域上空，近百架直升飞机和舰载攻击机护卫着几架AC—130和C—130运输机，像蝗虫一样，遮天蔽日地向海岸扑来。他们没有攻击滩头，甚至没有向滩头上严阵以待的守军扔一枚炸弹，便直扑珠珍机场而去。

这时，托尔托洛有点疑惑，美国人在搞什么名堂，怎么往岛中间飞去，而未先进攻滩头？不会，托尔托洛倒吸一口冷气，心想大事不好，这下要完了。

珠珍机场是一个中型民用机场，如果美国人在那里降落，便会在岛上有了立足之地，美国飞机将源源不断地在那里起降。

看来，美军这种先打“里面”后攻击周边海岸的“中心开花”战术，是托尔托洛没有想到的。即使你的滩头再固若金汤，也成了完全无用的摆设。

其实，托尔托洛上校哪里知道，美国人是有所备而来，对岛上的情况早就心中有数。早在古巴派出工兵部队帮助格林纳达修建机场起，美军就不断通过侦察卫星监视机场施工进度和军队修筑其他军事设施的情况。另外，美国还派出特工人员伪装成学生、旅游者、商人、侨民等，以合法身份进入格岛搜集政府军和古巴部队的配置与设防情况，并绘制地形和交通图。

美国设置在格岛的所谓旅游公司印制了十分详细的“寻游图”，这次，入侵部队就是利用这种“导游图”进行作战的。

在空袭珠珍机场的同时，美军28架C—130和6架C—5A运输机从巴巴多斯起飞，向正在修建中的萨林斯角机场飞去。正当美军准备在该机场空降伞兵时，猛烈的地面炮火向飞机射来，第一架C—130迅速完成空投后，其余飞机不得不急转弯，躲避地面炮火。

守卫机场的上兵刚准备松口气，美机又从低空返回到空投点。美运输机不顾地面炮火射击，迎着火网，一个拐弯猛扎下来。最后强行在150米的高度上强行跳伞。在地面抗击的古巴士兵目瞪口呆：这不像是跳伞，倒更像是跳楼。

美军在这里遇到最为强烈的抵抗。

7时15分，伞兵就基本控制了萨林斯角机场，并迅速清理了跑道上的障碍。后续部队第82空降师的2个营和多国警察部队共约1500人先后在机场着陆，立即投入战斗。

在25日这一天，萨林斯角的机降行动一直在持续，第二天又机降了2个空降营，使美军在格岛上的兵力得到大大的加强。

两个机场失守后，格岛之战的胜负格局已基本确定。

据说，托尔托洛上校向哈瓦那拍了一份急电，请求卡斯特罗增派军队，而卡斯特罗回电只有6个字：必须坚守阵地！

七、“海豹”突击队直扑圣乔治

就在空中和海上的登陆作战激烈进行的时候，两支秘密小分队已利用拂晓前的暗夜偷渡上岸，直插格林纳达首都圣乔治。

这就是美国海军的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

“海豹”这一名字，早已名扬四海。“海豹”是一支执行近乎自杀使命的秘密突击队，队员是一群胆识过人，独来独往，富于冒险精神，令人闻风丧胆的勇士。

这次，“海豹”突击队的出现，是去执行两项特殊使命：攻占格林纳达电台，解救被围困的英国驻格林纳达总督。

这两支分别由 11 人组成的突击队行大路，绕小路，斩关夺隘，到中午时分，已静静潜伏于圣乔治市郊的一片丛林之中。

到了市郊后，突击队不能找向导，仅凭手中的几张旅游图，搞错了方向，误攻了另一座楼房。

待他们匆匆赶到电台大楼跟前，发现这里被守军严密守卫，并有装甲车巡逻。10 来个人的突击队看来有天大的本事也无能为力。就在这时门前的守军出现混乱，一队队撤离而去。实际上这是美军在圣乔治周围实施了又一次空降，迫使守军撤退。突击队趁此混乱之机冲进大楼，控制了格林纳达广播电台。不久，它就响起了美国音乐。

第二支突击队没有犯第一支突击队的错误，他们准确地找到了位于圣乔治北部的总督府，并且得以全部潜入。

当已被囚禁很长时间的英国总督保罗·斯库恩见到这些操着同一种语言的士兵时，激动得上前拥抱他们。这时，总督府外枪声大作，几辆古巴装甲车已经封锁住总督府。要撤出此地，特别是带着总督撤走已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顽强抵抗，等待援军。

艰苦对抗持续 10 多个小时。由于不敢伤害总督，古巴人只好用轻武器与美军突击队交战。突击队员伤亡较大。

25 日中午时分，一支 250 人的陆战队乘“关岛”号两栖攻击舰，从格岛以北绕到西海岸的大巴尔湾海域。下午 2 时，陆战队开始登陆。一部乘直升机垂直登陆，一部换乘 13 艘登陆艇上岸，在飞机的支援下，占领了大马尔。此后，陆战队员仅用 10 分钟就攻占了总督府，用直升机将总督一家及被困了一天的“海豹”队员送到“关岛”号两栖攻击舰上。

晚上，美军陆战队员营救出美国学生。当陆战队员们一手端着枪，一手打着“V”形手势赶来时，学生们一个个热泪盈眶，欢呼雀跃，几个女学生跑上前，同陆战队员们紧紧拥抱，热烈亲吻。

经过 25 日一整天的交战，美军基本形成了南北两路对格首都实行夹击的态势。战至翌日，美军在格岛上的地面部队总数达 6000 余人，形成 3 倍于格军的优势。随即，美军凭借优势兵力，继续南北夹击，逐个摧毁格军据点。

26 日上午，美军充分利用古巴人新修的萨林斯角机场，得到了大批物资和增援部队，使岛上直接作战的部队人数有较大增加。美军在这时，很快攻占了格林纳达军队的司令部所在地弗雷德里克堡。27 日，攻占了军事要地里奇蒙山监狱。28 日，进攻首都的战斗打响了。那里人口密集，只能在直升机掩护下进行巷战，逐街争夺。

激战两天，美军控制了岛上所有重要地区，入侵目的也基本达到。

10月29日，美海军陆战队在圣乔治郊区搜捕到前副总理科尔德和一名内阁部长；30日，又陆续搜捕前“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奥斯汀及其他10多名成员，均将他们用直升机押送到“关岛”号舰上。

11月2日，美军完全控制了格林纳达全国局势，停止了军事搜索行动。至此，8天的入侵战争遂告结束。

“暴怒行动”对美国而言是成功的，以美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入侵这样一个弹丸小国，就像派华盛顿的橄榄球劲旅“湖人队”去对付哪个中学的校队一样。

美国军队最后的伤亡人数是：18人阵亡，93人受伤，16人失踪。

格林纳达方面的伤亡是：45人被打死，337人受伤，死亡的人中有24人是平民，其中21人是在一所靠近一座防空军事设施的精神病医院里被炸死的。摧毁这座军事设施是美国人采取登陆行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

古巴方面的伤亡是：24人被打死，59人受伤，另外有大约600名古巴“建筑工人”被俘。

在获悉入侵成功后，里根总统满怀喜悦，在日记上欣然写下：“看来，胜利照耀着我们。为此，我要感谢上帝。他把我掌握在他的手心里。”

最让里根感动的是，那800名美国学生，当飞机把他们运回美国时，他们一下飞机，其中一些人就跑下来，亲吻足下的美国土地。

里根的眼睛甚至被泪水弄得模糊了。

但是，美国公众舆论却对这次入侵行动持怀疑态度，认为格林纳达的美国学生没有真正的危险。

全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今天”的栏目主持人布赖特·冈贝尔就持这种观点。下面是12月26日电视采访的摘录：

布赖特·冈贝尔：本国美国军人第二次在国外被打死、打伤。今天上午，许多美国人在问：为什么这些伤亡发生在一个叫格林纳达的加勒比的小岛上。下面请国防部长温伯格回答这些问题，他今天上午从五角大楼赶来参加这次电视采访。

国防部长温伯格：早上好！

问：部长先生，里根总统说我们不得不进军格林纳达去保护在那里的美国人，您能举出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说明那些美国人确实处在危险之中？

答：好。当你们处在24小时的宵禁中，并得到警告不能去街上，否则会遭到不分青红皂白的枪击时，我看这种状况至少是相当令人不舒服的。在这样的环境里，你们也许不得不担心会被扣押当作人质。前不久，我们有过这种体验，人质被抓走，过了几百天才获得自由。所以，在我看来，似乎完全可以认为，这1000名美国人是处在危险之中的。

问：在选择动用军队干涉以前，为什么我们不去尽力争取通过外交途径来寻求事情的解决呢？

答：这个岛国的一些邻国已经进行过种种外交上的努力，它们没有军队，实际上，也把自己看成是个群岛的一部分。这些邻国迫切地，并且几乎是绝望地请求我们进行干预，帮助他们恢复格林纳达的民主政府。

问：部长先生，刚才我们去听安德鲁·米切尔的讲话时，我们听到了“战争贩子”这个词。该词已经好长时间没人使用了，现在又重新开始出现。我想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们听到这个词的机会将会非常多。当我们坐在这里时，我们有维持和平部队在黎巴嫩，有顾问在中美洲，有军队在格林纳达。

今天上午，有许多美国人在问我们：美国的边界线到底在哪里？对这些美国人，您怎样回答呢？

答：我说，如果你们是这些学生中一员，正遭到混乱、恐怖的威胁，或者是这些学生的亲属时，那么让美国陆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解除你们的一些担忧，保护任何地方的美国公民，这不会是一个坏主意。我认为这不是“战争贩子的行径”，特别是当我们不仅受到邀请，而且受到再三的恳求去进行干预、控制那座岛上的局势，恢复那里民主政府的时候。一旦人民选举的政府开始行使政权，我们就不会在那里多呆一分钟。

温伯格一直是五角大楼中的强硬派代表人物，他相信世界范围内行之有效的对话方式是武力，他希望以武力来重振美国的雄风。

然而不管怎样解释，公然入侵一个主权国家，这是文明世界所不能容忍的，这也将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抹不去的污点。

第十七章 军人的使命

- 一、伊朗人质危机
- 二、震惊世界的霍尔木兹惨案
- 三、多米尼加恩仇录
- 四、美国出兵黎巴嫩

一、伊朗人质危机

纵观战后国际政治舞台，美国总是主角。无论世界各地哪里出现争端，美国都不失时机地展示自己，不能说不讲公道，也不能说没有夹公带私。海湾地区争端中，美国的表演便是佐证，海湾地区由于它盛产石油和拥有石油航道及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美苏争夺的“热点”地区，由于两伊战争的爆发和持续，海湾又成为当今世界的“热点中的热点”地区，美苏都想进入和控制这一地区。

两伊战争发生后，美国和苏联虽然都想加以控制和利用，由于两伊所采取的独立自主政策，美苏都无能为力，它们只好采取表面中立的态度。美国同伊朗之间的外交关系由于 1979 年美国使馆人员被伊朗扣作人质事件而中断，“人质事件”既体现了伊朗人的反美情绪，又说明了美国对伊朗内政干涉的动机。美伊交恶便始于此。

自 1953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伊朗策动推翻摩萨台的政变、把国王扶回孔雀宝座后，伊朗就成为美国在中东的重要据点。伊朗国王成为美国的一个亲密合作者。美国依靠伊朗来维持波斯湾的稳定，而伊朗国王则要利用美国的支持来加强自身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以称霸波斯湾。尽管伊朗军事力量的增长使它在该地区的作用日显重要，国王在美伊关系中的主动性也有所增强，但是，美伊特殊关系的发展，长期以来使国王对美国具有依附性。

巴列维国王与美国共和党政府的关系一向比与民主党政府的关系融洽。1953 年王位失而复得是在艾森豪威尔任内，马列维与尼克松和福特政府有特殊关系，尼克松与福特都对他颇为推崇。而民主党总统肯尼迪当政时，美伊关系曾经历了一段波折，因为肯尼迪要国王裁减军队，把注意力转移到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上来。卡特在竞选时高喊“人权”，他如当选对实行专制统治的伊朗国王将是一个打击。伊朗驻伦敦大使在 8 月 8 日的日记中写道：“国王担心卡特具有肯尼迪式的要求，因此更希望福特再次当选。”

卡特总统上台后果然以“人权”压伊朗放宽政策。巴列维国王为呼应美国的政策，在皇室、高级官员和“民族复兴党”领导人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运动，宣传伊朗的“人权”观念。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卡特 1977 年初发表的人权声明，促使国王稍微放松了对反对派的镇压。同时，反对派在卡特声明的鼓舞下，成立了一个“维护人权与自由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久就成为要求进行根本改革的中心。由于镇压有所减轻，群众对国王的政权普遍怀有的失望情绪公开表达出来，并有所发展。这种失望情绪一旦公开化了，便发展成为难以遏制的民主运动。

伊朗此时民主运动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现代化的有力推动。

国内的不间断压力以及华盛顿的冷落态度使国王意识到，仅仅是口头上的表示并不能满足人心，还必须采取一些象征性的措施。1977 年 7 月伊朗议会接受了一项修改军事诉讼法的议案，对政治犯的条件略有改善；8 月辞退了首相胡韦达，由贾姆希德·阿穆泽加尔代替；恢复了三个机构，其职能是检查政策实施情况、民族复兴党是否接受公开批评，以及改组内阁后的状况。然而这些措施远不能满足人心，1977 年下半年伊朗内部的骚乱开始扩大，学生罢课增多，一些院校已被迫停课。

在这种形势下，国王感到有必要访问美国，他急于摸清华盛顿的态度，要求卡特政府作出支持伊朗的保证，以便放开手脚处理伊朗内务。

1977年11月中旬，伊朗国王访美，得到了美国政府支持的明确保证。卡特向他保证完全支持两国发展了30多年的特殊关系，承诺将进一步加强双方的联系，强调双方在波斯湾和全球范围内利益的广泛一致性，对伊朗为达到双方的共同目标而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重申国王统治下的一个强大、稳定、进步的伊朗的重要性，美国将继续奉行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方面与伊朗合作、满足伊朗安全需要的政策。当年年底，卡特结束波兰的访问后到达德黑兰，在新年祝酒会上再次称赞伊朗由于国王的伟大领导，是“世界上一个多事地区中的一个稳定的小岛。”

从此以后，卡特政府不再关心伊朗的“人权”问题。而此时伊朗国内一股强大的反政府暗流正在形成，并非像卡特所说有那么“稳定”。伊朗国王在得到美国支持的保证后，更加有恃无恐，当国内出现动乱时，多次采取了血腥镇压的手段。此时卡特不仅不提伊朗的“人权”问题，而且几次表示支持国王的统治。整个1978年，美国政策唯一的目的似乎是寻找各种办法来帮助巴列维国王存在下去。美国政府用船给伊朗运去燃料，帮助军队对付石油工人的罢工，在危机期间，布热津斯基也不断与国王及国王最亲密的顾问们保持接触，给他们出主意以及给予道义上的支持。

美伊关系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军事关系，美国的军事援助和武器出售是维系美伊亲密关系的一条重要纽带。尽管卡特在竞选中和就任总统后，多次强调要与其盟国一道限制武器的外流，但是由于卡特仍然需要伊朗“成为波斯湾这一关键地区强大、可信、友好的盟国”。维持波斯湾的稳定，遏制苏联，所以实际上美国对伊朗出售武器的政策依然如故。1977年5月万斯出访德黑兰，并通知国王，美国将尊重全部现有武器出售条约合同，并准备向伊朗出售空中警报与操纵系统飞机。在卡特政府的头三年里，美国向伊朗出售武器的数额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加了。1977年美国向伊朗出售武器的协定为27.6亿美元，移交额为24.16多亿美元，达历史最高纪录。1978年伊朗爆发革命，反美情绪急剧增长，美国对伊朗的武器出口几乎没有受到多少影响。同年3月，伊朗国王还迫不及待地执行价值五亿美元以上的大规模的海军扩建计划，而卡特直到7月份还批准出售六亿美元的美式武器。有趣的是，1979年初国王出走国外，伊朗革命取得成功后，美国武器装备仍源源不断地流向伊朗，全年的美国武器移交额仍保持在14亿美元以上。推行军火外交是美国中东政策的一个特点，美国持续不断大规模的向伊朗出售武器，一方面增强了国王对美国的依赖，另一方面也助长了他称霸波斯湾的野心，并强化了他对国内革命运动的镇压，引起了伊朗人民强烈的反美情绪。

卡特自从在1977年底的新年祝酒会上给伊朗下了“稳定的小岛”评语后，就没有对伊朗局势给以足够的重视，直到伊朗局势急剧恶化，才回过头来关心伊朗问题，正如美国学者巴里·鲁宾所说，“戴维营会谈耗尽了美国决策人的注意力，而这个时刻正需要他们了解伊朗革命形势发展的重要性。”

1977年的伊朗已是山雨欲来。1978年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上下，伊朗国王的统治岌岌可危。当美国明显看出国王注定要失败之后，它就开始笼络国王所任命的、基本上作为国王代理人的巴赫蒂亚尔总理，并帮助国王安全地离开伊朗，希望以此来左右伊朗的革命。但是，巴赫蒂亚尔也迅速被推翻，美国在伊朗的势力急剧下降。正当埃及和约签订时，伊朗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9年2月，流亡国外的伊朗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回国，领导了一场伊斯兰革命，4月1日“伊斯兰共和国”宣布成立，巴列维王朝被

彻底推翻。

在如何对待伊朗国王的问题上，美国政府内早就有不同意见，革命到来之后，不同观点之争更趋激烈。卡特总统左右摇摆，没有能统一决策圈内的各种思想，制订出连贯而有效的伊朗问题对策。以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一派认为，伊朗的战略应置对美国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对我们异常重要的地区，社会和政治结构的脆弱性受到分崩离析的威胁……由此产生的政治混乱很可能被仇视我们的利益和同情我们的敌人的国家所利用，使整个西方面临一场重大挑战。”他主张不论国王采取什么措施，美国都应坚决支持，认为伊朗的动乱是能够控制的，为挽救国王，美国可以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而以万斯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对伊朗的政策应留有退路。两人的观点相持不下，卡特本人动摇于二者之间。在1978年11月之前，他一直把伊朗问题简单化，认为只要国王实行一点“人权”、“民主”、“自由”，伊朗出现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他曾多次表示美国坚决支持国王的统治。但是当伊朗实行军人统治后，伊朗局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总统的调子开始有所变化，摆出姿态作两手准备，以防止国王倒台后美国无退路可走。他在答记者问时说，“我们不干涉伊朗内政”，国王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应由“那些国家的人民作出决定。”

伊朗的情况很复杂。一方面社会经过30多年的演变，封建君主专制的上层建筑已经与逐渐资本主义化的经济基础产生激烈矛盾。专制已经成为社会革命的矛头所向，人们把一切社会弊病与不满情绪都归根于国王的统治。同时，宗教势力又十分强大，国王长期压制宗教力量，其结果是造成了以宗教为号召的全社会的反国王运动。霍梅尼利用了这一次自发性革命，重返伊朗建立起了中世纪政教合一式的政权。伊朗国王倒台后，美伊关系滑向危机的边缘。

霍梅尼领导伊朗人民推翻了巴列维国王的统治、成立伊斯兰共和国后，十分仇恨美国对伊朗前国王的支持，他对1953年“巴列维国王复位”这一历史教训记忆犹新，对美国一直抱有戒心。美国国务院伊朗科科长1979年10月赴德黑兰，私下与伊朗临时政府的官员们及伊朗宗教界人士进行广泛接触，这引起霍梅尼和伊朗当局的疑虑。接着，美国不顾伊朗当局的抗议，于10月22日让前国王赴美治病，就更加深了伊朗方面的疑虑。

伊朗人愤怒了。10月29日宗教领袖霍梅尼宣布：“美国在伊朗的统治是我们一切不幸的根源，伊朗人民必将予以回击。”于是，本来就被这动荡的局势弄得心惊肉跳的美国驻伊朗外交官们便在1979年11月4日这个初冬的上午迎来了使他们终生难忘的时刻：

1979年11月4日，在首都德黑兰，几千名自称信奉霍梅尼主张的伊斯兰教信徒的学生上街抗议美同接受巴列维国王，他们高呼着：“送还巴列维！处死巴列维！”等口号，在市内大街上举行了游行示威。不久，他们来到美国大使馆，上午10点30分，约500人冲进大使馆。大使馆的美国武装海军陆战队士兵，用催泪弹进行了抵抗，但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学生降下了挂在大使馆的美国国旗，代之而挂上了写着：“真主伟大”字样的白旗，在馆内外进行演说煽动，气势咄咄逼人，并将66名外交官当做人质扣押。

学生们高呼着：“美国接受犯罪分子巴列维，帮助反对伊朗革命分子！在伊朗各地策划阴谋！进行反伊朗宣传！”等等口号，要求“将巴列维引渡到伊朗，以便伊斯兰革命法庭进行审判！”下午1点过后，学生们完全占领

了美国大使馆。这个事件虽然和伊朗政府没有直接关系，但伊朗外文部 4 日傍晚发表一项声明，语气强硬谴责美国说：“事件反映了伊朗国民的感情，是由于美国接受巴列维而引起的。”5 日，伊朗最高领袖要求美国引渡巴列维国王，要求英国引渡正流亡在那儿的巴赫蒂亚尔前首相。并说：“美国大使馆是间谍的根据地，许多阴谋都是从这里产生的。”因而表示支持学生。

大使馆一旦被占领，美国就立即在国务院内部组织一个伊朗工作小组，该小组昼夜不停地为人质问题而奔忙。人质被扣次日，布热津斯基为人质危机召开了特别联合委员会首次会议，以避免形势进一步恶化。会议建议向伊朗派出两名特使，这两个人便是伊朗宗教领袖与革命者都能接受的前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和参议院工作人员威廉·米勒。随后，特别联合委员会将注意力迅速转到紧急计划方面，并成立了一个小组来考察当人质受到伤害或伊朗开始瓦解时，美国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计划，而且重点集中在拟订一项营救计划。5 日夜里，美国国务院设法与伊朗要人贝赫斯蒂取得了联系，并通知他美国计划派遣特使的消息。6 日清晨，克拉克与米勒被召到国务院，万斯及其他人向他们通报了伊朗形势，并准备了一封概括美国关于人质危机立场的指令信，它包括下列基本要点：“关键目标是使所有被关在伊朗的美国入立即得到释放，第二个目标是就如何解决美伊关系的困难与伊朗宗教当局进行谈判。”

可是就在 11 月 6 日，霍梅尼和伊朗政府宣布支持学生们的行动，还宣布废除 1959 年签订的伊美安全条约。拥护霍梅尼的各政党和团体纷纷响应，并在德黑兰举行了 100 万人的示威游行，高呼“引渡国王”、“处死卡特”的口号。这样一来，就将基本上是政治对抗的象征性行为转变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全面对抗。通过直接与伊朗领导人接触迅速解决人质问题的希望遂破灭。

1979 年 11 月第一周年美国政府终日为人质问题所困扰。人们提出各种建议，从交出伊朗国王到向德黑兰投掷原子弹。一系列营救计划也一个个被搁置下来，因为力这些计划要么不切实际，要么会使双方伤亡过大。妨碍这场危机的解决有几个原因：

第一，“美国当时长达数月无法确定伊朗权力中心何在。它们包括霍梅尼及其神职专制机构，执掌政权的革命委员会（包括总统、首相、外交部长等），以及议会（直到 1980 年 5 月才选举产生），还有扣押美国人的穆斯林好战分子，使人难以断定谁是伊朗的真正负责者。结果，美国无法通过外交手段处理这场危机。”如万斯所说：“由于对德黑兰的政治动态缺乏了解，给美国政府制定一项确保释放人质的有效战略增加了困难。”

第二，在谈判中，白宫坚持有些问题不能讨价还价：安全释放全部人质、声明无权把外交官当作间谍来审讯，但是，“是通过外交妥协，还是采取惩罚性行动迫使伊朗释放人质，卡特政府犹豫不决”，结果导致美国外交上的被动局面。7 日，当卡特总统派遣两位特使携带总统的信件赴德黑兰商谈人质问题时，霍梅尼竟拒绝会见他们，美国特使离开德黑兰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停留后被卡特召回。

第三，解决人质问题的关键在于霍梅尼的态度，扣压人质对于霍梅尼巩固政权是有利的，它吸引住了全国的注意力，使他们不至于过多地注意国内出现的问题。伊朗成立伊斯兰共和国之后，尚处于巩固政权的阶段，政治不够稳定，经济混乱，一些不信奉伊斯兰教的青年人、妇女和知识分子对霍梅

尼的统治流露出不满情绪。人质被扣，美伊关系出现危机，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掩盖了国内矛盾，霍梅尼可以利用人民的仇美情绪大作文章，在即将举行的立宪、总统和议会选举中，削弱温和派的力量。因此在危机的初期阶段，伊朗的态度是强硬的，拒绝与美国谈判。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或发出呼吁，或从中调停，谋求问题的解决，其中包括利比亚那样对美国并不友好的国家。

人质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朝野哗然。美国先采取了一些“讨伐性”措施孤立和制裁伊朗，企图迫使伊朗释放美国人质。10日，美国决定中止向伊朗提供武器和运送军事装备零件，冻结伊朗在美国包括银行存款在内的所有官方资财。12日至14日，美国又停止了同伊朗的石油贸易，禁止在华盛顿的伊朗学生举行示威，并宣布对在美的伊朗学生进行特别移民审查，凡是不符合手续的一律驱逐出境。另外美国还通过联合国和中间人进行活动，号召四方盟友对伊朗进行制裁，试图通过外交途径及早解决人质问题。

但事与愿违，这些措施反而更加激起伊朗的敌对情绪。针对美国政府的制裁措施，伊朗革命委员会于13日决定，停止向美国出口石油，禁止在全国各地放映美国影片，禁止美国飞机、船只进入伊朗领空和领海。13日至14日，伊朗政府还宣布，它将取出存在美国银行的约120亿美元的存款。美伊双方僵持不下，人质问题陷入了僵局。

尽管如此，双方都表示希望和平解决问题。11月17日，霍梅尼下令释放美国使馆的13名妇女和黑人，被扣人质尚有53名。12月21日，霍梅尼同意美基督教传教士探望美国人质。12月15日美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伊朗前国王巴列维已离开美国到巴拿马居住。17日美财政部宣布，允许在纽约和旧金山的伊朗银行从国内调款，供伊朗留学生使用，并开放了伊朗驻美国的使馆的四个银行户头。19日美国政府还决定，暂不要求联合国对伊朗采取国际制裁行动。1980年2月15日，卡特表示，美国对它同伊朗之间存在的误会感到遗憾，希望同伊朗建立正常的关系。

在美伊双方同意的情况下，联合国秘书长出面组织了一个国际委员会，于1980年2月23日至3月11日在德黑兰调查了伊朗对美国和前国王巴列维的指控，但未能在探望人质、解决美伊危机方面取得进展。2月23日霍梅尼发表讲话说，释放人质必须由即将选出的伊朗议会来决定。3月31日伊朗革命委员会决定，让学生把人质交给政府照管和监护。4月7日霍梅尼拒绝将美人质从学生手里移交给革命委员会。

在上述情况下，美国政府4月7日宣布同伊朗断绝外交关系，要求伊朗关闭驻美大使馆和领事馆，所有伊朗外交人员和领事馆人员必须在8日午夜之前离开美国。美国还宣布，立即对伊朗实行正式经济制裁；禁止美国对伊朗的出口，清理冻结在美国的伊朗政府财产，并调查美国公民和公司对伊朗政府的财产要求；吊销发给尚未去美的伊朗公民的全部签证，并决定不给伊朗人发新签证。8日伊朗革命委员会就美国同伊朗断关发表文告，号召伊朗人准备对付伊斯兰敌人和压迫。这样，美伊矛盾就更趋尖锐化了。

1979年11月9日，也就是美国人质被扣押的第5天，美国陆军“蓝光”反恐怖特种部队的顾问梅多斯和一名助手被召到华盛顿，他们奉命拟定一个一旦伊朗人开始屠杀人质，就使用武力救出人质的应急营救计划，该方案的指导思想是：在适当的时机采用远程偷袭的方式，以武力一举救出人质。由海军出动舰载直升机负责提供战斗支援，空军出动C-130型运输机负责撤退

人质，为了解决目标距离远，与直升机航程有限的矛盾，在航行途中设置 2 个休整点，代号分别为“沙漠 1”和“沙漠 2”，“沙漠 1”位于伊朗东部霍腊散省的塔巴斯附近，“沙漠 2”位于德黑兰东南 80 公里处的加姆萨尔附近，整个行动的地面指挥由“蓝光”反恐怖特种部队司令贝克威斯担任。

根据预定计划，“蓝光”突击队在抵达使馆之后，应立即发起营救战斗。先派几个战斗小组用 M - 60 机枪封锁所有通往大使馆的道路，其余人员借助于携带的铝梯翻墙跃入使馆院内。用冲锋枪射击抵抗者。美国人预料，战斗一打响伊朗人就会遭到重大伤亡，除了突击队的地面火力之外，几架 C - 130 型特种作战飞机将把数千枚炸弹倾泻到抵抗者的头上。按照计划，至少有 1 架海王式大型直升机降落在使馆内，把所有的人质——无论活的还是死的，全部运走。每个人质都将系上一条发光的汗带，以便贝克威斯能准确地掌握人数。人质将被直升机运到德黑兰以南 80 公里处的曼扎利椰赫的一个简易沙漠机场，与事先等在那里的另一批突击队员汇合，然后换乘 C—130 型运输机飞离伊朗。同时，仍在使馆院内的美国突击队员将用 40 磅炸药把使馆的院墙炸开一道缺口，突击队员将从这道缺口冲出使馆，穿过罗斯福大街，进入附近的一个足球运动场，登上早已等在那里的另外几架直升机，撤出德黑兰。该行动方案最后被送交美国最高行政当局审议。

为了尽快搞清人质的确切位置，美国不得不铤而走险。12 月底，中央情报局派出的第一个特工抵达德黑兰。这是一位 60 多岁已经退休的情报官，绰号叫“鲍勃”。鲍勃顺利地通过了伊朗海关的检查。他一连在德黑兰呆了几个星期，然后又从那里几次出入雅典或罗马汇报工作，鲍勃频繁出入德黑兰而丝毫没有遇到麻烦，使中央情报局确信，德黑兰附近的麦赫拉巴德国际机场海关并不像他们所预料的那样戒备森严。不久，中央情报局派了另一名特工——一位富有的伊朗流亡者协助鲍勃工作。但是，对人质关押的确切位置，他们始终没有得到。中央情报局有些沉不住气了。于是中央情报局决定再派一名可靠的特工潜入德黑兰。

1980 年 2 月，梅多斯以理查德·基思的化名，住进了德黑兰的谢拉顿旅馆。另外一批特工也在同期偷偷地溜进了德黑兰。他们当中包括两名会讲德语的反恐怖特种部队的突击队员，从西柏林渗入德黑兰，负责侦察伊朗外交部。因为扣押人质事件发生的当天不在使馆内的美国临时代办和另两名外交官一直被扣押在外交部。另有两名伊朗籍美国军人，担任梅多斯的助手和司机，他们在德黑兰都有亲属，对市区非常熟悉。

营救行动发起前三天，伊朗人突然允许一名在美国大使馆工作的巴基斯坦厨师离开伊朗回国。他报告的情况说：“如果不是全部，至少是绝大部分”被扣押在使馆领事处内。同时，他还提供了伊朗警卫人员在领事处楼内的部署情况：“每层楼各派有 1 名哨兵把守，在每层楼的军械库前还有两名哨兵。”

梅多斯实地勘察了“沙漠 2”地区，准确地记下了由“沙漠 2”至美国大使馆的距离和途中所需时间，他还查看了使馆周围的每一条道路，唯恐卫星所获情报不完整。甚至还专程前往那所用来隐藏车辆的仓库作了一番勘察。经过周密的调查，梅多斯于 4 月 21 日电告华盛顿，一切准备就绪。他以他 30 年的经验保证说，在华盛顿拟订的行动方案将能够在德黑兰的大街上顺利实施。

11 月 9 日，美国总统叫来副总统蒙代尔、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律斯基、国防部长布朗、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琼斯，指示他们研究营救作战问题。按

照当初的想法，拟采取下列步骤：用几架直升机将营救队送至大使馆附近，由于路途遥远，C - 130 加油机随行，以到达预定地点，乘坐携带的车辆冲进大使馆，抢走人质。后来，虽然大体上没有多少变比，但在冲进大使馆时，改为使用当地的伊朗支持者和秘密潜入伊朗的特工人员事先准备好的车辆。

根据这个计划，于是从陆海空三军的海军陆战队抽调队员，组成一支以直升机、C - 130 机队，营救队为骨干的联合特遣队。各队根据各自的任务进行了训练，11月29日，完成大体的准备工作。到了3月，外交努力仍在继续进行，但谈判却毫无进展。4月1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完成计划制定工作，以备任何时候发出实施作战的命令，都可以马上执行。4月15日和16日，各级指挥官集中到国防部，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为了作战成功，进行了最后的磋商，1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计划，当晚卡特总统下达了“同意执行”的命令。

关于这次行动，一直到最后，秘密都被严格地保守着。卡特总统同往常一样，处理公务，会见记者。甚至连白宫内部成员，除了参与者外，任何人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计划，当然卡特夫人也不例外。

1980年4月19日至23日，联合特遣部队各队已布署在指定的基地和军舰上。24日下午（当地时间，下同），各队在新的位置上已准备完毕。4月24日晚，“饭碗行动”正式开始。从亚速尔群岛起飞的6架C - 130型运输机，载着97名突击队员，经埃及并在阿纳加油后飞向伊朗南部。与此同时，从停泊在阿拉伯海的“尼米兹”号航母上起飞的8架RH - 53型海王直升机，也向伊朗进发。二者企图在伊朗东部霍腊散省塔巴斯附近的“沙漠1”地区汇合加油后，飞往位于德黑兰西南80公里处的“沙漠2”地区。8架直升机从“尼米兹”号航母起飞，进入伊朗不久，便遇到沙暴。很快，2架直升机发生机械故障，1架被弃于伊朗东南部，另一架返回“尼米兹”号航母。剩下的6架直升机经过艰难的飞行，终于抵达“沙漠1”地区，与C—130型运输机汇合。但是又有1架直升机出了故障。

按照计划要求，至少有6架直升机才能顺利完成营救任务。贝克威思不得不向五角大楼建议中止这次营救活动。卡特立即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会商。会商结果是，剩余的5架直升机不足以将53名人质和93名突击队员安全运出伊朗，继续此项行动必将冒更大的危险，而没有成功的把握。于是，总统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撤退的命令传到“沙漠1”地区，已经乱作一团的突击队员纷纷爬上飞机。这时，更不幸的事件发生了，慌乱之中，另1架直升机与1架C—130型运输机相碰。随着一声巨响，大火立即吞噬了这2架飞机。8名突击队员当即被烧死，另有4人严重烧伤，其余突击队员被迫遗弃4架完好的直升机，抬着4名伤员，搭乘5架C - 130型运输机，仓皇撤出伊朗。

突击队在仓皇撤离“沙漠1”的时候，除了放弃了4架完好的直升机外，还把有关这次行动的绝密地图，侦察照片，无线电通信呼号和频率表都丢在了现场。在撤出伊朗的途中，贝克威思曾向华盛顿请求，派舰载机摧毁遗留下的直升机和绝密文件。但是，华盛顿唯恐事态扩大而拒绝了他的要求。下午6点21分，传来了C - 130机和直升机相撞的消息。白宫的成员们不胜惊愕，25日上午1点，政府第一次向新闻报界公布了在伊朗进行了一次营救作战，并且已告失败的消息。

一直期待着胜利消息的卡特总统此时非常沮丧，他不得不去做他自己极不愿意做的事。25日上午7点，卡特总统通过电视广播通告全国，为了营救

被伊朗扣留的 53 名美国人质，进行了极其秘密的作战，但由于直升机的技术故障，不得不放弃。营救人员在撤退时，在伊朗境内沙漠地带，直升机与运输机相撞而造成 8 人死亡。作战是人道的，没有发生战斗。而后又说道，实施作战也好，中止作战也好，都是出于我的决定，一切责任都由我负责！这时美国公民们发现总统的形象这时候糟透了。

反对营救作战的总统最高顾问万斯国务卿表明了辞去国务卿的意向。国会的领袖们也不满意，这是因为总统没有事先同国会协商。

盟国的反应也并不热烈。以前美国曾要求盟国响应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和其它制裁，当盟国正需要相互信赖的时候，美国却事先不通报就进行了危险而影响面颇广的军事作战行动。这是有悖信义的行为。为此，美国受到盟国的谴责。

伊朗最初保持沉默但不久，伊朗外长戈特布扎德指责说：“美国的行动是野蛮的，是对伊朗的战争行为。”霍梅尼和占领大使馆的学生强烈表示：“如果再来一次，就不能保证人质的生命。”

伊朗总统巴尼萨德尔声明说：“在现场发现美国士兵的尸体将无条件送还。”

后来，学生们为了阻止将来再来一次营救作战，而决定将人质都分散到秘密地点。

被遗弃在沙漠上的 8 具尸体，后来被送回美国大使馆，并被放在祭坛上祭奠起来。但受到了冲昏头脑的几名学生的残酷对待，尸体旁边贴的字条上写着：“所有人的头上都有上帝的一只手。”一名伊斯兰导师向他们的遗体表示了哀悼之意。

美、伊交恶的种子便是此时留下的。在后来发生的其它冲突中，美国人无论如何都克制不住强烈的报复欲望。

最后还是由于下列事态的发展，才出现了解决问题的转机：

第一，国王病故。7 月 27 日，由于巴列维国王在开罗病故，霍梅尼不必再以交回国王作为释放人质的条件。8 月 31 日新任国务卿埃德蒙·马斯基致书伊朗新总理穆罕默德·阿里·拉贾伊，要求早日释放美国人质。9 月 12 日，霍梅尼在国家电台发表讲话，首次提出释放美国人质的四个条件：把已故国王财产归还伊朗；取消美国对伊朗提出的所有财产要求；美国保证不从政治上或军事上干涉伊朗内政；解冻在美国和美国以外的伊朗资财。这一次他没有像原来那样坚持要求美国向伊朗道歉。

第二，伊朗经济困难。此时美国发起的经济和外交制裁已逐渐产生效果，伊朗经济由于石油出口量的大幅度减少而更加困难，进口货物的价格比世界市场实际价格高出 30%—40%，国内通货膨胀率从 50% 上升到 70%—80%，政府每月超支 8—10 亿美元，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地位；此外，国内几易领导人之后，政治上已基本稳定，人质问题已成了一个负担。

第三，两伊战争开始。9 月份两伊战争爆发后，伊朗与伊拉克的矛盾急剧上升，加速了解决人质问题的进程。这时对伊朗来说，继续扣押人质已无利可图，相反，如果能够用人质换回被美国冻结的财产，倒能增强抵御外敌的力量，摆脱不利的国际处境。这时伊朗向美国发出信息，表示愿意进行认真讨论，卡特便派遣了一个以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为首的谈判特使小组。谈判经由阿尔及利亚政府间接进行。

第四，里根当选。在 11 月举行的美国大选中。罗纳德·里相当选为新总

统。他在竞选时就严厉谴责伊朗扣押人质的行为。伊朗政府感到里根上台后很可能采取比卡特更为强硬的政策。如果不能在新总统上任前解决这一问题，那么以后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这种形势下，伊朗不愿把这个长达一年多未解决的问题再拖下去。由于伊朗和卡特都渴望在 1981 年 1 月 20 日里根政府就职之前达成协议，克里斯托弗在阿尔及尔同伊朗行政事务国务部长就一揽子协议进行了谈判，并于 1 月 19 日签订协议，伊朗决定全部释放美国的人质。但由于在最后关头出现障碍，释放人质工作施延到里根就任一个半小时后才得以最终实现。

1981 年 1 月 20 日，被伊朗扣留达 444 天之久的美国人质终于获释。

二、震惊世界的霍尔木兹惨案

海湾烟云越来越浓，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朗逐步占了下风，而美国则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制造任何借口的机会。

在美伊冲突中，人们很难忘记那场震惊世界的海上惨案。这是美伊的第五次冲突，它把海湾的悲剧推向极端。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国际机场。

1988年7月3日，海湾时间上午10时47分。

这里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国内6个国际机场中最大的一个。作为波斯湾空中走廊的重要一站，它是由欧洲至美国飞往亚洲或非洲的必经之路，整个航线每天约有250架次民航班机运载6万名乘客飞越海湾上空。一年中，单是使用迪拜机场的乘客，竟高达400多万人次，如果加上其它5个国际机场的吞吐量，可运载乘客2200多万人。

此刻，在这条航线的另一端——伊朗阿巴斯港机场，标号为A-300，编号为655的伊朗客机，已载着29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由辅助跑道平缓地滑向主跑道上的起飞线。

机上除了少数外国人之外，乘客大多是伊朗人。他们将直飞海峡对面的迪拜机场。

整条航线的全程为：德黑兰——阿巴斯港——迪拜。

这时，美舰“温森斯”号正在霍尔木兹海峡一带执行任务。

当地时间10点10分，“温森斯”号军舰上的1架直升飞机起飞不久，突然遭到炮击。紧接着，4艘伊朗炮艇以飞快的速度朝“温森斯”号冲来，摆出一副决斗的架式。两艘美国军舰立即作出反应，用火炮击沉两艘伊朗炮艇，击伤一艘。

10点47分，“温森斯”号上的荧光屏出现了一个亮而短的光线，这是一架似乎从阿巴斯起飞的机影映现的。从各种情况判断，这架飞机是伊朗空军的F-14战斗机。

但阿巴斯是一个军民两用的机场，机影也存在着是民间飞机的可能性。为了证实这一点，必须依靠民间飞行的飞行指南。而价值高达几亿美元的尖端设备却对判明情况不起什么作用。有关负责人匆匆翻开了航行指南，查阅类似的定期航班。但出现的机影比规定时间晚17分钟，于是便认为是别的飞机。

舰长又指示用敌我识别装置进行核实。第一装置接收到民用和军用双方的信号。在第二装置，来自不明飞机的信号是民用飞机使用的传输模3。但同时，还有军用飞机使用的传输模2的回答。经分析，据说同布署在旁边的伊朗F-14飞机一样。

飞机正向西南方向飞去，对着“温森斯”号的方向。从发现机影仅用了2分钟，于10点49分，“温森斯”号就向该机发出了警告。该舰3次用紧急民用频率，4次用军用遇难频率，前后发出7次警告电报。

为“宇宙盾”护航的驱逐舰“塞蒂斯”号也发了5次电报。但不明飞机既不通报名字，也不答复改变航线的要求。

罗杰斯舰长决定请示上级，便同中东联合机动舰队司令安索尼少将通了话。从前一年的“斯塔克”号事件以后，根据新的作战准则，敌机在靠近30公里以内时，舰长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相机行事。但当飞机接近这个范围时，

谨慎的罗杰斯舰长又一次请示上级，安索尼少将批准其发射。

10点52分，飞机到达30公里的线内，舰长认定“可能是敌机”，于是便下令“宇宙盾系统”作好发射准备。

2枚“标准1型”舰对空导弹被装上了发射台。电子计算机继而调整着导弹诸元。导弹本来是可以自动发射的，但为了等待不明飞机在最后关头退避，决定用手动发射。“温森斯”号用军用和民用两个频率又第2次发出警告。

但飞机仍没有答复，而且从3000米的高度开始下降并快速向“温森斯”号飞来。这立即被认为是一种俯冲的征候。F—14机如果俯冲下来，对“温森斯”号是一个很大的威胁。罗杰斯舰长想起1983年在黎巴嫩发生的海军陆战队兵营爆炸事件，担心对方会采取拼命的战术。

随着对方飞机的接近，“温森斯”号舰可供采取手段的范围越来越窄。因为“标准型”导弹在10公里以内是无法使用的。如果对方进入10公里以内，到头来，只能使用那2门只在1500米范围内有效的法兰克斯20毫米机关枪。舰长需要保护舰只，是尽快发射导弹？还是等到最后一瞬，只靠那两门法兰克斯机枪？罗杰斯犹豫起来。

10点55分，飞机已接近15公里处，舰长命令发射导弹。共发射了2枚导弹，导弹至少击中了1架，荧光屏上的机影和航迹立时消逝，宇宙盾系统显示目标坠落。

据一些目击者后来说：“当时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普什姆岛东南海域，漂浮的尸体、行李衣物以及飞机残骸碎片，足有三、四英里长。”几小时后，伊朗的营救直升机拖着照明灯，把飞机坠毁的海域照得通明。海面上漂浮着数不清的尸体，其状之惨目不忍睹。经过几小时的奋战，伊朗蛙人从大海中打捞出150具尸体，其中包括38名印度、巴基斯坦、阿联酋和南斯拉夫等外国人。

同天下午2点，据伊朗国家电台广播，伊朗航空公司IR665航班空中公共汽车A—300；载着274名乘客于7月3日上午10点15分从伊朗南部阿巴斯机场起飞，驶向西南方300公里处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

该机自10点23分向阿巴斯的指挥塔通报了位置之后，就从雷达的屏幕上消失了。该电台反复广播：A—300起飞约7分钟后，就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领土亨加姆岛附近海面上空坠落。

据正巧在亨加姆岛及附近海面上呆过的伊朗方面有关人士说：“正在美国舰队与伊朗高速快艇交火的时候，‘空中公共汽车’飞抵上空，结果被美国舰队发射的2枚导弹击落。据说，这一天，伊朗高速快艇也与正在巡逻的美国舰队遭遇，双方交火，伊朗艇击落了一架美军武装直升机。

据美国国防部公布，交火是3日上午9点40分开始的，正在巡逻的宇宙盾舰“温森斯”号上起飞的几架直升机受到伊朗高速快艇的袭击。该舰与僚舰“蒙哥马利”号立刻应战，并击沉2艘高速快艇，击伤1艘。另外“温森斯”号又击落1架向该向飞来的伊朗空军F—14战斗机。

当天，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对伊朗人说：“我们应该全部赶赴前线对美国及其代理人发动一场全面的战争。”

伊朗总统哈梅内伊称里根是杀人犯，并说，这次袭击是一项野蛮而残酷的犯罪。伊朗在世界各国首都的外交官重复了在德黑兰发出的报仇誓言。伊朗驻联合国大使说：“这不是一次误会，这是一次预谋的袭击，是残酷的谋

杀。”

在贝鲁特的西方外交官们说，这个事件危及在黎巴嫩的人质的安全。

1988年7月3日下午，美国国防部就波斯湾的交战问题，对新闻报道界承认说：“温森斯”号把民间飞机误为F—14战斗机，并用导弹将其击落了。但又说：这是为自卫而采取的措施。显然，美国还不想承认这件不体面的事。

同一天，里根总统也发表声明，在对牺牲者表示哀悼之意的同时，又说：“已命令法加蒂海军少将为首的小组，彻底调查事件真相。”

但是，事件是公正的，总得有人来解释它。美国军方最高负责人出面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克劳就这件事亲自会见了记者。克劳主席不得不承认美军的错误，他的表情充满着痛苦。克劳的谈话内容如下：3日，正在波斯湾上空飞行的宇宙盾舰“温森斯”号上的直升机为了支援直升机而同伊朗海军交上火，这时就把民间飞机当成了敌方的战斗机，为了自卫而将其击落。从目前能够掌握的情况判断，“温森斯”号舰正处于危险之中，因而有充分的理由发射导弹。对方飞机大大地偏离民间航线，我方用军用和民用的频率几次发出警告，尽管如此，对方既不回答，也不改变路线，并低空飞向“温森斯”号。美舰还截获了据认为是伊朗F—14的电子信号。由于这几天，伊朗F—14机频频飞到这个海域来，就断定又是F—14。鉴于去年“斯塔克”号事件的教训，舰长被授予以下权限：如果敌对意图明显，为了自卫，可以采取行动。

去年9月，美国要求通过交战区域波斯湾上空的飞机，提供飞行情报，通报所属出发时间、目的地和飞行路线等，并警告：如果不回答而采取威胁行动，将采取自卫措施。美军在4日的独立纪念日后，认为伊朗军有可能袭击，曾命令部队戒备。

当初，据认为“宇宙盾舰”是集尖端技术之精华而装备起来的高性能的舰只（可同时探测200个目标，攻击18个目标），可识别是大型机还是小型机，是民用机还是军用机，也可以区别F—14等机种。但现实并非如此。

克劳主席在回答记者团的质问时，又继续说道：“宇宙盾舰尽管集尖端技术之精华于一身，具有较高性能，但并不是万能的。这次事件，从探测目标到判定敌机只不过是5分钟的时间。考虑到是在特别心理状态的战场上这一事实，可以说当时还是判断错了。伊朗方面，让民用飞机在交战中的海域上空飞行，其用意也是明显的。美国军舰在结束油轮的护航而在归途中，没有接受空中警戒管制机（AWACS）和E—VC预警机的空中支援。”这一发言，一方面表示遗憾，一方面又坚持海军的正当性。

事隔两天后，一个由美国海军少将福格里率领的调查团启程飞往波斯湾进行为期15天的事故现场调查。6人小组7月7日登上“温森斯”号，要求舰长与水兵们在宣誓后回答问题。

对此，“温森斯”号舰长罗伯特向国防部证实说：“这事使我一生歉疚；但我应尽可能保护我的船只和船员，也只有我，应该对‘温森斯’号的一切行动负责。”随后，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解释说：被击落的伊朗客机曾使用两种无线电频道，其中一种为军用通讯讯号，因此，当“温森斯”号一连几次发讯号询问它的身份并在接收到了军用讯号之后，便将他误作为战斗机了。

然而，海湾地区和世界不少国家的军事专家则对此说法提出了质疑。

伊朗客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美舰击落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震惊和

广泛关注。各国政治、军事评论家纷纷发表了对此事的分析及判断。

三、多米尼加恩仇录

多米尼加人民在美国和独裁者的残酷统治下，生活困苦不堪，早已忍无可忍。特别是在委内瑞拉人民推翻希门尼斯政权和古巴人民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鼓舞下，多米尼加人民反独裁的斗争迅速发展。1959年初，流亡在国外的爱国人士纷纷成立反独裁的政治组织。这些组织于5月间联合组成了“多米尼加解放运动”，发表声明，号召一切民主组织团结斗争，推翻特鲁希略的独裁统治。1959年6月，在多米尼加解放运动解放军总司令希梅内斯·莫雅率领下，人民武装部队在距首都西北60英里的康斯坦萨镇附近向独裁政府军发动了进攻。这次袭击非常成功，反独裁武装人员歼灭了敌军，并烧毁了载运敌人的卡车。两天以后，又占领了康斯坦萨镇，并控制了中部的一个山区，许多农民纷纷参加反独裁的武装队伍。随后，起义部队又占领了多米尼加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德洛斯卡巴列罗斯，控制了这座城市附近的山区据点。同日，在北海岸也爆发了武装起义。据多米尼加解放运动发表公报称，反独裁武装部队同政府军曾连续在多米尼加中部和北部发生战斗，在这些战斗中政府军死伤500余人。

1959年9月下旬，又爆发了有空军基地人员和首都大学生参加的反独裁起义。这几次起义，虽然都遭到了特鲁希略独裁政权出动飞机和军队所进行的残酷镇压，但多米尼加人民反独裁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

多米尼加的局势，给美国的扩张政策带来了重重阻力。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继续扶持傀儡政权，美国的军事力量出动了。1961年美国出兵占领了多米尼加，成立了殖民政府。1961年5月，拉斐尔·特鲁希略被刺死后，资产政党纷纷成立，人民反对政府独裁统治的示威游行和罢工罢市斗争连续不断。在此期间，美国三次出动军舰进行威胁，干预多米尼加内政。同年11月，在美国策划下，组成了以巴拉格为首的7人“国务委员会”，并于1962年1月1日正式执政。1月16日，巴拉格在人民反美反独裁斗争的压力下宣布辞职，由武装部队总司令埃切瓦里亚控制的军人组成“军政委员会”接管政权。18日，一批空军军官发动政变，推翻了军政委员会，把政权移交给前“国务委员会”，由拉斐尔·博内利出任主席，继续推行亲美独裁政策，镇压国内爱国民主力量，甚至将大批进步人士驱逐出境。12月，多米尼加革命党领袖、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胡安·博什当选总统，1963年2月17日宣布就职。他颁布了新宪法，采取了一些抵制美国的政策，如规定国家主权和地下资源不容侵犯，实行“土地改革”，公布限制美资糖业公司利润的“最高糖价法”，废除了前政府同美石油公司订立的关于建立炼油厂的合同等。美国于1963年9月25日，再次策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博什政府，废除了新宪法，逮捕进步人士。26日，建立了以卡夫拉尔为首的“三人委员会”，再次实行独裁统治。

卡夫拉尔政权一上台，就废除了民主宪法，宣布左翼政党为非法，并进行大逮捕，企图通过残酷的军事警察统治，来阻止国内民主力量的发展。自此至1964年底，人民反美反独裁统治的斗志不断高涨，先后在首都圣多明各和圣地亚哥等地连续发生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和罢工、罢课运动；在农村和部分山区，爆发了反对独裁统治的农村起义等。

1965年初开始，卡夫拉尔领导的“三人委员会”对国内进步的爱国力量大肆逮捕、残酷镇压，这更加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在政府军内部也日益

滋长了对当局的不满情绪，到 4 月 24 日，以卡马诺为首的一批爱国军官终于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卡夫拉尔独裁政权，拥护前总统胡安·博什重新执政。这次起义，迅速演化成了群众性的斗争，美国为了维护其多米尼加傀儡政权，悍然向多米尼加共和国发动了公开的大规模武装入侵。

美国政府在 4 月以前，由于为侵越战争中日益严重的困难所困扰，对多米尼加的政局变化并不很重视。4 月初，华盛顿决策人在接到美国驻多米尼加大使贝尼特一个“含义隐晦”的电讯后，才表示了强烈的关注。贝尼特告诉华盛顿决策者说，在多米尼加“减少我们的努力或不采取行动，将酿成苦酒”。美国是绝对不想放弃对多米尼加的控制的。这是因为美在多米尼加有着重大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经济方面，在 1960 年前后，美国和古巴关系破裂后，多米尼加成为美国的食糖的主要进口国。美国企业家在多米尼加的投资也在大幅度增长，从 1964 年到 1965 年，这种投资达 200 亿美元。政治方面，美国害怕在加勒比海出现另一个古巴。约翰逊总统说得很明白，他说：“美洲国家现在不能允许，必须不允许并且将来也不允许在西半球建立另一个共产党政府。”

1965 年 4 月 25 日 8 时 45 分，美国总统约翰逊借口保护美侨生命和财产安全，下令航空母舰“拳击者”号，载着 1100 名海军陆战队员，驶抵多米尼加海面。4 月 27 日，驻市雷格登的空降第 82 师也处于完全戒备状态。4 月 28 日 18 时 30 分，美陆战队员开始在多米尼加登陆，19 时，登陆部队攻占了离首都圣多明各以西 11 公里的艾纳港。到 4 月 30 日前，美军陆战队和第 82 空降师占领了圣多明各以东 12 公里的空军基地圣伊西德罗附近的整个海岸线和该市的濒海地区。数日，美国侵略军出动 3.5 万多人的兵力，380 多架飞机和 40 多艘军舰以及大批坦克、炮兵部队，对多米尼加人民进行血腥镇压。随着战局的发展，美国又陆续将兵力增加到 3.5 万人。多米尼加人民对美国的侵略进行了英勇抗击。他们虽然没有现代化的武器以及丰富的弹药及配给，但还击侵略者的决心却毫不动摇。他们凭着一腔爱国热情同美国侵略者抗击了 4 个多月的时间。

5 月 24 日以后，美国一方面拼凑以美军为主的所谓“泛美部队”，使用美军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在海空军力量的支援下，对多米尼加人民继续进行残暴的军事镇压。另一方面，美国又通过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出面干涉，以图赢得时间，欺骗舆论，使其侵略的“合法性”得到国际承认。

美国对多米尼加的武装干涉，遭到了许多拉美国家的反对和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约翰逊总统策划组织“泛美部队”干涉多米尼加，遭到一些拉美国家的抵制，如墨西哥、乌拉圭、智利、秘鲁、厄瓜多尔 5 个国家的政府就宣布不参加，就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些国家如法国、荷兰、挪威、比利时、丹麦、意大利等国，也表示反对或不赞成美国的入侵活动。

国际舆论对多米尼加人民正义斗争的支持，鼓舞了起义者的斗志，他们顽强抵抗，使美军陷于旷日持久的军事行动中。为了从“多米尼加危机”中找一条出路，约翰逊政府不得不改变策略。1965 年 8 月，美国同起义者谈判。美国软硬兼施，强使卡马诺领导的“宪法政府”接受了“和解法”，其中规定：成立以前总统博什时期的外交部长加西亚·戈多伊为首的“临时政府”；9 个月内，在美洲国家组织的监督下举行选举；“临行政府”成立，“敌对双方”的部队立即开始撤除目前各自控制地区的防务，立即使多米尼加爱国军民控制的地区非军事化和解除人民群众的武装；美国控制的“泛美

部队”仍然留驻在多米尼加。1966年6月，美国又扶植巴拉格尔“当选”总统。美国最后一批入侵军直到1966年9月才撤离多米尼加共和国。然而，多米尼加人民的对抗情绪却在美国政府心头留下一块心病，他们不愿意失掉这样一个傀儡政权。美国侵略者1966年被迫从多米尼加撤退后，仍在那里留下2000多名特工人员，在所谓“和平部队”、“粮食用于和平”、“美国新闻处”和各种“援助”机构的外衣下控制多米尼加各部门，镇压多米尼加人民运动。

多米尼加人民的抗美救国热情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通过不同的形式同美国的侵略行径进行了公开对抗。自1965年以来，抗议不断，使侵略者颇伤脑筋。

1969年曾举行大规模反美集会和游行，反对洛克菲勒前去“访问”。

1970年头几个月，多米尼加人民举行了数万人以至20万人参加的反对巴拉格尔“连任”的大示威。

同年6月，各界人民开展强大斗争，反对美国在圣多明各策划召开美洲国家组织会议。1971年2月，圣弗朗西斯科德马科里斯市20多个政治、工会和学生团体组成统一领导委员会，发动了抗议反动警察暴行的全市性总罢工。

四、美国出兵黎巴嫩

位于地中海东岸的黎巴嫩，面积 10400 平方公里，这个亚洲国家历史上战乱很少，经常在阿拉伯国家事务中充当“调和人”的角色，素有“中东瑞士”之称。1958 年 5 月，当黎巴嫩人民掀起了反对投靠美国的夏蒙政府的武装起义时。美国为了保住在中东的势力范围，便同样毫不客气地对黎进行了直接的武装干涉。这次武装干涉是美国镇压阿拉伯各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黎巴嫩位于地中海东岸亚欧两洲交界地带。沿海为狭长低地，内地有许多与海岸线平行的山地。贝鲁特是自由港，每年有大量西方商品经过黎巴嫩转运到中东其他国家。美、英在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开采的石油一部分也经过黎巴嫩的港口转运西欧各国。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黎巴嫩曾经是古代腓尼基的一部分。在公元前 2000 年后，相继为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和罗马统治。7 世纪中时到 16 世纪初，是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随后被土耳其征服，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沦为法国委任统治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间，由于阿拉伯人民要求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当时戴高乐的“自由法兰西军”总司令贾德鲁被迫在 1941 年 11 月 26 日以盟国名义宣布黎巴嫩独立。1942 年 11 月 22 日，成立第一届议会，选出第一任总统。黎巴嫩政府随即规定 11 月 22 日为独立日。英法占领军直到 1946 年 8 月才被迫撤离黎巴嫩，但是，紧接着美国又插手黎巴嫩，从政治上收买了夏蒙政府，经济上缔结所谓的“援助”协定，推行“艾森豪威尔主义”，并“租用”了一些机场和港口。

黎巴嫩反动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遭到广大人民的反对。黎巴嫩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反对美国及其代理人夏蒙政府的斗争，此伏彼起。

按照黎巴嫩宪法规定，总统不得连任。但是，夏蒙的任期于 1958 年 9 月即将届满，他便玩弄各种阴谋手段，妄想连任，并残酷镇压人民的反抗。1958 年 5 月，黎巴嫩人民掀起了一场大规模武装起义。最初，群众采取大示威、总罢工和总罢市等斗争形式，最终发展成为人民武装。人们拿起各种自制的武器，不断向政府军的军营冲击，用缴获的武器再来武装自己。至 6 月下旬起义武装控制了黎巴嫩四分之三的领土，使夏蒙反动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黎巴嫩人民武装起义两个月来取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中东地区人民反对美国及其仆从的斗争。美国一直将中东地区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黎巴嫩当局不仅历史上与美国有着“特殊关系”，而且在黎境内已有美国的几处军事基地。美国为了保住在中东的阵地，一开始就对黎巴嫩人民起义进行了干涉，运送武器支援夏蒙反动政府镇压起义人民，并派遣海军在黎巴嫩沿海进行威胁。1958 年 7 月 15 日，美国以黎巴嫩政府的请求和“保护黎巴嫩主权”、“保护美国侨民”为借口，悍然采取突然袭击方式，派兵在黎巴嫩登陆，粗暴干涉黎巴嫩内政。7 月 16 日下午 3 时，在美海军第 6 舰队护送下，1500 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在贝鲁特以南国际机场附近的哈尔迪湾实施登陆。尔后又通过西德“空中走廊”不断增兵。到 8 月上旬，美国侵略军兵力达到 4.8 万人。其中，地面部队达 1.5 万人，作战部队 1.1 万人，编成 4 个陆战营、2 个空降战斗群和 1 个坦克营，后勤部队 4000 余人。美国侵略军侵占了贝鲁特及其附近的山区、国际机场区、火车站和海港区，还控制了几条公路。执行

支援任务的美国空军约 3000 人，编成一个混合空中攻击部队，有飞机 71 架，驻扎在土耳其的亚达那美国空军基地。此外，美国海军第 6 舰队及所属 200 余架飞机，全部调到地中海东部海域，其中有 50 余艘舰集中在黎巴嫩沿海活动。

美国的侵略行径，遭到了黎巴嫩人民的坚决反对。人民起义部队对美国侵略者不断进行英勇的反击。黎巴嫩一些政党领袖、起义部队领导人纷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武装侵略，要求美国侵略军撤出黎巴嫩。

人民起义部队对美国侵略军不断反击。7 月 16 日美国侵略军 2000 多人在飞机舰炮的掩护下，冲进贝鲁特区泛美大厦，遭到人民起义部队的猛烈回击。在议会广场和议会大厦附近，人民起义部队对美国侵略军进行了英勇抵抗，俘虏了一部分美国士兵，迫使美国侵略军退出上述地区。起义部队对美国飞机不断进行射击，到 7 月 22 日止，仅在贝鲁特地区就有 16 架美国飞机被起义部队击伤。美国的武装侵略，一开始就陷入了黎巴嫩人民武装反抗的汪洋大海之中。据报道，一个黎巴嫩孩子给美国哨兵送去一篮子汽水，篮子里装着定时爆炸装置，使美国兵送了命。这一事例，生动地说明黎巴嫩人民对侵略者的愤慨和顽强反抗。

黎巴嫩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得到了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在黎巴嫩人民英勇斗争面前，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愤怒谴责下，美国处于空前孤立的境地，不得不于 1958 年 10 月底从黎巴嫩全部撤出侵略军。美国的武装干涉未能挽救夏蒙反动政权的统治，1958 年 9 月，夏蒙反动政府垮台。黎巴嫩议会选举了原陆军部司令谢哈布为共和国总统，以反对派领袖拉希德·卡拉米为首组成新内阁。卡拉米在政府的政策声明中表示，新政府奉行中立政策。黎巴嫩人民捍卫了自己的独立和主权，美国的武装干涉遭到了失败。

第十八章 报复之箭射向利比亚

- 一、利比亚的两个特产：石油和卡扎菲
- 二、里根总统态度明确：“一直追到飞机库。”
- 三、响尾蛇导弹击中利比亚战斗轰炸机
- 四、多层次电子战网在“演习”中逞威
- 五、西伯林夜总会血肉横飞
- 六、空袭结果：利比亚旧仇未了又添新恨

一、利比亚的两个特产：石油和卡扎菲

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后不到三年时间，又把战火烧到了地中海的锡德拉湾，轰炸了利比亚的首都的黎波里和另一个城市班加西，使利比亚受到重大损失。

这场武装冲突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那么美国为什么要长途跋涉对一个中东小国大动干戈？其目的何在？这里不能不首先对利比亚和卡扎菲有个了解。

利比亚这个人口不足 300 万的辽阔的沙漠国家之所以著名并且锋芒毕露地活跃在世界舞台上，完全是因为两个因素：一个是石油，另一个就是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两者缺一不可。

伟大的预言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动物史》中说：“总有新东西出自利比亚。”1300 年之后，从地质学家在这片尘土飞扬的土地上开凿的洞内，果然冒出了石油。过去，这块从非洲的地中海岸向南直插入撒哈拉荒原犹如一个长方形的楔子的土地上，只能生长为数不多的硬粒小麦、大麦和阿尔法草，水眼周围也只有某些柑桔、油橄榄和海枣。自从 20 世纪 50 年代发现石油以来，利比亚成为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第三大石油输出国。

利比亚这块神奇的土地孕育了大量的石油，也孕育了它的第二个特产：卡扎菲。

1942 年，穆阿迈尔·卡扎菲降生在利比亚苏尔特沙漠卡扎菲家族的一个贝督因人的羊皮帐篷里。他有三个姐姐，因而受着缄默寡言的母亲暗中喜欢和老来得子的父亲的毫不掩饰的宠爱。卡扎菲放羊，放骆驼，这些牲畜都归家族所有。一直到 8 岁，他还是一个野孩子，直到后来费赞的一名教徒教他读《古兰经》，才变得规矩起来。读中学的时代，卡扎菲突然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纳赛尔和本·贝拉这些当时的革命领袖崇拜得五体投地。在 17 岁的时候，他就在考虑推翻利比亚现政府了。

当时，利比亚的统治权属英国扶植下的塞努西人穆斯林社团的伊德里斯一世。他统治下的政府缺乏严明的法制，包税人瓜分土地，大小官员贪得无厌，警察动不动就镇压学生。由于巨大宝藏石油的发现，中世纪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迅速瓦解。埃米尔伊德里斯瞬间成为挥霍无度的哈里发。然而，这也正是卡扎菲发动革命的土壤。伊德里斯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人正用锯子锯着王位的底座。

卡扎菲在大学里读了一年历史后便自动退学，来到利比亚的第二大城市班加西，考上了军事学院。在军事学院里，他开始在班上一个一个物色自己的同志，结成秘密团体，12 名军官组成了以他为首的自由联合军官中央委员会。1969 年 9 月 1 日，伊德里斯正在土耳其的一个疗养地休养的时候，卡扎菲上校包围了电台和兵营，逮捕了 5 位继承人。

一夜之间，27 岁的卡扎菲就成为利比亚土地上的新主人。

卡扎菲的革命目标是首先振兴这个过去遭受过无数次外国占领的国家，赶走最后一批卖国贼，使企业国有化，使国家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他长期思索阿拉伯世界的起源及其历史，认为先知穆罕默德的准则应该成为人类精神再生的源泉。饱受伊德里斯统治之苦的利比亚人被卡扎菲的理想打动了，他们紧随其后，渴望实现其所有的允诺。

卡扎菲大概可以算是当代阿拉伯世界领导人生活最俭朴，近乎僧侣式的

一个。他不抽烟，不喝酒，具有清教徒那样的生活信念。

卡扎菲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夺了权后最初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在利比亚恢复伊斯兰教的根本精神。虽然他的国家过去是酒的主要出口国，但他禁止出卖和酿造烈性酒。他讨厌的黎波里娱乐场所的下流气氛，常常坐着灰色的西德大众牌小汽车在城年私访，逐渐把相当荒淫的富有意大利风味的港口变成地中海沿岸最单调的城市之一。

卡扎菲上校喜欢在最出人意料的时候搞突然袭击。他晚上化装或穿着军装在黎波里街头溜达，经常突然闯进夜总会，中途中止夜总会的娱乐节目，下令逮捕放荡的舞女。他关闭了的黎波里和班加西的妓院，把所有欧洲妓女从这个国家驱逐出去。一位利比亚商人哀叹说：“卡扎菲上校正把整个国家变成一座清真寺。”

卡扎菲上校的鲁莽和堂吉诃德式的性格是阿拉伯世界的话柄。但卡扎菲向来我行我素，他才不管别人怎么说哩！

他上台最初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取消外国文字的路牌。然后，赶走惠勒斯空军基地的6000名美国工作人员，他迫使英国撤离托布鲁克空军基地。

他大胆的民族主义行动，使得他在国内外的排外支持者面前成了一个被崇拜的圣人。然而，卡扎菲关心的事，远远扩大到利比亚的边境以外。他要继纳赛尔之后，成为握有统治大权的阿拉伯世界的代言人。他是埃及、利比亚、苏丹和叙利亚联邦的热烈支持者，他要在三年内做到政体上的完全统一。

自封为泛阿拉伯统一的新救世主的卡扎菲上校，使利比亚以外的国家既发抖又羡慕。

不管人们对卡扎菲怎么看，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从1969年9月1日卡扎菲仗剑而起，取得对利比亚679.358平方英里土地的统治权到现在，半代人的时光过去了，卡扎菲和他的人民生活在一个与以前迥然不同的国度里。

1974年，美国著名记者约翰·库利对利比亚进行了一次访问。当时，卡扎菲发起的绿色革命正方兴未艾。官方派来的年轻向导对他说，“感谢真主，再也没有穷人了，每人都有一所住宅或一套公寓房间。我已经有了一辆汽车，因为我有工作、有薪金。在10年或者5年以前，谁也不敢保证我能有其中任何一样东西。现在保证人人都有这些东西了。”

这位向导的话无不自豪，因为在1969年以前，利比亚是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一。极少数的上层权贵靠石油而暴富，他们的奔驰牌或凯迪拉克牌高级汽车疾驶在黎波里和班加西的大街，根本不把路旁的驴车、满载货物的骆驼和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大多数老百姓的小棚子放在眼里。主动为你照料汽车赚小费的瘪三、沿街乞讨的叫花子、为妓女拉客的人和扒手小偷在城里四处游荡，一心想捞点外国人的油水或者偶尔得到哪个利比亚阔老的施舍。

约翰·库利走出机场，如今看到的是一排排鳞次栉比新建的黄褐色或淡沙色的公寓大楼和四户一单元的小型分散住宅，而过去这里曾是荒无人烟的沙漠。乞丐和其他穷苦可怜人或者过寄生生活的人已经在街头绝迹。在机场、出租汽车站或者在旅馆，都得自己动手搬行李，因为卡扎菲的革命号召废除仆役服务工作。

对于石油财富和卡扎菲的文化革命给利比亚带来引人注目的物质变化，美国的人类学者约翰·梅森博士深有体会。革命前不久，他住在昔兰尼加的

奥吉拉绿洲，那里住着阿拉伯化的柏柏尔人，是个宁静的地方。梅森 1968 年到 1970 年间在利比亚进行实地考察，兼任讲师。在那段时间里，他感到生活清苦，只有简陋的交通运输、栖身之所和机械设备以改善日常生活的艰苦条件和减轻种植番茄、洋葱、椰枣等绿洲作物的劳动强度。时隔 7 年，1977 年 6 月，梅森又来到了奥吉拉，他惊奇地发现，昔人牧人的绿洲“在一夜之间已经变成一座熙熙攘攘的城镇”。新的公寓和新建或重修的清真寺拔地而起，与椰枣树丛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加利福尼亚式的风情画。

卡扎菲巧妙地利用石油这张政治王牌在人民心目中频频得分，而使他的沙漠王国脱颖而出，摆脱了默默无闻的地位，使他的人民摆脱了贫穷，摆脱了不发达的阴影。但他的热情也使他在世界上树敌甚多，在这些敌人当中，美国这个西方世界的领袖，有“世界宪兵”之誉的国家，尤其给卡扎菲的心头投下了巨大的阴影。虽然卡扎菲并未见过 1968 至 1988 年间的历届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杰拉尔德·福特，吉米·卡特，罗纳德·里根和乔治·布什，但从内心深处却把他们看成本民族和他个人不共戴天的仇敌。

二、里根总统态度明确：“一直追到飞机库。”

最早利比亚是个亲美的国家，美国在利比亚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并且建有军事基地。

卡扎菲下令关闭了美国设在利比亚的空军基地，从此利比亚改变了亲美立场，视美国为“头号敌人”，并逐渐加强了同苏联的关系，购买苏联武器，聘请苏联军事顾问，美国对利比亚很不满意。

1981年8月初，美国海军的一位高级将领来到白宫，他要向里根总统和内阁汇报预定在那个月晚些时候在锡德拉湾开始的军事演习的情况了。

在五角大楼的策划者们看来，锡德拉湾显然是与利比亚卡扎菲对抗的理想地点。

锡德拉湾位于的黎波里和利比亚北部的班加西之间的地中海海域。卡扎菲在1973年就警告美国人说，尽管3海里或者13海里是国际公认的领海界线，但对于利比亚来说，沿海200海里海域为本国的领海，整个锡德拉湾都是利比亚的领海。

1976年利比亚在提交联合国的一份文件中，重申了锡德拉湾的特殊性，以北纬32度20分为界线，宣布此线为不可逾越的“死亡线”。

针对利比亚的警告，美国却明确表示，它认为从海湾起12海里以外就是公海，利比亚禁止入内的锡德拉湾内水域也不例外。自1976年以来的几年间，美国海军的飞机和利比亚的喷气式飞机曾多次险些发出冲突，利比亚的飞机有些是由叙利亚和巴基斯坦飞行员驾驶的。

1980年9月，美国卡特总统命令第六舰队不要进入锡德拉湾，因为他担心，一旦爆发严重冲突，将会危及在伊朗的美国人质。卡特希望利比亚在人质问题上能助一臂之力。

里根执政以后，伊朗问题已解决，便准备重新恢复在锡德拉湾的演习。

里根政府比卡特政府似乎更具威慑力，重塑美国在世界上的权威的形象、敢作敢为的领袖的形象，这也是里根的宿愿，所以，上台不久的里根首开先例，毫不掩饰地把卡扎菲说成是世界头号公敌，公开谈论利比亚“局势不稳”，并放出中央情况局密谋暗杀这位上校兄弟的谣言。

白宫里的关于恢复海军在锡德拉湾演习的会议正在进行之中。

海军高级将领汇报说，利比亚飞机已经在海湾已北的地中海水域零星地骚扰我们的舰只和飞机，一旦演习开始，骚扰的规模很可能会大大扩大。他希望总统指示，如果利比亚飞机向我们的飞机或军舰开火，或者以其他方式干涉它们在公海的活动自由，海军应当作出怎样的反应。

里根总统的回答很简单，他说，“只要我们的舰只和飞机在国际水域遭到射击，或者以其他方式剥夺主权国家应有的权力，海军就要以同样的方式作出反应。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们把一个美国人派到他或她可能遭到射击的任何地方，他们都有权还击。”

一位内阁成员问，“能追究吗？”

他想知道，如果利比亚飞机违反国际法骚扰美国的飞机或舰只，那么应当允许美国的飞机对利比亚飞机追到什么程度。

海军将领说完后清了清嗓子，看着里根，等着总统的回答。突然房间里鸦雀无声。

里根说：“一直追到飞机库。”

海军将领脸上露出笑容说，“是的，先生。”

国防部长温伯格和里根总统的意见不谋而合。他认为，美国在地中海的舰队，好多年来一直在这一水域进行军事演习，现在更有必要在这里继续呆下去，不必理睬利比亚关于海湾管辖区域的要求。如果承认了的话，那么就为世界上其他的国防水域开了一个令人担忧的先例。假若美国不进入这一水域，那就意味着卡扎菲的无理要求得到了重视。

温伯格在以后的一周一次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以及与联席会议主席单独商谈时，都再三说明他自己不希望因卡扎菲的威胁或其他什么原因改变这次计划。

不久，卡扎菲发出明确警告：如果美军战舰或飞机进入锡德拉北纬 32° 30' 以南的水域领空，他就要下令摧毁这些战舰和飞机。然而，美国人决定不理睬这种声明，让美军继续在这一地区进行演习。卡扎菲现在不得不决定采取积极措施阻止美国人在这一水域进行演习和自由来往，不让国际舆论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夸夸其谈，喜欢恐吓却没有行动的空谈家。

锡德拉湾剑拔弩张，战火一触即发。

三、响尾蛇导弹击中利比亚战斗轰炸机

1981年8月18日晚上，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刚好从洛杉矶回来，在“世纪市场宾馆”号飞机上，他向里根总统详细地陈述应该坚持的国防预算。

当时，这一预算正遭到预算管理局和白宫官员的抨击。讨论完毕，他与总统共进了午餐，然后，于11点飞回了安德鲁斯。总统继续支持增加国防预算，并在生日里来到飞机上与他交谈，这使温伯格感到鼓舞和振奋。温伯格也对飞机上的工作人员为总统准备了精致的生日蛋糕而感到高兴和愉快。

温伯格上床睡觉时已经差不多晚上一点了，因为事前他得为去伦敦访问作些准备工作。这次访问是很久以前安排的，他将于第二天晚上动身。就在他刚上床时就接到菲尔·加斯特将军打来的电话，报告有关地中海的行动，菲尔·加斯特将军是参谋长联席会议里的行动指挥官。

这天晚上，温伯格被电话吵醒了好几次——不可避免的美利军事冲突终于在锡德拉湾爆发了。

8月18日，以核动力航空母舰“尼米兹”号为核心的第六舰队特遣队按五角大楼的决策开始了包括锡德拉湾在内的地中海中的演习。

利比亚截击机起飞前往迎击。利比亚飞机的巡逻飞行大部分是两架一组，包括米格23、米格25和几种不同型号的幻影式战斗机。利比亚飞机从南面、东面和西南不同的基地纷纷会集到这一地区上空，其中6架进入了演习区。

18日这天，演习区域内几乎没有商业飞机或航海船只通过，也没有渔船活动。

8月19日清晨，利比亚飞机频繁进入这一区域飞行。上午7时15分，亨利·M·克利曼中校和劳伦斯·M·马克多斯基上尉正驾驶着两架格鲁曼公司制造的F—14战斗机在“尼米兹”号南面二万英尺的上空巡逻，突然在雷达上发现两架“来路不明的飞机”。

两架飞机都是苏霍伊—22“装配工”或战斗轰炸机。当时“尼米兹”号正在距利比亚海岸大约100海里处游弋，它立即命令两名海军飞行员向南转移战斗巡逻范围，把它们赶出这一区域。

克利曼和马克多斯基准确地定出了那两架苏霍伊飞机的方位。克利曼把F—14飞机向左倾斜了90度，打算左转弯150度，与利比亚飞机编队飞行。当他飞到苏霍伊飞机的上方500英尺，距离1000英尺时，那架利比亚飞机突然从翼下发射了一枚导弹。导弹没有击中目标，从克利曼的飞机下方飞了过去。

另一架苏霍伊飞机猛然右转爬高。克利曼调转机头，向下追去。等到那个利比亚飞行员挡住了太阳，克利曼不再感到阳光刺眼时，他发射了一枚空中截击导弹9—L（响尾蛇寻航导弹）击中了那架苏霍伊战斗轰炸机的尾部。利比亚飞行员被弹射出来，随之打开了降落伞。

与此同时，马克多斯基咬住了另一架苏霍伊战斗轰炸机，从后面向它发射了一枚响尾蛇导弹。导弹击中了苏霍伊飞机和排气管，并且炸掉了飞机的整个后部。飞行员随即弹身出机舱，后被利比亚搜索人员营救。

战斗结束了。美国第六舰队司令H·罗登海军中将充分肯定了两名美国飞行员的行动：“两架飞机是在受到攻击的情况下，出于自卫而击落那两架来犯的飞机。空勤人员为了自己进行反击是没有错误的。他们并没有要求或

请示特遣队司令詹姆斯·E·塞维思少将或其他什么人的任何特许批准。”

克利曼后来说，“我毫不犹豫地开了火，虽然当时我曾想到这样做可能引起一场争吵，”

空战发生的地点距离利比亚海岸线大约 30 海里。利比亚迅速作出反应，的黎波里电台的公报说，“美军”发动了“怯懦的进攻”，已经“危及和平”。两个星期后，也就是 9 月 1 日革命纪念日那天，卡扎菲警告说，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他将立即对美国在地中海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报复——而且蓄意放风，他正在考虑同苏联签订一个盟约。

美国国内的大多数人对美军飞行员在锡德拉湾的行动表示赞成，少数人为交火感到惊愕。

20 日 7 点 45 分，温伯格在五角大楼新闻发布厅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提供了他所掌握的全部资料。

记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在那里演习对利比亚是不是一种挑衅？”

温伯格回答，“不是，……我们的演习是在国际水域进行。”

第二个问题是：“你刚才说美国飞行员的任务完成得相当好，你好像对此感到很满意——”

温伯格回答：“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没有必要来点什么精神分析……飞机的飞行任务是为了侦察，一旦遭到袭击，就应该反击。事情经过就是这样。我再重申一遍，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觉得他们的任务完成得相当好。”

8 月 19 日，温伯格出席了在费城举行的每年一度的曾在海外作战的退伍军人大会。尽管电视报纸已经报道了他要在早晨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但来开会的退伍军人中还有许多人不知此事，所以温伯格又向他们报道了所发生的一切。

温伯格在讲话里还提到应该从越南战争中吸取的两个教训：

“如果我们并不是认真地去争取赢得一场战争，那就不必卷入此战争；我希望也相信我们再也不会卷入战争，除非我们能取胜。过去我们号召年轻人参加我们并不想打赢的战争，结果使他们忍受了巨大的痛苦”。这一观点受到与会老兵的热烈欢迎。

但美国前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对华盛顿的一位专栏作家的谈话却与信心百倍的温伯格截然相反，他说，“政府实际上正在告诉人们，我们比俄国人虚弱——但却比利比亚强大。”那位专栏作家接着写道：“尤其要指出的是，这届独特的政府竟然想要庆祝一番，那并不是衡量美国力量的标准。”

但不管怎样说，上任不久的里根总统用行动向卡扎菲发出了一个信息：白宫已经由新人来管理了，在涉及到自己的利益的时候，美国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

四、多层次电子战网在“演习”中逞威

锡德拉湾上空发生的激战不久，美国政府就透露出消息说，至少有 14 名利比亚刺客潜入美国，他们显然图谋暗害里根总统，黑格国务卿或其他美国领导人。从此，华盛顿白宫的屋顶上悄悄蹲伏着对付阻击手的巡逻哨。

里根总统和布什副总统的出入，都作了煞费苦心的巧妙安排，设下许多圈套，例如派高级轿车作假目标，还装模作样地有摩托车队护送，以诱使想象中的“暗杀小组”上当。里根总统在公开场合露面，安全人员总让他穿上防弹背心。里根总统乘直升飞机到什么地方去，路线都是在起飞前几分钟选定的，因为情报机构报告说，进入美国的利比亚刺客带有能用手发射的红外线自导导弹，企图击落被称为海军陆战队一号的总统直升机。

到底是否真有刺客潜入，使得美国情报人员草木皆兵？也令外国的分析家们难以置信，但是华盛顿对此却是非常认真重视的。美国总统为了进行报复，下令从利比亚撤离 15002000 名美国人，其中许多人是在利比亚工作的石油工人，于是众多的美国人卷起铺盖郁郁不乐地离开了。

美国和利比亚间的仇视继续发展，双方各不相让，对对方的威胁性宣传与日俱增。

1985 年 12 月底，罗马和维也纳机场发生两起恐怖分子袭击民航办事处的惨案，遇害死亡的 20 人中，有 5 名是美国人。美国一口咬定利比亚窝藏了制造事端的恐怖分子，以此为借口扬言要对利比亚进行军事报复。并派出多艘军舰，驶往地中海南部海湾，在利比亚水域附近演习，施加军事威胁，进行挑衅。

1986 年 1 月 3 日，美国第 6 舰队所属的“珊瑚海”号航空母舰携带其战斗机群从那不勒斯驶往锡德拉湾。1 月 4 日，驻在印度洋的“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和在美国东海岸弗吉尼亚的“美国”号航空母舰及战斗机群也被派往那儿。

实际上美国想打击利比亚已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在里根连任后，美国就开始筹划了。一心想要“惩罚”卡扎菲，二来也借此打击苏联在中东的气焰。里根一再宣称：只要卡扎菲不下台，中东就无和平可言。但像 1981 年那样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得采取大的行动。

要采取行动总得找点借口，这是一惯做法。里根的智囊团根据 80 年代以来恐怖活动猖獗的情况下，准备打起“反恐怖”的旗帜。随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打击利比亚的方案。

美国考虑再三，认为不能一上来就采取军事行动，宜先文后武，逐步升级，以争取国际舆论。

里根总统采纳了这一意见。首先宣布对利比亚实施全面经济制裁，冻结了利比亚在美国的全部资产，同时撤回在利比亚的 1500 名美国人。派出副国务卿到西欧各国游说，共同制裁利比亚。

美国的经济制裁确实给利比亚的经济造成很大困难。

利比亚并没有被美国的制裁所压倒。利比亚坚信苏联的武器是先进的，苏联不会把利比亚丢给美国而不管的，苏联不是好惹的。

其实，美国之所以迟迟未动手，其原因之一正是担心苏联的军事干预。

美国经过几次试探性的进攻后发现，苏联人不愿意介入这场冲突。里根这下心里暗自高兴，这次可以放心大胆地干了。

苏联人的袖手旁观，可坑苦了卡扎菲了。

1月22日，美国的间谍已从星空中拍摄的照片中发现，利比亚把从苏联购买的萨姆——5导弹已部署在锡德拉湾海岸。美国人以为，这些导弹对在地中海活动的美国飞机构成了严重威胁。应当立即除掉。

但如何除掉这些“钉子”，美国总统安全顾问波因德克斯献出一个计策，那就是让美舰故意越过“死亡线”，诱使利比亚开火，然后以此为借口，来好好教训利比亚。

里根认为这个主意不错，当即拍板定案，并把这一行动命名为“草原烈火”。

为了实施这一计划，美海军在地中海调集了34艘舰、240多架飞机，单是航空母舰就有3艘。随后，3个航空母舰编队劈波斩浪驶向锡德拉湾。

自1981年以来美国继续进行预定的海军演习，因为演习计划中的有些项目需要美国的军舰和飞机不时地在“死亡线”进行演习，以适应各种有可能出现的情况。

1986年3月14日，在国家安全计划小组会议上，里根总统决定军事演习照常进行，包括在北纬32°30'以南的锡德拉湾地区。

紧接着，美国发表了海军演习的通告，指定了演习的具体区域。1986年3月21日，又以政府名义正式发表了对“海军和空军的通告”。

3月22日，美国宣布它的海军要在3月23日到4月1日期间在锡德拉湾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并扬言美国有权进入锡德拉湾。白宫办公厅主任里甘说，“如果利比亚军队胆敢向美国军舰或飞机开火，我们就要采取相应的行动。”

这次演习是美国自1981年以来在那个水域进行的第19次海军演习，也是在卡扎菲称之为“死亡线”后在这里进行的第8次演习。

重新规定的行动细则发给了美国地中海第六舰队的司令凯尔索上将。这实际上是军舰舰长和飞机机长在国外水域行动时的“规章”。美国人认为，由于利比亚或苏联导弹能在几秒钟内覆盖数英里，现场指挥官必须在明确的基本指导方针下采取必要的防备措施，以确保完成演习任务。他们可以独立采取反击行动，不必事先请示华盛顿总部或其他司令部。

这些行动的细则得到了里根总统的批准。在细则中规定，在美国通知了利比亚和其他国家美军将要进行军事演习后，如果在这一地区利比亚的军舰或飞机有敌对行动，美国的军舰和飞机就将开炮轰击。

国防部长温伯格称这次利比亚将试图实施他们的计划。温伯格认为行动细则无须拟定得多么仔细，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因此，他决定就此事与凯尔索上将进行商讨。他们相会在伦敦一家宾馆里，当时温伯格刚开完了北约组织会议的准备会议。一见面，温伯格就说，“上将，我知道不管我们拟定的行动细则是多么详尽，总会存在不同的解释，甚至会采取不同的手段和方法。所以，我想让你明白我所想的确切细则是什么，也就此机会讨论一下，我俩的观点必须保持一致。”

“那可不寻常，不过，我仍很乐意。”凯尔索上将说。

温伯格继续讲：“首先，我们必须自由出入我们想去的国际水域，但利比亚公开阻挠我们这样做，而且，卡扎菲已经说过他要袭击我们。”

“现在，我签署这些新的细则，就是要你尽最大努力促使我们的飞机演习时飞越卡扎菲的‘死亡线’，利比亚将用萨姆5型导弹向我们开火。我认

为那就是‘敌意’”。

“的确是这样，”温伯格答道，“毫无疑问，那就是我完全支持你认为你采取的一切行动。”

温伯格补充道：“我知道我军可能会遭受损失，但希望你尽力减少伤亡。不过，最重要的是，我想让你明白，绝不允许卡扎菲恫吓我们，绝对不能让他实施威胁计划。”

最后，温伯格说，“我知道你将处于艰难和危险的境地，我的意图和行动细则意图就是你应采取的认为是必要的措施以完成演习计划。谁也不能阻挡这次演习，我将完全支持你在敌对情况下采取的一切措施。一旦发现情况下，你觉得怎样做合适，就怎样按照你自己的决定行事。现在告诉我，你还需要什么？”

“不需要了，”凯尔索答道，“我认为我需要的都已得到，你的指示十分明了，很有益处，像这样的会谈倒是一个绝妙的主意。”

温伯格和凯尔索上将的谈话意图很明显，美国绝意要对卡扎菲动武。

面对美国的挑衅，利比亚发出一次次严重警告。但美国行动非但没有停止，而且还有增无减。

利比亚忍无可忍了。

1986年3月24日早晨7点52分，美国人的飞机正在北纬32°30'以南的锡德拉湾上空巡逻配合联合舰队行动时，利比亚向他们发射了两枚苏联提供的萨姆——5型导弹，但没有击中目标。

利比亚又出动米格——25战斗机前去阻止，无奈又被美机拦截，不得不返回。

从利比亚发射第一枚导弹后，几个小时过去了，美军竟未还手。任凭利比亚发射导弹，出动飞机，美军就是不作反应。

按照“草原烈火”计划，只要利比亚动手，美军就可以进行还击。此时，已6个小时过去了，美军方面就是不见动静。

原来，美国人也是老奸巨猾，他们认为原来担心利比亚不首先开枪，现在卡扎菲已主动出击了，反击的借口也就有了。美国可以不用着急，应该寻找更为有利的时机。特别是利用利比亚军队夜战能力差的弱点，打利比亚一个措手不及，无法还手。

24日晚21点14分，2架A——6飞机从“美国”号航空母舰起飞，直奔一艘向美特混舰队逼近的利比亚“战士”1G级导弹艇。两枚“鱼叉”导弹命中该艇，即沉入海底。

另外2架A——7飞机从“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飞向利比亚苏尔特地对空导弹基地。美机真是有恃无恐，用2架飞机去突击地对空的导弹基地。实际上，美军早已掌握了利比亚雷达制导站的频率，并已制定了严密的措施，综合运用电子侦察、干扰、欺骗和摧毁的“一体化电子战”战术，并组成多层次的电子战网。

在高空，有E——2C“鹰眼”预警机监视半径300公里内的利比亚飞机、舰艇和防空阵地的动向，随时把搜索到的目标信息，传送给舰队指挥中心、舰艇和飞机。

在中空，有EA——6B电子战飞机盘旋，随时截获利比亚的电台和雷达发射的电波，测定其位置，适时对其实施干扰，造成对方通信中断、武器失控，以掩护攻击机突防和袭击。

美国 A——7 攻击机在电子干扰的掩护下，顺利发射了“哈姆”反辐射导弹，摧毁了利比亚苏尔特导弹基地。

当天夜里 24 点 15 分，“珊瑚海”号航空母舰上起飞两架 A—6 型攻击机，又击沉从班加西驶出的一艘导弹巡逻艇。1 时 54 分，“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两架 A——7 飞机又将锡德拉市导弹基地刚修好的制导雷达击毁。几小时后，一枚“鱼叉”导弹又击沉一艘导弹快艇。

美军舰队在锡德拉湾横冲直闯，仅用 15 小时，共击沉和重创利比亚 5 艘导弹巡逻艇，摧毁利比亚主要导弹基地，利军死伤约 150 人，而美军却无一人伤亡。

在这场短暂的不见面的战争中，美军利用其军事装备优势，使利比亚无还手之力。

27 日 16 时，美军宣布“演习”结束，美舰队撤离了锡德拉湾。

利比亚只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

五、西柏林夜总会血肉横飞

美国人的军事行动激起了利比亚人的愤怒，利比亚在国内举行了大规模反美示威游行。卡扎菲乘势鼓励人们树立信心，坚持与美国人进行战斗。

3月28日，卡扎菲在电视上向人民说：“里根总统现在仍然是个演员，不过他现在玩弄的不是棍棒，而是飞机、军舰和导弹，是一个危险分子。”他鼓励“全阿拉伯人民”攻击美国的一切，“无论是财产、货物、船只、飞机，还是美国人。”

4月2日，湛蓝如海的天空，一架白色的波音——107民航机，舒展两翼，在午后的阳光里，合着发动机的旋律在爱奥尼亚海的上空起舞。这是泛美航空公司从意大利首都罗马飞往希腊首都雅典的804次航班。

突然，一声巨响，飞机右舷出现一个两米见方的大洞，机舱内顿时一片血肉模糊，4人被气浪推出洞外，座位上到处是带血的肉块和红白相间的脑浆。1小时后，美国大使接到希腊警方通报：804次航班死亡4人，重伤9人，均为美国人。

3天后，在西柏林，车流如水，华灯闪烁。拉见勒舞厅门前，一排巨大的霓虹灯下停放了各色小车。人们在工作之余准备过一个狂欢的周末。美国驻西柏林军事基地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凑热闹。当舞兴正浓时，一道巨光伴着雷鸣般的响声给疯狂的舞曲猛地打了个句号。爆炸的气浪把所有站着的人齐齐地摔倒在地上。玻璃片四处横飞，呻吟与哭喊声、惊叫声混成一团。最后清点人数，伤亡共155人，其中44人是美国人。

事件发生后，卡扎菲发表声明说，利比亚与恐怖事件无关，但美国中央情报局4月6日宣布截获并破译了的黎波里同利比亚驻东柏林人民办事处之间关于西柏林迪斯科舞厅爆炸事件的来往电报。利比亚驻东柏林办事处发往的黎波里的电报说“行动”很成功；而的黎波里的回电则表示了“祝贺”。

美国向舆论界宣布，近年来几十起恐怖事件都与利比亚有关。里根扬言要对利比亚再次作出“军事反应”。

西柏林夜总会的爆炸声给美国带来了对付卡扎菲的绝好的机会。华盛顿紧锣密鼓地秘密进行着一项重大的行动。

西柏林爆炸事件发生时，里根总统正同夫人南希在加州的牧场休假。此时，里根心头主意已定——让的黎波里的卡扎菲尝尝美国人的铁拳。里根轻蔑地宣称，卡扎菲“不只是一个野蛮人，而且也是一个不堪一击的人。”

里根总统责成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具体计划。遇到了具体问题，对利比亚进行全面打击，还是选择一些重要目标实施有限打击？选择哪些重要目标呢？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委员们各抒己见，争论十分激烈。

一部分人，尤其是国务院的有些人主张所谓的“无焦点”回击。即马上采取报复性行动。他们的意见是，如果认为恐怖分子在叙利亚或伊朗的某一城市，就可以轰炸这座城市。一部分人包括里根总统在内，反对这种简单的报复办法。同意一旦发现和找到恐怖分子，就采取“有焦点”地回击，即对恐怖分子的行动采取相应的反击，打掉那些从事恐怖活动的国家和个人的嚣张气焰，阻止这种事再次发生。

4月8日晚，里根再次召集会议，里根总统研究了利比亚地图和图片，权衡了各种选择，包括袭击的黎波里某些可能会造成平民伤亡的地点。他提出了几条应遵循的原则：一是袭击与恐怖主义有关的目标，惩罚卡扎菲；二

是最大限度地减少美军的伤亡；三是尽量避免毁伤目标周围平民的房屋和人员。会议上还决定中央情报局长凯西负责物色将来取代卡扎菲的人选。那天晚上里根在他的日记上写道：“我坚持我们选择的军事目标一定要避免平民伤亡，因为我相信利比亚一大部分人是不要这个上校的。”

4月10日，里根总统又在其日记中写道：“又开了一次会，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威廉·克劳海军上将商谈利比亚的目标问题。我想在星期一夜，我给撒切尔首相发了一份长长的电报，全面地说明我们要做的事情。她也回了一份长信，保证给我们支持，但对可能造成的平民伤亡，表示关切。这也是我们关心的问题。”

美国人强调这一计划必须拟定的仔细周密，需要协同行动。主要的袭击任务将由停在英国的F—111型空军轰炸机和地中海的航空母舰上的许多舰载机担任。美国还将飞机担任侦察、搜寻和营救任务。在地中海的舰队飞机还必须在轰炸机来到之前，使利比亚的雷达失去战斗力。像这样的袭击需要大量的协作和后勤支援。美军将有100多架飞机参与战斗，许多飞机将从很远的地方飞来。这些行动要配合得十分默契，分毫不差，从伦敦调来的轰炸机一到，海军的飞机就出其不意、迅雷不及掩耳地摧毁利比亚的雷达。

这之前，许多报道都透露出在准备对利比亚炸毁西伯林夜总会实行报复，但美国人仍希望出其不意地采取行动。

4月13日7点，星期日早晨，国防部长温伯格回到安德鲁斯。从澳洲的悉尼起飞后一直到飞机着陆前，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考虑袭击利比亚的计划，考虑会出现的各种意外情况以及该如何处理，考虑是否预料到所有可能的紧急情况。下午3点，温伯格和威尔·塔夫特等军队指挥官在五角大楼召集了一个会议，再次审阅军事行动方案。

最后，里根总统选出了五个轰炸目标，美国人认为，对这五个目标的轰炸在战略上和道义上都是无懈可击的。这五个轰炸目标是：

- 1、在穆拉特·希德·比拉尔的游泳设施，美国人认为它是一所训练游泳运动员或突击队员的著名学校。

- 2、阿齐齐亚兵营，美国人认为它是利比亚恐怖分子活动的指挥、控制和联络中心。

- 3、的黎波里国际机场有利比亚IL—76/CAN—DID巨型运输飞机。这是恐怖分子的后勤中心。

- 4、本哈兹兵营，美国人认为它驻扎着卡扎菲的精锐部队和一些从事恐怖活动的部队。

- 5、贝尼拉机场，美国人认为它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恐怖活动，但把它作为袭击目标是为了使利比亚防空部队不能拦截美国的飞机。

出击时间定在夜间，主要原因是，卡扎菲夜间总得要睡觉，挨炸的可能性很大；夜里利比亚平民活动少，可以减少伤亡；利比亚飞行员夜间一般不能起飞作战。

夜袭利比亚就像传说中古代西班牙人冒险在深山峡谷之中找到一座黄金城一样，是一桩冒险的军事行动。美军克劳上将风趣地称这次行动为“黄金峡谷”行动。

在作战中要求海空协同进行夜袭。里根一想到卡扎菲将被炸死，不觉喜上眉梢。

美国人之所以要动用部署在英国的F—111型战斗轰炸机，也是有原因

的。按照作战的目标，空袭的主要目标是机场、港口、兵营、指挥中心等。远距离袭击很难达到理想的目的，最好的办法是用轰炸机投掷重磅炸弹。参加行动的“美国”号航空母舰，载有F—14战斗机；“珊瑚海”号载的飞机是FA—18战斗机。尽管这些飞机很先进，但一般只携带空对空或空对舰导弹，实行护航及空战任务。两艘上海军的A—7、A—6型飞机也属于轻型轰炸飞机，显然不足以单独当此重任。

为了使用英国的空军基地，里根总统召见驻联合国大使沃尔斯特面授机宜，携带里根亲笔信去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按照当初美国和英国的有关协议，在英国空军基地上的美国F—111飞机，只有在北约国家遭到苏联及东方集团的军事攻击时，才能起飞作战，现在让它去袭击一个与北约并不存在战争状态的主权国家利比亚，英国是否同意还是未知数。

4月10日，当一批美国记者在采访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她曾表示，英国既不参加对利比亚的经济制裁，也不赞成对利比亚实行军事报复。

4月12日晚，人称“铁女人”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唐宁街10号接见了沃尔斯特。她仔细阅读了里根的信，看了利比亚参与西柏林夜总会爆炸事件的证据，听了“黄金峡谷”计划的要点后，改变了初衷，立即表示同意美国使用英国的空军基地。

“铁女人”之所以爽快地答应美国使用英国国土上的军事基地，也是有其原因的。一是在1982年的英阿马岛战争中，美国拒绝了阿根廷这个拉美国家的求援，暗地里还向英国提供情报、帮了英国的忙，这笔人情债撒切尔夫人还没还呢！二是1984年利比亚驻伦敦使馆人员曾经开枪打死一名英国警察，为此两国绝了交。如果追溯历史，自卡扎菲执政后，英国与利比亚的外交关系时冷时温。三是就反对国际恐怖主义这一立场而言，英美有共同观点。基于这些原因，英国也想不出什么理由拒绝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

使用在英国的军事基地这一问题解决了，那么英国飞向利比亚航程最短的航线要经过法国和西班牙上空。为此，里根总统又急忙致函两国总统，要求“借道”去空袭利比亚，信发出后，里根不放心，又亲自打电话给法国总统密特朗。

但密特朗总统客客气气地拒绝了美国的要求。

法国人和美国人的不合作是有其传统历史的。戴高乐时代是其对抗最严重的顶峰时期。拒绝和美国人合作，法国总统还就如何采取袭击行动向美国人提出了忠告，建议给卡扎菲以沉重打击，而“不要隔靴搔痒”。温伯格对法国人深为不满，认为这是“典型的令人气愤的事情”。

里根总统也对法国的做法很反感。里根认为，“在抵抗恐怖活动问题上，所有的文明国家都应坐在一条船上。然而，至少对法国来说，经济上的考虑起了主要作用：法国表面上是谴责恐怖活动，但是它同利比亚做的生意不少，因此它两边都要兼顾，这是它的特点。”意大利也拒绝了美国人飞越其领空的要求。这样，从英国起飞的F—111型轰炸机不得不多飞数小时，多绕1000多英里，且整个晚上不能使用无线电通讯设备进行联络。在静静的飞行中，飞机得加四次油，最开始在法同海岸线附近，其次在西班牙，然后在阿尔及利亚北部一个地方，最后一次是反击前在突尼斯北部。尽管空军把这看成是一件极普通的事，但给飞机加油确是一件极大冒险的事情，更何况在不允许进行通讯联络的情况下，在晚上执行这样的任务的确是很不容易的。

尽管4月14日欧洲共同体12国的外交部长在海牙举行了紧急会议，呼吁美国不要诉诸武力，美国仍然紧锣密鼓地进行战争准备。

美军为了隐蔽自己的意图，调兵遣将的工作也在例行的演习中加紧实施。

为了迷惑利比亚，美国故意通过某些渠道，传出美国制定了一个连续向利比亚发起三十冲击波的二小时作战计划。按照这个计划，美国将袭击利比亚境内30多个目标，这些目标不仅有军事设施，还包括油田，炼油厂和输油管道等经济设施，以及广播电台、电视台、电信局等通信设施。这样目的是使利比亚无法进行有针对性的部署。

同时，五角大楼实施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在地中海的“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驶回母港，“美国”号和“珊瑚海”号航空母舰撤到“死亡线”以北活动。

4月13日，美向英增派KC—10型空中加油机10架，向塞浦路斯派去F—4战斗机30架，“企业”号航空母舰由印度洋驶入阿拉伯湾，准备支援第6舰队；驻南欧各地美军进入战备状态。空袭由驻英空第3大队，“珊瑚海”号和“美国”号航空母舰编队在第6舰队司令凯尔索中将统一指挥下实施。

除了攻击的黎波里3个目标区24架F—111战斗轰炸机外，还动用了33架喷气式飞机对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实施攻击，其中有15架A—6型和A—7型飞行来自两艘航空母舰上。同时，美军还动用了大批辅助飞机：5架EF—111战斗机行列，保证他们往返有足够的燃料；4架负责协调两个空战行动的E—2C预警机，另有6架装备了百灵鸟导弹的F—18战斗机和一定数量的F—14战斗机护航。

这样，直接参与这次袭击行动的舰艇达20余艘，飞机200余架。

六、空袭结果：利比亚旧恨未了又添新仇

4 月的地中海，春意正浓。

4 月 17 日下午 7 时整，美国空军基地。

海上舰群和驻英国的战斗机部队同时接到凯尔索将军的命令：

“黄金峡谷行动现在开始！”

巨大的探照灯把英国拉肯希思和朱登霍尔等机场跑道照得通亮。

装着激光制导炸弹的 F—111 战斗机起飞了。

E—2C“鹰眼”预警飞机起飞了，担任空中指挥和警戒任务。

KC—10A 加油机也离开了跑道，扑向了茫茫的夜空。

美国的空袭机群绕过法国和西班牙、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经 4 次空中加油，飞行 10380 公里，对利比亚实施远程突袭。

实行无线电静默和灯火管制的“美国”号与“珊瑚海”号航空母舰战斗群也开始悄悄地向南移动。它们将在袭击行动开始前分别从海上控制利比亚的两个大城市——的黎波里和班加西。航空母舰甲板上已经整齐地排满了即将起飞的飞机。这些飞机将在利比亚当地时间凌晨 2 时与远道而来的 F—111 飞机汇合，并主要担负电子干扰和攻击“民众国”兵营与贝尼纳军用机场的任务。

此时机上飞行员仿佛看到天边蹒跚移动的太阳发出的微弱炫光，由于实行无线电静默，耳机里只有编队左侧掩护 F 飞行的电子干扰机发出干扰电流声。在这种电子干扰掩护下，机群出现在地面雷达上的影像只不过是一块高空中的积雨云。

15 日凌晨零时 20 分，16 架 F—111 飞机到达距利比亚海岸约 500 公里的地中海上空，经空中协调，绕过突尼斯阿达尔角，以 3 个编队向南直飞的黎波里。与此同时，已在地中海的舰载机 A—6 攻击机 14 架、A—7 攻击机 6 架、F—18 战斗机 6 架、EA—6B 电子干扰机 14 架、E—2C“鹰眼”式预警机先后升空。

“美国”号航空母舰的指挥室里，灯火通明，凯尔索中将根据卫星传真图像和高空侦察拍摄的最新照片，再以审视的目光注视着作战地图，站在将军身旁的情报处长十分有把握地说，从各方面情报看，要攻击的目标无任何异常。

几只红色箭头直指阿齐齐亚兵营、西迪比拉勒港口、的黎波里机场和位于班加西的“民众国”兵营与贝尼纳军用机场。其中两个兵营都是卡扎菲的住处和第一、第二指挥所。

“再过一会儿，卡扎菲就将不存在了。”将军指着放大的阿齐齐亚兵营中那个白色帐篷的光点，露出一丝冷笑。

凌晨 2 时许，利比亚首都的居民早已进入梦乡。市区某处有几座外表相同的贝都印式帐篷，那是阿齐齐亚兵营。利比亚首脑卡扎菲就住在这里。兵营周围，卫兵荷枪实弹来回巡逻。

突然，天空由远及近传来飞机的轰鸣声，哨兵抬头遥望，城内已多处出现火光，接着，爆炸声接连不断。几枚炸弹落在兵营内爆炸，掀翻了贝都印式帐篷。从梦中惊醒的人们意识到这是美国再次发动了对利比亚的袭击。

F—111 飞机上的雷达红外线搜索瞄准器也开始工作。武器吊舱的激光束根据红外线与雷达瞄准器显示的图像，把目光锁定在十字光源的正中。

利比亚的防空导弹已发现目标，但一开机立刻就成了循电而来的反雷达导弹的绝好靶子。第一架飞机上的4枚2000磅的“石眼”激光制导炸弹立即沿激光波束向目标飞去。接着，预先选定的其余4个目标，也遭到同样的下场。

“飞机为什么不起飞？”美国情报侦听网收到利比亚总部向空军基地发出的质问。

“雷达受到强烈干扰，导弹无法发射。”导弹基地收到下面的报告。

“打，快给我打！没有雷达也给我打！”

利比亚指挥官真是无可奈何。

此时，飞机在头顶呼啸，火炮在脚下震响，曳光弹在夜空中飞舞，半个天被打成了红色。

利比亚的导弹拼命射向天空，不但无一命中目标，反被美军完全掌握了雷达的性能，被美军大功率干扰机完全压制。

在利比亚空袭行动开始时，温伯格、海军上将威廉·克罗韦、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都在五角大楼的情况室里等待着前方的最新消息。

里根总统向国会领袖报告了将要发生什么事，深夜才回到白宫楼上家庭住宅区里的书桌旁。他将袭击的情况记在日记本上：“初步报告，全部飞机撤离，但有两架F—111没有消息。可能是无线电出了毛病，也可能是被击落。此刻情况不明。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次袭击成功。”

晚上9点15分，国防部长温伯格和国务卿舒尔茨一起向白宫新闻机构简要地介绍了情况。

美国空军在空中拍摄了这次轰炸影片。影片显示了飞速运动的地区，使人真切地感受到离地200英尺，以每小时500英里速度进行夜间飞行是极其困难的。当飞行员发现了目标大型停机坪上停放的苏制大型军用运输机，摄影机迅速地对准了目标。可以清晰地看到，激光制导炸弹投掷后自动飞向目标，整个机场随着苏制运输机的爆炸而消失在一片浓烟中。

这次短暂突击，美军投掷炸弹100吨，5个选定目标全部摧毁。炸死卡扎菲一个养女，炸伤他两个儿子。然而卡扎菲却不在死亡者的名单之列，这是里根总统最为遗憾的事。里根不得不把一份“卡扎菲被炸死纯属偶然”的声明扔进了纸篓。

美国人在这次空袭中损失1架F—111型飞机，两名飞行员失踪、死亡。

美国人对自己的军事袭击效果感到满意，温伯格甚至认为，“里根总统在国内外大大地增强了自己的威信与声誉。”他自己则“对我军的杰出表现感到特别高兴。”

令人奇怪的是，面对美国人的狂喜，卡扎菲保持了少有的沉默。自然，他并未就此了结与美国的宿仇，经不住军事恫吓而向美国俯首称臣，他仍在积蓄力量以实践自己的信仰，动武毕竟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只不过新闻界以后一些传闻似乎不利于这位在利比亚被当作超人的神，传说空袭过后，他取消了许多原定的公开露面的计划，在沙漠里呆了很长时间，而且，几乎每个晚上都要睡在不同的地方。

第十九章 “蓝勺子”计划无懈可击

- 一、美国人的神经又一次紧张起来
- 二、诺列加组织大选引火烧身
- 三、美军密切注视着兵变局势的发展
- 四、切尼签署部署新部队的命令
- 五、“蓝勺子”计划
- 六、美军兴师动众虚惊一场

一、美国人的神经又一次紧张起来

美国通过“草原烈火”和“黄金峡谷”行动，狠狠地教训了卡扎菲一番，出了心中一口恶气，美国人弹冠相庆，正准备好好松口气时，另一个美国人放心不下的人物，又开始活跃起来，跟美国人叫起了劲。他就是巴拿马的铁腕人物诺列加。诺列加扬言，他要收回由美国人控制的巴拿马运河的主权。美国人的神经又一次紧张起来。

要了解巴拿马与美国在巴拿马运河上的恩恩怨怨，还得从头说起。

1903年，美国强迫刚刚取得独立的巴拿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开凿巴拿马运河的权力，并且永远租借运河区。1914年巴拿马运河建成，使大西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航程缩短了1万多公里。美国一直是运河的主要用户和受益者，每年运河总收入约3亿美元，绝大部分为美国所得，巴拿马只能得到少得可怜的零头。美国把运河两岸16.1公里范围划为运河区，设立美军南方司令部，不许巴拿马人入内，使运河区成了“国中之国”。

对于美国年复一年地从自己的领土上掠走巨额美金，巴拿马人是极不甘心的。几十年来，巴拿马人不断地为收复巴拿马运河的主权而斗争，经过长期努力，两国领导人终于在1977年于华盛顿签订了新的运河条约。新条约规定，1999年12月31日午时之后，运河完全交巴拿马管理。从1990年起，运河区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应由巴拿马人担任，副主任由美国人担任。美国的南方司令部必须同时撤离运河区。

按说新协议一签订，巴拿马收回运河主权只是时间问题了。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能作出这种让步，已是极其不易的了。可是，80年代中期，诺列加登上了巴拿马总统的宝座。上任伊始，他就宣布要收回运河主权，问题就来了。

曼纽尔·安东尼奥·诺列加将军不仅在巴拿马是响当当的“超级明星”，就是在美洲以及整个世界也是一位名闻遐迩的统治者。

诺列加确实非等闲之辈，20年前，他就是中央情报局间谍。他曾就读于秘鲁的一所军校，读书期间，校官经常发现他行踪难觅。

一天傍晚，绿茵茵的草坪上，两个青年正在窃窃私语。一个是诺列加，另一个正在倾听的，是美国的一个情报人员。诺列加此时正给美国提供军校学生中的左翼分子。二人分手时，那情报人员递给他一叠美钞。

次日，他提供的人员全被逮捕。

晚上，他通过铁窗口见到，几个同学浑身血肉模糊地躺在一片稻草上。他心中窃喜，从此，他对暴力有了极大的兴趣，施暴便成了自己的一件快事。

军校毕业后，他投奔了当时正走红的军官奥马·托里霍斯。没多久，托里霍斯就任巴拿马总统，而诺列加则踏着托里霍斯的肩膀，青云直上。

然而，诺列加并不满足这些，他看中的是总统宝座。于是，他设置圈套，让托里霍斯死于神秘的飞机失事。1983年，诺列加不失时机地成为仅次于巴里斯德总统的第二号人物，而后在第二年又抛弃了他，转而支持另一位总统候选人巴勒蒂。巴勒蒂当选了，但是当他在一年后答应调查反对党领袖斯马德福勒被谋杀的原因时，旋即被赶下了台。而诺列加则在这一系列暴力事件中不断上升，直到踏上总统宝座。

诺列加不仅是一名间谍，而且是一名双重国际间谍。

1976年4月，诺列加以工作方便为由，为美军第470情报组购置了电话

窃听设备。美军安全部门发现，所窃听的内容大部分与当时美国巴拿马关于运河地区的谈判有关。而这方面的情况，诺列加从没提供给上司。相反，谍报人员在古巴发现了有关的专题报告。

曾是里根总统安全顾问之一的诺曼·贝利说：“中央情报局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但是兰利（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所在地）的人们确认，我们从诺列加那里得到的关于古巴的情报，要比诺列加向古巴人提供的情报宝贵得多。”

诺列加和美国可以说是互相利用。

美国就像位老板，诺列加则像一位跟在美国身后的“马仔”。美国在中美洲特别是巴拿马有着自己特殊的利益，为保证巴拿马运河的特权和中美洲地区的战略地位，美国不愿看到后院起火，他们希望巴拿马的统治者是一位对美国俯首称臣、合作密切的人物，只要不触动太多的美国利益，让他搞点小偷小摸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没看见。毒品交易就是这种偷摸行为之一。

美国每年死于吸毒的人数以万计，而大部分的可卡因是通过巴拿马运河流向美国的。诺列加不但提供市场、码头作为贩毒集团偷运可卡因的中转场地，而且还提供巴拿马海关的印章，以掩饰这些毒品走私活动，甚至向毒品走私集团的枪手提供避难地点。

如此这般，诺列加当然不是白干的。他每年至少要得到 460 万美元的报酬。据毒品走私头目凯立欣供认，他单单在 1984 年为了求见诺列加，一次就付出了 400 万美元，他还亲手给诺列加一个装满了 30 万美元的手提箱。诺列加帮助偷运了 100 万磅大麻进入美国，帮助转移帐目。事后，诺列加及其两名帮手分享了 100 万美元。

对于诺列加所做的事，美国人知道的一清二楚，但却视而不见。美国人的想法是，只要不触及美国的运河利益，任凭他胡作非为。

然而，这一次不同了，诺列加积极主张收回运河。这严重触犯了美国的利益，也大大地激怒了美国人。

美国统治者认为，诺列加是个惹事生非的家伙，他领导着一个腐败透顶的军人政府。因此布什政府希望搞掉诺列加，而组织对美国比较友好的军人或文官政府。

为了迫使诺列加就范，美国所采取的行动有二条：从军事上以暴力解除他；或者选择一位亲美国的反对派政治领袖在选举中获胜。

二、诺列加组织大选引火烧身

1989年5月7日，星期天。

巴拿马城陷入一片血腥的混乱之中。

诺列加过于自信了，美国采取政治高压、经济封锁并没有使他下台。1989年5月，他搞了一次大选。他想，他和支持他的政党在大选中获胜，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说他是得到人民支持的，美国再搞动作，就是推翻民选合法政府。为此，诺列加还邀请了包括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内的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作为国际观察员。

选举主要的支持诺列加的民族解放联盟候选人杜克和公民反对派民主联盟的恩达拉之间进行。当一部分公民选票统计出来后，国际观察员说恩达拉获得75%的选票，已获胜。诺列加以大选中出现许多不正常现象为由，废除选举结果。引起美国和巴拿马反对派极大不满，许多拉美国家也对此提出批评。美洲国家组织从中斡旋，要诺列加承认失败，诺列加坚决不让步。美国立即以此为把柄，揪住不放。

反对派候选人来到巴拿马城的维斯埃斯派纳，组织了数千人的游行，他们鸣响汽车喇叭以示抗议。示威者用西班牙语高呼：“打倒菠萝”。“菠萝”是诺列加绰号，形容他那张长满粉刺的脸。

所谓的“尊严营”，即拥护诺列加的准军事组织，迅速作出了反映，他们袭击了反对派候选人。

52岁，体重240磅的反对党总统候选人吉列尔莫·恩达拉长着一张宽厚的胖男孩面孔，他被一名“尊严营”成员用铁棒击中前额。反对党第二号人物总统候选人吉利尔莫·比利·福特的保镖被打死。比利·福特则从汽车里挣扎着钻出来，沿着人行道摇摇晃晃地走，血模糊了他的双眼、并染红了他的白衬衣，当另一个人上来用管子打他的时候，福特盲目地用手遮挡。

美国电视上一再播放这组镜头，以及恩达拉躺在医院里的镜头，白发苍苍的福特被人抢走了选举得来的职务，他浑身是血，脸上的血使他看不见东西。这一形象立即成为巴拿马混乱而没有法律的直接象征。

5月10日晚，美国政客在白宫举行会议，研究巴拿马局势。

布什总统急于采取行动，解决诺列加问题，但他又指出：美国不能让诺列加在一夜之间成为一名殉道者。布什说，我们不能容忍对美国军人的骚扰升级成为像对巴拿马反对派领袖那样的人身攻击。如果电视上出现美国人挨棒打和穿着血迹斑斑的衬衣逃跑的画面，就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克劳保证，他要军队处于时刻准备战斗的最佳状态。

美国国务卿吉姆·贝克是对布什最有影响的人，此刻，他半开玩笑地说道：“如果早知道我们能以那么大的优势赢得选举，当时就不该给自己找这么个大麻烦了。”

布什说他希望能利用巴拿马正在高涨的反诺列加情绪，他还想知道是否可以用比利·福特挨打的录像带。在拉丁美洲内部组织反对诺列加的力量。

布什的如意算盘是找到某种审慎而又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方案，既能达到目的，又不致于招来指责。

当晚，布什的新闻秘书马林·莫茨沃特宣读了一份布什谴责暴力行为、措辞温和的公开声明。

在后来的 24 小时里,克劳和国防部长切尼商量着为总统提供什么样的军事建议。

克劳向切尼建议,他们可以用 2000——3000 人的兵力增援美国在巴拿马的部队,大张旗鼓地派出部队,向诺列加和巴拿马国防军施加心理压力,切尼表示同意。

克劳用保密线路与巴拿马的美军南方总部司令陆军上将小弗雷德里克·沃纳通了电话。他首先问沃纳,是否需要补充说明作战指导方针。这些方针规定,什么时候可以施加武力,以及可以使用多大程度的武力,这样他就可以使军队处于一种更加主动的状态。

沃纳否定了克劳的意见,他说,他的 1.2 万人没有发生过一次不适当地使用武力的事件,他希望交战规则像从前一样简单明了。

克劳建议派增援部队去,但沃纳说他不需要。克劳试图解释他们必须传递某些信息,沃纳认为增援部队可能带来不必要的负担。

克劳说,事态的发展非常快,因此,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沃纳也许必须接受某种军事援助。沃纳并不是不知道白宫的政治意图,但他有自己对局势的看法。他与白宫在巴拿马问题上的分歧是明显的。在这之前,他就被人认为在巴拿马问题上过于软弱而倍受攻击。

5 月 11 日,旬尼和克劳向布什提出如下建议:宣布部署军队,秘密派遣一个“三角洲”中队以及第 6“海豹”A 队的部分人员。布什同意了他们的建议。

这次活动的代号叫“猎人舞蹈家”,共派遣了 1716 名陆军官兵和 165 名海军陆战队员。

5 月 12 日,星期五。切尼正式批准实施秘密部署部队的计划,有资格了解部署特种部队详情的大多数人都被告知,部队去那里是为了执行营救人质的任务。由于诺列加以及他的“尊严营”可以对巴拿马的美国人所欲为,因此,派出部队准备执行复杂的援救任务,被认为是一个明智的预防措施。

但是,“三角洲”中队还有另一个使命。一个月前,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叫库尔特·穆斯的特工被巴拿马国防军抓获,罪名是组织秘密的无线电通信网,而这正是中央情报局搞垮诺列加的秘密行为的一部分。根据有关情报,一名手持冲锋枪的士兵在穆斯牢房门外站岗,他得到的命令是,一旦美国人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就打死穆斯。

中央情报局对穆斯事件十分关心,并希望避免重演 1984 年贝鲁特情报站站长威廉·巴克利被绑架和杀害的事件。因此,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敦促切尼让军方拟定一份营救穆斯的计划,而穆斯随时都可能被处决。

穆斯被关在诺列加指挥部对面的莫德罗监狱中,生活待遇很好。但作为诺列加手中的美国人质,他的处境十分危险。

一个名为“酸性游戏”的特别计划出笼了,一个“三角洲”小组要在 9 分钟的行动中营救出穆斯。美国人走出了冒险的第一步。

曾担任过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克劳发现,总统对情报局的被捕特工人员非常担心。布什还清楚地表示他希望军队能抓住诺列加并把他带回美国受审,到一个主权国家中抓国家元首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克劳发现没有人认真考虑这些后果。

“我猜不出总统将做什么”,参联会主席克劳在保密电话中告诉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指挥官,“但要做好准备”。

5月13日，星期六。布什登上“空中一号”飞到密西西比州，在一个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他请与他同机的记者们来到他的机舱，对他们说，他从未和巴拿马军队过下去，仅仅和诺列加及其“罪行”过不去，这是他迄今为止最为强硬的公开讲话，布什号召巴拿马人民和军队推翻诺列加，“他们应该采取一切行动，把诺列加赶下台。”

当有人问理解他的话是否要加些限制条件时，布什回答：“不，我不打算再加什么限定语。”

克劳给沃纳将军的一份秘密的私人信件，建议制定一份计划，让美军在巴拿马进行新的演习，以使用积极的姿态重申美国根据《巴拿马运河条约》享有的权力。

5月17日，沃纳回答说，他已做好准备。

克纳告诉沃纳，布什已决定批准进行演习。“但要明白你不能有什么挑衅行为，”克劳补充道。

沃纳已经习惯于执行微妙而又含蓄的巴拿马政策了。他对克劳的新指示作了如下解释：要咄咄逼人，显示出决心，在诺列加的心目中制造出对美国意图的疑虑，要强硬；同时又不能挑起导致巴拿马国防军作出武装反应的事端。这两者之间的界线似乎并不分明。

后来几天，诺列加有些退让，沃纳收到一些情报，其中有些来自翁上校的秘密渠道。这些情报反映，诺列加告诫其军队，在与美国人打交道时要非常小心谨慎，他们不能给美国人提供做出军事反应的借口。诺列加告诫说：“别惹恼美国人。”

切尼知道沃纳是一位巴拿马问题专家，但他满意南方总部对事件作出反应的态度。每当建议采取主动行动，如部署新的部队和强调美国根据条约享有的权力时，沃纳就唱反调。他的心思似乎并不是尽早解决诺列加问题。

切尼得出的结论是：沃纳已经成了当地人。对切尼来说，如果巴拿马情况紧急，美国只有两种选择：执行早已拟就的进攻巴拿马国防军的“蓝勺子”计划；或者逮捕诺列加。沃纳对这两种选择都不感兴趣。

这样，沃纳也就结束了其军旅生活。他被突然解职了。

三、美军密切注视着兵变局势的发展

美国人还策划了几次兵变，想搞垮诺列加，但失败了。

最后一次是 1989 年 3 月 16 日。巴拿马警察司令西马亚斯上校带领一批军人、警察，占领国防军司令部，发表声明，要求诺列加辞职。不久，便被忠于诺列加的部队包围。经过短促交火，叛军自知难敌，打起白旗投降。

接替沃纳的瑟曼将军不由经常为之感叹。白宫给他的指示，无论如何要配合政变部队。可这种配合往往难起作用。

望着窗外的满天星斗和灯火闪烁的巴拿马城，瑟曼将军在想：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打算同诺列加干一场，他得把美国人的家属送出巴拿马，或者把他们转移到巴拿马的美军基地。

瑟曼将军正想得入神时，他的副官进来，报告说门外有人求见。

“什么人？”瑟曼将军不耐烦地问。

“自称是巴拿马乌拉卡营营长的夫人”副官答。

瑟曼将军心头一震，职业上的敏感使他意识到有好戏了。

“叫鲍上校接待，情况直接向我汇报。”

副官“啪”一个立正，转身离去。

巴拿马乌拉卡营营长吉罗尔迪少校的夫人亲自驾车，在灯红酒绿的城市兜了几圈，见无人跟踪，便直驰运河区。

车在美军南方司令部的门口停下。巡逻的美军上前询问这位不速之客。

“我要见你们的最高指挥官。”少校夫人自我介绍后说。

10 分钟后，少校夫人坐在了情报官鲍上校的办公室里。

“夫人深夜来访，一定有什么急事。”鲍上校微笑着问。

“我想……”少校夫人瞥了一眼鲍上校旁边另一位没穿军服的中年男子，欲言又止。

“不妨事”，上校摊开手，“你丈夫是国防军总部的卫队长。这位先生同样对他很感兴趣。”

穿便装的中年男子咧嘴笑笑。少校夫人没再犹豫。

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负责安全保卫的吉罗尔迪少校预谋 10 月 2 日兵变。除了他的营外，还有首都骑兵连、第一公安连的军警参加。鉴于前三次政变流产，他比较慎重，准备时没有联络美国人。但他又需要美国人鼎力相助。于是指派夫人悄悄潜往运河区。

少校夫人讲完丈夫的用意，接着说：“我可能会来这里避难。不过，在没有看到贵军采取具体措施前，我不会给丈夫回话，也不会离开这里。兵变也许就不会成为现实。”

少校夫人燃起香烟，斜视着鲍上校。鲍上校背手踱步，抬腕看表，时间是 1989 年 10 月 1 日 22 点零 3 分。他对穿便衣的中年人说：“我立即向瑟曼将军汇报，你呢？”

“我当然去给白宫发报。”穿便衣的中年人说。

凌晨 2 点 30 分。美国国防部长切尼被电话吵醒。

“我是鲍威尔。部长先生，巴拿马有好消息。”话筒那边传来才上任一天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的声音。

鲍威尔向切尼汇报了吉罗尔迪少校同美国方面接触的情况。切尼听罢，喜出望外。真是天赐良机。前几次，因失败，一些人指责军队优柔寡断，处

理不力。这帮该死的家伙，只会嚼舌头，切尼恼火地暗骂。推翻一个政府，可不像用餐刀叉肉那样容易。切尼当即批准吉罗尔迪要求家属到美军基地避难的要求。

但对请求美军派兵封锁巴拿马城道路之事，切尼感到复杂，当时没有给予答复。他挂通了白宫的电话：“斯考克罗夫特先生，你看这事怎么办？”

斯考克罗夫特是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切尼得到满意的答复。

10月2日上午7时，美军南方司令部第一营508机械化步兵连开出阿马多基地。军事操练一个半小时，停止活动，但部队留驻原地未动。

上午9时半。白宫。布什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召开政府要员紧急会议，研究驻巴拿马运河区1.2万美军如何应付巴拿马即将发生的政变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的对策。布什总统最后决断说：“为了保卫国家利益和在巴拿马的美国公民和运河安全，军队可以见机行事，搞一些配合行动，但避免直接参战。任何直接参战的行动，必须得到我的批准。”

美军南方司令部。鲍上校向占罗迪少校夫人通报了全部情况。少校夫人驱车离开。

原定上午的政变取消，改至下午发动。晚上，吉罗尔迪少校夫人给美军打电话：“情况有些变化。下午没动手，只好明天行动。”

这样改来改去，增添了美国方面的疑虑，所谓的政变会不会是诺列加设的圈套，引诱美国落网。美国人采取了防范措施。

10月3日清晨5时，瑟曼将军给霍华德空军基地司令下达命令：取消海军陆战队军事演习，部队原地待命。霍华德空军司令放下听筒，下达命令，听着坦克引擎的发动声，抬腕看表忍不住嘀咕：“见鬼，离出发演习还有60秒。”

吉尔罗迪少校10月3日早晨动了手。

诺列加将军同往常一样，准时步入国防军司令部上班。快接近他的办公室，他身后的卫队长把他推到墙角，两名训练有素的卫兵挡着他的身体。

“将军，情况不妙，有许多持枪的陌生面孔。”卫队长告诉诺列加。

“撤。”诺列加说。

话音刚落，埋伏在办公室附近的政变部队现出身，朝诺列加拥来。他的卫兵立即开枪射击。顿时，国防军司令部枪声大作。卫兵护着诺列加边战边退，快接近大门，四周楼房窗口出现叛军。诺列加只好束手就擒。

首都骑兵连和第一公安连配合乌拉卡营，扑向国家电台。一小时后，广播中断正常节目，广播了吉罗尔迪少校、科科纳上尉、桑多瓦尔上尉签字的声明。声明说：

“诺列加和其他超过25年军龄的军官必须退休。在美洲国家组织监督下举行大选，成立临时政府，以解决谁也不能容忍的、持续2年的政治危机。”

声明广播不久，忠于诺列加的部队包围了叛军占领的国防军总部和国家电台。巴拿马精锐的“2000年营”与首都骑兵连、第一公安连激战，夺回电台。宣布哗变军人的声明不具备任何法律价值。国防军总部陷入重围，忠于诺列加的部队切断了巴拿马城与外界的联系。

就在巴拿马发生兵变的时候，美国国防部长切尼正在陪同首次访美的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参观。一位秘书人员附耳悄悄告诉他：“巴拿马军队行动了。”

切尼看着他身边高贵的客人，无可奈何地耸耸肩。他无法脱身参加白宫

召集的紧急会议。

布什总统、贝克国务卿、斯考克罗夫特顾问及助手盖特等坐在一起，分析兵变开始后的形势。

“情况怎样？”布什总统问。

斯考克罗夫特回答：“还不明朗。”

布什起身离开。10点钟，白宫南草坪举行盛大迎宾式、隆重欢迎墨西哥总统萨利纳斯。欢迎仪式用了半小时。布什陪萨利纳斯进入白宫办公室。

斯考克罗夫特当着客人向总统汇报了最新消息：“诺列加生死未卜，兵变军队占领的国家电台已被人家夺回……”

布什对斯考克罗夫特说：“我们的军队按原计划行动，但暂不参战。”

留滞在阿马多基地外的美军封锁了美洲大桥公路，阻止反击部队前进，霍德华空军基地周围被封锁，武装直升飞机在天空盘旋。美军密切注视着兵变局势。此时，时间已晚，忠于诺列加的军队早已开进城了。美国又一次优柔寡断，贻误战机。

巴拿马国防军总部，包围它的忠于诺列加的部队架起高音喇叭，向拘禁诺列加的叛军喊话。20多名叛军举着手走出来。另外一些军人对峙一阵后，陆续投降。在欢呼声中，诺列加走了出来。

“走，去电视台。我们发表讲话。”诺列加对“2000营”营长说。

连续几天，巴拿马爆发反美大游行。

四、切尼签署部署新部队的命令

由于美军贻误战机导致兵变流产，瑟曼将军也因此被召到参众两院的武装部队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作证。在分别召开的每次3小时的会议上，瑟曼实际上只回答了唯一的一个问题：我们错过了一个良机吗？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出示了当时可得到的有关政变的情报，又拿出那些在巴拿马国防军总司令部的目击者事后提供的详细资料。

瑟曼最后告诉议员们：“我打算回巴拿马去，制定一个周密的应急计划。”瑟曼知道不论是布什总统、切尼、鲍威尔还是他本人，都不能再承受一次失败或明显的失利。

于是，瑟曼去见新上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鲍威尔问：“正在制定的计划有新的高度吗？”

瑟曼保证说，“有新高度。”他比鲍威尔大6岁，两个星期前，他的职位还高于鲍威尔。但瑟曼知道军队纪律，也表现得很有礼貌，毕竟他早已习惯于服从别人的命令。

“你是否在完善你的计划？”这位参联会主席问道。“是的，”瑟曼说，“我们正在这么做。我们为此已经付出了代价，我们正在加紧干这事。一旦干完了，我会向你报告的。”回到驻地，瑟曼命令他手下的1.3万名男女军人每天着棕绿色相间的迷彩服，他还叫人搬走了司令部情报室前的饮料出售机，不让军官们聚集在那里，成为巴拿马国防军刺探注意的目标。另外，他增加了第三、四类的演习活动，每天派出150至500人的部队在巴拿马各地的舰只、直升机、坦克、两栖车辆和飞机上进行作战演练。每晚至少进行一次直升机演练。他有意使以上演习显得杂乱无章，而实际上这些训练都有实际目标，一旦开始对巴拿马国防军进攻就要摧毁这些目标。

政变流产后那个星期的一天晚上，斯廷纳中将乘坐一架C-20飞机飞抵巴拿马境内的霍华德空军基地。他和主要随员都身穿便衣，以避免巴拿马国防军的注意。

瑟曼会见了18空降军军长斯廷纳，要求他们尽最大努力推敲那项“蓝勺子”应急计划，力求做到无懈可击。

“是，长官。”斯廷纳回答道。

“你和第18军空降军必须每两个月演练一次该计划。”

“是，长官。”

10月11日，瑟曼要求增派宪兵的请求获得批准。很快，在所有敏感地区每天都保持了24小时的巡逻。瑟曼还命令直升机部队到巴拿马国防军第“2000营”的驻地高空进行训练，这个营有800人，驻在巴拿马城以东的锡马龙堡，是诺列加最精锐的最善战的部队。

鲍威尔对巴拿马国防军领导层的情况已经了如指掌。作为里根的国家安全顾问，他曾花费很多时间研究巴拿马军军官的情报档案，以寻找一个可取代诺列加的人选。然而，他得出的结论是：没有这样的人。

最上层的10名或20名军官都是追逐权力和财富的营私之徒，美国不可能支持这号家伙。在鲍威尔看来，只有哈桑上校是个正派人，此人曾任巴拿马驻以色列大使，但他在巴拿马人心目中的形象不佳，因为他曾在1988年参与中央情报局拟定几起政变计划的活动，这些计划均未付诸实施。

鲍威尔实在不想冒然从事，免得让军方直接或间接卷入到挟持另一个野

心家的丑闻中去。

他觉得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进一步扩大“蓝勺子”计划。任何针对巴拿马国防军的进攻作战都必须完全彻底，必须抓获或驱逐整个领导层，以使合法的文人政治领导人能够接管政权。

鲍威尔给瑟曼签发了一项命令，要求南方司令部作好应付巴拿马危机的准备，在接到命令后两小时之内使部队进入指定地域。

为了对巴拿马国防军进行全面进攻，必须大幅度修改“蓝勺子”计划，瑟曼只有48小时的动员时间，而不是原来的5天。

政变后的那个星期里，鲍威尔命令凯利和谢弗在五角大楼组建了一个秘密计划小组，由凯利的作战部和谢弗的情报部成员组成。该组的任务是与瑟曼和斯廷纳及其下属紧密合作，确保互通情报和协调工作。

通常，作战与情报部门是公开工作的。而这一次，鲍威尔让它们互相协作。闪电似进攻能否成功，关键是看作战部队能否尽可能详尽地了解进攻对象的情况，并知道进攻的方法，包括哪个班从哪个楼的哪个门进等。计划小组人员的任务是确保每一份有关进攻目标的文件（包括情报、地图、图表和照片以及奉命打击该目标的美国部队的的所有详情）都是最新的，并让所有有关人员了解这些情况。拟定进攻的目标有20多个。

10月14日是星期六，卡尔·斯廷纳到田纳西州诺屯斯维尔的一个教堂参加女儿的婚礼。宴席内，他被叫出去接五角大楼打来的电话。电话命令他次日清晨飞往华盛顿，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汇报“蓝勺子”计划的修改情况。

斯廷纳告诉鲍威尔，他又对“蓝勺子”计划作了充分修改。首先，常规部队和特种部队将由他统一指挥。包围国防军总部、第“2000营”和莫德罗监狱等。

斯廷纳设想，如果他能在开战前48小时得到通知，他将向辖有1.3万人的驻巴美军南方总司令增派1.1万人的兵力。他认为必须进行倾巢出动式的进攻，同时攻击计划人员标出的所有目标，这样才能减少伤亡，打击所有巴军并确保瓦解巴军的领导层。巴军不会有多少人积极抵抗，他计划使用心理战部队，恐吓巴军官兵，迫使巴军投降。

该计划定于夜间实施。斯廷纳说，瑟曼指示他和部队不断演练，使巴拿马人对地面和空中演习习以为常，从而放松警惕。

鲍威尔问：如果发生另一起政变而总统决定支援，情况将会怎样？他必须能向国防部长和总统报告军队有能力并有计划接管被政变领导人驱逐的诺列加，或干脆将其劫持。

斯廷纳回答说，5月份在“猎人舞蹈家”行动中部署完毕的部队可在接到命令后迅速出击，另有一部分驻扎在巴拿马的特种作战人员可供总统使用，但他强调现有驻巴拿马的部队不足以完成所有任务。他对鲍威尔说，我们建议是全面实施“蓝勺子”计划。

鲍威尔同意了。

10月16日上午10点，鲍威尔把勒克将军叫到他的办公室，让他作了两次30分钟的演练汇报。5个小时后，鲍威尔和勒克来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同切尼向布什总统汇报两次绝密的特别作战计划。

汇报一开始，切尼说他希望总统知道部队在接到总统命令后9个小时内就可以开进巴拿马：4小时用于集结，5小时飞抵巴拿马。

第一项特种作战紧急计划的代号是“加贝尔·阿德尔”。勒克简要汇报了如何将他的300人部队迅速送往巴拿马或世界任何地方，去执行援救美国或者其他国家人质的任务。他这支部队还可以用于劫持贩毒要犯或诺列加本人。这支部队的专长是强行进入目标区，如某一敌对国家或某一守卫坚固的扣押人质的建筑物。他详细介绍了这支部队的组成情况。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中，勒克汇报了营救穆斯逃离莫德罗监狱的“酸性游戏”行动计划。

勒克详细描述了“三角洲”部队发动同步攻击的细节，精确到每一分钟，甚至每一秒钟的行动，如他们如何打昏卫兵，突入穆斯的牢房，或许他们根本不用杀死卫兵。穆斯将在9分钟内获得自由，并要安全登上一架直升机。

切尼并非在建议实施“酸性游戏”计划，这次汇报只是为了说明军方具有的能力，并表示五角大楼已对总统和中央情报局的要求作出了反应。

就在白宫和五角大楼密谋着的时候，春天被派往巴拿马的一部分特种作战部队返回了美国。这样，瑟曼需要更多的特种部队。如果要求他抓获诺列加或营救穆斯，或营救别的人质，而时间又很紧迫，那么他就需要大批已经在巴拿马的部队，而不是在布雷格堡等待派遣的部队。

10月20日，根据瑟曼的请求，鲍威尔批准在巴拿马秘密部署一支由勒克将军指挥的特种作战部队。鲍威尔把部署命令转给切尼，因为在全球任何新的地点部署新的部队，都要经过切尼批准。

部署这支部队的名义是，为了进行更多的第三、四类演习而实施正常的、审慎的准备；对紧张局势的加剧作出反应，加强应付紧急情况的能力。此外，新部署的部队和驻巴部队的演习也是极好的临战演练。

瑟曼的前任沃纳并不想要更多的兵力，切尼对瑟曼和沃纳两人之间的差别大为惊异。

但切尼很痛快地签署了部署新部队的命令，这次部署行动的代号是“时髦包装”，部队由以下部分组成：1个“三角洲”中队，16架“银色子弹”直升机，3名“罗宾·夸特”信号情报侦听员，再加上勒克及其专家班子。该部署与勒克的那项营救穆斯并劫持诺列加的“加贝尔·阿德尔”计划只有一点显著区别，即没使用第6“海豹”小队的部队。

瑟曼为得到更多的部队而感到欣慰。

五、“蓝勺子”计划

陆军参谋长沃诺亲自参与了制定出兵巴拿马的行动计划。10月27日，他把斯廷纳和勒克手下的两位将军召到华盛顿，就“蓝勺子”计划的修改问题进行了一次详细而秘密的交谈。听完两位将军的汇报，沃诺说，“这个计划真他妈的复杂到家了。”根据计划，行动一开始，就要有350架飞机和直升机进入巴拿马上空。沃诺要求斯廷纳和勒克密切协作，要求“必须根据计划尽力进行演习。”

斯廷纳表示他将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巴拿马行动的筹划和演练。

在如此狭小的空域实施夜间密集飞行，必须给每一位驾驶员、副驾驶员以及其他机组人员配备高度灵敏的夜视仪，使他们能像白天一样飞行。为了支援头戴夜视仪的飞行员，将出动配有巨大红外探照灯的AC—130武装运输机。这种飞机可在高空盘旋，噪音极低，每架能照亮几个足球场大小的区域。10月30日，星期一，瑟曼签署了一份有四分之一英寸厚的文件，即“南方总部司令官1——90号作战命令”（即“蓝勺子”计划）。该计划是根据以下三条原则制定的：最大的突然性，最小的不必要破坏（即对非军事目标的破坏）和尽可能小的兵力。

星期三下午2点，凯利将军带着作战参谋来到鲍威尔的办公室，详细汇报了“蓝勺子”计划。此时，鲍威尔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刚好满30天。

星期五。瑟曼、斯廷纳和勒克在秘密会议室向各总部（司令部）司令汇报“蓝勺子”计划，解释如何令一支1.1万人的轻型师快速开进巴拿马并有助于消灭诺列加及其国防军。勒克说，鉴于营救库尔特·穆斯的“机敏的开局”特别行动计划不再单独进行，因此，他将把它并入“蓝勺子”行动。如果实施“蓝勺子”计划，穆斯就有生命危险；因此，营救行动必须在进攻行动发起之时完成。

同一天，美国司法部发给斯考克罗夫特一份长达28页的备忘录。该备忘录的内容远远超出了早先的裁决，即联邦调查局可在国外执行逮捕任务。

备忘录指出：禁止在美国使用军队实施逮捕令的波西·柯来台特法案不适用于海外。这样，就可以使用军队去国外逮捕毒品走私犯和逃犯了。

备忘录指出：这种解释对于执行某些刑事法律和避免总统在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力时受到限制是必要的。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总统发出一项情报工作指示，授权中央情报局可花费300万美元进行招募巴拿马军官和流亡分子推翻诺列加的秘密活动。实际上，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已经较上劲了，看谁能率先搞掉诺列加，了却布什的一桩心事。

在这期间，鲍威尔带着他的作战参谋向切尼汇报“蓝勺子”计划。

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位于巴拿马西南25英里的里约哈托军事基地，诺列加请古巴顾问训练出来的精锐部队就驻扎在这里，就是这支部队平定了10月间的那次政变。该计划要求空军出动最新式的F—117A隐型战斗轰炸机，在这个基地附近投掷每枚重达2000磅的炸弹，吓懵这个基地的驻军。这种飞机每架造价1.4亿美元，是一种美国秘密研制多年的最新式隐形战斗轰炸机。外界最早知道这种飞机是在1988年，而此时它已秘密试飞了8年。这种飞机的最大本领是对雷达具有隐身功能，而它之所以具有这种得益于它那奇特的外型设计和外表的吸波涂层。由于采用了这两种技术F—117

在雷达屏幕上显示的信号和一只小鸟在雷达屏幕上显示的信号相差无几，因此用肉眼从雷达屏幕上根本发现不了的，除了隐形本领外，F——117 的攻击能力也非常强，可携带多枚激光制导炸弹。

“好呀，伙计们，”切尼嗤笑着说：“隐形飞机，你们想使用隐形飞机吗？”他对人们对 1983 年格林纳达行动的批评记忆犹新。在那次行动中，各军兵种都想露一手。在“蓝勺子”行动中，如果空军拿出它的法宝——隐形飞机，它起的作用就会越大。切尼厉声问道：“为什么非要使用隐形飞机呢？上一次我已调查过，巴拿马的防空能力并不强嘛。”

鲍威尔和斯廷纳解释说，这是所廷纳的要求，因为 F——117A 具有最佳、最准确的夜间轰炸能力，命中率几乎是 100%。

F——117A 还将用于轰炸诺列加在巴拿马城东的一处别墅。

切尼对这一问题穷追不舍。他又问道：如果批准这项轰炸计划，他们是否能搞清诺列加到底在哪里？如果他在城西，是否就不必轰炸城东的目标了。

后来，城东的目标被取消了。

瑟曼和斯廷纳还想在巴拿马预先部署更多的部队。上次的流产政变表明：仅靠现有兵力美军无法以强大火力攻击诺列加的总司令部，也无法阻止诺列加第“2000 营”的部队从 10 英里外的西马龙堡支援诺列加的总司令并救出诺列加。11 月初，斯廷纳要求增派兵力。

瑟曼和鲍威尔满足了斯廷纳的要求。11 月 7 日，切尼签署了部署命令，代号为“动人的宴会”。

六、美军兴师动众虚惊一场

11月20日前后的一星期，斯廷纳带了几个助手飞往巴拿马，检查训练和演习情况。这一次他们又是身着便衣，夜间飞抵。

斯廷纳要求每一位美军指挥官详细汇报情况。汇报自上一次检查后每天都做了些什么，不许讲空话、套话。他耐心地听着，讲得再细他也毫不厌烦地听。对“蓝勺子”计划的关键部分——夜间飞行作战，他表示了不满。

由于想回布雷枚堡参加感恩节晚宴，斯廷纳没带军服。然而就在他抵巴后不久，美国使馆报告说有一人跑进使馆，声称一个叫麦德林的集团正试图将10辆炸弹车安放在或派人炸掉美国的设施，袭击目标包括军官、士兵及军人家属。这个集团对美国支持哥伦比亚反毒品极为不满。

瑟曼得知了这一情况，尽管很难证实其可信性但他立即给斯廷纳打电话。瑟曼说，“看来我们得马上准备行动。”

斯廷纳说，“是，长官。”

瑟曼接着说，“那么，我的朋友，请你立正。”意思是说，斯廷纳的联合特遣部队现在正式组成。斯廷纳作为统辖所有参战部队的战区司令官的使命开始了。一旦巴拿马情况有变，华盛顿命令作出军事反应，他就将下令立刻行动。

“是，长官。”斯廷纳答道。

瑟曼说：“你有权处理任何情况。只要有一个美国人被害。我们就找诺列加算帐。诺列加先生马上就要完蛋了。”

“是，长官。”斯廷纳又答道。

接着，瑟曼给鲍威尔发出一份电报，告诉他联合特遣部队已紧急组成。

鲍威尔对此很不高兴，因为联合特遣部队正式组成应当中切尼和他本人决定。瑟曼只能指挥驻巴拿马美军和南方总部的其他部队，无权指挥其他部队。他也无权单独命令斯廷纳，斯廷纳归美军部队司令部领导。

鲍威尔用保密机给瑟曼打了一个电话。他不无讽刺地说：“你想得真周到，为什么不干脆等下次再请示呢？我该作出什么决定呢？”

瑟曼认为，面对麦德林集团的破坏计划，组成联合特遣部队是万不得已的事情。他争辩说，上次政变失败，新闻界一致批评，7周前国会也提出严厉指责，如果发生爆炸事件，很难交待。

鲍威尔向切尼作了汇报。切尼对汽车炸弹很重视，担心重演贝鲁特悲剧，导致数个人或数百人死亡。要知道在巴拿马驻有1.3万人的部队，这可不是儿戏。他决定支持瑟曼，他说联合特遣部队可以继续工作。

瑟曼令美国部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对任何恐怖行动严加防范。所有基地实际上都进行了封锁。对所有进出人员和物品都要进行他所说的“相当令人讨厌的检查。”

他还请求给他派来全军几乎所有的经过炸弹检查训练的军犬队。这项请求基本上得到了满足，大部分军犬队都被派到他这里来了。另外还派来了一些刑侦和人身安全专家。这些安全措施是切尼在那一周批准的，行动代号是“极税”。

斯廷纳统管安全工作。“别废话！”他说，要设法满足瑟曼的军犬要求，“不一定非得是受过训练的军犬，什么样的军犬都行。”他检查了所有的通信频道，建立了更多的情报收集点，并加强了夜间演练。

在戈尔加斯美陆军医院里，美军人员对车辆进行严格检查。诺列加的“尊严营”提出抗议，说美军这样做妨碍了人们正常上班。发生了一起骚乱，但没有发生枪击事件。事后，美军不得不派部队撵走这些人。

与此同时，鲍威尔等人一开始怀疑那个到使馆报告汽车炸弹问题的人。鲍威尔觉得这可能是个骗局。整整一个星期，那家伙每天晚上都来使馆，还说他是麦德林集团的核心人物。

鲍威尔认为如果真是这样，麦德林集团不会让他在夜间如此自由地行动。这里有诈。美军整个情报系统都用上了，却看不出那人所说的丝毫危险迹象。

又对那人做了一次测谎检查，这一次他没能通过。所有测谎专家一致认为那个人撒了谎，要么那人有意编造一些东西，来恐吓或迷惑美国。

11月底，在同鲍威尔协商后，瑟曼解散了联合特遣部队，并召回了斯廷纳。

各部队根据“蓝勺子”计划进行的演练都进展顺利，瑟曼决定11月间举行一次联合演习，这实际上是整个行动计划的一次全面演练特种作战部队，驻巴拿马部队和其他一些部队将在巴拿马实地演习，但多数增援部队将在美国本土参加演习。

此外，夜间战备演习按规定的時間间隔正常进行，瑟曼认为这样做可以在发生冲突时隐蔽大部分调动。

营救穆斯的“机敏的开局”行动计划也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孤立的营地进行演练。为了进行演练，那里修建了一个相当于莫德罗监狱四分之三大小的模型。

第二十章 把诺列加抓到美国受审

- 一、“枪击美军”事件点燃战争导火索
- 二、“蓝勺子”更名“正义事业”
- 三、五路大军兵临巴拿马
- 四、悬赏 100 万美元捉拿诺列加
- 五、在美国受审的外国最高领导人

一、“枪击美军”事件点燃战争导火索

12月16日晚，凯利中将正在家中。

9点25分，电话铃响了。这是南方司令部作战处长威廉·赫佐格准将从巴拿马城打来的电话，他的声音有些激动。

“我们的一个人刚才遭到枪击”，赫佐格说：“他可能死了。”

凯利想了解更多的情况。

赫佐格说：“那是一个下了班的海军陆战队中尉。我们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正在继续了解这件事。”

“好吧。”凯利说，他挂断电话，又开始拨号码。

鲍威尔正在第6区家中的2楼上，这里有一个书房、一个电视室和一个小餐厅，鲍威尔一家多数时间都在这儿度过。宽敞、整洁的一楼则用于会客。所有的迹象表明，这里是一个天下太平的周末。阿尔玛·鲍威尔正在看书。这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私人电话响了。

“我是鲍威尔将军，”鲍威尔说。

凯利报告了巴拿马枪击事件。

“狗娘养的”，鲍威尔说。他叫凯利报告事态的发展情况。

不久，鲍威尔得到报告说，那个海军陆战队员伤势严重，接着又得到确切报告说，他已经死在医院里了。他名叫罗伯特·帕兹。

鲍威尔在家打电话给切尼：“开始出事了。”

凯利来到他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他那负责当前形势的副手，严肃认真的乔·洛佩斯海军少将也来了。他们同联合参谋部的几名专家成立了一个危机行动小组，并在国家军事指挥中心立即开始工作。

枪击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帕兹是4个下了班的军官之一。他们没带武器，身穿便服，去巴拿马城吃晚饭，显然是迷了党，他们拐入了巴拿马国防军总部附近那条叫做一号大道的街上。他们的汽车被国防军的路障所阻。国防军的士兵想把他们从车里拖出来，并把武器对准他们。因此，司机企图加速离开路障。国防军士兵开了火。一名军官的脚跌踝被子弹擦破了皮。帕兹受了伤，后来死在戈尔加斯陆军医院。

凯利一直在亲自检查美国人在巴拿马受污辱或骚扰的所有主要事件。但他找不到确切的证据，证明诺列加或国防军高级军官在加紧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在此之前，还没有美国军人被国防军杀害。

凯利看完报告后，觉得帕兹事件不是一次国防军不问青红皂白进行袭击的简单事件，因为汽车加速驶离合法路障，可能使人产生误解。

这天晚上，瑟曼将军抵达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计划对五角大楼、国务院和国会进行为期两天的闪电式造访。瑟曼在每次首都之行中，都喜欢拿出一张纸，列出他作为南方总司令部司令所负责的区域，作一番解释。各地区按字母顺序排列，从阿根廷、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排到乌拉圭、委内瑞拉。在末尾，他总是不好意思地加上华盛顿特区，说这是他负责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地区。

瑟曼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去城里他兄弟家，吃了晚饭，上床休息。晚上11点，他被叫醒，并被告知枪击事件。他直奔五角大楼，在那里向巴拿马打电话，与赫佐格通话。现在的情报表明，诺列加正亲自负责处理枪击事件。

“我一离开那个该死的地方，总要出点事。”瑟曼心想。他知道，事情

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我该回去了。”说完，他便调动他的飞机。12月17日凌晨1点，他踏上了回巴拿马的5小时航程。

到早晨6点，更多的报告从巴拿马送到国家军事指挥中心。另一件与此相关的事也发生在同一个国防军检查站。亚当·柯蒂斯海军上尉和他妻子邦尼在枪击事件发生前半小时也被拦住，等候检查身份。在等候检查时，他们目击了那次枪击事件。他俩被蒙上眼睛带到附近一个国防军办公室，后又带到另一座楼里。事后证明那是国防军总部所在地。一个国防军高级军官负责监督对柯蒂斯夫妇的审问。

4小时后，柯蒂斯夫妇突然获释。晚上2点15分左右，他们回到美国海军基地，报告了所发生的一切。海军调查处正在向这对夫妇作深入的调查。

“凯利想知道巴拿马国防军是否正在走向崩溃。巴拿马形势已到了摇摇欲坠的时刻了吗？过去，诺列加是小心翼翼地避免同美国直接对抗，因为那会有国防军高级官员卷入和违纪之嫌。这次事件不是由于某个士兵或军官失控，而是由于政权失控。诺列加失去了对军队的统治吗？国防军正在背叛他吗？”

柯蒂斯夫妇受拘留和折磨一事已详细上报鲍威尔和切尼。切尼打算于星期天上午10点在五角大楼他的办公室开个会，商讨对策。他打电话给斯考克罗夫特说，他必须在当天和总统见面。

瑟曼在早晨6点左右回到巴拿马，去他的司令部评估形势。

星期三早晨8点30分，鲍威尔前往五角大楼，同凯利和危机行动小组开会。凯利报告说，诺列加果然在仓促处理这件事。诺列加发表了一份公告，把枪击事件的责任归咎于4名美国军官，说这几个人坐在车里冲进国防军检查站，向诺列加的总部开枪，打伤3个巴拿马人，包括一名士兵和一个1岁的小女孩。

和帕兹在一起的3名军官都受到彻底的调查。“诺列加的公告是胡说八道！”凯利说，美国情报侦听部门发现，诺列加本人在电话和无线电中编造事实，把责任转嫁到美国人身上。

鲍威尔同瑟曼通了保密电话。瑟曼已命令他的1.3万名官兵处于“三级戒备”（即二级最高战备）状态，严格限制全体官兵及其家属的活动。瑟曼说，诺列加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提醒鲍威尔，就在两天前，诺列加操纵的议会已任命他为“全国解放最高领袖”，并宣布巴拿马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瑟曼说，国防军里的那些暴徒满耳听的都是诺列加的花言巧语，准备为诺列加献出一切。

瑟曼认为有三种方案：第一，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只表示抗议；第二，部分执行“蓝勺子”计划，对国防军发起进攻，并逮捕诺列加；第三，全面执行“蓝勺子”计划。

“如果不采取行动，我们将付出可怕的代价。”瑟曼说“因为这样只会增加他在那些狐朋狗党心目中的地位。帕兹被蓄意谋杀一事得有个交待。”

瑟曼认为逮捕诺列加要冒风险，因而否决了第2方案。他们正在跟踪诺列加，知道他80%的行踪。但是，万一美军逮捕他失败，而他仍然拥有国防军，那么在巴拿马的美国人就都没有安全可言了。

瑟曼建议采取第三方案，一举打垮国防军，一干到底。南方司令部已作好了这一切准备。

大约10分钟后，鲍威尔说：“好，先按你说的办……我要向切尼报告一

下情况，”鲍威尔显然持保留意见，“回头我再找你。”

鲍威尔上楼来到切尼的办公室，两人单独在此会面。

巴拿马国防军对美国人的所作所为大有文章。鲍威尔说：“国防军并非一时糊涂。”他说：“蓝勺子”是个很好的计划。他们演练了全部内容，准备得再充分不过了。

切尼点点头，毫无勉强之意，给鲍威尔的印象是：他们俩想法一致。

鲍威尔说：采取这样的行动（包括任何军事行动），重要的是按他们自己的时间表进行，他赞成全面执行“蓝勺子”计划。

随即，切尼、鲍威尔，助理国防部长亨利·罗恩等又碰头，商量对策。最后，切尼让国防部发言人皮特·威廉斯起草一份声明，准备说明帕兹和柯蒂斯夫妇的遭遇，声明发表之前交他过目。

二、“蓝勺子”更名“正义事业”！

鲍威尔和凯利带着标有巴拿马空袭地点的大挂图钻进小车，直驰白宫。

白宫二楼，布什在两点钟和大家见面。鲍威尔注意到，没有到场的关键人物只有副总统奎尔和白宫办公厅主任苏努努。一般在没有事先了解各位决策人物的态度之前，鲍威尔是不会参加这种会的。但事情来得突然，他根本来不及了解别人的想法。

凯利用7分钟时间简要说明了帕兹中尉之死和柯蒂斯夫妇遭虐待一事。他说，后一件事是在一个国防军高级军官监督下发生的。凯利感到，布什和其他的人对此比帕兹被杀更感到忧虑。凯利赞成出兵行动，他抓住这两件事不放，尽量说得越严重越好。

鲍威尔只把一种选择摆在总统面前：“蓝勺子”计划。

布什问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只搞掉诺列加呢？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能少派一点军队。”

鲍威尔滔滔不绝地讲起摧毁国防军的必要。他也提醒说，美国人将要流血，但派少量部队流血可能更多，只好给国防军当头一击以制服它。

鲍威尔说，要完成“蓝勺子”计划的兵力准备和集结以及空中运输工作，起码需要提前48小时下达通知。理想的进攻时间是凌晨1点；这是以使国防军感到意外；同时离天亮还有5个小时，又可以促使投降。还有，1点钟正是海水开始涨潮的时候，对海军的“海豹”突击队很有利。另一个有利条件是，1点钟以后，仅有一架民航飞机在托里霍斯国际机场着陆，这个机场是一个关键目标。

“蓝勺子”计划将彻底制服国防军和巴拿马政府。“我们要控制这个国家几个星期”，鲍威尔强调指出，“这个计划不是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也不是简单的进去又出来。总统先生，会有不测之事发生，会有人员伤亡；有我们的人，也有他们的人，有军人，也有平民。我们将尽量使伤亡减少到最低限度。”

鲍威尔说他保证迅速取得胜利，但不知道具体要用多长时间。

“不能要求我们两天内就回家，总统先生。”鲍威尔说：“也许国防军在我们刚刚到那里时就投降，打出欢迎美国兵的标语，也许会鏖战几个星期。”

布什仔细推敲着，对“蓝勺子”计划提出了种种疑问，其中有些问题相当具体，比如，从一条公路到另一条公路需要多长时间，等等。

鲍威尔担心会议会像海湾里转来转去的帆船一样漂浮不定，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在回答完所有问题之后，他最后说：“我的建议是，我们按整个计划行动。我可以告诉大家，参联会成员都完全同意我的意见。”

鲍威尔说完之后，切尼发了言：“我支持鲍威尔主席刚才提出的建议。我认为我们应该干。”贝克说：“大家知道，国务院一直想这么做，但是必须考虑下列问题。”

于是，国务卿开始历数世界各国对此可能产生的反应。总的看来，贝克认为没有什么国家会真正持批评态度，他预计大部分国家将私下通过幕后渠道表示中立甚至赞成。

贝克说，国务院将把情况通报给其他国家——盟国和苏联。当然，总统也要打许多电话。

斯考克罗夫特再次加入了争论。在鲍威尔看来，他是想迎合布什的观点。

“到底会有多少伤亡？”斯考克罗夫特又一次问道，并提高了嗓门。

鲍威尔说，这些数字无法估算。

“那么损失程度呢？”

鲍威尔觉得这也很难说，虽然部队去那里不是为了胡乱扫射一通，但因派去的军队很多，造成的损失当然也会很大。28 个计划突袭的地点都有原因：有的是国防军集结的地区；有的可能是诺列加的巢穴；有的是要害权力部门，还有梅登大坝，它控制着巴拿马运河的大部分水量，必须加以保护。如果梅登大坝受损，可能会导致运河一年停用。中央情报局的库尔特·穆斯也要营救出来，为此，“愤怒策略”营救计划也被纳入“蓝勺子”计划中。

“能抓到诺列加吗？”

“精良的特种部队人员将追踪他的蛛丝马迹。”

斯考克罗夫特问：“总统说在巴拿马要达到的目的之一是实现民主，能做到这一点吗？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美国计划让在巴拿马 5 月大选中获胜的恩达拉在出兵前秘密宣誓就任总统。

不久，他搁下“蓝勺子”计划这个话题，开始讨论事情的后果。这时，鲍威尔终于看到，布什看来会批准该计划。帆船结束了漂流，向着目的地驶去。

有人问到公众和新闻界对此的反应。

一直沉默不语的马林·菲茨沃特说：“两者的反应总的来说都将是积极的。当然，也可能会受到新闻界的批评。”他告诉布什。但他本人认为那不是主要的问题。

会议进行了 1 小时 40 分钟后，布什概括了对诺列加的看法：“这家伙不会罢手，事情只会越来越糟。”

“好，那我们就干吧。”布什说。他看着鲍威尔，非常冷静他说，“我们这就干！”

“是，先生。”

凯利觉得这对他的意志是一次考验，这是他当作战部长两年以来的第一次。他们将派常驻的美国士兵去作战，其中有些人将要阵亡。

因为“蓝勺子”计划要求至少提前 48 小时下达。进攻时间便是在 12 月 20 日，星期三，凌晨 1 点。

有人问：为确保不会泄密，哪些人可以知道这些决定？布什指出，极少数对该行动的成功实施起关键作用的人可以知道。他明确他们的意见是极少数人。

鲍威尔和凯利坐车回五角大楼。“我想让你把情况传达下去”，鲍威尔说，只通知指挥作战的关键人物，“我不想发布命令，希望你在保密电话中通知他们。”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鲍勃·赫雷斯将军和联合参谋部主任迈克·卡恩斯中将可以在第二天得到通知。

鲍威尔和凯利都在考虑这个秘密究竟能保守多长时间回到五角大楼后，鲍威尔给四位总部司令打电话，他们都是马上要参与此事的。

鲍威尔又打电话给每个参谋长，通知他们布什批准了计划。他向沃诺道歉，说下午没能参加他的圣诞聚会。切尼也没有去参加。

那天晚上，鲍威尔的最后一件事是，确定主要特种作战部队的调遣工作。

代号“时髦包裹”的“三角洲”飞行中队和代号“银色子弹”的直升机部队将留在国内，以对付世界各地可能发生的紧急恐怖事件。除此之外，美军许多特种作战部队将被送到巴拿马，数量超过 4000 人，许多人将负责追踪诺列加。如果一切顺利，那么在行动一开始就把他逮捕。

鲍威尔下令，用巨大的 C—5 运输机把 20 架特种作战侦察机和攻击直升机运到巴拿马。这些飞机将在夜里装上弹药，并隐蔽在飞机库里直到进攻开始。

凯利深知心须保证这次行动安全可靠。他回到五角大楼办公室后，召见了联合参谋部负责公共事务的军官欧文·夏普海军上校，告诉他圣诞节按计划休假。

在所有的人都离开后，凯利把负责当前行动的副手乔·洛佩斯和拉美小组的 4 名初级军官召集到他的办公室，在沙发和椅子上坐下。

“我们将执行‘蓝勺子’计划”，凯利说。他命令每个人都要绝对保密，并指出他们每走一步都要首先考虑行动计划的安凯利接到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林赛将军打来的电话。林赛说：“这次行动的名字太糟糕了，你想让你的孙子们说你在蓝勺子里吗？”他问凯利。

凯利想，这可能是比较糟糕。在对付巴拿马突发事件行动计划中，有一个计划代号为“盲目逻辑”。多年来，其它许多行动都有稀奇古怪的代号。一位将军曾执行过“绊脚石”和“利马蚕豆”行动，凯利和乔·洛佩斯斟酌着新名字，“就叫‘正义行动’，怎么样？”凯利提出。

“叫‘正义行动’如何？”洛佩斯反问道。

他们都同意这个名字好多了，他们把这个名字告诉了各总部，并得到了他们的同意。

从巴拿马来了一份传真，报告海军调查处对海军上尉柯蒂斯和他妻子邦尼调查的情况。邦尼、柯蒂斯对其遭遇的详细申述比报给布什总统，切尼和鲍威尔的情况还要严重。这份传真共两页半，于 12 月 17 日 13 时 30 分传到参谋长联席会议，上边记有柯蒂斯夫人的口述，“审讯人员说了许多下流话……”

鲍威尔回到家里。他还要打几个电话以确保每个关键人物都知道其他人要做些什么。打完电话后，他突然感到时间是自己的了，便想把大事先放一下，他们就要打仗了。他知道，也听说和读到过指挥官在临战前的心神不安。现在这种不安紧紧抓住他，再想一遍整个计划仍不能使不安减轻或消除。“蓝勺子”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计划，需要精确同密，一个失误就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像高速公路的汽车撞在一起一样。

在巴拿马的南部，两名美国士兵从戒备森严的斯廷纳的住地走出来。他们边走边谈，谈到了这次进攻发起的时间，恰巧被一名巴拿马国防军的密探窃听到了。

那位密探把这一信息逐级上报。诺列加很快就知道了。

诺列加说：“美国人不会来的，他们不会做那样的事。”他安排于第二天早上 8 点在国防军司令部召开会议，研究当前形势。

美国监听人员只听到一部分谈话内容，其中一名巴拿马国防军成员说，“球赛 1 点开始。”

斯廷纳认为这指的是进攻发起时间，因危及到整个作战行动，他给瑟曼打了直通电话。

斯纳廷说：“我们的行动时间需提前。”他的理由是，巴拿马国防军的一些人似乎已知道了情况。

“你想提前多长时间？”瑟曼问道。

“50分钟怎么样？”

“好，就这样定了。”未经批准，瑟曼就把这一信息送到了华盛顿。

但是情况很复杂。营救穆斯与国防军司令部发起进攻必须配合默契。只有把吊桥架过运河，4辆“谢里登”坦克才能开上小山，直接攻击国防军司令部。而架吊桥，必须干掉封锁运河的那艘船。

斯廷纳又给瑟曼打了一个电话。

“我不能在30分钟后再动手，”斯廷纳报告说，“15分钟怎么样？”

“15分钟也行。”瑟曼说。

午夜12点零7分，瑟曼正式把命令下达到联合参谋部作战处，命令要求在夜里12点45分攻击国防军司令部，与此同时，“海豹”突击队执行在普恩塔·派底拉机场的任务，即上岸摧毁诺列加的私人飞机，防止他乘该机逃跑。

12点29分，鲍威尔和其他人在“危机情况室”通过扬声器听到一则报道说：“在巴拿马城美军控制的阿尔布鲁克空军基地，巴拿马国防军打伤一名美国妇女。”过5分钟后，他们又听到瑟曼发来的巴国防军炮击阿莫多堡，以及攻击横跨运河的泛美大桥这一战略设施和阿尔布鲁克基地的消息。

布什总统告诉切尼和鲍威尔，一旦恩达拉同意就任巴拿马总统，并要求美国进行干涉，美国不撤回部队的目的就达到了。如果恩达拉不愿这么做，他们就不得不亲自商量。

12点39分，再次收刊瑟曼的报告，恩达拉已宣誓就任巴拿马总统。

尽管一些部队提前就位，但正式的“正义事业”行动是于12点45分开始的，行动开始前，布什来到椭圆形办公室。他在衬衣和领带外面套了一件深蓝色毛绒衫。他签署了一个简短的命令，授权武装部队逮捕诺列加及目前被美国控告与贩毒有关的其他巴拿马人。

三、五路大军兵临巴拿马

1989年12月19日午夜，在茫茫的夜色中，几架形状古怪的F—117隐形战斗轰炸机从美国本土的一个空军基地起飞了。经过数千公里的长途跋涉，20日凌晨1时，这几架飞机幽灵般地潜入巴拿马领空。

巴拿马的防空警戒雷达在不停地转动，然而对这些空中不速之客却毫无反应。

实践证明，美国人的钱没有白花。F—117闯入巴拿马领空犹入无人之境，巴拿马的雷达全都变成瞎子一般。

按预定计划，F—117机群直扑位于巴拿马城以西120公里的里奥阿托，向驻守在那里的巴拿马高炮阵地和兵营投掷了激光制导炸弹，炸弹准确命中目标。

F—117的突袭完全达到了突然性。战争的帷幕也由此被拉开。

清晨，参战的美国陆海空三军，兵分5路，同时扑向巴军各军事要地。

第一路，是由美国南方司令部的特种作战部队和一个突击队营组成的“红色特遣队”，利用“隐形”战斗轰炸机的轰炸效果，进行低空伞降，从150米高的空中跳了下来，以扇形包抄巴拿马第6、第7连的兵营。美军首先拿巴军的第6、第7连开刀，一是为了声东击西，掩护大部队偷袭巴拿马城的巴国防军司令部。二是因这两个连队十分忠于诺列加。美军很快就瓦解了第6、第7连的仓促抵抗，俘虏250人。与此同时，这路美军还占领了托里霍斯国际机场，封锁了帕科拉河大桥。

第二路，是由第6机械化营、一个轻型坦克排、第5步兵营海军“海豹”分队组成的“尖刀特遣分队”。该路美军直扑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大楼和驻扎在附近的巴军第5连。经过一番交战，美军攻占了司令部大楼，歼灭了第5连，美军原以为19日晚诺列加住在司令部大楼里，可是情报有误。美军搜遍整个大楼，也没抓到诺列加。于是就放火焚烧了整座大楼。与此同时，该路的“海豹”分队袭击了诺列加的私人小型机场，炸毁了诺列加的座机；偷袭了运河岸边守卫诺列加专用船只的卫兵，炸沉船只。这样，就切断了诺列加的空中和海上的逃路。

第三路，是由第82空降师一个旅（欠一个营）和别动队组成的“太平洋特遣队”。任务是增援帕科拉河大桥的美军别动部队，阻止巴军的“2000营”和其他巴军进城增援，经过激烈战斗，挫败了“2000营”和国际机场巴军空军飞行中队的反击计划，并把这些巴军打得溃不成军。

第四路，是由1个轻型步兵连、1个海军陆战队步兵连和部分宪兵组成的“永远忠实特遣队”。他们的任务是抢占横跨巴拿马运河的泛美公路大桥，负责保卫运河区的美军霍华德空军基地。

第五路，是由第82空降师1个营和第7步兵师的一个营组成的“大西洋特遣队”。他们在特种部队的支援下，攻打巴拿马第二大城市科隆，击败了巴军第8连和沿海警卫队，攻占了运河附近的许多重要设施，释放了10月3日政变中被捕的47名巴拿马军人。

美国各路大军兵临城下，惊恐万状的市民四处逃散。

整整一天的时间，美军的坦克、装甲车，在战斗机、大炮的掩护支援下，在巴拿马的国土上横冲直撞。成群的直升飞机超低空掠过巴拿马城，盘旋在巴拿马运河上空。巴拿马战云密布，诺列加的国防军司令部火光冲天。

正当巴拿马城激战犹酣之时，布什总统沉静地抓起了电话。

“要加拉斯！”

“找戈尔巴乔夫！”

布什总统通过电话正式向各国首脑通报了美军的行动，表明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以求得到支持。但是，只有日本、英国、加拿大等西方盟国表示支持布什这一军事行动。

同时，在华盛顿的各国记者也被经久不息的电话铃声唤醒。美方通知他们立即到白宫参加紧急记者招待会。记者们顶着鹅毛大雪，从四面八方驱车赶到白宫。坐定，还没互相打招呼，总统新闻秘书马林·菲茨沃特便出现在记者们面前。

“女士们，先生们，请看时间，现在是凌晨 30 分。”菲茨沃特用流利的英语说：“我们勇敢的军队，现在正在巴拿马运河区外浴血奋战。”

会场大哗。记者们纷纷拿起话筒，询问美国入侵巴拿马的原因。

“关于这个问题”，菲茨沃特说：“我想众所周知。布什总统下达这项采取军事行动的命令。第一，逮捕诺列加，并把他带回我国来接受审判；第二，保护在巴拿马的美国人的生命安全；第三，恢复巴拿马民主进程。当然，我们也是为了保卫运河，维护巴拿马新的运河条约。”

在这里还要提及的是，在美国参战的 2.7 万大军中，还活跃着一支“娘子军”，人数达到 711 人。在这些女中豪杰当中，最为出色的要算是第 988 宪兵连的莲达·碧利上尉。在进攻巴拿马城时，她率领 30 名宪兵一举攻克巴军的一个坚固据点，一时间在美军中传为佳话。

美国的军队中，女兵是世界各国最多的。自 1972 年以来，美国女兵的数量猛增了 3 倍。在美国武装部队中共有女兵 20 多万人，占美军总数的 10%。这些女豪杰在各个岗位上干得有声有色，毫不逊色于那些须眉大汉。

1984 年，美国海军的一个女驾驶员曾驾驶 L—130 飞机冒着枪林弹雨飞进贝鲁特机场，向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支分遣队提供了给养。

1985 年，美国在中东举行了快速反应部队模拟作战演习，参加演习的飞机维修队中有 3 个是女兵领导的。

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女兵大多从事医护、通讯和行政工作，而真正作为指挥官参加战斗的，莲达·碧利还是第一

四、悬赏 100 万美元捉拿诺列加

巴拿马的战斗仍在继续。

至 20 日下午，巴拿马的国防军基本上被美军制服，但是诺列加却自始至终未见踪影。

美国人清楚，只要诺列加这位铁腕人物不落网，巴拿马人就会随时随地在他周围聚集起来。

美国军队迅速包围了古巴和尼加拉瓜大使馆，以防诺列加逃入使馆避难。

“美国之音”则从 20 日反复广播说，凡提供能捉住诺列加的线索者，美国将悬赏 100 万美元。

诺列加在哪里？

在美国入侵 6 小时后，一队美国兵冲进了在太平洋边上的诺列加行宫，他们在那里发现，烟头尚在烟缸里燃烧，这意味着诺列加刚离开这里。可是，寻遍各处，还是找不到诺列加的踪影。

美军开始大规模搜捕诺列加，凯利中将恨恨地说：“我们正在开动所有监视监听设备，不信找不到他。”

如果抓不到诺列加进行审判，这对美国人来说，不仅是个脸面问题，而且形势也会变得严峻起来。美国就有可能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同诺列加为首的游击队进行一场越南式的丛林战之中。这是美国最感头痛的。

美军四处搜查，过往车辆一律不放过，甚至连巴拿马外交部长胡利奥·利纳雷斯的座车也不例外。这位部长驱车路过巴拿马城老区时，被美军拦住，并对车内和车内的箱子进行了搜查。2000 名巴拿马战俘领到表格，要求他们用英文填写诺列加藏身的情况。

美国的做法引起全世界的公愤。当他们搜查诺列加包围了尼加拉瓜驻巴使馆时，尼加拉瓜人民也同样采取了武力包围了美国驻尼加拉瓜使馆，作为对“我国在巴拿马的使馆受到美国军队困扰”的回击。

诺列加就是诺列加，这个曾当过 10 多年巴拿马军队情报局长的铁腕人物，虽然没有能力指挥巴军顶住美军的进攻，但是，躲避美军的追捕却自有一套办法。

在美军入侵巴拿马前几小时，诺列加伪装成普通军官，悄悄离开总部，进入古巴大使馆。他的办公室灯亮着，外人以为他还在熬夜。

古巴人保证，一旦开战，给巴拿马道义和物资支持，并同意他找一个合适的驻巴使馆暂时栖身，以便战后引渡他到第三国古巴避难。因为，现在诺列加还不能走。战斗打响了，诺列加从古巴使馆又走不了，美国人肯定会封锁古巴使馆的。

诺列加出来，便销声匿迹。

巴拿马国家电台 20 日凌晨告诉全国，巴拿马政府首脑、国防军司令正在第一线指挥抗击美国军事入侵。西班牙“国家电台”12 月 20 日早晨，向世界转播了诺列加将军最新的讲话录音。讲话仅 53 秒钟，是电话转来的。诺列加要求巴拿马人民誓死抵抗。

自 20 日神秘地消失后，诺列加先后更换了 5 个藏身处，躲过了 2.7 万美军的追捕。24 日下午，诺列加给梵蒂冈驻巴拿马大使打电话。

诺列加说：“大使先生，我是诺列加。”

“天啊！您在哪里？”梵蒂冈大使拉沃亚大吃一惊。

“一个现在不太安全的地方。”诺列加说，“我请求到贵使馆避难，能否提供方便？”

“哦……”拉沃亚大使犹豫片刻，斩钉截铁他说：“您可以随时来，我们的大门敞开着，教廷也会尽最大努力保护阁下的安全。”

不久，诺列加开着一辆私车溜进大使馆。

但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美国坦克、士兵接踵而至。瑟曼亲自约见梵蒂冈拉沃亚大使，要求交出诺列加，大使婉言拒绝。

梵蒂冈。美国外交官拜见教廷领袖，要求教廷指示巴拿马大使馆交出诺列加。教廷领袖也拒绝了。

梵蒂冈当局发言人对记者声明：“我们认为，不存在一定要交出诺列加的法律责任。那是美国人的说法。诺列加曾是一国政府和武装部队的首脑，须考虑法律、外交、人道主义和道义等方面的问题。这是我们的权力。”

12月28日，不知是谁想出了一个怪招：音乐“轰炸”诺列加。于是，侵巴的美军特种作战部队的心理战分队弄来一些高音喇叭，反复播放包括一首名叫“无处可逃”的歌曲在内的摇滚乐曲和抨击诺列加的新闻，展开攻坚战。与此同时，还纠集了几千名巴拿马反对派人士，在使馆前示威游行，呼喊反对诺列加的口号。

美军直升飞机在天空不间断的盘旋，频繁起降，发出阵阵轰鸣声。夜晚，枪声不断。一些美国兵比赛击路灯。梵蒂冈大使馆周围路灯无一幸免。巨大的探照灯和车灯扫描着使馆楼墙。

诺列加情绪低落极了。拉沃亚大使一天几次来看他，向他透露些情况。美国继续在与教廷交涉，这不是好兆头，末日即将来临。诺列加痛苦地抱着头，有时还用力拍打。

“诺列加将军，快投降吧！”

刺耳响亮的喇叭又响了。

“……你的贩毒同伙已陆续被捕。他们是前国防部2号人物、参谋长马科斯上校，奇里基军区司令德尔锡斯上校，前工商部长罗尼奥尼、财政部长戈丁……”

这时，拉沃亚崩着脸走进屋。诺列加盯着他，不由得站起来。

“将军，”大使难过地说：“我不得不通知您，我接到教廷最新指示，要求您尽快离开大使馆。”

“……”诺列加缄口无言。

拉沃亚大使解释一阵，诺列加没吭一声。拉沃亚站起身来。准备离开。

“将军，我还接到另一个指示。教皇已委派我与美国人和贵国新政府谈判，以找出交出您的最终办法。”

诺列加震动了一下，痛苦地咬住嘴唇。

拉沃亚大使又来过几次，劝诺列加。他建议诺列加体面地投降。因为教廷已经确认，诺列加既不是外交上的也不是政治上的难民，而是被指控犯有罪行的难民，显然不能去第三国，只能选择回巴拿马或美国。回巴拿马落入政敌之手，后果不堪设想。诺列加走投无路。只好确定向美军投降，这样安全些。

诺列加“自愿”投降以前，提出三个条件。即让他身着军装向美国一位军官投降；让他打电话通知亲朋好友；在他被捕前，对他向美国投降的决定

保密。

美国同意这些条件，向诺列加保证，将对他进行“公正的审判”，不对他判以死刑。

五、在美国受审的外国最高领导人

1990年元月3日下午8时44分，身穿将军服的诺列加耷拉着头，走出了大使馆。一群美军士兵立即围了上去，给诺列加带上了手铐。

诺列加被直升机运到霍德华空军基地，在那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的一位代表逮捕了他，多年追随山姆大叔的“马仔”诺列加如今成了阶下囚。

下午9点，切尼给布什打了电话。40分钟以后，布什总统轻松地走进白宫新闻发布室，宣读一份声明：

“8点44分，也是刚才。诺列加将军在巴拿马向我的军队投降。目前，巴拿马问题已基本解决。”

“诺列加将军的被捕是‘正义事业’军事行动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里程碑。美国完全遵照政治的、外文的和道德的原则使用自己的力量。……”

“我想对那些受伤的军人和牺牲了亲人的家庭特别表示我们国家的感谢。他们是为一项崇高的事业而牺牲的，他们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元月5日，鲍威尔飞到巴拿马来视察看望部队和军官们。第二天，在一个有记者在场的会议上，鲍威尔强调指出了这次行动的政治意义：“我们所完成的最为重要的使命是，我们把这个国家交给了它的人民。”

这次军事行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巴拿马事件仍然不时出现在新闻节目中，新闻界不断报道出一些以前没有公开的东西。

美国南方司令部元月中旬公布的初步死亡数字是：巴拿马军314人；巴拿马平民204人，美军23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60分钟”报道说，在冲突中，巴拿马平民死亡数字多达4000人。巴拿马和美国其他组织的调查表明，尽管南方司令部多算了巴拿马军人的死亡数字而低估了平民的死亡数，然而实际情况与这些数字出入不大。南方司令部公布的数字基本是可信的。

1992年4月9日下午3点，身穿军服、佩戴4星将军肩章的巴拿马前总统诺列加将军，面无表情地出现在迈阿密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霍弗勒宣读了陪审团的裁决，认定诺列加犯有贩毒、诈骗、洗钱等8项罪状。

这是历史上第一位在美国受审的外国最高领导人。

1988年，诺列加就被迈阿密法院起诉，他被指控犯有向美国走私毒品等12项罪名。经过历时近两年、耗资2亿美元的调查、准备，迈阿密地方法院于1991年9月5日正式开庭审讯。经过7个月的审理，听取了79名证人作证，查看了700条证据，陪审团作出了裁决。

陪审团的成员事后透露，他们是在考虑了国家的名誉之后才好不容易作出诺列加有罪的决定的。

诺列加一案的审理，先是美国检查院的证人出庭作证，出庭的46名证人中，有26人是在押毒犯。他们被事先告知，如果能作证指控诺列加，可得到减刑和其他优待。被美国判刑135年的哥伦比亚大毒枭莱德因而被转移到条件较好的监狱，美国还出钱让其家属8人到美国与其相聚。

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专门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说，美国政府同60名犯罪分子达成协议，为了让他们指在诺列加，有的给钱，有的减刑，有的办合法居留证，有的免交贩毒得来的钱。因此，这个委员会对审判的公正廉洁提出了质疑。

美国行政当局声称对诺列加的定罪裁决是打击毒贩的一个重大胜利。但

美国国内的一些法律专家就宣称，诺列加案似了未了，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法律程序上，审案过程都留下了一些颇有争议的问题：

其一，诺列加落入美国人手中的经过极不寻常。诺列加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本来十分微妙。当 1983 年诺列加成为巴拿马实权人物时，他因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关系密切，但在 80 年代后半期两者矛盾开始加剧。

诺列加被捕一事的合法性一直是人们争论的话题。一位同案被告律师迈克尔·奥凯恩曾称，诺列加将军虽不值得同情，但对他进行起诉的方式确实存在问题，对他的劫持也是违反国际法的。因此，在审讯中，诺列加的首席辩护律师鲁比诺从开庭至今一至抗辩美国法院是否有权审理此案，理由是，诺列加是在美军非法入侵巴拿马被非法抓获的“战俘”，而不是一般的“刑事犯”。但起诉人称，尽管诺是个显要被告。对他审讯则是一件“毒品案”。法官甚至裁定，辩护律师在审讯中不能提出美国起诉诺列加的“政治动机”。

其二，此间一些刑法专家认为，美国政府部门在诺列加案审讯中采用的手段已经引起了争议。据报道，美政府为了让 40 多名贩毒分子或刑事犯出庭作证，与之达成减免徒刑等交易，以便利用罪犯的口供，说明诺列加同麦德林贩毒集团合作，通过巴拿马向美国运送毒品。因此，对诺列加定罪的证据不是直接而主要是间接证据。

此外，美国政府还冻结了诺列加在国外的资产，使辩护律师缺少心要的经费从事比较充分的辩护活动。被告律师虽然引用美国反毒执法机构官员的信件，申诉诺列加曾协助美进行反毒战，却不得公开诺列加与美合作从事秘密活动的“保密文件”。凡此种种，都提出了一些引起争论的法律问题。

诺列加案从 1988 年 2 月开始提出，至今已过 5 年，尽管目前审讯已告结束，但错综复杂的案情却难以使人相信此案已就此了结。

诺列加被判处 40 年徒刑，这样等诺列加服完刑时，已是 97 岁的老人了——如果他能活到那时的话，诺列加在判决后称这是对他的“政治迫害”，表示不服判决，将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上诉。但诺列加知道，他们不会判他无罪，不会有更好的结果。

在美国迈阿密的一个小岛上，等待诺列加的是漫长的刑期。

刚进小岛，诺列加不停地谩骂：“布什，你这棍棒主义！”

这天，看守他的一个美国士兵递给他一张报纸。

原来是张《华盛顿邮报》，那上面重申布什总统的一项决定：美国军队有合法的权力在海外逮捕贩毒分子、国际恐怖分子及其他逃犯……其中包括巴拿马上将诺列加。

诺列加看完报纸，两眼直瞪瞪的，嗤嗤几下把报纸撕得粉碎，愤愤道，“真是以强凌弱！出兵动武，到他国捉拿自己认为该受审的人，这世界能安宁吗？能安宁吗？”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

被战火洗劫的巴拿马城，满目疮痍，原国防军司令部只留下一片残垣断壁。巴拿马的警察部队被美军打散，全城陷入无政府状态，社会渣滓、监狱逃犯和各种歹徒乘机大肆抢劫，巴城 70% 的商店，包括一些有名的超级市场都遭到抢劫。就连巴拿马总统府、最高检察院也未能幸免。

巴拿马人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奇耻大辱。

随着时间的流逝，巴拿马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随着运河的正常开通，无数的美钞继续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人的口袋。

但是，美国人没有想到，动武并不能一劳永逸的换取巴拿马的亲美和当地美国驻军的安宁和美国的利益。

1992年6月11日，前往巴西参加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布什在途中对巴拿马进行了访问，这是1989年12月美军入侵巴拿马以后，美国总统对巴拿马的首次访问。

当得知布什要访问的消息后，几百名巴拿马学生在6月9日封锁了巴拿马城的主要街道以抗议布什访问巴拿马。

巴拿马主要反对党民主革命党同日发表声明，反对布什来访。

6月10日，在巴拿马首都以北50公里的奇利夫雷镇，在近中午的时候，有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坐在一辆民用汽车上，向两名驻扎在巴拿马的、执行例行公事的美军士兵背部开了枪。司机被打死，同行的一名军士被击伤。

五角大楼第二天说，美国南方司令部加强了安全措施并延长了宵禁时间，因为对在该国的美国人的威胁增加了。由于这种威胁增加，美国驻巴拿马的已军民已得到了通知，外出应小心谨慎，不要到可能发生冲突的地区。

就在布什到达巴拿马前几小时，应邀出席欢迎的近千名各界人士集中在市中心波拉斯广场。而抗议布什访问的示威者则在广场边点燃了汽车轮胎，并在附近设置路障。

布什访问期间，巴拿马城军警密布，街上车辆稀少，商场停业、学校停课，呈现一片紧张气氛。尽管如此，仍有不少学生和市民在巴拿马城一些地区举行反美示威，他们设置路障，焚烧轮胎和高呼反对布什访问的口号。

在这种情况下，布什被迫中断演讲，在美国警卫人员的簇拥下，前往美国一个空军基地，他的脸色很不好看，有些恼怒，但又无可奈何。正如被他抓到美国的不甘心却又无可奈何的诺列加一样。

第二十一章 陈兵海湾铸造“沙漠盾牌”

- 一、海湾风云突变美国高层决策难定
- 二、这回可不是另一个巴拿马
- 三、布什怒气冲冲他说：“你们等着瞧吧！”
- 四、沙特同意美国兵发海湾
- 五、总统授权征召后备役部队
- 六、空军参谋长泄密被免职

一、海湾风云突变美高层决策难定

美国人如愿以偿地将不听话的诺列加送进了监狱，巴拿马的战火也在美国人满意的微笑中漫漫熄灭。然而，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和平的岁月总是那么短暂。美国人扑灭了“后院”之火，多事之地的中东又狂飚突起。一时间，世界的目光从拉丁美洲转向波斯湾。

曾几何时，荒芜的沙漠与贫穷一直陪伴着阿拉伯人，为了渴望富足，阿拉伯人编出了一个后来广为流传的神话，说有一个秘密的藏宝地，只要在它面前叫声：“芝麻，芝麻，快开门。”

宝穴的大门就会自动打开。

20世纪初，阿拉伯人的神话竟变成现实，因为在浩瀚的沙漠中，人们确实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宝藏：在幼发拉底河两岸竟然蕴藏着世界总储量一半的石油。于是，仅仅二三十年的功夫，海湾国家就从默默无闻的沙漠穷国，一跃成为世界上的富国。在世界8大储油国中，海湾地区就占了5个；在世界公认的20个特大油田中，海湾地区占了11个。这里的石油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一些世界经济大国，也左右着这些大国的经济命脉。海湾地区有什么风吹草动，全世界的经济都将受到牵连。然而，这里偏偏是一个多事之地，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使中东地区多年来战火连绵不断，什么阿以战争、黎巴嫩内战、两伊冲突……特别是为了石油这黑色的金子，昔日的阿拉伯兄弟也反目为仇，寸土必争。

1990年8月2日凌晨2时，白天大地摄氏40度的暑气稍消，190万科威特人还在沉睡之中，月明星稀，万籁俱寂。就在这死一般宁静的时刻，随着萨达姆的一声令下，以共和国卫队为主力的10万装备精良的伊拉克军队，在350辆T—72坦克的开道下，如天边的炸雷，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越过125公里长的伊科边境，长驱直入，冲向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

对于有8年实战经验、号称阿拉伯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伊拉克来说，科威特实在是太弱小了。它的国土面积只有1.8万平方公里，没有可供回旋的余地，它的军队也只有2万人，根本不是伊拉克军的对手。

仅仅用了10个小时，伊军就占领了科威特。

消息很快传遍了世界，举世震惊，同声谴责。由于时差原因，美国进入深夜，欧洲正在酣睡。美国在海湾地区已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历来对这一地区的形势极为关注，美国的侦察卫星时时刻刻盯着这里。萨达姆向科威特边境调集重兵的情况当然逃不过那些太空“火眼金睛”。但美国人的判断是伊拉克不会动武，萨达姆只是想威胁一下科威特。

8月2日凌晨，坐在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测中心的安全局局长史蒂曼被眼前的景象惊异了，卫星发回的图像清楚地表明伊拉克的军队正快速向科威特境内挺进。他赶紧打电话向有关方面报告这一情况。

凌晨3时（华盛顿当地时间1990年8月1日晚9点，华盛顿时间比科威特晚6个小时）美国国防部长切尼在家里接到海军少将欧文斯的电话。他被告知，伊拉克的部队已从两个坦克集结地越过边界，进入科威特。数百辆主战坦克正向南和向东急驰，向科威特推进。

当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接到科威特被攻陷的电话时，他已回到了马时兰郊外的家中。他十分震惊。

斯考克罗夫特返回白宫并将情况告诉了布什。布什说，他要求立即采取

一些措施。由于国家副安全顾问鲍勃·盖茨在度假，斯考克罗夫特立即在情况室通过内部电视系统召开一次副顾问委员会紧急会议，并由他主持会议。

会议起草了一份声明，斯考克罗夫特将其送布什审批。晚上 11 时 10 分，声明发表，强烈谴责伊拉克的侵略行为，并要求“立即和无条件撤出全部伊拉克部队。”

斯考克罗夫特、总统法律顾问博伊登·格雷和财政部的官员一道，制定了一个冻结伊拉克在美国的一切资产、禁止与侵略者进行任何交易的计划。由于科威特被占领已成为明显事实，又制定了冻结科威特资产的第二个计划。这样，萨达姆就无法动用科威特人在国外拥有的约 1000 亿美元资金中的任何一部分。这两个计划又都改写成紧急行政命令，由布什签发。

在副顾问委员会会议上，斯考克罗夫特强烈要求采取更多可表明美国认真对待伊拉克侵略行动的措施。

“出动地面部队行吗？”有人问斯考克罗夫特。动用地面部队，将是美国“认真”程度的终极表现。

斯考克罗夫特回答说：“不”。他要动用的是这样的部队：（1）可非常迅速机动的部队；（2）不表明直接的、可见的军事存在的部队。他提议派空军的一个 F—15 战斗机中队（约 24 架飞机）到沙特阿拉伯去，如果这个王国同意的话。

其他人——国务院的金米特、五角大楼的沃尔福威茨和杰里迈亚以及中央情报局的克尔都同意这一建议。

斯考克罗夫特决定召开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这天早晨的第一件事。五角大楼报告说，中东和西南亚战区总司令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就在城里，他知道中东所有部队的部署，他参加会议可提供很多情况。

然而，施瓦茨科普夫已经回佛罗里达州的司令部去了。约在凌晨 2 时 30 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上将打电话给在危机情况室的凯利将军，指示凯利打电话给施瓦茨科普夫，要他早上 7 时回他的办公室，因为 8 时白宫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他要出席会议。

5 点，斯考克罗夫特来到总统的卧室，请总统签署冻结伊拉克海外资产的行政命令。

上午 8 点，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在年阁会议室举行。除鲍威尔和施瓦茨科普夫以外，切尼和负责政策的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也参加了会议。金米特是代表贝克国务卿出席会议的，因为贝克正在西伯利亚会见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

中央情报局局长韦伯斯特首先作了情况介绍。他说，10 万之众的伊拉克入侵部队正在补充给养，调整部署，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向南推进，突破异常薄弱的沙特军队的防线。沙特军队不足 7 万人，形势非常严重。

接着，鲍勃·金米特概括介绍了外交方面的情况。联合国安理会几乎一整夜都在开会，已谴责了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阿拉伯联盟也在开会。不过，还没有一个国家跟随着美国冻结伊拉克和科威特的海外资产。

总统说需要考虑进一步的经济制裁措施，他已经冻结了伊、科两国的海外资产，他不无骄傲地说，萨达姆或其他人恐怕决没有料到，一贯行动迟缓的美国官僚机构竟会如此迅速地采取行动。

布什希望听到联合国进一步采取措施的确切消息。刚刚搭乘早上 6 点 30 分的班机从纽约赶来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皮克林说，联合国正在这

样做。总统和斯考克罗夫特已与詹姆斯·贝克通过话，贝克正与苏联人磋商此事。布什说，他希望美国做出巨大的外交努力。他命令尽可能地增加对伊拉克的压力，动员世界舆论反对伊拉克。

财政部长尼克拉斯·布雷迪接着介绍说，伊拉克每天可从科威特的石油产量中获得约 2000 万美元的利润。现在伊拉克已拥有世界已探明石油储量的 20%。如果萨达姆占领了沙特阿拉伯，他将拥有世界石油储量的 40%。

切尼说，石油交易很难靠经济和政治压力加以阻止。这位国防部长告诉大家，为适应当前军事形势的需要，美国空军 Kc—10 大型空中加油机已飞抵沙特。

鲍威尔补充道，一支空军的攻击机部队，即 F—15 飞行中队，已处于待命状态，一旦得到沙特的允许，便可飞往那里。

能源部长詹姆斯·沃特金斯指出，伊拉克是靠输油管道，经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将石油输出国外的。可以在这些输油管上做些文章，因为这是萨达姆的经济生命线。美国能否轰炸这些输油管？

鲍威尔说，可以。他不知道伊拉克有多少石油通过两条管道输出，或者说，他不知道空袭能使这两条管道关闭多久。不过从军事角度看，轰炸线状目标，如公路、铁路以及油管等是不可取的，因为这类目标很容易修好后重新投入使用。

接着，大家又提出全面封锁伊拉克石油出口的可能性问题，即不仅要封闭伊拉克的输油管，而且还要封锁伊拉克的炼油厂、原油集散地以及油泵站。

切尼说，这样做是不明智的，萨达姆对科威特下手的目的之一就是搅乱世界的石油供应。美国不应以轰炸世界石油供应地的办法报复萨达姆。

斯考克罗夫特担心讨论变得太漫无边际了，这很容易导致议而不决。

切尼说，伊拉克拥有百万军队，如果再占有世界石油储量的 20%，将构成巨大的威胁。不应该把保卫沙特与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混为一谈。他说他本人赞同美国执行保卫沙特的任务。

施瓦茨科普夫说，美国现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第一种方案是只实施报复性空袭。这是一种有限的、惩罚性的打击。这类打击不会持续时间很长，从破坏伊拉克军事、经济的角度来说意义也不大。

第二种方案是实施保卫沙特的 90—1002 号作战计划，即“沙漠盾牌”作战计划。还需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从各军种调集 10—20 万军事人员。要完成这一计划，沙特或其他某个国家必须允许美国在那里建立一系列基地，而从过去阿拉伯国家一再拒绝的情况看，这种可能性微小。

白宫办公厅主任仍然坚持要求采取某种经济措施。能否找到某种办法既不让伊拉克出售科威特的石油，也不让他出售自己的石油？他问道：“伊拉克石油的买主是谁？”

预算局局长理查德·达尔曼说，从历史上看，经济禁运从未奏效过。国际贸易体系不会受禁运令或关闭边境的影响。市场只受价格的影响，禁运只能使价格上涨，更加刺激人们违反禁运规定。

布什总统表示赞同。伊拉克很容易找到一个新的中间人。他说：只要有利可图，就会有人做石油买卖，“就像我那些德克萨斯的朋友们一样。”布什以前在德克萨斯做过石油生意。

达尔曼说，他认为美国的目标尚不明确，虽然施瓦茨科普夫已经提出了行动方案，但伊军已经占领了科威特，而且他也看不出有什么办法能阻止伊

拉克的石油进入市场。

“你想说什么？”布什问道。

达尔曼就石油问题回答了布什。他说：禁运必须辅以强制性的措施，也就是说必须采用海军封锁一类的军事行动，而这些行动也许是总统不愿采用的。

“然而，我们总不能仅仅因为很难采取什么行动就对发生在科威特的事情听之任之。”

鲍威尔觉得一切事情都悬而难决。他提出一个问题：“难道我们不想与沙特联系吗？”

皮克林说，这样做等于把科威特留在了另一边，即留在伊拉克人的手里。

会议就这样不了了之地结束了。

会议结束后，斯考克罗夫特与总统一起回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达尔曼和其他一些人均通过苏努努表达了他们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所造成的经济后果的担忧。斯考克罗夫特则向总统指出，刚才的会议似乎遗漏了更为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

二、这回可不是另一个马拿马

下午，在科罗拉多州的另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布什的立场已与早晨有所不同：“我们尚未确定任何方案，但我们也没有排除任何可能方案。”

两个小时之后，布什与沙特国王法赫德通了电话。在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以及中央情报局局长时，布什与中东的王室成员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中央情报局经常将他们这些人称为“友好的贵族”。布什和法赫德都知道，他俩随时可以拿起电话进行交谈。

现年69岁、富甲天下的法赫德是个谨小慎微、略亲西方的君主。布什与他谈了近半个小时，法赫德极为关心美国对萨达姆下一步行动的看法以及布什能帮助沙特做些什么。他们都认为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是不能接受的，但两人没能就下一步的行动做出安排。

在乘坐“空军一号”返回华盛顿途中，布什与约旦国王侯赛因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通了电话。当时这两位领导人正在亚历山大进行会谈。他们轮流接过话筒，以便两人都能与布什交换意见。他们俩的意见是：再给我们一些时间，尽量让阿拉伯人自己处理这一问题。

布什与斯考克罗夫特回到华盛顿便开始了早上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进行的那些没有结局的讨论。对斯考克罗夫特来说，阻力实在太大了：有人认为这件事太难办了，它发生在另一个半球；军方与政府财力不济；也有人认为事情并不那么严重。

布什与斯考克罗夫特的意见一致，认为形势极为严峻。

斯考克罗夫特说，“总统先生，我认为你不必出面，先让我来应付这件事，然后我们再看看事情会有什么发展。”

第二天，8月3日，星期五，国家安全委员会再次在白宫召开会议。斯考克罗夫特手拿讲稿，开口说道：“如果入侵和占领科威特成为既定事实，我们必须研究我国和中东的长远利益所在。实际上我们不能坐视不理，我们必须从这一点出发来考虑问题。是的，我们有些无能为力，有许多原因使我们无能为力，但是有所作为才是我们的职责。”

与会者感觉斯考克罗夫特的开场白，是请求内阁把意见统一起来，团结一致。

斯考克罗夫特讲完后，布什总统说，他和国家安全顾问的观点一致。与会者接着讨论了经济制裁，以及政府与盟国和联合国合作孤立萨达姆的种种方案。

斯考克罗夫特主张应当双管齐下。“首先美国必须愿意动用武力制止萨达姆，并且要向全世界声明这一点。其次必须推翻萨达姆。应该由中央情报局隐蔽地行动，做到无人知晓。”

布什命令中央情报局着手拟定隐蔽活动计划，推翻萨达姆政权。他要求各方全力以赴扼杀伊拉克经济，支持伊拉克国内外的反萨达姆抵抗团体，在伊拉克军界或社会其他各界寻找能取代他的领导人。

布什又说，他想让切尼、鲍威尔和施瓦茨科普夫第二天到戴维营，向他们汇报能采取的军事行动方案。

当天下午，鲍威尔召开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参联会有了新生力量，新任空军参谋长迈克尔·杜根上将和前任海军作战部长弗兰克·凯尔索上将进入参联会才一个月，陆军的沃诺和海军陆战队的格雷现在已经是老资格了。要

讨论的问题很大，这就是：作为一个国家，美国最终想要达到的结果是什么，这个问题不清楚的原因很简单：布什总统尚未宣布自己的决定。

鲍威尔说：各参谋长和各军种要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一致行动，要有统一的意见，要和施瓦茨科普夫合作；不允许有单一军种的解决方案，不能各行其是。

8月4日，国家安全会议继续在戴维营举行。中央情报局局长韦伯斯特首先把最新情况向大家作了介绍。

国防部长请鲍威尔发言，鲍威尔说施瓦茨科普夫上将会介绍早先研究的扩大后的第二套手案，即90—1002作战计划。“这个计划是切实可行的，”鲍威尔说道，“它能完成防御或击退敌人进攻的任务。”鲍威尔强调道：“如果按照这个计划，以后又决定向北进入科威特，它们是可行的，但要耗费更多的人力物力。无论如何，都需要征召一些后备役部队，才能长期保持这样一支部队。”

鲍威尔提醒与会者说，鉴于应付威胁所需兵力很大，而调动部队的距离又很远，这可不是另一个巴拿马。

“伊拉克空军同沙特空军力量对比怎样？”白宫办公厅主任苏努努问道。

施瓦茨科普夫回答道：“伊拉克共有飞机1127架，其中好的数量不多。伊拉克空军主要用于防御。”

施瓦茨科普夫所辖的中央司令部的空中司令查尔斯·霍纳中将说，沙特有60架美国提供的F—15型飞机和115架老式F—5型飞机。他说，在入侵科威特期间，沙特人曾为小小的科威特空军加油，但拒绝为其补充弹药。科威特空军只坚持了一天的战斗，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施瓦茨科普夫开始介绍情况，他说伊拉克陆军兵力虽多，但“他们并非强大无比”。他说，他们的部队编制如下：

——地面部队总数为90万人，编为63个师，但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只有8个师，即其共和国卫队。

——共有各型坦克5747辆，其中1072辆为前苏联提供的T—72型坦克。大部分T—72型坦克现在在科威特。

——约有轻型装甲车1万辆，其中仅有1600辆为先进车型。

——各型火炮3500门，其中仅330门为自行火炮，其余为牵引式。

——共有3000件可运坦克的重型运输工具。他说这个数字相当大。整个美国陆军才有500件。

“经过一个相当短的时期，我们就不必过分担心伊拉克的空军了。它的海军构不成威胁。”施瓦茨科普夫说，“从整体上看，伊拉克的实力显然在于它的规模庞大的地面部队和他们的化学武器。他们在两伊战争中使用过化学武器，1988年对自己的公民，即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反叛者也使用过。他们的弱点是指挥与控制过于集中、装备依赖外国提供零备件、缺乏远离前线进行纵深作战的经验，因为他们主要是贯于采用两伊战争中伊朗常用的攻击战术。”

施瓦茨科普夫说，需要17周才能把“90—1002作战计划”规定的全部遏制力量——陆、海、空军和陆战队，总计20万到25万人，运到那个地区。他提醒大家，作战力量或进攻能力却又有区别。他说，陆军指挥官提起理想化的攻防兵力对比，往往会说3比1，4比1，甚至5比1。展开攻势作战时，

美国将成为进攻的一方。这样，按计划美国一方将需用 7 个师的兵力，约合 15 万人。针对伊拉克的 10 万大军，这还达不到传统的比例。不过美军装备精良、战术灵活，又有制空、制海权，再加上许多其他因素，例如经济封锁和他国派兵等，倒也可以发动进攻。

施瓦茨科普夫说，就作战能力而言，要把将萨达姆赶出科威特所需的美军运到位，将需要 8 到 12 个月的时间。

施瓦茨科普夫是一位历经战火、指挥经验丰富的高级将领。作为美国“中心指挥区”负责人，需对中东、非洲和海湾地区的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并多次指挥部队进行沙漠和海外作战训练。尽管他对伊侵科的紧迫性始料不及，但在此数月前对美国会议员说过“地区性冲突将成为近期石油供应的最可能的威胁，而这一冲突的挑起者将是伊拉克”并强调“伊拉克与伊朗停火的目的在于恢复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

鲍威尔对施瓦茨科普夫所做的上述情况介绍十分赞赏。他认为，从实际角度讲，萨达姆手里有 90 万陆军，可以同美国向那个地区的地面上派遣的任何部队较量。所以，调集遏制力量和作战力量均属不易，可以说难上加难。这一点必须当面向总统讲清。鲍威尔不希望军方把事情说得易如反掌，使人产生幻想。

接着，施瓦茨科普夫又重点介绍了美军面临的局限性。陆军的后勤支援人员 60% 为后备役；美国将依赖中东国家提供燃料，战争一爆发，可能发生弹药供应不足现象。

与会者曾简短地议论进行空袭的可能性——只派空中力量，而空中力量显然是美国的优势。施瓦茨科普夫说，可以调集数百架飞机进行空袭，并且说明几天、几周内便可调集。但是国防部长切尼和鲍威尔，根本不赞成只派空中力量的打算。

切尼认为地面力量是空中力量的重要后盾。他觉得部署一支部队时，有必要对它的各个组成部分采取怀疑的眼光。美国利用防御性和进攻性空中优势，可能迅速做到需要做的事情，但谁也没有十分把握。他主张无论如何，防御和进攻部队都要包括地面作战部队。

切尼把会议的注意力又引回到地面防御的可能性上。他问道：“伊拉克有多少化学武器？美军在 8 月的酷暑天气，在沙特的沙漠中戴着防毒面具作战会是什么样子？”

施瓦茨科普夫说，可能调动的部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沙漠里的国家训练中心受过训练，在夏天那里的气候同沙特大体相同。“戴着这种装备很不舒服，”他说道，“这会降低战斗力。不过我们已经演练过多次。”

当会议又转回来讨论空袭的可能性时，切尼告诉大家：“从历史上看，空袭常常达不到期望它达到的目的。”

但是，施瓦茨科普夫对国防部长的意见不完全赞同。他说：“我不是一个空中力量决定论者，可是有四个说明空中力量会显得特别重要。第一，那是个目标多的地方，容易发现可以轰炸的目标，第二，伊拉克没有在空袭条件下作战的经验。在两伊战争的 8 年中，伊朗人没有大量空军力量可用，所以伊拉克人惯于在空中安静的条件下作战。因此空袭会使他们一片混乱，溃不成军。第三，我们有先进武器，命中精度比以前更高。第四，空袭对方后的伊拉克人会产生巨大心理影响，他们以往从未经历过这种危险。

鲍威尔说，他认为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遏制一挡住萨达姆不要进入沙特

阿拉伯。“要想遏制，就不要设置假防御，不要制造假遏制。”他说，伊拉克陆军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陆军之一，必须用地面力量对付。“要干，就真干，干好！”

三、布什怒气冲冲他说：你们等着瞧吧！

8月3日下午，沙特驻美国大使班达尔亲王来到切尼的办公室，切尼和鲍威尔已经坐在小圆会议桌旁。班达尔在一把船长椅上坐下。沃尔福威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东问题专家理查德·哈斯也参加了会议。

切尼说：“总统指示我向你介绍一下美国可以帮助贵国的自卫的措施。如果美国介入，那将是大规模的，如果美国应邀保卫沙特王国，美国将非常认真地承担责任。”切尼说，美国完全可以从一艘航空母舰上派出一架飞机，在萨达姆头上扔几颗炸弹，但那样做只会使他更加恼羞成怒，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地面部队。

切尼知道，班达尔大使刚给沙特打过电话，正准备回国向国王当面汇报情况。他要保证这位大使得到的信息清楚明确。

为了强调沙特面临的问题，切尼和鲍威尔拿出了高分辨率的卫星照片，指出最先突入科威特的3个伊拉克装甲师的位置，其中一个正守过科威特向沙特边界移动，另两个也可能随后行动。数量更多的伊拉克士兵配置在装甲部队后面，这种部署与两天前入侵科威特时的情况一模一样。排成一串的伊拉克师就像一把利剑指向沙特王国，沙特看上去的确处于严重的危险之鲍威尔用了大约10分钟概要介绍了90—1002号作战计划。他让班达尔看了一眼绝密计划的册子和显示数月内部队调动情况的图表。他说：“这是一支规模相当大的部队。”

“你们说的部队究竟有多大？”班达尔问。

鲍威尔说，战区内有10至20万。

班达尔长长舒了一口气，这声音连旁边的人都能听到。“好，这至少可以说明你们是认真的，现在你们该明白我们当初为什么不想要那个战术战斗机中队了。”

鲍威尔又强调说，这的确是认真的。

“我们也认为你们有必要持认真态度。”班达尔说，他想在会谈中掌握主动：“如果这支部队现在就部署在沙特阿拉伯，沙特王国就可以采取切断伊输油管之类的主动行动了。没有这样大规模的防御力量，陛下的手脚就放不开，因为萨达姆可以长驱直入打垮沙特阿拉伯。”他同意并赞赏这个计划，还承诺向国王和他父亲，即沙特的国防大臣，转告美国所能采取的措施。

班达尔明确他说，他和其他沙特官员曾设法与萨达姆会谈，以弄清他的意图，但未能如愿。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的10个小时中，法赫德国王一直未能与萨达姆取得联系。当他们后来终于举行会谈时，萨达姆很不耐烦他说，他的部队向沙特边界移动是在进行演习。尔后，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会见了法赫德国王，但拒绝说明萨达姆的意图。

班达尔描述了国内有节制的恐慌状态，他强调是有节制的，因为大家都相信一个君主国是不会发生真正的恐慌的。

他向切尼保证，自己一定积极促成美国立即部署兵力。

沃尔福威茨对双方的态度突然变得严肃起来感到吃惊。鉴于班达尔大使态度十分积极，他建议让美军部队，尤其是最先出动的空降部队进入戒备状态。

“他在吹牛皮”，鲍威尔说：“我认为还没到让第82空降师进入戒备状态的时候。”实际上该师的一个旅始终处于戒备状态。

切尼同意了，但他告诉鲍威尔，他想让施瓦茨科普夫把各军种的主要指挥官都带到戴维营去。他知道总统很看重个人交往，只有布什亲自见过面的人才算得起真实存在的人。所以让总统亲自见见那些即将指挥这次作战行动的人是非常重要的。

班达尔打电话向法赫德国王汇报了情况，法赫德想确切知道伊拉克的威胁是否真的存在。他们都知道，科威特之所以没有及时向美国求援，是由于科威特人怀疑美国以伊拉克的威胁为借口，趁机把自己的部队部署到科威特领土上去。

班达尔告诉法赫德，卫星照片确实说明沙特处于严重危险之中，伊拉克的威胁是千真万确的。

“你看到……亲眼看到那些卫星照片了吗？”

法赫德问。

“看到了，陛下。”

“那就让他们带上照片到我这儿来。”

鲍威尔直到切尼登机时才得知他要去沙特。心中回想一下过去几天来所发生的一切，这个参联会主席无法准确说出，总统是在何时才最终确定他要搞这种大规模军事部署的。实际上，从未有过一纸文件提到过这一决定，或列出各种选择方案，或说明可能会造成的影响。对于这一计划的目标，根本没有明确的阐述。唯一清楚的是，总统对沙特王国的命运表示深切的关心，甚至有些感情用事。

鲍威尔认为，自己做了份内的事，说明了正确行动所必要的一切——地面部队、空军、90—1002号行动计划。施瓦茨科普夫正在随切尼飞往沙特的途中，他随身带去了一份“1002”计划复制件，概述了25万陆海空军的部署计划。

这天下午，鲍威尔在观看CNN节目时，看到布什从戴维营返回华盛顿，在白宫前的草坪上下了直升机。布什走到麦克风前，对自己的外交活动发表评论——他如何同土耳其、日本、加拿大、法国、德国的领导人会谈，以及怎样同流亡科威特的艾来尔会晤。“目前的形势是，没有一个人公开表明接受伊拉克不从科威特全部撤军的方案，也没有人同意在科威特建立傀儡政权。”总统讲道。

“你打算采取军事行动吗？”一名记者问道。

“我不会同你讨论我的方案是什么，或可能是什么，但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一点我能向你保证。”很显然，布什已经有些恼火了。

“伊拉克再次撒谎，他们说过今天就开始撤出科威特，但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在撤军。”

当记者进一步追问时，布什怒气冲冲他说道：“等着瞧吧，你们会明白的！”

总统挥动着手臂，看来是越来越激动。他说道：“我们对我们要打退这种侵略的决定看得很认真……对科威特的侵略行径是不能容忍的，是无法容忍的。”

总统现在已十分明确地、确定无疑地提出了新目标，不仅要防止对沙特的进攻，保卫沙特，而且要打退对科威特的侵略。这使鲍威尔感到十分吃惊。总统从来没有同他商量过。自从前一天早上戴维营会议以来，他还从未与布什谈过话。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的当天，布什曾经说过他要扭转这一局势，但当时并没有决定。此时此地，总统终于感情冲动地亲自宣布了这一决定。

贝克也像鲍威尔一样意识到，没有讨论过向海湾派兵方案，同样，对于所派兵力的规模也没有讨论过。部署兵力是由布什决定的；而所派兵力的规模则取决于 90—1002 号作战计划。

贝克喜欢通过谈判和交易解决问题。他在通过谈判结束冷战的过程中曾大显身手；同样，他也希望不会出现用外交手段解决这场新危机的机会。

四、沙特同意美国兵发海湾

1990年8月5日下午2时30分，切尼的专机离开了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切尼的座机是一架舒适、现代化的喷气式客机，与副总统的“空军二号”机十分相似。陪同切尼出访的有施瓦茨科普夫上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鲍勃·盖茨、负责政策的副国防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皮特·成廉斯、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查尔斯·弗里曼和来自国家照片判断中心的一位中央情报局专家，这位专家携带最新、绝密的卫星照片。

飞行途中，切尼想再推敲一下自己的讲话。他分别将盖茨、沃尔福威茨和弗里曼大使请到自己的机舱，共同进行研究。这三人均强调说，切尼是逆水行舟，让沙特人邀请美国出兵还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切尼听完这些意见后表示，他必须谨慎从事。他说，既然我们不知道萨达姆是否要入侵沙特阿拉伯，那就不要说到那一步，即说入侵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说我们已有内部情报。切尼要向沙特人明确无误地说明美国能够派出多少军队和总统允诺承担的政治义务，而在透露情况上则点到为止。对科威特的入侵，已经使萨达姆对其阿拉伯邻国的觊觎之心昭然若揭。

那天晚上，切尼、盖茨、施瓦茨科普夫、沃尔福威茨和弗里曼大使被带到白宫的王室私人会议室，法赫德、6名沙特政府要员以及王室成员，包括外交大臣和国防副大臣都在场。阿卜杜拉王储则站在一边。

班达尔亲王为双方进行翻译。

切尼预料，在他们讲完话后，国王会说，非常感谢你们，我们将给你们答复。然后国王将把切尼等人送走，让他们等候沙特人的最后决定。

切尼、施瓦茨科普夫极力游说希望沙特同意美国出兵与沙特抗击伊拉克的侵略。

法赫德说，“我们同意美国的合作，并不是出于进攻他国或者要当侵略者的需要。”他补充说，“我们合作的基础是沙特阿拉伯所遭受的威胁和共同利益。”这位国王似乎自言自语地继续说道：“我们没有制造麻烦，而是别人在给我们制造麻烦。人们不仅要问，为什么萨达姆·侯赛因要组建这么多的军队？”法赫德指出，萨达姆把所有的钱都用于军备，而不是花在对人民有益的福利事业上，“没有人给他制造麻烦……这表明他是多么肤浅！他们为什么要进攻科威特这么一个小国，并压迫它？”

“这不仅仅是侵略科威特的问题，他还在谋求实现更大的企图……他自我吹嘘，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如果他真是这样自信，那他就犯了大错。我想他正是犯了这种错误。”

“我们如果同我们的美国朋友合作，也只是为了自卫。而不是为了当侵略者，这表明我们两国的关系是多么深。这本身还表明，这两个国家都关心彼此的利益和安全。”

“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侵略。全世界都问：美国会为沙特阿拉伯做什么呢？我对刚才所听到的一切感到非常高兴，为了实现那个目标，我们必须做出努力，去执行这些计划。”

法赫德说道：“我们必须这样做，科威特人曾经等待过，他们等得太久了。科威特现在已不存在。”

此后，国王又转向切尼：“部长先生，我们同意这一原则。让我们相信真主，做必须做的事。我们开始研究细节吧。”

国王补充道，“我不管别人说什么，最主要的是，必须同美国人一起来保卫我们的国家，还要从与我们友好的阿拉伯国家中请些人来。”

切尼说：“我想，这样太好了。”

法赫德说：“很好，其中有些国家过去就说过他们有准备，也愿意来。其中有些国家，像埃及和摩洛哥，对你们和我们都很友好。”

切尼说：“陛下同意我们的计划，这使我非常高兴。”

国王说：“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正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他说：“需要快干的事情必须马上干。”

切尼不禁喜出望外。

切尼说，布什总统殷切地盼望着国王的访问。他说：“这确实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

法赫德回答说：“毫无疑问，的确如此。”

切尼说，他打算立刻动身返回华盛顿，向总统汇报这次会谈的情况。施瓦茨科普夫上将同你们的官员一道工作，解决细节问题。我们将留下一个小组。

“留下一个小组，太好了。工作落实得越快越好，而透露给新闻界的消息越少越好。”

切尼说：“我将向总统报告，他将立即开始调动部队。”

回到房间后，切尼对他们的助手说：“他们已经邀请我们进驻了。”他给布什总统拨通了电话，这时布什正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再次和撒切尔首相会晤。

切尼说：“法赫德国王已经同意我们的部署计划了。”

布什回话的声音显得十分高兴。

切尼说，他正式请求总统批准调动军队。

布什说：“你已经得到批准了，干吧。”

切尼在次日上午离开沙特之前，又会见了班达尔和他的父亲、沙特国防大臣苏丹亲王。经过进一步讨论后，双方同意推迟宣布派兵的时间，到首批部队实际上到达沙特阿拉伯地面再说，也就是美国时间8月8日上午，沙特阿拉伯时间8月8日下午和晚上。

五、总统授权征召后备役部队

切尼打电话给鲍威尔，通知他总统已授权他们开始部署军队。

鲍威尔听到沙特人同意美军进驻其领土的消息后，感到十分吃惊。

凯利将军及其作战参谋们，在周末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在这座大楼里度过的——先是为部署军队做准备，然后是等待，凯利早已接到通知，说政府领导层正在进行有关活动，但还没有最后解决。大约下午4点，任务下达了，命令他们去保卫沙特阿拉伯，制止伊拉克的进攻，并准备奉命执行其他作战任务。与此有关的直接命令是执行第90—1002号作战计划。

派出的第一批部队，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公利空军基地第一战斗战术机联队的48架先进的F—15喷气式战斗轰炸机，接着是战备程度最高的第82空降师的战备值班旅（共2300人）。

切尼离开沙特后来到了开罗，然后从开罗乘一架小飞机飞往亚历山大，会见穆巴拉克总统。在他离开埃及返回美国途中，切尼接到了总统的一个直拨电话，那时他正在飞越意大利上空，布什仍在忙着给世界各国首脑打电话，以谋求更多的国家的支持和出兵。布什对切尼说：“我刚与摩洛哥哈察国王通过电话，我希望你到摩洛哥停一下，去拜访他。”

切尼终于在8月8日上午6时，即布什发表“震惊世界”的美国出兵海湾的电视讲话前3小时，飞抵华盛顿。在此之前，他已看过通过无线电传真送来的讲稿，并审阅了全文。这篇讲话用了一些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语言，说伊拉克已经“用闪电战的方式攻占了科威特”，“姑息退让无济于事，其结果就会像30年代那样。”讲话把派兵说成是“符合原则的道义性十字军东征”，并且明确表示派兵的任务是“防御性的”。

布什发表出兵海湾的全国电视讲话后，美国五角大楼就为实施这一计划加紧运筹，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在海湾地区大规模集结军队。美国此举有其深远的战略企图。

伊拉克的行径直接威胁着美国全球霸权主义的利益。首先，海湾拥有世界已探明石油储量的65%，若伊拉克在海湾甚至在中东称霸，就等于卡住了美国及西方经济的脖子，切断了它们的血管，这是美国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其次，海湾及中东地区地处欧、亚、非三洲交接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不仅是前苏联的“软腹部”，而且是世界海上航行的生命线。若让伊拉克控制这一地区，势必成为美国称霸全球的一大障碍。再则，伊拉克拥有大量化学武器，而且还在研制核武器，这不仅直接威胁美国在中东的盟国——以色列的安全，而且对美国的安全也将构成威胁。因此，美国如果不除掉伊拉克这个地区小霸，不仅使美国在海湾的重要利益受到损害，而且其世界霸权的地位也会受到严重挑战。

在伊拉克吞并科威特之际，西德完成了“统一德国大业”，正专心致志消化东德，加强对东欧和苏联的投资，以扩大和确立其在欧洲的影响和领导地位。而且日本也在加紧对亚太地区特别是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试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太经济圈。美国虽然一心想充当世界警察，维持其世界霸权地位，但实在是心有余力不足。伊拉克的侵略给美国带来了机会。美国打着“共同责任，共同分担”的招牌，要盟国出钱出力来资助美国的行动。美国指出，西欧、日本也都从海湾进口石油，不能光靠美国一家来维持西方的石油利益。若打起仗来，一天耗资10亿美元，美国一家难以承担，必须同盟

国共同分担。

在此之前，美国曾做过通过“多国国际援助计划”来援助菲律宾、波兰和匈牙利的尝试，以弥补美国财力不足的缺陷。这次美国更是大张旗鼓地运用这种方式，倡导建立了“海湾危机财政协调集团”，要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西方主要国家出钱出力。

8月8日下午1时，切尼和鲍威尔出席了在五角大楼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切尼很克制地说：“首先，我愿向你们，尤其是你们中间对出兵巴拿马行动记忆犹新的人强调指出，目前这种形势不同于那时。”他指出，这次军事行动尚在进行之中，所以无法回答有关调动哪些部队，部队什么时候出发以及各部队的兵力等问题。

鲍威尔以一种不寻常的语调直接向新闻界发出了呼吁。他说：“如果你们获得了什么信息，当你们考虑登不登这些信息时、我希望你们进行一些自我约束，始终想到确保我们部队安全的作战保密的需要。我认为在我们所有人的心目中，这应该是最重要的。”

在回答有关旨批部队的易受攻击性这个问题时，鲍威尔有些夸张。他说：“我认为，他们很安全。”他提到了“独立”号和“艾森豪威尔”号战斗群的空中力量，以及装备有空中预警机和第一流战斗机的沙特军队。这位参联会主席还补充说：“因此，我有理由断定，我们能够十分顺利地部署部队，并且不暴露任何弱点。”

但是，私下里，鲍威尔仍然担心首批部队的安全。在头三、四周内，他的部队将赤手空拳，极易遭受攻击。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保守这个秘密，士兵的生命有赖于此。

8月12日，切尼在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会见新闻界》节目中露面，他没有透露任何细节，只是说：“实际情况是，今天早晨美国向那一地区派出了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更多的部队还在途中。”

有人追问，到底派了多少部队？他回答道：“我不想谈派兵数量的上限……任何人都不应认为这是件简单的事情，或者是件很快或无需美国为此花太大精力就会有结果的事情。”当然，他最清楚真正的时间表——用17周时间部署防御部队，然后大概用8至12个月时间使美军获得全面进攻的能力。但是，当时甚至没有任何人想到，美国已走上了战争之路。

布什决定到五角大楼去一趟。8月14日，切尼和鲍威尔为了作好向总统汇报的准备，在五角大楼的密室进行了一个小时的预演。第二天，布什便光临此室。

鲍威尔感到吃惊的是，他本人对已经开始的向海湾派遣军事力量的工作到底什么时候结束，也不很清楚。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自10天前的那个星期六下午。鲍威尔注视着总统在白宫外面的草坪上走下直升机，并毫不含糊地说“我们无法容忍”以来，这个问题便一直在他的脑海中萦绕。对他来说，这好像是个关键的时刻，也许是对一次新任务应有明确认识的时刻。如果要把侵入科威特的伊拉克人赶走，那么在军事上到底应该做些什么？要多少美军？应制定什么样的作战计划？

在鲍威尔看来，美国的军事机器仿佛正在高速公路上飞速前进，但不知道怎样刹车，在密室开完会后，布什、切尼和鲍威尔来到切尼的办公室。

鲍威尔对总统说，我要告诉你部队集结的情况。这是下令部署部队以来，他第一次有机会跟布什谈话。他递给总统一张图表，上面用图形显示着美军

每周到达海湾地区的情况。图表标示的最后日期是 12 月 1 日，即这次任务的截止时间，那时到达海湾的美军将达到 25 万人。

鲍威尔说，我们的任务是进行威慑和实施防御作战。毫无疑问我们能最终守住阿拉伯。他说，我们没有别的事可做，这就是到 12 月 1 日我们完成部署任务时的情况。现在我们有风险，但我们的威慑作用很大。

“如果你要我做更多的事情，整个部署活动就会急剧增加。如果这样，我需要知道，我还要沿这条路再走 2 英里还是 3 英里才能下车离去。”

鲍威尔告诉布什说：“到某个时候，施瓦茨科普夫会向你报告，任务完成了。总统先生，我们所需要的，是你能在我们完成任务之前，就告诉我们下一步该干什么。这样，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是停止还是继续向海湾运送物资，或者采取其他什么行动。”

鲍威尔并不想从布什那里得到一项新的紧迫任务，他也不是在敦促布什做出某项决定，只是在询问总统，他们是否必须或者将要执行一项新的军事任务。布什没有回答他，但是鲍威尔感到，他至少已经使布什意识到应该马上做出一项决定了。

后来，在俯视波托马克河的大楼入口处，布什向五角大楼的官员们发表了讲话，切尼和鲍威尔站在他身后。他说：

“萨达姆宣称，这是一场阿拉伯人反对异教徒的圣战。这便是这个用毒气对付自己国家男女老幼发动的战争，他在另一次战争中侵入了伊朗，夺走了 50 多万穆斯林的生命，现在他又洗劫了科威特。萨达姆的士兵和爪牙们犯下了累累暴行。来自科威特的报道向人们讲述了这些野蛮暴行。”

这是对萨达姆的猛烈抨击。布什说：“是萨达姆欺骗了他的阿拉伯邻国，是萨达姆侵占了另一个阿拉伯国家。是他现在正威胁着整个阿拉伯民族。”

布什的声音越来越高了。

在那个周末，布什签署了一项绝密的情报“报告”，授权中央情报局采取秘密行动推翻萨达姆。不过，中央情报局不能触犯不得参与暗杀企图的禁令，只能雇用伊拉克的持不同政见者来推翻萨达姆政权。

8 月 17 日，切尼义前往沙特阿拉伯，并对该地区的其他国家进行为期 4 天的闪电式访问，以寻求更多的支持。在谋求对沙特阿拉伯的访问取得更大成果的同时，他还要为美军部队尤其是空军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寻求在这一地区的着陆权和停留权。

切尼回到华盛顿后，便于 8 月 22 日和鲍威尔一起飞抵肯纳邦克波特向总统汇报情况，并讨论下一步的行动。

在美丽的沃克角海滨别墅，这一天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切尼同鲍威尔与布什、斯考克罗夫特、苏努努、盖茨、伊格尔伯格一起，围坐在一张能俯视海岸的小桌旁。贝克此时正在怀俄明州休假。

切尼和鲍威尔最终促使布什批准了征召大约 5 万后备投人员的要求。一些无关的军事专业人员，如后勤、运输、医疗卫生、工程建筑和情报专业人员都集中在后备役部队。由于越战期间约翰逊总统拒绝通过证召后备役人员进行全面战争动员，五角大楼有意识地调整了军种结构，以便比后备役部队拥有在任何大规模军事行动中都需要的专业人员。这一情况会使任何一位总统在任何大规模军事行动中都必须证召后备役部队，从而使其很难或无法将美国没有公众参预的情况下慢慢地拖入战争。

由于决心在海湾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布什、鲍威尔和切尼都十分清楚，

征召后备役部队已势在必行。现在布什授权征召这支部队。

六、空军参谋长泄密被免职

联合国已经批准对伊拉克进行经济制裁，现在正考虑通过一项对伊拉克实行封锁的决定，眼前的问题是，是通过联合国通过这项决议，还是单方面采取行动，强行检查伊拉克船只，美国海军已经拦截过八艘伊拉克货轮，但还没有登船检查过。

切尼可以感觉到，对总统来说，这是一项重大决定。显然，布什很想维护美国独自行动的权力，并想显示一下美国的力量，切尼却建议不要急于做出登船检查的决定，而应等联合国做出决定。

8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投票通过决议，授权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海军以武力中止伊拉克的对外贸易。在联合国45年的历史中，不打联合国军旗号的国家被授权实施国际封锁，这还是第一次。这的确是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重大胜利。

布什耐心等到最后，终于得到了联合国的授权，禁不住欣喜万分。就在布什欣喜之时，空军参谋长迈克尔·杜根的一篇关于对伊拉克作战计划的谈话报道，给他带来了不大不小的麻烦。

9月16日早晨，《华盛顿邮报》在头版以《如爆发战争，美国将依赖空袭》的通栏大标题刊载了这位空军上将的谈话。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杜根将军对记者称：“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断定，如爆发战争，美国的军事航空力量，包括特别以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为目标的对巴格达的大规模轰炸行动，是迫使伊拉克军队撤出科威特的唯一有效的选择方案。”

杜根说，其他各兵种的参谋长以及施瓦茨科普夫上将都同意杜根的这种看法，认为“空中力量是我国掌握的避免发生很可能将会摧毁科威特的血淋淋的地面战争的唯一解决方法。”

“直到两个星期以前，美国的目标计划人员列出一份稍微有点平淡的伊拉克目标清单。按优先顺序排列，它包括：伊拉克防空部队，机场和军用飞机，中程导弹发射场、包括飞毛腿地对地导弹，通信和指挥中心，化学工厂、核工厂和军火工厂，伊拉克的装甲部队等等。”杜根说，“这是一份很不错的目标清单，我可能能够接受，但这还不够。”

“以色列人士建议说，刺痛萨达姆的最好办法是把他的家庭、他的私人卫队和他的情妇作为目标。”杜根说，“由于萨达姆在伊拉克是唱独角戏的，如果我们选择使用暴力时，他应当成为我们打击的焦点。这就是称之为斩首的军事战略。”

这位空军参谋长，不仅对伊拉克的作战能力进行了过低的不切实际的评论，而且还大大宣扬美国空军在各军种中的突出地位。

这篇报道透露了部署到该地区的美军及其全面备战的状况，包括具体的飞机数量和种类，而这些细节则是鲍威尔曾经力图对新闻界保密的。

鲍威尔不相信杜根将军已经这么做了。在早晨7点，他给切尼打了电话。

“你看了今天的《华盛顿邮报》吗？”鲍威尔问。

“什么事啊？”切尼说他还没有看过。

鲍威尔把这则新闻报道告诉了他，并且说，他认为这件事很不好。

切尼找到报纸，把那条消息看了两遍。他打电话给斯考克罗夫特，斯考克罗夫特很生气。

为了消除或减少由于杜根失职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斯考克罗夫特“面对全国”节目中强调指出：“杜根上将不在指挥系统之内，他并不代表政府说话，”

布什看过报道后，认为这种讲话实在太过分了，他觉得有必要解除杜根上将的职务。

切尼找到杜根，问杜根是否真的说了文章中说他讲的那些话。“是的，”杜根说，“报道中所引述的话，基本上是我说的。”

切尼对杜根说，他将不得不解除他担任的空军参谋长的职务。

9月17日下午在白宫召开的记者吹风会上，切尼宣布了撤销杜根职务的决定。由于事先作了周密细致的工作，此事在空军中并没有引起什么大的震动，各种工作照常运行。

在海湾现场，夏尔·霍纳少将在协调空军的到达。在两三天内，200多架歼击机及100架支援机将部署在沙特基地。50架B—52巨型轰炸机正在迪戈加西亚岛待命，用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它们准备对伊拉克的军事目标进行“地毯式轰炸”。14架F—111战斗轰炸机停驻在土耳其的基地。五角大楼预计总出动600架飞机，同伊拉克的500架飞机对阵。

施瓦茨科普夫从其设在利雅得的司令部，监督着这一行动的具体进展。这位驻沙特阿拉伯的美军司令，从此有了个绰号“沙漠之熊”，以同当年有“沙漠之狐”之称的德国元帅阿尔瓦·隆美尔相类比。

施瓦茨科普夫有一条专线电话同鲍威尔在华盛顿的办公室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这两个人一天到头在通话。施瓦茨科普夫认为：“我们在现场的军队既有防卫能力，又有进攻能力。”

这是五角大楼架向沙特阿拉拍的一座真正的空中桥梁。每5分钟就有一架C—141巨型飞机降落在沙特基地，有45万吨物资被空运到这里。除武器零件外，堆放的箱子里装有各种军需用品，比如有16.8万套防化学战的用具，还有15万瓶防晒油。在军队内部，只有鲍威尔、施瓦茨科普夫及其主要助手才知道，这次大规模行动的最终目的是在科威特对面的沙特大沙漠里部署25万大军。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还没有出动过如此规模的兵力，也还没有过如此惊天动地地炫耀其军事力量。

为了在将来的战争中制服对方，美国人已对伊拉克军队的长处和短处作了详尽估价。在美国专家们看来，这几乎是一支“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它的装备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制造的，它也是按照红军的技术条件训练的。

9月21日，在美军向海湾部署军队的第6周，萨达姆的革命指挥委员会发表了一项气势逼人的声明，宣称：“绝没有任何撤军的可能……要让大家都知道这场战争将成为战争之母。”

美国的情报称，萨达姆在科威特及伊拉克南部有43万部队。他的部队正在挖壕据守，不久将进入更坚固的防御工事。看来，萨达姆不大可能对沙特发动进攻。尽管美国已部署的部队在数量上还不足伊拉克部队的一半，但切尼和鲍威尔对布什说，他们完全肯定美国和盟国军队能够保卫沙特。

9月28日，布什将正在美国作首次访问的科威特流亡埃米尔请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会晤。斯考克罗夫特也参加了为时60分钟的会谈。虽然埃米尔没有直接请求美军出面干涉解放其国家，但斯考克罗夫特却觉出了他内心的这一愿望。布什随后为这位流亡领导人引见了政府内阁成员并与各位共进午餐。当天下午，切尼和鲍威尔秘密会见了埃米尔。

后来，布什说，必须马上解放科威特。如果继续等待制裁起作用，科威特必将被破坏得不成样子。切尼和鲍威尔都看出，埃米尔本人以及各种情报证实了科威特遭受种种破坏的说法给总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布什被感动了。他说，科威特必胜，伊拉克必败。

与此同时，鲍威尔已经意识到，身在沙特的斯考克罗夫特正变得越来越急躁不安。他对于伊拉克的增兵速度越来越感到不安，并且不断地对美国的目标和出兵规模提出疑问。尽管施瓦茨科普夫的公开军事使命仍然是保卫沙特，但他从总统的多次声明和讲话中已经感到其使命正向解放科威特步步接近。

在每天与五角大楼的鲍威尔通过保密电话时，施瓦茨科普夫总是忧心忡忡地寻找蛛丝马迹或干脆直接询问有关下一步的行动指标，他的任务是否仍将局限于防御，还是进一步增兵，准备采取更大的行动。

“我正在对此作出计划”，鲍威尔总是这样对他说。

在每天下午奉行的例会上，切尼和鲍威尔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讨论这些问题。

鲍威尔在10月初对切尼讲：“你知道我们就要做出决定了。”12月1日是防御作战所需的所有部队和给养到位的截止日期。在此之前，总统必须告诉他的是继续部署部队还是停下来。

鲍威尔感到遏制或制裁正在产生作用。前所未有的政治和外交联盟的形成，使伊拉克失去了任何可靠的盟友。制裁可能在数周内看不出什么结果，但在数月后肯定会显示其作用。可能在萨达姆弹尽粮绝前一个月或6周内的某一天，制裁会致使他突然作出某种反映。

鲍威尔找到切尼研究遏制伊拉克的办法。他说，除非他们确知制裁和封锁已经失败，否则将很难发动战争，切尼答道：“这很难说。我想总统不会同意。”切尼认为仅靠制裁是不够的，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制裁一定会成功。总统一心想使其政策获得成功，遏制将使科威特继续受萨达姆的摆布。这将表明，我们的政策是失败的。对总统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

鲍威尔想再作一次努力。他担心，没有人向总统提供其他选择方案。布什所听到的一定都是他所需要听到的。应该指出多种选择方案。12天之后，鲍威尔又找到切尼，向他进一步阐述了关于遏制的想法。但切尼似乎不感兴趣。

鲍威尔又去找贝克。贝克告诉他，已经让一些助手对实行遏制的优点进行分析。贝克指出，这将促使在布什的内部圈子里展开对遏制政策的讨论，或至少把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总统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科威特。

第二十二章 多国部队刮起“沙漠风暴”

- 一、请求增派精锐第7军
- 二、战争会不会爆发
- 三、绝密的“预先号令”从华盛顿发出
- 四、第一轮角逐美军占尽上风
- 五、当代高科技电子战大曝光
- 六、“沙漠军刀”快刀斩乱麻
- 七、再让萨达姆尝尝厉害

一、请求增派精锐第7军

9、10月份，美国地面部队陆续抵达战区，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中央总部的战斗力。到10月初，在海湾地区的作战飞机总数已近1000架。空军第4、第37和第48战术战斗机联队提供了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由于第366和第35战术战斗机联队具有电子对抗能力的中队的到达，伊拉克的防空体系可被压制或摧毁。最后，对地面支援至关重要的5个中队的F—16C战斗机和4个中队的A—10攻击机到达，防御能力可进一步加强。另外，第三陆战队航空联队可用固定翼攻击机和AH—1W攻击直升机支援地面部队，还可用战斗机帮助保持重要的海岸地区的空中优势。“肯尼迪”号和“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到达战区后，分别取代了在红海的“艾森豪威尔”号和阿拉伯海的“独立”号航空母舰，它们的舰载机联队也增强了攻击和战斗机的作战能力。

10月10日，星期三上午，鲍威尔在五角大楼会见了施瓦茨科普夫的参谋长、海军陆战队少将罗伯特·约翰斯顿。下午，切尼、沃尔福威茨，鲍威尔、各军种参谋长和凯利来到五角大楼的作战会议室。他们是五角大楼少数几个可讨论绝密作战计划的人。五角大楼正在考虑进攻作战这一情况绝对不能泄露，否则，萨达姆就会在美军完成防御部署之前发起攻击。

约翰斯顿首先说明，“中央总部是按照总统下达的威慑与防御任务部署部队的。但是，如果总统告诉我们明天实施进攻，虽然我们没有准备就绪，但作为军人只有服从。我们草拟了一项应急计划。”

“这个计划分为4个阶段，”他解释说，“头3个阶段全是空中作战阶段，第四个阶段是地面进攻。”随后，这位参谋长详细地介绍了他们的计划。

第一个阶段，将用飞机攻击伊拉克的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以切断萨达姆与其部署在科威特和伊拉克南部的军队的联系。与此同时，空军还将摧毁伊拉克的空军和防空系统，另外，在第一阶段还将利用空袭摧毁伊拉克的生物、化学和核武器库。

第二个阶段，将对伊拉克的补给和弹药基地、运输设施和道路进行大规模的连续空袭，以切断伊军补给线。

第三个阶段，将对守在工事里的43万伊拉克地面部队和共和国卫队实施空袭。

这四个阶段会有交叉，在第一个阶段的空袭一周后，就对驻科威特伊军发起属于第四阶段的地面进攻。

切尼、鲍威尔等人听后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约翰斯顿提醒他们说，“这个计划是初步的。”施瓦茨科普夫认为，如果要实施一个合适的进攻方案，他还需要增派一个由3个重型装甲师组成的军。

切尼的结论是：按照该计划，以现有的美军发动进攻，将冒极大的风险。

约翰斯顿补充说：“由于气候和宗教方面的原因，1月1日至2月5日之间的6周内是实施进攻的最佳时机。

第二天，即10月11日，约翰斯顿在白宫向布什汇报。在情况分析室，约翰斯顿再次讲述了该计划。会议进行了近2小时，布什多次插话，提出了许多方面的问题。当约翰斯顿说施瓦茨科普夫需要一个由三个重型装甲师组成的整编军才能具备发动地面进攻的能力时，布什问运兵需多长时间。约翰斯顿答称，2至2个月可到位。

约翰斯顿的简要汇报使切尼对该计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希望计划制

定人员改变投入所有力量直接突破的伊军防线的想法。他请鲍威尔考虑一下，在西面距科威特 300—400 英里处沿沙伊边界向约旦边界方面对伊拉克实施地面进攻。对通往巴格达的西部通道进行这样的突然袭击，可使美军地面部队不必克服伊军的防御工事也不会遭到伊军的抵抗，可切断巴格达与约旦的交通线，可对那些位于伊拉克西部地区，威胁到以色列安全的固定的“飞毛腿”导弹发射场进行直接的地面攻击。

但鲍威尔直接反驳道：“不行，这种战法不切实际，我们没法调动兵力。”

10 月 21 日，鲍威尔离美前往沙特，次日下午见到了施瓦茨科普夫。他说，“他没有从总统那里带来关于下一步该怎么办的决定，没有指示他们是继续执行目前的任务，还是为发动进攻作好准备。但不管怎样，现在都必须拿出一个十分像样的进攻计划来。更重要的是，为了完成进攻任务，要说明还要增派多少部队。”他要施瓦茨科普夫开个单子，看他想要什么，并保证帮他得到这些东西。

施瓦茨科普夫估计，在此刻要把萨达姆赶出科威特所需兵员得超出他现有兵力的一倍才行。最后他说：“我想要第七军。”

第七军是美国驻欧洲地面防御力量的精锐部队，有 3 个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师，两个坦克师和一个机械化师。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要求，在一年以前，在华约解体之前，这个要求是不可想像的。施瓦茨科普夫说：“如果布什总统真想进攻，他必须把第七军派来。”

鲍威尔支持这些要求，他还建议把在美国本上的一个绰号“印第安大个子”的陆军第一机械化步兵师调来。施表示同意。

10 月 24 日，切尼来到白宫。经过 6 个月尤其是近两个月使美国蒙受政治损失的争吵之后，政府与民主党终于在预算问题上达成了妥协。现在布什有时间回答他目给切尼的问题了：还要增派多少兵力？

总统说，他认为增兵应以能够实施进攻，把伊拉克驱逐出科威特为限。那天下午，切尼跟贝克在国会的保密安全室向议员们简要介绍了一些机密情况，但两个人谁都未对正在考虑增兵这一点做出任何暗示。

10 月 30 日下午 3 点半，布什同贝克、切尼、斯考克罗夫特和鲍威尔在情况室碰头。

斯考克罗夫特首先发言，他说：“我们正处在一个交叉路口。”他的意思是，或者继续采取威慑与防御政策，或者改为制定进攻方案。

听到这里，切尼已经明白，布什除了要实现他所提出的解放科威特的目标外，已不再愿意接受其他任何方案。反伊国际联盟太脆弱，无法无限期地维持下去。局外人可能不这么看，但他们这些局内人却清楚，各种计划安排都是十分脆弱的。切尼觉得，某些外界的偶然事件就很可能彻底瓦解这个联盟。

会议开始前就说过，要留出时间让参联会主席报告他与施瓦茨科普夫协商的情况。

“好，好，好，”总统终于说；“让我们听听他要说些什么。”

鲍威尔说：“总统先生，我们已完成了你赋予的任务。”保卫沙特的任务已经提前完成。他介绍了在伊拉克继续集结部队的情况下，施瓦茨科普夫是如何抽调一部分部队来完成这次任务的。

鲍威尔说：“现在，假如总统决定采取进攻行动，集结部队的话，下面就谈谈我们的要求。”他随后讲出了施瓦茨科普夫要将部队增加一倍的想法。

中心意思是，增调第七军，这样，施瓦茨科普夫就可用高速机动坦克部队对伊拉克发动翼侧攻击。采取这种打法，他们可以避免正面攻击伊拉克的主力部队。

使斯考克罗夫特感到惊奇的是，施瓦茨科普夫会要求增派这么多部队。会议桌周围发出“噢、啊”的惊叹声，但布什却不动声色。

鲍威尔说，如果总统决定实施进攻，他赞成施瓦茨科普夫的建议。他转向总统说：“如果你给我更多的时间，譬如说3个月，我可以调去更多的军队。这一点就是这么重要，你可以带我到储蓄借贷银行去保贷款，要破产大家一起破产。”鲍威尔的意思是，实施进攻将付出高昂的代价。他认为唯一的限制因素就是运输系统的运输能力问题。

切尼说，他不仅无条件地支持施、鲍两人的建议，反而更进一步。他说：“假如总统想采取进攻方案，增兵不应成为问题，总统应该同意增兵，应该下令增兵。”他解释说，如果他们不得不投入交战的话，只有增兵才能确保胜利。他不希望在明年1月或2月再要求增加部队。萨达姆完全有能力用更多的部队抗衡。切尼不希望再回到情况室来，说，“总统先生，我记得我们在10月份对你说过的话，我们在海湾增了兵，但现在还是不够用。”

最后，布什说：“如果你们认为需要，我们就增兵吧。”次日，总统最后批准了增兵方案。

切尼也并非认为美国在海湾的所有行动都是正确的，正如他决心像他的军事指挥官熟悉统一作战计划一样，他也要深入了解海湾作战计划的细节。

切尼告诉沃尔福威茨，虽然他要严格监督计划人员并向他们提出问题，但他不想对他们进行微观管理。他无意重新制定作战计划。“但计划定出后我要掌握它，”这位国防部长说。

在大多数的上午，切尼都要听取联合参谋部作战与情报方面的汇报。这种汇报十分枯燥乏味，总是讲述伊拉克部队和多国部队的位置、多国部队的事态以及一些一般问题。然而事必躬亲的切尼都想知道得更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听取了15次汇报。

鲍威尔在制定进攻计划时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为三个阶段的空战列出一份伊拉克主要战略目标的清单。目标分为几类，每一类中又都有重点目标。

施瓦茨科普夫的计划人员正忙于设计一系列矩阵和计算机模型，以期找出在20至30天的轰炸期限内适于打击各种目标的武器系统，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工作。所选用的这些武器一方面要使敌人受到最沉重的打击，另一方面又要最大限度地保护美国及盟国的部队免受伊拉克部队的打击。

如何实施第四阶段的地面作战。要看空军对伊军造成的损伤程度而定，要设法在对多国部队有利的情况下与伊拉克陆军部队交战。

二、战争会不会爆发

1990年11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会议，就授权使用武力把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的678号决议进行表决。结果以12票对2票通过，也门和古巴两国投了反对票，中国则投了弃权票。这是自1950年朝鲜战争以前，联合国安理会授予最广泛的开战权力的决议。

该决议明确规定1991年1月15日是伊拉克从科威特最后撤军的期限，如果到了1月15日，萨达姆还不从科威特撤军，那么美国就可以拿着联合国安理会的“令箭”，“名正言顺”地对伊拉克发动进攻，把其赶出科威特。

联合国关于使用武力的决议，在总统看来是一个分水岭。现在，布什已在这个非同一般的联盟中拥有许多国际朋友，其中主要国家领导人有戈尔巴乔夫、撒切尔夫人、穆巴拉克和法赫德。如果萨达姆不在45天之内撤军，布什会采用武力将其赶出科威特。

12月16日，星期天，布什从戴维营返回白宫，他要在白宫录制戴维·弗罗斯特对他的公开电视采访，此片将在元月2日播放。

总统说，只要美国和盟国勇敢地与萨达姆抗衡，世界就可能更加和平。“如果我们妥协，这种和平就不会实现。我们所面临的是一场极其明白无误的善与恶之战。这场道义之争泾渭分明……如此重要，自第二次世界以来尚属首见。这是二战之后最重要的一次道义之争。”

“1月15日之后，您打算怎么办？您倾向怎么办？”弗罗斯特问布什。

“噢，我还没定下决定。”

鲍威尔的心理状态是矛盾的，他不愿被这种心理状态所压倒，甚至不想被矛盾心理所困扰。他觉得，只要通过其他手段还能达到目的，布什就不愿进行战争，鲍威尔仍然确信，萨达姆不愿与美国交战，并力图不断找出萨达姆不愿交战的理由。

但是，一旦战争爆发，美国必须取胜。假如美国不能速战速决，将造成毁灭性后果。美国必须取得全面胜利。美国外交政策的成败，以及军队今后几年、甚至几十年声望、士气如何，都将取决于这场战争的胜负。

12月17日，布什两次对记者发表谈话。第一次有人问他，在1月15日最后期限过后会采取什么行动。

“你们等着看吧，”布什说。

下午第二次见记者时，一位记者问布什为什么不指明具体的军事威胁的手段？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说明将采取进攻行动？

布什回答说：“因为我没有威胁的意思，我想其他人也没有。我们只是决心已定。”当天鲍威尔和沃尔福威茨一起研究了布什表达自己意见的方式。鲍威尔实在是有些恼火。总统的态度模棱两可，尽管他不想这样做。一天中，总统忽左忽右，拿不定主意。既要解释政策，又要做到不起误解，这正是总统所做的唯一重要的事情。鲍威尔不愿看到这件事情给办砸了。

鲍威尔和沃尔福威茨甚至考虑，他们是否要设法向白宫建议，找位传递信息的把关人。

1月15日到来这段时间至关重要，这是心理战时期。总统的一字一句都事关重大：第一，必须震慑萨达姆；第二，必须使国会不从中作梗；第三，一旦使用武力，必须获得大多数公众的支持。

鲍威尔不愿因信息传递的重大失误而被迫进入战争。

12月17日，莱斯平与斯考克罗夫特一起去白宫开会。在此之前，以阶斯平为首的众议院武装部委员会刚刚开完了关于海湾政策的听证会。他得出结论说，他可能支持战争。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还不使用武力，那么何时才能使用呢？

阿斯平明白，斯考克罗夫特对采取外交手段失去耐心。萨达姆说，他要到最后期限的前三天即1月12日，才在巴格达会见回克。这遭到了布什的拒绝。斯考克罗夫特说，萨达姆对周围每个人都那么蛮横无礼，我们没有必要去理睬他。4个月的外交活动和经济制裁都失败了。折腾了4个月，我们都精疲力尽，而且感到失望了。斯考克罗夫特说，用战争解决则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他确信，这场战争只要2至3个星期就能解决问题。

12月21日，布什邀请多国部队28个成员国的大使到白宫。会见之后，他带着大使们参观了身披圣诞新装的白宫。

与此同时，中央情报局局长韦伯斯特正在整理一份圣诞节前送来的国家情报分析特别报告，就萨达姆会不会在1月15日最后期限到来以前撤出科威特提供准确预测。在各个情报机构举行的讨论会上，韦伯斯特和中央情报局及国务院情报部门都一致认为，一旦萨达姆意识到部署在地面前的部队规模以及美国和盟国的决心，他将撤出科威特。

帕特·兰想，事实恐怕会与此相反。他确信，萨达姆只看到了自己的部队规模和自己的决心，国防情报局长李伊斯特以及4个不同军事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与兰的观点一致。

他们坚持将不同意写成几个“注脚”加在情报分析报告上。这份报告付印后，交给布什总统。

圣诞前夕，布什接受了《时代周刊》记者的采访。记者问布什：会不会爆发战争？

他说：“噢，上帝。”他想了一下，接着说：“我的直觉告诉我，他是会从那里滚出去的。”他的回答反映了情报分析报告大多数人的意见。

三、绝密的“预先号令”从华盛顿发出

虽然战斗还没有打响，但多国部队总司令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并不显得轻松，他在一心一意地忙于制订战争计划。按照施瓦茨科普夫的设计，战争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大规模空袭，时间将持续两周以上，目标是科威特和伊拉克境内的战略性军事和通讯设施；第二阶段为地面作战，时间大约一周左右，第一阶段的行动代号为：“沙漠风暴”，第二阶段的行动代号为“沙漠军刀”。

为了保证“沙漠风暴”行动首战告捷，施瓦茨科普夫吸取了以往战争的教训，将海军、陆军所属的作战飞机统统集中起来。交由海湾美空军司令霍纳中将全权负责指挥。同时命霍纳及其助手巴斯特·格洛森准将拟定出“沙漠风暴”行动的具体方案。1990年12月底，霍纳中将经过若干次修改后的行动计划呈报给施瓦茨科普夫和五角大楼。

为选择最佳时机，尽快发动空战，美最高决策层决定让鲍威尔去向施瓦茨科普夫说明情况，让施根据月相和天气预报，提出开始空战的时间和实施空战的时限。

鲍威尔手中已有了一份绝密的“预先号令”，准备发给施瓦茨科普夫。“预先号令”是指“在命令与行动前下达的先期通知。”

“预先号令”一旦发出，施瓦茨科普夫就必须全力以赴投入执行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

通过保密电话，鲍威尔询问施瓦茨科普夫1月15日联合国规定的最后期限过后，选择什么日期和时间最为合适。

施的回答是，沙特时间1月17日凌晨3点，即华盛顿时间1月16日下午7点，联合国最后期限过后整整19个小时。那将是一个有月光的夜晚，这对于F—117A隐形战斗轰炸机来说至关重要。实际上，伊拉克雷达捕捉不到F—117A（机，伊拉克人即使在月夜里也不能发现它或其他任何飞机。

鲍威尔对有两页篇幅的“预先号令”进行了修改，具体要求施瓦茨科普夫在1月17日凌晨3时做好实施“沙漠风暴”行动的一切准备。接着，“预先号令”被送到五角大楼的几位官员手中，征求意见。最后的定稿准备待总统批准后发出。

12月29日，鲍威尔授权向施瓦茨科普夫发出“预先号令”，时间是格林威治时间12月29日16点12分，也就是华盛顿时间上午11点12分。

布什决心争取国会的支持，布什心里明白如果动用武力最后获得成功，如果尽可能以小的代价和尽可能少的伤亡实现了预定的目标，人们就不会在乎国会展开过怎样的辩论，投过什么样的票。反之，如果这一军事行动遭到惨败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人们就会把一切推到总统身上。

依照美国的法律，不管国会是否投赞成票，总统作为部队总司令有充分的权力指挥军队采取军事行动，尽管总统也受法律的约束，但他有宪法这个强大的后盾。

历届总统都曾单独下令使用过军队，他们这样做总计起来有200多次，只有5次宣战。目前的危机十分类似的情况是朝鲜战争，当年社鲁门就没有通过国会，只是根据类似现在的联合国决议行事。

斯考克罗夫特赞成向国会提交一份建议性提案。他说，即使总统拥有宪法授权，但有了国会的支持，总统的政治权力会得到更大的加强。总统并不

希望在政府与国会意见不一时发动战争。

日内瓦会谈之后，国务卿贝克又飞抵沙特阿拉伯与法赫德国工会面。根据美沙之间的秘密协定，从沙特发动任何军事进攻，都必须国王批准。贝克此行的目的正在于此。法赫德当即同意，条件是开战前必须通知他。

贝克许诺说，进攻之前他将向来自华盛顿的班达尔亲王通报。

1月12日，星期六，国会经过3天认真辩论之后，授权预见布什发动战争的权力。国会通过的决议采用了联合国决议中关于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的措辞，同时也特别提到了可以“使用军事力量。”

美国国会的表决等于是对伊拉克的宣战。这是美国国会自1941年12月7日对日本宣战以来的第一次宣战行动。

参议院的表决十分接近：52票赞成，47票反对；众议院则以250票对183票通过了决议。在国会通过这一决议的当天，布什对记者发表谈话说，国会的授权“并不意味着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仍有时间维持和平。”

一位记者问：“你心中是否已经作出了动武的决定？”

布什回答说：“没有。我仍然希望能够和平解决。现在避免战争的唯一和最好的办法是伊拉克马上大规模撤军，毫无条件和妥协可言，当然，事到如今，我也不得不说，想让萨达姆不折不扣地执行联合国决议，几乎是不可能的。”

就在这个周末，白宫派遣伊格尔伯格和沃尔福威茨来到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仍是一张活牌。上个月沙米尔总理曾出人意料地向布什总统作了保证，以色列决不会先发制人，去进攻伊拉克。

现在看来，萨达姆肯定会向以色列发动进攻。至于以色列如何作反应，美国方面毫无把握。沃尔福威茨和伊格尔伯格试图就此游说以色列领导人。

沙米尔说，他不会对以色列如何行动做出许诺，因为任何国家都不会作出不反击的许诺，尤其是以色列，它素有针对所有恐怖行动作出反应的传统。

沙米尔答应在行动之前征求美国的意见。沙米尔说，他明白不卷入战争的好处，但是有关维护国家生存的千锤百炼的信条告诉我们：要采取单方面行动。

伊格尔伯格和沃尔福威茨提出，通过扩大部署美国“爱国者”导弹的方式改善以色列的防御系统，该方案正在实施之中。

布什还批准在五角大楼作战中心和特拉维夫以色列国防军总部建立绝密通信联络，并于1月13日正式启用。

当晚，布什在白宫官邸会见切尼、斯考克罗夫特和鲍威尔。他们一致认为，既要及时，又不能太早，在大部分情况下，应在进攻发起前1—2小时通知他们。

切尼和布什还重新审定了轰炸目标，以便总统对有争议的目标心中有数。

布什对其中的一组目标有所担心，要求删除，其中包括萨达姆雕像和凯施门，据说这些目标是伊拉克国家的象征，对伊拉克人有极大的心理价值。

1月14日（星期一）早晨，切尼和鲍威尔最后一次在特别作战中心用1个小时复审空袭目标。

布什当天在白宫官邸邀请空军参谋长麦克皮克、切尼和斯考克罗夫特共进午餐。麦克皮克结束了他对驻海湾空军部队为期10天的视察之后返回美

国。布什作为二次大战中的飞行员，希望听到第一手材料。

下午早些时候，贝克和鲍勃·金米特来到五角大楼用1个小时的时间在特别作战中心复审了轰炸目标。切尼希望贝克能从政治角度审查空袭方案，以防发生预料不到的后果。贝克没有对轰炸目标作任何更改。

1月15日上午，布什给两名牧师打电话。一名是布什自己教区的埃德蒙·布朗宁主教，主持主教派教堂。前一天晚上，布朗宁在白宫外面组织了“和平守夜”。布什还打电话给参议院牧师理查德·霍尔沃森，让霍尔沃森与他一起为国家祈祷。

上午10时30分，布什在椭圆形办公室与核心内阁成员碰头。在场的有奎尔、贝克、切尼、斯考克罗夫特、鲍威尔、苏努努和盖茨。他们最后审阅了绝密的“国家安全指令”的草稿。对此文件修改时加了两个条件，即实施“沙漠风暴”行动的条件是：第一，直到最后一分钟，外交上毫无突破；第二，已按正当方式通知国会。

布什签署了指令。“国家安全指令”故意没有注明日期，一旦上述两个条件具备时，再加上日期和时间。

布什批准切尼正式签署一项执行令，并且在当天发给施瓦茨科普夫。

下午5时，切尼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鲍威尔带来了一个绝密文件夹走了进来，夹子里装着执行令。该令由参联会主席亲手写成。他和切尼一起看了一遍，一张桔黄色的纸上注明：此令批准施瓦茨科普夫依照12月29日的预先号令实施“沙漠风暴”行动。

如果是一张普通的执行令，切尼只需在封面一栏里签署姓名的第一个字母，以示批准，尔后由鲍威尔正式颁布，按规定程序将国防部长令传达给总部司令。

这次，两人都深知这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性文件，因此签署了全名。

鲍威尔通过绝密传真线路将印有“阅后即毁”字样的命令副本传送给施瓦茨科普夫。再过26小时左右，“沙漠盾牌”行动就会变成“沙漠风暴”行动。

1月16日，在美国万里之外的海湾地区，美国士兵们已经做好了战争的一切准备。他们静静地等待着布什总统下达开战的命令。

16日上午10时半，布什总统终于拿起笔，签署了给驻海湾多国部队总司令施瓦茨科普夫的作战命令。放下笔之后，他对身旁的国防部长切尼说：“现在，这个命令立即下达。如果在今天午夜之前，伊拉克宣布无条件撤军，它将由我本人宣布收回。除此之外，发生任何情况均不能影响它的执行。”

时间在悄悄地流逝。最后的时刻到了，萨达姆没有宣布撤军，布什也没有收回他的命令。

四、第一轮角逐美军占尽上风

1月16日，星期三，凌晨时分，施瓦茨科普夫收到了国防部长切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发出的进攻命令。这时，弗里曼大使也通知沙特费萨尔王子，总统的决心已下，进攻命令已下达到海湾舰队，第一颗打向伊拉克的“战斧”式导弹就要发出。命令也下达到空军基地。

施瓦茨科普夫将军要军队牧师卡尔·彼得森上校为美国军队的安全祈祷。于是，这个在国防部的地下水泥掩体里已待了143天的牧师，唱起了他喜爱的李·格林伍德的歌——《上帝保佑美利坚》。

施瓦茨科普夫在下达给他手下所有部队的动员令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我已从你们眼中看到了坚定的决心。这种决心就是要尽快完成这次任务，以便让我们都能回到我们伟大的祖国身边。我对你们充满了信心。总统、国会、美国人民以及全世界都会联合起来站在你们这一边，支持你们的行动。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现在你们应该是‘沙漠风暴’中的雷和电。上帝与你们同在，保佑你们所爱的家人和我们的祖国。”

此刻，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共28个国家出兵参加）在海湾地区部署总兵力近70万人，其中美国约23万人、英国35万人、法国1万人、海湾6国15万人、埃及3.6万人、叙利亚1.9万人。美军装备包括1200辆坦克、2000辆装甲车、1300架战斗机和1500架直升飞机。在海湾及其附近水域部署370多艘船只，其中3艘航空母舰（“肯尼迪”号，“萨拉托加”号及“中途岛”号，这三艘航空母舰编队共38艘舰只）已到位；另外还有“威斯康星”号战列舰以及中东特混舰队（18艘舰只）、两栖攻击舰（13艘舰只）。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历史上在海外的最大规模的一次海、陆、空军集结。

1月16日夜，天上没有星月，四野一片漆黑。风呼呼地叫，不时卷起地上的沙粒，又抛向远东。

在沙特阿拉伯中部的某空军基地，一架架满载炸弹的飞机，像一头头潜伏的怪兽，随时可能突然扑出。机场跑道旁两行长长的指示灯，像巨兽伸出的两颗嗜血的獠牙。

当地时间1月17日零点50分，第1架美国F—15E从这里腾空而起，紧接着，数百架各型飞机也从这里及其他机场相继起飞，列队向伊拉克飞去。

在靠近沙伊边界线的伊拉克境内，一架美国陆军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距离伊拉克一个保护巴格达的防空雷达站旁的发电站只有12公里了。这将是战争的第一个目标。

飞行员通过前视红外传感器能看到该建筑物，好像是地平线上的一个小舞场。飞行员的仪表显示，他的“地狱火”导弹飞到目标需要20秒钟。他发射了导弹。他说：“这一枚导弹是给你的，萨达姆。”仪表一秒秒地计算着时间，从荧光屏上，他所能看到“地狱火”导弹飞向建筑物的上空，像一块岩石那样坠下去。这个小舞场一下子炸得粉碎，画面无声无息地显示在他的雷达荧光屏上。

从海湾的战舰上发射出第一颗“战斧”巡航导弹，在伊拉克爆炸。大约当地时间凌晨2点30分，庞大的机群飞临巴格达上空并开始空袭。

为空袭打头炮的是一架名噪一时、绰号为“黑色幽灵”的

F—117隐形战斗轰炸机，它把一枚2000磅的精确制导炸弹精确地投到位于巴格达闹市区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大楼屋顶的正中。顷刻之间，飞蝗般

的炸弹从天而降，铺天盖地，爆炸声震撼大地。巴格达市内的政府大楼、兵营和炼油厂也先后被命中，大火冲天，浓烟滚滚，整个巴格达市笼罩在火光和硝烟之中。

战争的火焰与光芒照亮了海湾黑色的天宇。

美军和多国部队的空袭是从四个方向全线展开的：

伊科东南部的波斯湾：从“中途岛”号、“突击者”号航空母舰上出动战斗轰炸机，同时载有常规弹头的“战斧”式导弹也向伊境内目标发射。

伊拉克西面的地中海：停在那里的美国数艘战列舰向伊境内军事目标发射中远程导弹。

伊科边界南侧：利雅得和宰赫兰等多国部队空军基地里担负不同任务的飞机编队起来，飞向伊科纵深执行轰击任务。

伊科西南部的红海：从“萨拉托加”号、“肯尼迪”号、“罗斯福”号和“美利坚”号航空母舰上出动战斗轰炸机，一批战列舰也发射“战斧”似巡航导弹，目标是伊境内的军事通讯网、“飞毛腿”导弹发射架和其他军事目标。

在第一轮的空袭中，美军出动的飞机及其任务是：F—4G“野鼬”式电子干扰机和EA—6B“徘徊者”反干扰电子作战机，它们的任务是干扰伊拉克的军用雷达和通讯联系；F—117A隐形战斗轰炸机和F—15E战斗轰炸机以及A—6攻击机，这三种飞机是空袭伊拉克防空火力网和飞机场等战略目标的主力机种；“战斧”式巡航导弹、F—111隐形轰炸机和F—15E战斗轰炸机，其任务是摧毁伊南部的“飞毛腿”导弹、核工厂和化学武器生产工厂；A—6攻击机、F—111隐形轰炸机、B—52重型轰炸机和其他种类战斗轰炸机，其任务是轰击伊科境内的军事指挥机关和控制中心；另一批A—6攻击机、F—111隐形轰炸机、B—52重型轰炸机和其他种类的战斗轰炸机，其任务是轰炸伊科境内的地面部队，重点是精锐的“共和国卫队”；F—15，F16和FA—18战斗机，其任务是护航。

在对巴格达的第一次空袭中，美军还出动了新投入现役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编队和“别动队”。

战斗打响90分钟后，伊拉克的防空部队开始作出反映。

巴格达市区。根据萨达姆的命令，全城所有防空火器一齐向空中开火。高射机枪、高射炮射出的弹道轨迹与空中投入的炸弹经纬交织，形成一片片奇丽而骇人的火网，甚是壮观。防空警报声和爆炸声吞没了整个巴格达市区，震撼着中东这座历史名城。

然而，多国部队的空袭实在是太猛烈了，再加上强烈的电子干扰，伊拉克的防空雷达和地空导弹很快被压制住。剩下的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因指挥通信设施和目标指示雷达受到强烈的干扰，失去指挥，因此只好各自为战，盲目地对空射击。

5点整，也就是美国东部时间16日晚上9点整，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办公室里通过电视向美国和全世界人民宣布：战争开始，美国已经发动进攻。

从6点左右起，多国部队的飞机开始返回自己设在沙特阿拉伯和航空母舰上的基地，许多飞行员走下飞机的第一件事就是紧紧拥抱，眼里闪烁着泪花，还有人高举V形手势以示胜利。

6点35分，美军及其盟军又向伊拉克及其占领下的科威特发动了第二轮轰炸。

天渐渐放亮了，多国部队加大了空袭密度。到 17 日午夜，多国部队的飞机共进行了 3 轮高强度轰炸，出动飞机 2000 多架次，投弹 1 万多吨。此外，停泊在波斯湾的美海军军舰也向伊拉克腹地的指挥通信中心、雷达和防空导弹阵地以及部分机场发射了 100 多枚“战斧”式巡航导弹。

第一天轰炸过后，萨达姆的总统府、巴格达电信电报大楼、空军和防空指挥部被摧毁，巴格达附近的两个机场陷于瘫痪，一切工业设施、巴格达电厂、电视台大楼也被炸坏。此外，在伊拉克领土上至少有 75 个地方遭到轰炸。对于这样的空袭结果，布什总统、五角大楼和施瓦茨科普夫将军都感到非常满意。

按照“沙漠风暴”行动计划，从 1 月 17 日至 30 日为战略空袭阶段，主要目的是削弱伊拉克战争潜力，夺取并保持战略制空权。因此，在以后的 13 天当中，多国部队的飞机不分昼夜，轮番上阵，连续对伊拉克保持强大的空袭压力。在有多国部队飞机的狂轰滥炸之下，伊拉克的军队既无招架之功，也无还手之力。伊拉克空军装备的几百架飞机，要么逃往国外，要么深藏于地下，勉强升空的为数不多的飞机立即成了多国部队飞机的活靶子，有些伊军飞行员尚未发现多国部队的飞机，就被发射的空对空导弹击中，魂归西天。多国部队没费多大劲就夺得了制空权。

在萨达姆的百万大军中，给多国部队带来最大麻烦的是伊拉克装备的 800 余枚“飞毛腿”导弹。从 1 月 18 日开始，萨达姆下令用“飞毛腿”对沙特和以色列境内的目标进行反击，时间给多国部队造成很大恐慌。

施瓦茨科普夫急令多国部队空军派专门飞机去搜寻消灭“飞毛腿”导弹。然而“飞毛腿”导弹的机动性很强，它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使多国部队空军的攻击效果甚微。用施瓦茨科普夫的话说，寻找“飞毛腿”犹如草堆中找针一样困难。最后，还是“爱国者”地对空导弹上演了一场大战“飞毛腿”的好戏。伊拉克发射的“飞毛腿”大多被“爱国者”拦截。由于战绩突出，因此，“爱国者”地对空导弹获得了“‘飞毛腿’的克星”的美誉。

在战略空袭阶段，萨达姆的“军中之军”共和国卫队也上了黑名单，被列为重点攻击目标。

担负炸伊拉克共和国卫队任务的是美国战略空军的 B—52 轰炸机。

提起 B—52 轰炸机，那可是大名鼎鼎，全世界的人对此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名气，是因为它曾创造多项世界纪录：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重量最大的轰炸机，达到 233 吨；在美国的 B—1 轰炸机问世前，它是世界上载弹量最多的轰炸机，最大轰弹量近 30 吨；它是世界上飞得最远的轰炸机，一口气可飞 16100 公里；它还是世界上服役时间最长的轰炸机，从 1955 年服役至今已有近 40 年的历史，可谓是一名“老兵”。

由于 B—52 能在 1.6 万米以上的同温层高空中飞行，因此人们送给它一个绰号叫“同温层堡垒。”

在美国战略空军中，B—52 不仅是一个创纪录的能手，而巨还是一个战功显赫的功臣。在越南战争中，它常常采用令人恐怖的地毯式轰炸战术，这一次，为了降服萨达姆，B—52 再次披挂上阵了。

18 日晨，太阳还没露面，一架架挂满穿甲集束炸弹的 B—52 轰炸机从土耳其和印度洋迪戈加西亚基地腾空而起。在空中编好队后，机群向科威特西北部地区的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的阵地飞去。几个小时后，机群飞临共和国卫队阵地上空。只见 B—52 轰炸机排着队用他那拿手好戏地毯式轰炸战术，

铺天盖地地向下倾泻穿甲炸弹。

霎时间，共和国卫队的阵地上硝烟弥漫，爆炸声响成一片，B—52 所到之处均化为一片焦土，苏制 T—72 坦克不时被击中起火。

在以后的十几天中，B—52 天天都去轰炸共和国卫队，使其动弹不得。

在多国部队超强度的空袭下，萨达姆的空军和地面防空部队一败涂地，根本没有还手之力。萨达姆心里明白，这一回是必输无疑了。

1 月 31 日，在战略空袭进行 12 个昼夜之后，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命多国部队空军转入战术空袭阶段，主要对在科威特和伊拉克南部的伊军地面部队和防御阵地、坦克和装甲车集群、交通枢纽，桥梁、铁路和公路运输线、燃料和弹药库以及后勤补给基地等目标，进行猛烈的轰炸。施瓦茨科普夫是想通过这一阶段的轰炸，利用空中优势最大限度地削弱伊拉克的有生力量，为尔后地面部队的进攻扫清障碍。

经过第一轮 38 天的角逐，多国部队的空军可以说是出尽了风头，占尽了上风，也取得了空军战争史上最辉煌的战果。伊拉克的所有战略目标除深藏在地下的之外，都被多国部队刮起的“风暴”扫得荡然无存。可怜萨达姆的百万大军，尚没有与多国部队的地面部队真正交火，就遭到了惨重的打击，伊拉克南线战区的 54 万大军，在多国部队疾风暴雨般的空袭下损失 25% 以上，重装备损失高达 30—45%。伊拉克的 4000 多辆坦克有 1600 多辆成为多国部队飞机的靶子，2800 辆装甲车也有 840 多辆被毁。萨达姆的精锐之师共和国卫队作为多国部队空军重点“照顾”的目标，损失更是惨重，它每天都要遭到多国部队数百架飞机的轰炸。到 2 月 23 日，第二阶段空袭结束，共和国卫队已损失近半，被打得七零八落，“军中之军”往日的威风早已荡然无存。

萨达姆的战争机器严重受损，它的反击软弱无力，但它们在顽强地运转。当有战场记者问萨达姆是否放弃抵抗时，他的回答是：不！绝不！

于是，战争之神继续发出狰狞的微笑。

五、当代高科技电子战大曝光

美国一名电子专家说，“当代的世界是电子世界，当代的战争是电子战争，海湾战争就是一场电子战争的大曝光！”此话不无道理。

早在 1982 年，以色列空军在叙利亚的贝卡谷地进行电子战，使叙利亚损失了 30 多个导弹连和近百架飞机，显示了电子战在现代战场上的威力。西方军事专家由此预言：“未来的战争将是一场电子战。”仅隔 9 年之后，海湾战争的结果似乎使这个预言变成了现实。

所谓电子战，是指战争双方利用电子设备或器材进行电磁斗争，其目的是压制、干扰，削弱以至破坏对方的电磁辐射能，使得对方电子监测设备陷于瘫痪，无法了解己方的军事行动，从而赢得战争。

在海湾战争爆发以前，美国就部署了 4—7 颗 KH—11、KH—12 照相侦察卫星和红外侦察卫星，不断地监视伊拉克地面军事装备的变化和调动。KH—12 卫星的照相分辨率高达 0.1 米，使地面设施难以隐蔽，从而为多国部队的轰炸提供了详细的目标地理坐标及目标性质分析的依据。美国发射了“长曲棍球”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它能探测地下几米深的物体，可描绘伊拉克的地下防御工事分布。美国还发射了数颗保密的通信侦察卫星和电子情报侦察卫星，以截获和窃听伊拉克的轻便无线电报话机通讯和小分队间的电话交谈，收集伊拉克的雷达电子情报。

此外，设在阿曼、塞浦路斯和意大利圣维托的地面侦察站。对伊拉克的雷达和通信网络进行远距离的侦察、窃听。这些侦察设备较准确地侧出伊拉克绝大多数的战略目标的位置性质，并可根据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使用的通讯设施的电子“指纹”来跟踪萨达姆的活动。

美国用 6 架预警机监视伊拉克的飞机活动，预警机的电子侦察系统（无源探测系统）并可监视伊拉克的军舰、防空雷达、制导雷达的分布和活动。因此，在海湾战争爆发以前，多国部队对伊军的军事部署和军事活动了如指掌，而伊拉克缺乏这些侦察手段，无法获取多国部队的准确情报。伊拉克在第一轮的电子战中便败下阵来，从而决定了它在战时被动挨打的地位。

早在海湾战争爆发前的 5 个月，多国部队就在海湾部署了高、中、低三层侦察监视系统，全方位、多途径，昼夜对伊拉克的重要军事设施、雷达、导航等系统实施不间断的电子侦察，将所获得的有威胁的电磁信号输入作战飞机的电子战数据库，为多国部队飞机雷达告警、电子干扰和发射反雷达导弹提供了依据。在高层，通过部署在地球同步轨道上的两颗电子情报卫星与地面情报截获系统相配合，获取坦克之间的无线电通话和其他轻便型无线电通信设备的通信联络信号。在中层，派出 U—2R 和 TR—1A 飞机在高空进行电子侦察，每天还至少出动 5 架 RC—135 电子侦察机，用于截获电子情报。多国部队的各种专用电子战飞机和作战飞机都可利用机载电子战设备对 100150 公里纵深进行战术电子侦察。在底层，利用设在阿曼、塞浦路斯和意大利圣维托的地面侦察站进行监听和侦察。

在“沙漠盾牌”行动前，美国就已拉开了电子侦察网。集中在海湾战区的上千名电子战专家从收集的情报中研究分析各种雷达信息，辨认伊军各种电子武器和制导设备的反射波，编制干扰波和反干扰波，干扰破坏伊军的雷达探测系统。

在“沙漠风暴”行动开始前的 24 小时里，美军对伊拉克电子干扰达到最

强点。EA—6 日“徘徊者”式电子干扰飞机专门对付电磁波制导武器和干扰通讯电波。FF—11A“乌鸦”式飞机发射出强大的干扰波，使伊军地——空通讯联络、地面雷达、以及飞机和导弹中的雷达制导系统全部失灵。

对此，法国《巴黎日报》以《电子战的真正胜利》为题，报道说：

“当美国第一批‘战斧’式巡航导弹飞向巴格达时，电子战达到了最激烈程度。据证人说，连巴格达电台的广播都听不清楚。

“这是一场隐形战争，战斗员根本看不见。6 个月来，所有的卫星、监听、破译和照相处理手段详尽截获了伊拉克领土上空的全部无线电联系，美国人把截获的数百万信息输入电脑，处理分析，极其精确地制定了进攻计划。此次 1300 架次飞机空袭的前锋是最先进的 AGM—88A‘哈姆’式反雷达导弹。它的红外线传感器可以发现一个普通微电脑发出的热辐射。它可以越过敌区（电子干扰装备）咬住目标加以摧毁。

“美国的 AGM—88A 导弹轻易地摧毁了敌方电子装备，因为这种导弹有两种使用方法，第一种是飞行员在空中预先咬住目标后发射；第二种是盲目发射，无定向飞行，直到发现地面雷达的超高频信号，咬住目标俯冲。它可在 500 至 6 万英尺之间的高度发射，可飞行 20 公里。美军使用的第二种导弹是 AGM—64D‘小牛’式导弹，弹头装有微型摄像机，一旦发射后，可供飞行员遥控飞向目标。这种导弹速度为一马赫，射程 32 公里。”

在这样强大的电子战的掩护下，多国部队的隐形飞行、巡航导弹、战斗轰炸机直抵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上空。当时伊军毫无察觉，巴格达夜空灯火通明。因此，当 F—117A 隐形战斗轰炸机投放的炸弹在电信大楼内猛烈爆炸时，伊拉克防空部队尚无反应，直到爆炸后 10 分钟，记者才听到防空武器的枪炮声。与此同时，F—4G 反辐射导弹攻击机把一枚枚反辐射导弹送入雷达波束，这些导弹能沿着雷达发射的电磁信号路径直射雷达干线。多国部队的战斗轰炸机都带有先进的电子自卫系统，可以有效地欺骗和压制敌方雷达。在这样大规模的、综合的电子作战兵器的攻击下，伊拉克的防空系统完全瘫痪。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说：“这次在伊拉克的夜空中发生的一阵接一阵的爆炸声，已开始了战争的一个新纪元，人们称之为高技术战争。”

“人们谈论的已不再是炮火支援和大规模轰炸行动，而是‘外科手术式的切割’、‘智能武器系统’、‘精确命中率’和‘计时作战行动。’”鲍威尔说，“过去的摩托车通讯兵和手摇战地电话已成为往事。新式电子武器都是在近 40 年里研制出来的。其中还包括任何雷达都捕捉不到的魔影般的隐形轰炸机，”

在这场电子混战的 1.2 万米高空，有若干个“空中指挥堡垒”，即 E—3A 型空中预警飞机。在这些指挥部里，军官们坐在几十个电脑前，从空中指挥并协调攻击行动。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写道：“他们几乎就像在玩一种杀人的电子游戏。”

在海湾战争第一阶段混战中，美军使用了 10 多种最新式战斗机、攻击机、轰炸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F—117A 隐形战斗机。

美机还大量使用了高精确度的“灵巧炸弹”。它的最大特点在于使用了激光制导系统、红外线制导系统或电视制导系统。在电视制导系统中，飞机上的机组人员可通过安装在炸弹上的电视摄像系统传回的图像信号来随时校正炸弹路线，使之准确地飞向攻击目标。由于这类炸弹制导系统十分先进，所以飞行员可在防空炮火之外进行投掷。

在波斯湾、红海、地中海的水域里，美国有 7 艘航空母舰，其中“罗斯福”号最为先进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可载 95 架飞机和 5000 多名海军官兵。每艘航母上都配有远程导弹，又可载 40—100 架的各类作战飞机，因此，它们实际上是 7 个大型军事基地和飞机场。这些航母均受电子操纵，它们对美国掌握制海权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在陆军地面作战方面，美军先进的 M1A1 坦克和“布莱德利”战斗装甲运兵车是主战装备。此外，美军还拥有上千架 A—10A 反坦克攻击机和“阿帕奇”反坦克攻击直升机。A10A 反坦克攻击机可在超低空范围内对敌方坦克实施有效攻击，装备有“小牛”反坦克导弹，配有激光和红外线瞄准装置，可携带重达 8390 公斤的武器，是挫败坦克攻击的有效武器。

在美军的高科技主体作战中，电子计算机发挥了中心作用。从华盛顿的五角大楼到沙特宰赫兰的多国部队总司令施瓦茨科普夫将军的作战指挥室，从每个军师的指挥部到连排基层军官的小皮箱，大大小小的微机在紧张地工作。

五角大楼里有一套叫做“全球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的计算机。施瓦茨科普夫的电脑系统叫“现代战争规划系统”，它专门用来帮助这位美军司令模拟战场情况，设计作战方案。

美国国防部还有叫做“联合部署系统”的电子计算机指挥网络，美空军则有“储存物资控制和分配系统”。比较重要的还有“军队战队服务支援系统”，为部队提供伤亡情况并提供药品服务等等。

海湾战争是一场高科技军事战争，它向人们提供了现代战争的典型模式，也充分证明了电子战在现代战争中的巨大作用。

六、“沙漠军刀”快刀斩乱麻

“沙漠风暴”行动取得圆满成功，空中打击给萨达姆以重创，但萨达姆仍占据着科威特，在这种情况下，代号为“沙漠军刀”的地面作战开始了。

2月24日，正是中东地区的凌晨时分。此刻，设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一应大楼内的美军司令部灯火通明，充满着紧张的气氛。进进出出的男女军人全部步履匆匆，神情严肃。

作战室内更是一片繁忙景象。

身高体壮的施瓦茨科普夫将军站在沙盘前。两片很薄的嘴唇紧闭着。不时看看腕上的手表，在室内来回踱着步子。

前线不断传来消息：各路大军已按预定时间抵达出击地点；装满炸弹的飞机正在一批批地轮番轰炸指定的目标；载有1.8万名海军陆战队员的两栖登陆舰队已向科威特海岸逼进；空降师业已登机待飞……

然而，施瓦茨科普夫在攻击时刻到来之前却显得有些不安。

这位被人称为“敢冒险的军人”对中东地区作过多年研究，深知这场战争的风险。尽管经过一个多月大规模空袭，萨达姆的地面部队受到很大削弱，而且他和他的将军们对“沙漠军刀”计划进行了反复推敲，并讨论了所设想到的每个细节和应变措施，但对萨达姆精心布下的防御阵式，仍无迅速取胜的把握。如果真像外界猜测的那样，陷入“第二个越南战争”的泥潭，那对美国来说就等于是失败。

为了有效地利用前一阶段的空袭成果，一举冲垮伊拉克的防线，施瓦茨科普夫下了一个充满风险的大赌注，他把30万美国地面部队和数万盟国部队一字排开，准备全线出击，后面只留下一个美军师和部分沙特部队。采取这种后来被称为“胆大包天”的部署，如果成功，多国部队就能实现速战速决的目的，如果受挫，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就很难预料了。多国部队的后方已非常空虚了，可见，施瓦茨科普夫的担心并非是多余的。但，事已至此，只得全力以赴，见机而行了。

当地时间凌晨4时，根据施瓦茨科普夫的命令，多国部队的先头部队相继跨过科伊边界和沙伊边界，一场事关全局的地面攻势终于展开，几十分钟之后，华盛顿的五角大楼向全世界宣布：海湾战争的“最后决战”已在24日格林威治时间1时开始。

最先发起进攻的是助攻方向上的美海军陆战队和牵制方向上的阿拉伯国家的军队。

然而，天公不作美，此刻天空中大雨滂沱，地面泥泞不堪。先头部队为了预防伊拉克狗急跳墙使用化学武器，全部穿着臃肿的防化服，迈着沉重的步伐行进在沙漠中，远看去像一群外星人入侵者。沙特阿拉伯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部队负责进攻海岸附近的伊军最坚固的工事。在它们左面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第1师和第2师，这两个师由海军陆战队驻海湾地区司令沃尔特·布默中将亲自指挥。海军陆战队的任务是突破伊军防线，攻占科威特城。

工兵在部队进攻之前已在伊军的雷区炸开一条条前进的道路，陆战队的坦克和装甲车排成长长的纵队从通路上向前开进。在此之前，空军的飞机还向陆战队进攻的地段上投掷了汽油弹。把伊拉克用来迟滞美军前进灌油壕沟里的石油引燃烧掉，推土机和装有推土铲的坦克则把深壕填平。

海军陆战队的推进很顺利，遇到的抵抗是软弱无力的。这说明前一阶段

的空袭效果是非常好的。施瓦茨科普夫终于放下了心，他决心提前 14 个小时发动主攻。

担任主攻任务的是美国第 7 军的 5 个师和英军第一装甲师，它们从伊科沙三国边界汇合处由南向北发起猛烈的进攻。美第 1 骑兵师率先冲过边界沿巴廷于河河谷向北虚晃一枪，深入到伊拉克部队最集中的地方，然后突然调转方向，向西推进，直插伊拉克腹地。美第 1 骑兵师突破了伊军的一个布雷区，为英国第 1 装甲师扫清了前进道路。美第 3 装甲师冲过边界后，避开了伊军防线的正面，在荒芜人烟的沙漠中兜了个圈子，从北面伊军的后背发起了进攻。伊军对美军第 3 装甲师的这一招毫无防备，他们的大炮由于固定在修筑的工事里，无法调转炮口，所以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美军的坦克冲了上来。

多国部队全线出击了。到 24 日下午，在 500 公里战线上，11 路大军相继突破伊军防线，进入伊拉克和科威特境内。天空中，轰炸机、攻击机不停地袭击伊军阵地和后方交通线，战斗机在空中往来盘旋；地面上，坦克和装甲车隆隆开进，炸弹从空中、海上和陆地向伊军阵地倾泻。整个战场上硝烟弥漫，爆炸声、战车和飞机的吼叫声交织成一片。11 路大军犹如 11 把“军刀”直插伊军腹地，在飞机的掩护下，冒着大雨和炮火冲向各自的目标。

在同一时刻，美国总统布什、国防部长切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及其他一些高级官员都聚集在白宫的总统办公室里。前线传来的消息是令人高兴的。布什和他的顾问们既感到意外，又感到振奋。鲍威尔预言：这场战争将在 3 月 1 日结束。

巴格达萨达姆的地下指挥部。作战室里一片忙乱景象。前线不时传来伊军阵地被攻陷的战报。萨达姆已经预感到形势的不妙，战局已经越来越对伊拉克不利了。但天生的倔强性格使萨达姆根本不考虑再打下去的后果，仍下令对多国部队实施反击。然而，此时伊拉克和科威特境内已处于多国部队空军的严密监视之下，伊军哪里还敢离开阵地去进行什么反击，萨达姆的命令无疑是想让他们以卵击石。

多国部队继续向前推进。美国第 101 空中突击师在建立前进基地后，又多次采取“蛙跳”战术，在伊拉克纵深 200 多公里的纳西里那和巴士拉以北地区再次实施机降，两天内前进了 160 公里，配合地面部队突入到幼发拉底河畔，切断了 10 万伊拉克共和国部队北撤的退路。法国第 6 装甲师在前进中攻占了伊军的一个机场，击溃了伊拉克的一个步兵师，随后又兵不血刃占领了塞勒曼城。

26 日，美军第 7 军开始向伊科北部边界进击，其任务是消灭伊拉克共和国卫队，攻占军事重地巴士拉。

共和国部队不愧是一支劲旅。尽管在前一阶段的 38 天空袭中，它的实力受到很大的削弱，但面对多国部队上千辆坦克的进攻，它仍顽强地坚守着阵地。在这里，多国部队遇到了展开地面进攻以来最强硬的抵抗。

几次冲击受阻后，第 7 军急招飞机前来支援。没一会儿，一群“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和 A—10 攻击机从远处天际闪出，急驶而来。“阿帕奇”从 5 公里以远的距离上向伊军坦克发射一枚枚“海尔法”反坦克导弹，而 A—10 则从更远的距离上发射“小牛”导弹。地面上，M1A1 坦克在 2000 至 3500 米的距离上也不停地怒吼。共和国部队的抵抗不能说不顽强，但怎经得住美军这空地一体的立体打击。共和国部队终于顶不住了，防线被撕开了个口子。为防止被围歼，共和国部队的 3 个装甲师，既依赖真主师、麦地那师和汉穆

拉维师，只好丢弃阵地向东撤退，奔向巴士拉。

眼见多国部队的 11 把“军刀”直插过来，萨达姆明白，对他来说败局已定，只是时间问题，如果再硬撑下来，只会招至更惨重的损失，弄不好部署在科威特的几十万大军将全军覆没。于是，2 月 26 日，萨达姆下令在科威特的伊军全线撤退，这等于是向多国部队摇起白旗。

然而，布什总统不愿看到就要到手的胜利功亏一篑，他命多国部队继续进攻。这正合施瓦茨科普夫的意，这位四星上将指挥 11 路大军展出了一场追击战。

由于路面和桥梁均受到严重破坏，交通阻塞，伊拉克成千上万的车辆拥挤在一起，完全暴露在中多国部队空军的打击之下。成了轰炸机的活靶子。霎时间，在通往伊拉克腹地的各条公路上爆炸声震耳欲聋，火光冲天。公路上燃烧的军车排出几十里，形成了一条条巨大的火龙。

越来越多的伊拉克士兵在围攻中缴械投降。一个多月来，由于多国部队的狂轰滥炸，伊军后勤补给线被切断，他们一个个蓬头垢面，衣衫破旧，很多人身上长满了虱子，他们一天只能吃一顿饭，而这顿饭只是一个 4 两重的面包。许多人生了病，但却因缺少药品而得不到治疗。

26 日上午，美国海军陆战队完成了对科威特城的包围，但那几乎已成了一座主城。27 日凌晨，一支由坦克、装甲车组成的车队从沙漠深处奔驰而来。坦克上插着科威特国旗，在晨风中飘扬着，脸上挂着欣喜的泪水。他们在为打败萨达姆而欢呼，他们在为重新夺回被伊拉克蹂躏了 7 个多月的首都而欢庆。

2 月 27 日，布什总统召集他的战时委员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前线传回的战报表明伊拉克军队已全部撤出科威特，战争的预期目的已经实现。有一位官员建议布什在 28 日宣布停火。布什沉思了一下说：“我要在今晚宣布停火。同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商量一下。”鲍威尔转身操起电话，把总统的决定告诉施瓦茨科普夫，此时，这位前线司令正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听到让他停止进攻的命令后大感意外，他当即建议继续进军。鲍威尔提醒他，总统决心已下，命令不能更改。这位直率的四星上将只好嘟嘟囔囔地接受下来。

布什的助手们注意到，午夜停火标志着地面进攻战正好打了 100 个小时。布什很喜欢这个整数。于是，海湾的枪炮声就在午夜时分停了下来。

历时 42 天的争斗终于偃旗息鼓。在这场战争中，伊拉克的战争机器遭到严重破坏。战争中，伊军共死伤近 10 万人，被俘 17.5 万人，损失坦克 3700 辆、装甲车 2000 余辆，火炮 2000 余门，飞机 150 余架，其各种经济损失超过 2000 亿美元。与此相比，多国部队的损失则显得微不足道，仅伤亡 600 余人，被俘 11 人，损失飞机 49 架。战争打成这样的结局，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要原因是多国部队占了高技术装备上的优势。

战争实践表明，战前人们对这场越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战争进行种种推测大多都应验了。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人们猜测的将爆发一场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世纪性坦克对攻战没有出现。本来多国部队的坦克和装甲车数量要少于伊拉克军队，但一战下来，仅 100 小时，萨达姆的装甲大军就被摧垮了，形成一边倒的局面。这里固然有多国部队的坦克质量普遍优于伊拉克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多国部队掌握着制空权，使伊拉克的坦克部队受到严重的空中威胁。实践结果表明，伊军损失的坦克和装甲车中，大多数是

被多国部队的 A—10 攻击机、AH—64 攻击直升机、B—52 轰炸机等飞机击毁的。于是，这场发生在幼发拉底河畔的角斗向人们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在现代条件下，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坦克部队的作用将受到极大限制，空中力量已经对曾威风一时的装甲大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美丽的幼发拉底河畔，在经历了 38 天加 100 小时的战火之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这种平静只是暂时的。在后来的日子里，美国等几个西方强国仍不断向萨达姆发难。

七、再让萨达姆尝尝厉害

“沙漠风暴”行动狠狠地教训了一下伊拉克，但萨达姆仍是伊拉克的总统，他平息了库尔德人的“叛乱”，打败了什叶派穆斯林“反叛分子”，至今牢牢掌握大权，稳坐宝座。这不仅使美国的胜利失去了耀眼的光环，而且有关这场战争的争论如今成了人们非议美国政府决策能力和领导能力的话柄之一。因此，如何除掉萨达姆政权，给海湾战争的胜利打上一个完整的句号，成了美国政府的一块心病。

美国认为，彻底摧毁伊拉克的武器生产能力，防止萨达姆卷土重来并使其丧失权力基础是对伊政策的一个重点。1991年8月和10月联合国安理会分别通过第707、第715号决议，要求伊拉克提供它所拥有的化学武器、生物武器、核武器及导弹能力的全部情况，并规定将伊大部分军用和部分民用工业置于联合国的永久控制之下。

1992年2月19日，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未能执行联合国决议一事提出严重警告，并决定派代表去巴格达督促决议的执行。2月28日，安理会再次发表声明，谴责伊拉克在销毁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上没有同安理会合作。安理会当日主席、美国代表皮克林指责伊采取拖延战术，以回避销毁某些导弹的义务。

7月5日至25日，联合国派往伊拉克的核查组对伊拉克农业部大楼进行核查时，遭到伊方拒绝。美、英、法三国威胁要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这使伊拉克继1991年7月之后又经历了一场危机。双方相互作出要妥协让步，紧张局势才得以缓和。

同时，联合国为保护伊拉克库尔德族人，先在伊北纬36度线以北地区建立“禁飞区”，禁止伊拉克飞机进入该地区上空；8月，为保护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又在伊北纬32度线以南建立另一个“禁飞区”。并宣布“关于要击落进入北纬32度线以南的任何伊拉克飞机”的决定于当月27日生效。

10月3日，安理会没收伊拉克大部分与石油有关的资产，作为在叛乱分子控制下的库尔德人购买食品和药品的权宜措施。

10月9日，伊拉克保安人员在伊科边境的非军事区逮捕了美国人查德·霍尔。伊拉克次日把他交给联合国。

10月26日，联合国检查小组说，巴格达提供的关于其弹道武器计划的情报有很大出入。

11月23日，联合国标定伊拉克和科威特陆上边界上工作宣告结束。

11月24日，安理会断然拒绝伊拉克提出的放宽贸易制裁的要求。

12月27日，美国针对伊拉克企图渗透到伊拉克南部上空的“禁飞区”的做法，将“小鹰”号航空母舰从索马里沿海水域调到海湾。

美国通常有一艘航空母舰派驻在海湾——阿拉伯海地区。但是自从美国在1992年12月初在索马里集结以来，这一水域就没有航空母舰了。“小鹰”号航空母舰是不久被派到索马里沿海水域的。这艘航空母舰通常有70架作战飞机和5500名士兵。

12月27日，美国飞机使用“阿姆拉姆”中程空对空导弹，在伊拉克南部和“禁飞区”击落一架伊拉克米格飞机。

28日，数架伊拉克喷气式飞机再次越过32度线，进入“禁飞区”，美军战斗机奉命截击，伊拉克飞机逃之夭夭。

由于伊拉克空军在海湾战争中损失惨重，因此没有能力同盟国空军进行大的较量。

1993年1月5日，伊拉克将防空导弹运进南部“禁飞区”。导弹的调动可能意味着，伊拉克正在预行采取行动，以防止美国以违反禁令为由可能对它的军事设施发动突然袭击。

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说：“我们正在监视导弹活动情况，我们非常担忧。我们仍在考虑我们的选择。”

国防部长切尼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小鹰”号航空母舰已在海湾停泊就绪，正严密监视伊拉克近来在南部禁飞区的行动。

切尼警告说，如果萨达姆以为当选总统克林顿不会像布什总统那样要求伊拉克遵守联合国决议，“那就大错特错了。”1月7日，美英法在俄罗斯的支持下，要伊拉克在48小时内把防空导弹撤出禁飞区。伊拉克拒绝这项最后通牒。与此同时，联合国安理会警告伊拉克，必须允许联合国的飞机自由出入伊拉克。伊拉克拒绝了安理会的警告，说联合国官员必须使用伊拉克的交通工具。

1月9日，白宫说，伊拉克作出让步，同意遵照最后通牒办事。伊拉克说，它没有这样做。就在同一天，萨达姆的首席新闻秘书穆赫辛在伊拉克政府报纸《共和国报》头版发表文章说，伊拉克人“别无选择，只能为了生存进行抵抗和战斗”。1月10日，伊拉克不许一架联合国飞机着陆。数百名伊拉克士兵闯入科威特境内，并发动了90分钟的袭击，抢走了一些武器，其中包括“蚕”式导弹。

随后，伊拉克不顾联合国的强烈抗议，公然连续4天入侵科威特领土，并宣称要“收复失地”。

萨达姆如此无视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时对他的军事行动所作的种种限制，再次嘲弄了联合国并对美国政府进行公然的挑衅。美国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一忍再忍。

1月13日当地时间18点45分（格林威治时间13日17时，北京时间14日凌晨1时），110架美国和盟国的先进战斗机从各自的基地起飞，袭击伊拉克南部禁飞区内或附近的指挥控制中心及地对空导弹发射场。来自“小鹰”号航空母舰上的35架飞机是这支力量的主力。

当地时间21点15分——21点45分，作战飞机轰炸了塔利勒、约杰夫、塞马沃和阿马拉4个军事目标，巴士拉和塔利勒附近的机动萨姆导弹发射场受到袭击。

伊拉克发射高射炮，但没有击中任何目标。

空袭非常成功，所有要轰炸的目标都“被炸得七零八碎”美国使用了高速反辐射导弹，它能自动寻找地面发射的雷达信号，并用40磅的弹头将其摧毁。

据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表的一项公报说，这次空袭造成伊拉克19人死亡，15人受伤，其中有军人也有平民。

这是自“沙漠风暴”行动以来海湾地区最大空袭。这一天距海湾战争爆发两周仅差4天，离布什告别白宫仅差7天。

战机返航一个小时之后，菲茨沃特在新闻界的焦急等待中露面，他声称三国空军完成了预定任务，无一损失。他的话很强硬：如果伊拉克再次“挑衅”，盟军方面保留在不发生任何预先警告的情况下再次打击的权力。他向

报界声明说，这是一次短促而有限的军事行动，目的是为了维护联合国关于在伊拉克设立禁飞区的决议，要求伊拉克必须严格遵守有关海湾战争的一系列决议。

当选总统克林顿在空袭之后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对布什的决定表示无条件的支持，并向萨达姆预先发出“克林顿时期”的警告。他说“我的政策同现政府的政策没有什么不同。”

克林顿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入选者塞缪尔·伯杰也在美国有线新闻电视公司《星期天新闻人物》电视节目中说：“我们将实施禁飞区，克林顿总统将同布什总统一样，决不能容忍对这一行动的任何威胁。”并指出，克林顿政府将会“基本延续”布什政府的政策。

美英法三国空军对伊拉克的空袭，只是“有限度的军事行动”，然而却不排除在不发生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实行再次打击。海湾局势被这突如其来的骤变搅得更不安宁。一个美军突击营正在开进科威特，以防不测。驻德克萨斯州的美陆军第一机械化师 1200 名军人 15 日也开进科威特。布什总统在白宫发表讲话，称空袭行动是“出色的”，梅杰首相也说这是对萨达姆的一次教训，两人互相打电话祝贺。

继 13 日空袭之后，17 日，美国飞机又空袭了伊拉克地对空导弹基地，并在伊拉克北部击落了一架伊拉克战斗机。18 日，美、英、法三国的战斗机再次轰炸了伊拉克北部和南部的防空设施及导弹基地。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阿斯平说，伊拉克正把导弹运回南部禁飞区。美国又有一艘舰只开进地中海。

难道果真如古代预言所说，中东是一片永不安宁的土地吗？时至今日，这里仍是世界的焦点。

第二十三章 美军在索马里不能一走了之

- 一、“非洲之角”战火遍地
- 二、美军进驻摩加迪沙：缴枪不杀
- 三、艾迪德扬言发动大规模圣战
- 四、美国人该怎么办

一、“非洲之角”战火遍地

位于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可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央政府、军阀各自为政的国家。在这个连年饥荒的国度，人们挺而走险，发动了无边际的军阀派系冲突，内战使原本就已陷入了水深火热境地的贫民更难维持艰辛的生活，而军阀们除了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外，并无意使战火平息。再加上这军阀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和奇特，不同于当前世界别的热点地带，因此，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索马里，过去很少有人知晓，也不为人们所关注，现在却成了世界上的一个热点地区，新闻不断报道那里发生的事件，弄得联合国都觉得不好办。而号称世界第一强国的山姆大叔也身陷泥潭，欲拔不能。

联合国的维持和平部队在那里也时常遭致攻击，这是历史上少有的事。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一种使联合国下了很大力气都未能解决的局面的产生？这还得从索马里这个国家说起。

索马里位于非洲的最东部。由于它像一支巨大的牛角插入印度洋，因而它也被称为“非洲之角”。人口约 840 万，面积不足 64 万平方公里。整个国家是一个农业国，以农牧业和种植业为主，也是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一。

在本世纪初，由阿卜杜勒·哈桑领导的反殖民主义斗争，持续了 20 多年。1960 年国家独立。索马里全国人民同属一个民族，讲同一种语言，信奉伊斯兰教，这样不存在什么民族矛盾。由于索马里国家十分落后，在国内还存在着许多的原始部落。主要有三大部落：北部的伊萨克部族，中部的哈威依部族和南部的达鲁德部族。在每个大部族中又繁衍出许多小的部落。每个小部落就是一个小社会。由此产生了部落之间的矛盾。有时，部落之间争斗得你死我活。这是造成战火不断的主要根源。

1969 年 10 月 21 日，以西亚德·巴雷为首的一批民族主义军官发动了政变，成立了以他为主席的全国最高革命委员会，并停止政党活动。由于西亚德在国内政策上体现“多部族利益均等”，因而一直到 80 年代中期前，索马里政局较稳定。1985 年以后，西亚德走向独裁，任人唯本部族是用，排挤其他部族人士，这样就打破了部族平衡的格局，使得部族矛盾激化。西亚德政府逐渐失去民心。

1988 年 5 月，索马里北部的伊萨克族首先揭竿而起，进行大规模反政府的武装斗争。南部的达鲁德部族也于年底对政府发动进攻。中部的哈威依部族也于 1990 年成立了“索马里联合大会”组织。

1990 年 8 月，三方部族首领召开了一次协商会议，决定联合起来对政府军采取一致的行动，并就设立一个联合指挥部以协商三方部队行动问题达成协议。经过激烈战斗，反对党于 1991 年 1 月 27 日控制了整个首都摩加迪沙，宣布推翻西亚德政府。

随着新政权的诞生，索马里内战按理说应划上一个句号。但是，权力斗争却又使得索马里内战的战火又重新燃起。先是索马里联合大会党内部以临时总统迈赫迪为首的和索马里联合大会党主席艾迪德为首的敌对两会发生严重内讧引起了一场新的内战。而联合大会党夺取政权后宣布成立完全由哈威依部族组成的临时政府，完全不顾其他众多集团利益的做法引起了其他部族的强烈不满。从而其他部族又联合起来向首都发兵。在首都摩加迪沙市区的炮火从未间断过，造成大部分市民流离失所。

临时总统迈赫迪和身兼三职（联合大会党主席、议长、军队参谋长）的艾迪德为首的两派，为了争权夺利，到9月初，矛盾发展到了公开冲突的地步，双方在首都摩加迪沙激战三天，动用了包括机枪、火箭、大炮在内的各种轻重武器，首都硝烟弥漫，造成300余人死亡，700多人受伤。后经调解，迈赫迪虽然作出了让步，但只在政府中为艾迪德自下少量职位，艾迪德并不买帐。

1991年11月，双方冲突再起并发展成为大规模军事作战行动。12月30日，战斗再度升起。

1992年1月4日，迈赫迪集结部队反攻摩加迪沙，激战久久不能平静。

最后，艾迪德武装主要控制首都以北地区，迈赫迪控制首都以南地区。两派矛盾尖锐，联合国和欧共体一直想努力使双方坐在同一张谈判桌上来，都未成功。

祸不单行。对索马里来说，连年的战乱使索马里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近年来又遭受本世纪最严重的干旱，农业一蹶不振，使得原本就十分虚弱的经济更加恶化。战乱饥荒和大量武器流入民间，造成四处打家劫舍的人增多，人人手中有武器，整个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据统计，从1991年到1993年，就有30万索马里人死于饥荒，还有200万人受到饥荒的威胁，每天有1000人濒临死亡边缘。大约100万人逃往邻国。

国际社会也一直关注索马里的局势。

联合国前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曾呼吁交战双方结束冲突和帮助联合国向灾民提供食品援助。

非北约秘书长萨利姆也曾呼吁两派结束内战。

阿拉伯联盟还于1992年1月5日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索马里局势。这次会议作出三点建议：一是要求联合大会党两派在摩加迪沙立即停火；二是成立一个由阿盟秘书长马吉德为首的阿拉伯外长委员会同索马里有关各方接触，邀请索交战双方领导人参加和平会议；三是呼吁建立阿拉伯紧急援助索马里基金，向由于内战而陷于饥饿或无家可归的几十万索马里人提供紧急援助。16日，伊斯兰会议组织也表示支持阿盟为结束索马里内战而作的努力。

1992年7月，安理会通过了一项采取“大规模人道主义行动”的决议，向索马里提供大批紧急救援物资，随后，救援物品被纷纷送到索马里，然而，这些本可以使成千上万妇女儿童免遭饿死的食品运达后却根本到不了饥民手中，反而成了冲突各方和众多的武装匪徒抢劫和为之交战的目标。有的食品甚至被抢走又被偷运出境以换取武器弹药，也有的被匪徒抢走囤积以高价出售牟取暴利。到后来，有些地方武装人员竟然炮击运送救援物资的车队和船只了。

由于军阀混战，匪徒横行，救济食品很难到达难民手中，甚至连运送物资的人员安全都没有保障。

索马里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的乐园和世界上最为悲惨和死亡之地。

在这种时候，“世界宪兵”美国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引述“联合国发展计划”一位顾问的话说，两年来把索马里搞得支离破碎的交战各派一直要有一个大部族出现来收拾残局，美军就是这个大部族。

二、美军进驻摩加迪沙：缴枪不杀

鉴于非洲的普遍情况和索马里的特殊情况，1992年9月中旬，一支和平先遣队在联合国指派下进入战火纷飞的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旨在展开对数以万计的饥民的援助。

这支先头部队面临的是没有统一政府、统一军队、统一警察，然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枪的摩加迪沙，是一个没有为数百万人共同生活提供必需品的“国家”，它没有行政管理机构、司法、能源供应、公路建设、通讯联络，更不用说“党派”或地区性“议会”了，有的只是大大小小的军阀盗匪和每天的枪炮声以及随之而来的流血事件。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因为在这里几乎分不清敌友，人人都有枪，并且武装抢劫已成为数以千计的青年人选择就业机能的唯一行动。因此，联合国和平先遣队除了在一些小型的场合发挥作用外，未能给索马里带来安定。鉴于索马里在联合国干预之下仍然战火不熄，安理会不得不再次派兵，并且以美国部队为主力，登陆索马里，收缴各派军阀的武器，敦促交战各方谈判，使国际社会向饥民的救援物资能无损地送到他们手中，建立一个“进行人道主义救济活动的-safe环境”。但美军认为要让武装分子缴械并清除北部一个庞大的布雷区，再训练一支由当地人组成的警察部队以维护秩序，至少需几年的时间，而美国虽然愿意为此出力，但也不想被陷在那里。

11月25日，布什总统宣布：美国愿意派遣2800人的兵力参加由联合国组成的联合国部队，前往索马里保护救援物资的分发。布什总统之所以出来收敛这个残局，据说他想充分利用他作为美国总统的有限的时间里的每一分钟，为自己的4年任期划上一个漂亮的句号，并希望通过这一行动为自己在美国历史上确定一个位置。

美国发出这个信息后，经过几天协商，安理会于12月3日晚通过了决议，决定派联合国部队前往索马里，以确保救援物资的运送分发。联合国决议通过后，法国、英国、日本、加拿大、摩洛哥、土耳其等国家纷纷响应，表示愿意出兵、出钱、出物。这表明了世界各国对索马里局势的关注和对索马里人民的支援。

安理会依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授权使用军事力量，派遣以美军为主的20多个国家参加的多国部队，于12月9日在索马里展开代号为“恢复希望行动”的武装救援行动。

12月9日清晨，联合国派驻索马里联合国部队中的第一批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附近的一处海滩突击上陆。美军首先进驻摩加迪沙，很快就控制了所有的机场和港口。

与此同时，法国第一批近200名士兵也从邻近的吉布提抵达摩加迪沙，并在摩加迪沙机场附近路口设置了检查岗。联合国部队对索马里的救援行动就这样开始了。

在各国部队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及邻近地区局势迅速好转，安全得到一定恢复，救援食品也开始不断地送往分发点，“恢复希望行动”为数百万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索马里人民带去了一点希望。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进驻索马里后，局势得到了初步控制。美国特使罗伯特·奥克利在美军登陆后24小时之内就安排索马里两大派别头目会面。这样给人们的印象是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为此努力了几个月都未办到的

事，美军一来，便办到了。人们对美军恢复索马里稳定的期望比较高。但，这样一来如果美军有负重望，就会遭到大家的责骂。

美军设想，在索马里的行动将分阶段进行，先占领摩加迪沙机场港口，建立沿海基地，然后逐步向内陆推进。部署和展开既不易而耗时，撤出就更难和要长些时间。

美国一些人担心，索马里可能变成另一个越南。

一个资深老兵抱怨说：“现在，别以为冷战结束，世界太平了，其余全球到处都充满了可能的越南、波黑、中东、安哥拉、海湾、索马里……到处都是新的越军。我们美国老兵虽说对这些都见惯不惊了，但还是希望早一天回家睡大觉。”

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在索马里境内，人人都有武器弹药，秩序混乱，既没有政府，又无警察，这样的无政府状态，无疑是对执行维持和平的部队是一个最大的障碍。

就在美军登陆前，两派武装力量进行激烈交战，48名旁观者死亡，51人受伤。另外，一个部族在港口城市基斯马尤杀害了100多名宗教领袖、商人和其他知名人士。索马里的目击者和美国外交官说，控制基斯马尤的奥加登部族领袖奥尔马·杰斯的追随者连续三个夜晚挨门搜查，抓到了几十个人，并将他们杀害。他们这样做主要目的是试图除掉可能支持美国人的受过教育的索马里人。

几周前，西方情报机构已经注意到，索马里的各派武装可能估计到国际社会将进行干预，有些地方武装把部队和重武器全部运往内地，一些散兵匪徒则到处贮存大量轻武器。

美国陆战队在街上凡是见到手持武器的人都要进行盘查，并收缴他们手中的武器。美国计划在使用武力的同时，也将采取一些说服的手段。据悉，五角大楼将在已经派往索马里的2.3万士兵之外，再动用1500名特种作战士兵到索马里去，其中包括两个营的“绿色贝雷帽”。

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说：“每个人都同意，索马里必须结束枪杆子的统治，问题是如何做。”同时提出，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美国派往索马里的特使罗伯特·臭克雷能否说服那些武装交出他们手中的武器，实现和平也可能有希望。

在奥克雷和美军司令约翰斯顿的安排下，索马里的最大对立派法拉赫·艾迪德和阿里·迈赫迪举行了首次谈判。经过谈判，双方最后同意结束对摩加迪沙的分割，从街头撤出各自的战斗人员和车辆。但是，这一协议对其他小股的地方势力并没有约束力。而且，这两个头目经过几年交战，积怨较深，能否严格履行诺言，还是个未知数。尤其是艾迪德不会轻易罢手。

那么，艾迪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艾迪德今年60岁，他小的时候，家庭贫穷，是个牧羊童，10岁那年离开家乡到首都上学。在即将毕业的时候，他参加了意大利军队，1956年升为中尉。他曾因参与部族冲突，被前总统关进监狱达6年之久。1989年，他成为索马里最大的反对派索马里联合大会的领导人。当他于1991年初到达摩加迪沙时，先期到达的迈赫迪已宣布担任索马里临时总统。艾迪德见此，坚决反对，于是与迈赫迪拉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经过4个多月的交战，艾迪德控制了摩加迪沙80%的地区，成为索马里最有军事实力的部族首领。

三、艾迪德扬言发动大规模圣战

“恢复希望行动”执行几个月后，索马里的饥荒有所缓解，首都摩加迪沙和邻近地区的治安开始好转。特别是多国部队强大的军事压力，使各派武装力量间的冲突大为减少，局势没有再恶化。

然而，在维持和平部队收缴两派手中的武器时，触动了各部族头领的自身利益，他们觉得这样下去将会动摇自己的权力，说话的份量将减轻。为此，艾迪德对联合国索马里行动极为不满。美国一些研究人员也曾提出这个建议，索马里也有人赞成这么做。

一些穆斯林领导认为，只要“一点钱”，就能让一般平民把武器交出来；不肯交出的，再以武力对付。教授组织也普遍支持这一建议。在联合国，也讨论过这种建议，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必须同时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一位官员说：在没有一项政治解决办法的情况下，进行这种交易是不可行的。因为，索马里人不会交出他们的武器，除非能得到保证，敌对部落不再攻打他们。

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在初期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一是交战双方的头目——摩加迪沙南部的艾迪德和北部的迈赫迪的言和；其二是救援物资得以运到索马里全国各地，分发到饥民手中；其三是各派政治势力于 1993 年 1 月达成协议，同意在 3 月中旬举行全国和解会议。

1993 年 2 月底，艾迪德主动发动了一场暴乱。美国士兵成了索马里枪手们的射击目标。有 6 名美国士兵丧生。

紧接着，美军和法军两次采取大的军事行动，一次摧毁 3 辆向美军直升机开火的索马里人的武装车辆，一次向 1 辆强冲路障的小货车开火，先后打死多名索马里武装人员。

分析家说，艾迪德在索马里首都掀起的骚乱目的是显示他的政治实力。他想告诉美国人，在索马里恢复法律和秩序仍然主要取决于他。美军最高司令部担心的不只是艾迪德成功地在幕后策划和指挥了暴力行动，而且还担心暴力行动会迅速蔓延。

艾迪德在电台发表讲话，扬言要对美国部队发动一场大规模圣战。

在美国采取了强硬行动后，3 月 28 日，在联合国主持下，索马里的 15 个政治派别参加了和解会议并达成了和解协议。长期内战的索马里人终于迎来了和平的曙光。

事实上，事态并没有像人们顶想的那样向前发展。

索马里人一天比一天大胆，外国军队刚到索马里时，他们对现代的军事装备感到恐惧，冲突和抢劫行动都有所收敛，派系斗争转到了军队不管的地方。但是他们现在不再害怕以美国为首的大批驻军了。

记者们看到，摩加迪沙街道上武器绝迹几天，又陆续出现了，先是手枪，然后是 AK——47 步枪。美军驻地几百码之外，就可见到索马里人手持武器走来走去。

5 月 4 日，美国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定把军事指挥权移交给土耳其将军北切维奇，美国海军陆战队大规模从索马里撤军，首都的安全主要由联军中的 4000 名巴基斯坦军人负责。

人们刚为索马里的事松口气，蓝灰部队与武装分子之间的流血事件就接踵而至。

6月5日，巴基斯坦军人到艾迪德控制的“摩加迪沙”电台附近，对其中一个军火库作例行检查巡视时，突遭艾迪德武装分子的袭击。23名巴基斯坦士兵丧生，57人受伤，受伤士兵中包括3名美国人。该部队奋起组织还击，有40多名索马里人被打死，131人受伤。美军一个连在直升飞机掩护下，立即前往营救。

同一天，80名巴基斯坦军人和10名美国军人被艾迪德武装分子围困在一个用旧烟厂的装的军火库中，直到意大利军队12辆坦克和6辆装甲车来营救，才突围出来。这次流血事件是30多年中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死伤人数最多的一次战斗。

流血争斗、抢劫一类的事又在多国部队眼前发生了。军事人员说，他们在护送的路上发现的石块越来越多。一些年轻人向维和部队发射火箭。有的索马里人在美国军车前慢慢地行走，他们的同伙则在车后试图偷走车上的东西。

为此，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一项决议，授权维持和平部队在执行第二阶段恢复和平的使命时可以使用武力，对那些胆敢干扰破坏和平行动的人员给予有力打击。决议中还向第二期联合国索马里行动提供包括装甲运兵车、坦克、攻击直升机和运输工具在内的紧急援助。安理会还支持加利秘书长关于扩大第二期行动的报告，将现有的16700名官兵迅速扩充至2.8万名。

6月8日凌晨，巴基斯坦官兵又遭袭击，其后两天，有数百名联合国官员和救济人员撤离索马里。

为了对索马里的艾迪德武装进行打击，6月11日，联合国在索马里行动总部发表声明，将对肇事者严惩不贷，以期恢复和平行动。

四、美国人该怎么办

6月12日凌晨，两架AC——130“幽灵”型特种作战飞机和数架AH——1W超级眼镜蛇直升机打破了平静的夜空，对艾迪德武装营地实施了第一次轰炸，摧毁了艾迪德控制的电台和4座弹药库。天亮以后，美国陆军1200名快速反应部队和11国联军突击占领了摩加迪沙多处战略要点，逐户搜查艾迪德和他的4名助手，逮捕了200多名当地武装分子，缴获了一批坦克、大炮和重武器。

6月13日，联军发动第二轮空中袭击。14日凌晨2点，联军发动了持续90分钟的第三轮空袭，继续对艾迪德的军事目标进行轰炸，摧毁了30多辆配备了机关枪的军用吉普车。

6月17日凌晨1点35分，联军开始长达4小时的第四轮空袭。艾迪德总部大火燃起，不久就成了一座废墟。联合国驻索马里特别代表乔纳森·豪上将立即正式命令联军总司令逮捕艾迪德。上午11点，巴基斯坦士兵首先攻入艾的住所，但艾迪德已逃之夭夭。

由于艾迪德自6月份以来不断制造流血事件，联合国安理会曾一致通过837号决议谴责这一事件，并要求缉拿凶手，绳之以法。联合国决定将对艾迪德以犯有反人类、反对联合国部队和煽动暴力等罪予以起诉。由于这种做法在联合国的历史上尚属首次，为了解决这一行动的法律问题，一组联合国的律师被派往摩加迪沙，指导联合国部队执行对艾迪德的逮捕令。

6月30日，联合国部队中的美国部队指挥官下令以2.8万美元悬赏捉拿艾迪德，不论是死是活，一定要抓住艾迪德。

然而，自1993年6月以来，艾迪德的800人的武装与联合国的2万多部队周旋，游刃有余，终不为美军所获。这使得美军大丢面子。这一方面是他有部族的支持，熟悉首都的一草一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多国部队在突击中造成很多平民的死亡，激起民愤，而使各部族的索马里人纷纷反对占领军，倒向艾迪德。

9月9日，美军“眼镜蛇”式武装直升机向人群频频发射20毫米炮弹，使妇女、儿童在内的203名平民死亡，349人受伤。

美国向艾迪德的不断进攻，使得驻索美军成了众矢之地，一举一动都受到索马里人的监视。就连驻索机构的文职人员白天也不敢上街，下班都要用直升机载送回家。

9月28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美国今后的目标应该是把索马里的事情交给索马里人自己去管和“给参与维持索马里和平的国家的脱身确定一个日期”。这说明美国人已在改变他们在索马里的战略。

10月3日，由于索马里的奸斗分子在摩加迪沙击落2架美国直升机，因而爆发了一场战斗。5名美国人丧生。那天，美国别动队——美国陆军训练和装备最好的部队之一，在袭击艾迪德的助手们开会的秘密场所后的撤退途中，在摩加迪沙大街上被艾迪德的部队击溃，由于救援部队迟迟不能赶到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长达15小时的激战中，美军的伤亡率高达70%。

到10月初为止，在索马里的包括美国在内的维持和平部队的人员死亡人数共达64人，至少有214人在战斗中受伤。

由于上述一些恶性循环的暴力事件不断发生，使得参加维持和平行动的国家表示严重担忧。有人提出，维和部队过多使用暴力，与恢复和平的目标

背道而驰。

对此，参加维和部队的国家之间及与联合国关于如何处理索马里问题产生分歧意见。争议开始是由意大利单独与艾迪德支持者会谈而引发的。7月2日，3名意大利士兵被索武装分子打死。为这件事，意大利维和部队司令洛伊和艾迪德支持者进行了会谈。这可是违背了联合国作出的关于维和部队的任何参加国不能单独与艾迪德进行会谈的决定。于是联合国就决定让洛伊尽快离开索马里。意大利政府立即作出强烈反应，认为洛伊是否离开索马里应由意大利政府来决定。

意大利政府认为，联合国应该停止在索马里的军事行动，这样才有利于通过和平方式在索马里恢复和平。这一观点得到了德国和法国的支持。

美国一直主张对艾迪德武装采取强硬的措施。美国认为，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追究杀害4名美国士兵的凶手及其幕后者。联合国方面也立场坚定，其特别代表乔纳森·豪将军重申，联合国维和部队致力于解除索马里各派武装，把艾迪德绳之以法。

随着伤亡人数的增加，美国国内对美军的出兵也议论纷纷，国会有人提出要求美军从索马里撤军。另一些国会议员批评说：正是因为目前美军在索马里执行的政策与索马里的实际不符，而索马里内战没有停下来，反而使联合国也卷进去了。

联合国维持和平内部出现意见分歧，甚至分裂，这正中艾迪德的下怀。

艾迪德一开始就不喜欢联合国在索马里的存在，他认为联合国是他夺取总统宝座的障碍。所以，在美国把多国部队指挥权交给联合国后，他让他的支持者拿起武器，走向街头，向维和部队展开了一场游击战。艾迪德不断煽动索马里人反联合国的情绪，并向联合国在索马里存在的合法性提出挑战。要求是他所有部队撤出索马里，让“索马里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看来，艾迪德在某种程度上已达到了目的，因为联合国维和部队已不知不觉地变成了索马里土地上交战的一方。目前，一些索马里人对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信心已大大减弱，他们认为联合国维和部队已不再是一支能保护他们生命安全的中立力量。

10月7日，法国国防部长莱奥塔尔尖锐地批评了美国在索马里采取的行动，指责美国的所做所为超出了人道主义使命。他说：“索马里的行动渐渐偏离了原定目标，明显地变成了不能容忍的对抗，而且其态度也不能为索马里人所理解。”

国际舆论谴责声更激烈。德国报刊称美国“在索马里进行的是一场肮脏的战争。”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萨利姆说：“在索马里的暴力行动已损害了联合国在那里的基本救援目的。”

美国与联合国在索马里问题上的合作分歧不断地扩大。分歧之一是联合国部队在索马里的使命问题，这也是他们之间的根本分歧。美国认为，他们的目标是给这个受饥荒摧残的国家带来稳定，而联合国却想在这片废墟上重建这个国家。另外一个分歧是将艾迪德从政治舞台上清除掉有没有必要。联合国虽然签发了逮捕令，美国军队的指挥官也宣布要悬赏捉拿艾迪德，但是，最近美国却暗示，其今后的目标不再是抓艾迪德。

随着武装冲突不断加剧，摩加迪沙的安全保障越来越差。新闻记者和救护人员出门时不得不带上保镖。人道主义救援活动也因缺乏安全保障而大大减少，维和部队尽量从空中进行巡逻。

观察家指出，在大批武器尚流散在索马里人手中的情况下，任何平静都是短暂的和虚假的现象。

在8月6日的时候，索马里的14个武装派别中11个派别又签署了一项新的和平协议。索马里前总统欧斯曼在签字仪式上说，索马里的利益重于那些追逐权力者的个人利益。他呼吁这11个派别严格遵守协议。

遗憾的是，索马里临时总统迈赫迪、艾迪德和摩根领导的3个派别没有在这个协议上签字。

美国军方发言人弗雷德·佩克说：“我们正迅速地接近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可以不慌不忙地把接力棒交到联合国手中。”佩克上校还指出，在实施“恢复希望”行动期间，人们在索马里共建立了8个人道主义援助区域。目前在这些区域的人道援助工作得到了“安全保障”。他说：“有待解决的问题仍是首都的问题”。佩克上校认为，多国部队也许会考虑有步骤地将指挥和监督权移交给联合国。他还说，重要的是应重建一支索马里警察部队。在此部队建立起来以前，美军的“警棒”接力赛就不能进行。

事实上也是如此。摩加迪沙发生过这样的事：刚登陆的一支美军巡逻队在一屋子内发现大批军火，包括重型机关枪、一箱箱的子弹和一门榴弹炮。美军要收缴，索马里人抗议，巡逻队向上级报告，得到的回答是：“立即上车离开！”事件显示，美军无意在收缴武装上发挥积极作用。一位法国高级军官说：“要解除索马里的武装是不可思议的。”

不久前，红十字会61辆救济车一开出重兵把守的摩加迪沙海港的大门，就受到枪弹的袭击。一伙歹徒从路两边跳出来，疯狂地向车队开火，并抢走一袋袋小麦。

索马里人要求美军继续进驻。但据有关人士称，美军希望索马里人自治的要求如果不被索马里人实施，则美军无意自我一个新的越南。

冷战时期，索马里一直是前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解体后，美国早就想填补这一真空。索马里内乱，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一看机会来了，便积极参加，唱了主角戏。另一方面，这样做美国还可以实现进一步插手非洲国家事务，遏制中东非激进的穆斯林的目的。

非洲国家指出：联合国不应该像海湾战争那样，被利用来使美国的海外冒险合法化。

事情叙述到此，索马里问题并未得到最后解决，要想解决这一问题，还要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一起采取有利的可行的措施，不要把救援行动变成进攻，要逐渐消除旧怨，这些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那么，美国人怎么办呢？正像许多人看到的那样，美军在索马里并不可能一走了之。现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一方面宣布将要从索马里撤军，另一方面却决定增加索马里的美军。

这一切又很难自圆其说。

索马里——又一个令美国人头痛的地方！

第二十四章 附录

- 一、美国十大五星上将简介
- 二、美国的“世界末日计划”
- 三、20世纪美国先进武器装备集萃
- 四、美国总统的黑皮包
- 五、五角大楼探秘
- 六、神秘的美国国家侦察处
- 七、全球美军部署概览
- 八、美军海外基地巡礼

一、美国十大五星上将简介

美国国会规定，美军的五星上将军衔只在战时授予。五星上将是美国军队的最高军衔，肩章上镶有五颗星徽，相当于西方其它国家的元帅军衔。

美国第一次授予五星上将军衔是在1919年，最后一次是1951年。自1981年最后一名五星上将去世以后，美军将官中至今无五星上将。在美国历史上，被授予五星上将军衔的高级指挥官总共只有10名。且只有陆、海、空军有五星上将，海军陆战队的军衔中没有这一衔级。

陆军五星上将（5名）

1. 约翰·约瑟夫·潘兴（1860.9. 13—1948.7. 15）

1919年晋升为陆军五星上将，是美军历史上第一位五星上将。1886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1904—1905年任驻日本武官，1916—1917年率领1.2万名美军出兵墨西哥。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担任美国驻欧洲远征军司令，跨洲渡洋，成为大战中的美军英雄。大战最后阶段，参加了圣米耶勒和马斯—阿贡讷战役。1921年任陆军参谋长，1924年退役。

2.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1880.1. 26—1964.4. 5）

1944年晋升为陆军五星上将。1903年毕业于西点军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美军第四十二师师长，在法国战场作战。1919—1922年任美国西点军校校长。1930—1935年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任远东美军总司令、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1945年4月任太平洋美军总司令。朝鲜战争初期（1950—1951年）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积极主张扩大战争规模。1951年4月由于美军在朝鲜受挫，被解除全部指挥职务，从此退役。

3.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1890.10.14—1969.3.28）

1944年晋升为陆军五星上将。1915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负责坦克训练工作。1933年任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的助手，后随麦驻菲律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任欧洲战场美军司令、北非战场盟军司令和地中海盟军指挥官，指挥盟军在北非、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实施登陆和抗击法西斯同盟军队的作战。1943年12月至战争结束，任盟军驻西欧远征军最高统帅，领导了英美军队在法国诺曼底登陆战役和盟军在西欧战场的其它战役。德国战败后任美驻德占领军司令。1945年11月起任美国陆军参谋长。1950年—1952年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武装部队最高司令。1953年—1961年在美国总统。在其总统任期内，美国被迫签订《朝鲜停战协定》。

4. 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1880.12.31—1959.10.16）

1944年晋升为陆军五星上将。1901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任美国驻法国第一集团军作战处处长和第八军参谋长。1939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任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是英美联合参谋部成员，英美军事战略计划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负责指挥美军作战。1945—1947年作为杜鲁门总统特使，来华参与国共两党谈判，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1947—1949年任国务卿。1950—1951年任国防部长。

5. 奥马尔·纳尔逊·布莱德雷（1893.2. 12—1981）

1950年晋升为陆军五星上将。1915年在西点军校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任步兵学校校长，后任步兵师师长。1943年任美国第二军军长，在突尼斯和西西里作战。1944年任驻西欧美国第一集团军司令。1944年8月任驻欧洲第十二集团军群司令。1947—1949年任美国陆军参谋长。1949年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委员会主席。1953年退役。

海军五星上将（4名）

6. 威廉·丹尼尔·莱希（1875. 5. 6—1959. 7. 20）

1944年晋升为海军五星上将。1897年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参加过美西战争。1899年被派往菲律宾海军基地，镇压过菲律宾人民解放运动。1900—1901年来华参加镇压义和团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海上运输舰舰长，战后先后任海军装备局局长和航海局局长。1937年任美国海军参谋长。1942年7月任美国武装部队司令（即总统）的参谋长，同时主持参谋长联席会议，参与制定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计划。1948年退休。

7. 欧内斯特·约瑟夫·金（1878. 11. 23—1956. 6. 25）

1944年晋升为海军五星上将。1901年毕业于安纳利斯海军学校。1933年毕业于军事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先后任驱逐舰舰长、驱逐舰分队长、大西洋舰队助理参谋长。战后曾任潜艇分队长、潜艇基地司令。“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舰长、海军航空局局长。1941年2月起任大西洋舰队司令。1942年3月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担任海军作战部部长。他是美国武装部队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和英美联合参谋部成员。根据他的决定，1943年美国海军增设了反潜部队司令部。在他的影响下，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改变了对战列舰的看法，不再把它看成是海战中起决定作用的舰种，而主张加速建造航空母舰。1945年11月退役。

8. 切斯特·威廉·尼米兹（1885. 2. 24—1966. 2. 20）

1944年晋升为海军五星上将。1905年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美国大西洋潜艇部队司令的参谋长。1939年任美国海军航海局局长。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后，他立即被提升为太平洋舰队总司令。他是太平洋战争战略计划的主要制定者之一。

1942年4月，他兼任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取得珊瑚海海战胜利后，他调集了所属的全部陆海空兵力，在中途岛海域一举大败山本五十六指挥的日本联合舰队，取得了中途岛海域的辉煌胜利。从此，太平洋战争的主动权转到了美军手中。以后几年，在他指挥下，美军又取得了所罗门群岛战役、巴绍尔战役、马里亚纳战役、帕劳岛、菲律宾群岛战役、硫磺岛战役和冲绳岛战役第一系列的辉煌胜利。1945年9月2日，尼米兹代表美国参加了在东京湾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1945—1947年任美国海军参谋长。

9. 哈尔西（1882. 10. 30—1959. 8. 16）

1945年12月晋升为海军五星上将。1904年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他指挥美军对日本占领的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群岛和威克岛进行奇袭。1942年4月，他指挥舰队对日本首都东京进行轰炸。10月，担任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在此后两个月中，他指挥圣克鲁斯群岛战役和瓜达卡纳尔海战，立下显赫的战功。1944年6月任美国第三舰队司令，率领航空母舰特遣队执行空中打击任务。同年10月在莱特湾战役

中，他掩护和支援美军陆上作战，搜捕和消灭日本的舰队。自 1945 年 5 月 28 日至 9 月 2 月(日本投降)，他指挥在冲绳岛周围的最后海上战役。 1947 年退休。

空军五星上将(1 名)

10. 亨利·哈利·阿诺德(1886.6. 25——1950.1. 15)

1944 年晋升为陆军五星上将， 1947 年改为空军五星上将。1907 年毕业于西点军校。1911 年学习飞行，是美国最早的几名飞行员之一。 1918 年在航空兵从事参谋工作。 1940 年任美国陆军航空兵副参谋长。 1942 年 2 月——1946 年 2 月任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1944 年领导组建航空兵第二十集团军(装备 B—29 轰炸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负责美陆军航空兵的组织、装备、训练和作战指挥，为美空军 1947 年成为独立军种奠定了基础。大战期间，他作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英美联合参谋部的成员，在对德、意、日进行战略轰炸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包括参加制定原子弹轰炸日本的计划和选择核打击目标)。

二、美国的“世界末日计划”

从 50 年代中期开始，在宾夕法尼亚州奥姆斯特德空军基地就驻扎了一支由直升机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组成的精锐部队——

第 2857 试验中队。60 年代，这个试验中队被调到特拉华州的多佛空军基地，一直驻扎到 1970 年，这支部队伪装成在发现任何遇难情况时出动的军民联合营救小组。他们的真正任务是，在发生核进攻的时候，营救艾森豪威尔总统，后来是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

一旦获悉外部对华盛顿的大规模原子弹袭击迫在眉睫，这支部队就会向白宫草坪飞跑过去，并且迅速而又神秘地把总统带到几座挖好洞穴的山中去，或者带到停靠在大西洋沿岸的那艘加固严实的美国“诺桑普顿”号通讯船上去。

在遭到核袭击之后，飞行员要进行营救工作。在登上直升机的时候，他们已准备的清除核污染的工具袋以及营救工具。飞机飞得很低，他们戴着墨镜，以防原子弹的火光伤害眼睛。他们从头到脚穿戴着重 20 磅的保护服：牢不可破的靴子、手套、橡皮紧身服，因此，能够抵挡得住核辐射。他们还在帆布袋里放着总统和第一家庭要穿的特殊防辐射服。

如果飞行员的营救工作不成功，那么第二支营救部队已作为准备，他们携带着重型设备，其中包括吊车，去营救总统。

这项计划制定者的任务是：在发生核进攻之后，确保美国政府的生存、维持正常秩序和挽救经济。其他的任务还有：负责挽救国家的文物，其中包括从《独立宣言》到国家美术馆里价值连城的美术品。

由于冷战结束，末日计划的制订者终于打破了沉默，它才得以为人所知。

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末日计划已经定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官僚机构以及在首都周围重新设置连成一片的政府办公地点。每年政府都要进行经过精心安排的演习，数千名官员在模拟核进攻的时候进行迁移。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内阁在雷文罗克 26.5 万平方英尺的“地下五角大楼”召集会议。“地下五角大楼”在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附近，一个被称作芒特韦瑟的掩体在弗吉利亚州贝里维尔附近。空中指挥和加固的通讯船随时准备接待总司令及其顾问。国会在格林布赖尔地下有自己的绝密地点，格林布赖尔是西弗吉尼亚州白硫磺泉镇一个五星级旅游胜地。

面积为 20 万平方英尺的芒特韦瑟，藏在坚固无比的绿岩山脉中，这块地方是内阁和联邦雇员中的官员躲避核袭击的主要地点，也是长期以来总统的主要避难地。1960 年 5 月，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内阁在芒特韦瑟举行了会议，作为一次演习。

一天 24 小时，这个地方在跟踪着那些依次要继任总统的官员的行迹。如果美国受到核袭击的威胁，内阁部长和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将被空运到这里，总统本人是否要到这里，则根据威胁情况而定。官员们在走进该设施那座厚 1.8 米的大铁门之前，必须出示特别身份证。如果他们是在发生核袭击之后抵达这里的话，那么他们就要接受核辐射检查。受到核辐射的任何人都会使一系列传感篇出现变化，钟会响起来，闪光灯会亮起来，根据受辐射的程度，灯会显示黄光或红光，那些辐射多的人将被带到消洗室，用浴皂洗身。他们的衣服将被烧掉，发给他们军服，改成救护车的电车将来回穿梭于设施中的

地下医院。

该设施有一个火葬场，还储备着自动武器，芒特韦瑟的负责人说，他还负有执行“开枪击毙”的使命，以阻止那些不在花名册上的人进入设施，包括官员们的家属或误入者。

芒特韦瑟总共能够容纳几千人。只有总统、内阁部长和最高法院法官有私人住房。艾森豪威尔在他的桌子上放着合家照。由于肯尼迪背疼，为他安了一张治疗床，对那些无法应付这种紧张局面的人来说，该设施备有镇静剂，还有墙上装着衬垫的病房，一位官员戏称为“橡皮房间”。据传病房门外的挂衣钩上有疯人穿的拘束衣，该设施的负责人矢口否认。设施中的库存货物是如此的充足，以至于还包括避孕药片，备有这种药片是为了使女官员不致于中断她们的用药周期。

该设施的一个地下气象站每天公布风向和风速的情况，绘制潜在的核辐射图。该设施的电视台时刻准备通过紧急广播系统向全国观众提供总统（或他的继任者）的情况。

在艾森豪威尔整个执政期间以及后来的几年中，保管库中一直存放着艾森豪威尔和著名人士戈弗雷的讲话录音。预先录制好的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全国已处在核袭击之下，但是政府在继续发挥作用。此外，一批发誓严守秘密的著名新闻人物将跟随总统选择的地点露面，用他们为人所熟悉的名字和面孔帮助幸存者镇定情绪。

在另一个房间里，有绝密的原子弹警报系统，这个由传感器和铜钱组成的系统纵横交错地把美国连在一起，对起压力、热度和光会作出反应。在一幅星罗棋布地装有几百个小灯泡的巨型地图上，红灯将表明核爆炸地点。山顶上有一系列遥控照相机和辐射传感器监视这种地区。如果附近发生核攻击，这些装置就会产生烟雾。该设施还设有备用辐射传感器。此外，还有由保安部队组成的个体“探测仪”，他们将穿上辐射橡皮服，冒险去试验空气中的核辐射。

末日计划是否行得通？1962年五角大楼一份研究报告对10来个依次要继任总统职位的官员昼夜所在的地点进行了研究，结论是：他们中的所有入通常都处于对首都进行的核袭击的杀伤范围内。这份报告说，用一万吨级的武器，就可以击毁在白宫周围80公里范围内的任何地方飞行的直升机。

还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在一次末日计划演习期间，艾森豪威尔由华盛顿车队扩送。在他接近芒特韦瑟的时候，一辆满载猪的卡车进入狭窄的道路。护送车队只得停下来，在卡车慢慢后退到山间之后，护送车队才得以通过。艾森豪威尔哈哈大笑说，如此精心设计的计划可能毁于一群猪。

艾森豪威尔如何从华盛顿逃跑呢？比较富有创造性的计划是：政府采购一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过的整修一新的鱼雷快艇，把它停靠在华盛顿海军造船厂前面的波托马克河边。艾森豪威尔将由轿车送到河边一个事先安排好的地点，鱼雷快艇在那里等着他。在安全地通过核爆炸地区之后，总统将同特工人员会合，并被送到地下指挥所。这条鱼雷快艇以及在马里兰州总统休养地戴维营的绝密地下指挥所，均由一个精锐的军官小组进行保养，这个军官小组有一个不起眼的名字：海军后勤部队。还考虑过改造一艘“北极星”型潜艇，使潜艇成为水下指挥所。

在白宫的地下室里有艾森豪威尔的处理危机一级战斗准备的命令，总统已经在命令上签了字，其内容包括实施军事管制法。在白宫东厅的地下就是

总统的掩体，里面有食品、精密的通讯设备和营救工具。

艾森豪威尔对末日计划不抱什么幻想。1956年白宫一份“秘密”备忘录记载着他的指责。当时一位内阁部长说，在一次演习中，450人“相当顺利地”被疏散。艾森豪威尔提醒内阁说，在实际情况下，这些人都不可能是正常人，他们会受惊吓、会歇斯底里、会“完全变疯”。“我们将必须准备同那些‘发了疯’的人一起行动。我们不应该假设我们会沉着地去处理这些问题。”

今天，美国联邦每个机构都有一项在发生核袭击的时候就实施的计划，每项计划都是全国生存综合计划的一部分，这项综合计划是全国生存综合计划的一部分，这次综合计划是几十年来在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连续几届处理危机机构（最近一届是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指导下逐渐形成的。

由于针对核破坏这一背景，因此“行动计划”既慎重又荒唐。公务委员会的处理危机条款中包括这样的规定：“在得到雇员死亡日期报告之前，已经死亡的雇员应该得到政府准假。”在发生核袭击时生效的有关邮政规定，将取消向受灾地区发送的信件和明信片上贴邮票这一常例。

许多计划还加进了挽救核袭击之后的经济工作。财政部的章程规定银行在正常时间里仍然开门，但是只允许有限制的提款以防囤积。财政部还将监视核袭击之后工资和房租的稳定问题。1972年的章程说，事先要同“非危急目标区”的公司一起安排好印支票事宜。1971年劳工部和纽约州签署了一项协议。规定“为稳定核袭击时期的经济所作的准备以及行动职责”，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将要求“各银行检查员向离得最近的幸存下来的联邦储备银行报告核袭击之后的情况，联邦储备银行能够帮助重建银行制度。”事实上，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弗吉尼亚州库尔佩珀有自己的一个面积为1.3万平方米的防辐射迁移地。直到80年代，该中心的大型地下室里还保存着大量现金，以便在核战争之后能够立即用来重振美国经济。这些钞票一捆捆地堆积起来形成一堵2.7米高的墙。这些钞票放在5吨、10吨和100吨的木制货盘上，铲车随时可以把它们运走。该设施的各张办公桌上都标有疏散到这里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各位官员的名字。这里还备有冷冻食品和干粮，甚至还有存放尸体的冷藏坑道，以便在核辐射消退之前暂时存放死者。

由于苏联瓦解，美末日计划的制订者对处理危机的方案进行了彻底的重新估价，老的迁移中心在研究中：一些迁移中心将留着备用，另一些迁移中心将用来存放记录和用作办公地点。应急计划和无价值的危机处理章程正在重新加以研究。

在最后一批末日计划制订者退下来的时候，他们说话很谨慎：苏联也许成为历史，但是还有新的危险——核扩散、民族主义的东山再起和恐怖主义的威胁。芒特韦瑟的第一位负责人利奥·布拉萨警告说：“你们不可能把罪恶拒之门外。”但是他的继任者巴德·加拉格尔喜欢引用柏拉图的话：“只有死者看到战争结束。”

三、20 世纪美国先进武器装备集萃

“大酒瓶”电子侦察卫星

美国第三代电子侦察卫星，主要用于截取通讯雷达信号以及导弹遥测信号，并对电磁信号辐射体定位。重约 2500 千克，卫星上没有 1 部直径约 90 米的大型盘状天线，用于接收电子信号，一部小型天线用于转发信号，通信侦收和定位设备，数据处理以及传输转发设备。卫星运行在地球同步轨道，侦察能力强，覆盖面广。在海湾战争中，2 颗“大酒瓶”和 1 颗“旋涡”卫星被用来监听伊拉克的无线电信号，为美国提供通信、电子情报。

“锁眼——11”（KH——11）照相侦察卫星

美国第五代照像侦察卫星，广泛用于全球，特别是军事热点地区的侦察。星上装有大型望远镜，可见光和多光谱 CCD 成像设备，电视摄像机、数据处理与传输设备等。卫星轨道近地点 265——304.7 千米，远地点 650——364 千米。图像分辨率 1.5——3 米。卫星采用所见光和多光谱照相侦察技术，具有较高的图像分辨率。目前，该型卫星共有 3 颗在轨，海湾战争期间全部用于军事侦察。

“锁眼——12”（KH——12）照像侦察卫星

美国第六代照像侦察卫星，是“锁眼——11”的改进型。星上装有方型望远镜，可见光和多光谱 CCD 成像设备。卫星近地点 303 千米，远地点 315 千米。采用光学侦察技术，包括可见光及远近红外、远红外照像，图像分辨率明显高于“锁眼 11”。该星现有一颗在轨，曾广泛用于海湾战争中。

“长曲棍球”后成孔径雷达侦察卫星

美国军用卫星，可完成雷达成像，用于监视、侦察地面目标和一些深度地表下目标及部分海上目标。卫星上载有合成孔径雷达、数据处理和传输设备，具有全天候、全天时侦察能力，有一定的识别伪装物的能力。卫星轨道近地点 667 千米，远地点 692 千米，分辨率为 1—2 米。该星于 1989 年由航天飞机首次发射升空，在海湾战争中被用来对海湾地区实施雷达成像侦察。

“发现”号航天飞机

美国生产。该机由轨道器、不回收的外部挂贮箱和可回收的固体火箭助推器等 3 部分组成。起飞重约 2000 吨。轨道器又称带动力的有人驾驶航天飞机，全长 37.2 米、高 17.3 米、翼展 23.8 米；机身前部为乘员增压舱，限乘 7 人，最多 8 人；可重复使用 100 次。同类型的航天飞机共有 6 架。“企业”号主要用于飞行试验；“挑战者”号在飞行升空时意外爆炸；现有“哥伦比亚”号、“阿特兰蒂斯”号、“奋进”号和“发现”号在执行任务。主要用于部署大型军用卫星、大型科学探测器以及为未来的空间站提供服务。

“F——16”战斗机

美国第三代轻型喷气战斗机，主要用于争夺制空权，也可执行支援地面部队的对地攻击任务。该机最大飞行速度 2.5 马赫，实用升限 18300 米，最大航程 4000 公里，作战半径 1200 公里，最大起飞重量达 11370 公斤，载弹量 6500 公斤。该机装有 1 台 F100——pW——200 涡扇发动机，APG——68 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惯性导航系统。该机武器主要有：1 门 20 毫米 M61A1 多管航炮，9 个武器外挂点（可外挂 AIM——g “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制导导弹、核弹及常规炸弹）。该机加装“夜间低空导航和红外目标选择吊舱”后，可在夜间和不良气候下作战。

“F—15C”鹰型战斗机

美国空军军用战斗机，主要用于夺取制空权，也可用于对地攻击。该机最大飞行速度 2.5 马赫，实用升限 19500 米，最大航程 5560 公里，作战半径 1400 公里，最大起飞重量 30840 公斤，最大载弹量 10750 公斤。该机装有两台 F100—pW220 涡扇发动机，脉冲多普火控雷达，平视显示器，惯性导弹系统等。主要武器有：一门 20 毫米方管航炮；9 个武器外挂点（可同时携带 4 枚“响尾蛇”和 4 枚 AIM—7F/M“麻雀”空对空导弹，或 8 枚 AIM—120 中距空对空导弹）；支援地面作战时可挂装各种炸弹、火箭弹。

A—10“雷电”攻击机

美国空军主要近距离空中支援攻击机，主要用于攻击坦克群和战场上的活动目标及主要火力点。该机最大飞机速度 0.7（高空）——0.6（低空）马赫；实用升限 11000 米，最大航程 4026 公里；作战半径 460——1000 公里；最大起飞重量 22680 公斤；最大载弹量 7250 公斤。该机装备有：激光指示器，罗兰导航系统，自动武器发射器等。主要武器有：1 门 30 毫米航炮；11 个外挂架（可挂 MK80 炸弹，“石眼”集束炸弹，AGM—65“幼畜”空对地导弹和“响尾蛇”空对主导弹，火箭发射架等）。

F/A—18“大黄蜂”战斗/攻击机

美国海军主要战斗/攻击机，主要用于舰队防空，也用于对地攻击，该机最大飞行速度 1.8 马赫，实用升限 15240 米，最大航程 3700 公里，作战半径 740（空战）——1070（攻击）公里，最大起飞重量 22328 公斤。该机装备有 2 台低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多功能火控雷达，惯性导航系统等，主要武器有：1 门 20 毫米 6 管航炮；9 个外挂点（可挂 AIM—120 中距空对空导弹，“响尾蛇”空对空导弹、空对地导弹，前视红外跟踪吊舱等）。

F—117 隐形战斗轰炸机

美国空军主要战斗轰炸机，主要用于携带激光制导炸弹对地面目标实施精确攻击。该机最大飞行速度 0.9 马赫，实用升限 15000 米，作战半径 550——740 公里，最大起飞重量 23814 公斤，最大载弹量 2000 公斤。该机装备有前视红外传感器，伸缩式激光定位器，惯性导航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等。主要武器有：2 枚 BLU—109 激光制导炸弹；2 枚空对空导弹。该机具有较强的隐形功能和夜间攻击能力。

B—52“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

美国空军主要远程战略轰炸机，主要用于远程常规轰炸和核轰炸。该机最大速度 0.95 马赫，实用升限 17000 米，作战半径 7400 公里，最大航程 16000 公里，载弹量 27200 公斤。该机装备有远距通信、导航设备前视红外设备，电子对抗设备，脉冲多普勒尾部告警雷达等。主要武器有：1 门 20 毫米 6 管航炮；挂装常规炸弹、核弹、空对地导弹、巡航导弹等。

B—1 战略轰炸机

美国空军主要战略轰炸机，主要用于战略突防轰炸，以及用作巡航导弹载机使用。该机最大速度 1.25 马赫，实用升限 15000 米，作战半径 4800 公里，最大航程 12000 公里，载弹量 56700 公斤。该机装备有多普勒速度传感器，多模套攻击雷达，惯性导航系统等。主要武器有：24 枚巡航导弹或 38 枚空对地导弹，各种炸弹等，该机 B 型具有隐形功能。

F—4G“野鼬鼠”电子战飞机

美国空军主要防空压制飞机，主要用于干扰并摧毁敌防空导弹、雷达，

开辟空中通道。该机最大速度 2 马赫以上,实用升限 16580 米,最大航程 3184 公里,作战半径 1200 公里。机上装有 AN/APR——38 雷达与导弹发射告警系统,AN/LQ——131 双模干扰吊舱,AN/ALE——40 干扰物投放系统,以及通信导航设备。该机可携带 AGM——45“百舌鸟”、AGM——65“幼畜”、AGM——78“标准”和 AGM——88“哈姆”反辐射导弹;“麻雀”和“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具有软硬杀伤双重能力。

EF——111 电子干扰飞机

美国空军专用电子战飞机,主要用于远距离干扰、近距离支援干扰以及突防航干扰。该机最大速度 2 马赫,最大航程 3706 公里。机上装有战术干扰系统,特高频指令仪,惯系导航系统,攻击雷达,地形跟踪雷达,敌我识别器,雷达告警接收机等设备。该机全向辐射距离可达 230 公里。

E——2C“鹰眼”空中预警机

美国海军主要预警机,主要用于舰队防空和空战引导指挥,也适用于执行陆基空中预警任务。该机最大速度 5984 公里/小时,实用升限 9390 米,续航时间 3——4 小时。机上装备有 QL—77/ASQ 中央处理机,可同时跟踪处理 250—300 个目标,引导数十架飞机进行空战。

KC——135“同温层油船”加油机

美国空军主要空中加油机,主要用于为军用飞机补加燃油。该机最大速度 965 公里/小时,巡航时间 5 小时 30 分,最大可供油量 47 吨,加油率 12.68—21.97 公斤/秒,实用加油半径 1850 公里。该机可以为 B—52 轰炸机、C—5B 运输机、A—10A 攻击机和 F—15 等作战飞机进行空中加油。

C——130“大力神”中型战术运输机

美国空军主要运输机,主要用于在战役战术范围内的空运,亦可空投、空降人员及军用物资和作战装备。该机最大速度 602 公里/小时,实用升限 10060 米,最大载重航程 4067 公里。机上装有先进的通信、导航设备,气象雷达,近地报警系统和自动驾驶仪。该机运载量为 128 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或 32 名伞兵,或一辆 12 吨加油车,或一门 155 毫米榴弹炮,或一辆重型坦克。

AH——1S“休伊眼镜蛇”攻击直升机

美国军用直升机,主要用于攻击装甲目标和支援地面部队作战。该机最大速度 315 公里/小时,巡航速度 232 公里/小时,升限 3725 米,航程 500 公里。主要武器为 1 门 20 毫米航炮,8 枚陶式反坦克导弹或 4 枚火箭发射器。

AH——64“阿帕奇”攻击直升机

美国军用直升机,主要用于攻击装甲目标和支援地面部队作战。该机最大速度 329 公里/小时,巡航速度 239 公里/小时,升限 6250 米,航程 610 公里。该机采用旋翼雷达,装有先进的火控装备、夜视和夜瞄系统。主要武器为 1 门 30 毫米航炮,16 枚反坦克导弹或 4 个火箭发射器或空对空导弹。

UH——60A“黑鹰”中型运输直升机

美国军用直升机,主要用于空中机动作战和为地面部队提供补给,执行空中救护,搜索救援,指挥控制等任务。该机最大飞机速度 296 公里/小时,巡航速度 268 公里/小时,升限 5790 米,航程 600 公里。该机可运送 11 名士兵或内载 4000 公斤货物或外挂 4000 公斤货物。

“尼米兹”级航空母舰

美国海军主要航空母舰。现有“尼米兹”号、“艾森豪威尔”号、“卡

尔·文森”号、“罗斯福”号、“华盛顿”号和“林肯”号军舰在服役。“尼米兹”级“艾森豪威尔”号满载排水量 91480 吨，最大航速 30 节以上，续航力 80—100 万海里。该舰共载各种飞机 90 架，标准装备方案为，20 架 F—14，20 架 F/A—18，20 架 A—6E 攻击机，6 架 EA—6B 电子战飞机，5 架 E—2C 预警机，10 架 S—3A/B 反潜机，6 架 SH—3G/H 或 SH—60F 直长机。该舰舰载武器和电子设备有：3 座 MK29 型八联海麻雀对空导弹发射装置；4 座 MK15 “火神”密集阵反导火炮，SPS—48 型三坐标空中搜索雷达，水面搜索雷达 2 部，MK91 型海麻雀导弹制导火控雷达 3 部，导航雷达 1 部，电子干扰与对抗设备等。

CG—47 “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

美国海军主力巡洋舰，主要用于舰队防空，也可担负反潜、攻舰和对岸攻击任务。该舰标准排水量 7800 吨，满载排水量 9100 吨，最大航速 30 节，航速 20 节时续航力为 6000 海里。主要武器为：2 座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标准”防空导弹和“阿斯洛克”反潜导弹）；2 座四联装“鱼叉”导弹发射装置；2 门 MK45 舰炮；2 门“密集阵”近程防御武器系统；2 座 MK32 鱼雷发射管；2 架 SH—60B “海鹰”直升机；武器系统的核心为“宙斯盾”作战系统。该舰装备有各种先进的电子设备，具有在复杂电子环境中工作的能力。

“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美国海军最新型驱逐舰，具有防空、反舰及反潜作战的综合作战能力。该舰满排水量 8400 吨，航速大于 30 节，续航力为 5000 海里/20 节。该舰装有一套“宙斯盾”作战系统。舰载武器有 2 座 MK41 垂直发射系统，载弹 90 枚；两座四联装“鱼叉”导弹发射装置；一门 MK45 舰炮；两座 MK15 “密集阵”舰炮；两座 MK32 鱼雷发射管。主要电子设备有相控阵雷达，对海警戒/导航雷达，防空导弹制导雷达，球艏声纳，火炮火控雷达，及潜火控系统，电子战系统等。

LHD—1 “黄蜂”级两栖攻击舰

美国海军最新型两栖作战舰，主要用于实施两栖突击作战，也可作为扫雷直升机母舰或担负制海作战任务。该舰满载排水量 40532 吨，最大航速 24 节，续航力 10000 海里/20 节。主要武器和电子设备有：2 座“海麻雀”舰空导弹发射架，3 座“密集阵”火炮系统，8 挺机枪，4 座干扰火箭发射装置，对空搜索雷达，电子战系统等。该级舰没有多层车辆装载甲板和货舱，一次可装运一个加强陆战营及全部装备。舰上没有大型飞行甲板和机库，可搭载各种直升机和 AV—8B “鹞”式垂直/短距起降攻击机 30 余架。

LCAc 气垫登陆艇

美国海军新型气垫登陆艇，主要用于在登陆作战中运送人员和物资突击上陆。该艇空载船重 92.68 吨，最大载重 68 吨，可装载 1 辆主战坦克或 4 辆轻型装甲车。该艇最大航速 50 节，续航力 200 海里/50 节。

“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

美国海军第三代战略核潜艇，主要用于对敌方重要目标实施核打击。该艇水面排水量 16600 吨，水下排水量 18700 吨，航速 25 节，最大下潜深度 400 米，续航力 40 万海里，自持力 70 天。艇载武器和电子设备有：24 具导弹垂直发射筒（可发射“三叉戟”式弹道导弹）和 4 具 MK68 鱼雷发射管（可发射 MK48 鱼雷和“鱼叉”式反舰导弹），射击指挥仪，水声设备，通信设备

和导航设备。

M——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美国陆军主战坦克，主要用于与敌坦克及其它装甲车辆作战，也可以压制、消灭反坦克武器和其他炮兵武器，摧毁野战工事，歼灭有生力量。该坦克乘员 4 人，战斗全重 53.4 吨，最大速度 72 公里/小时，最大公里行程 500 公里，爬坡度 31 度。主要武器有：1 门 105 毫米线膛炮，可发射脱壳穿甲弹、破甲弹、碎甲弹；2 挺 7.62 毫米机枪；1 挺 12.7 毫米高平两用机枪。火控系统包括激光侧距机、弹道计算机、热成像仪和各种传感器等。该坦克采用了复合防护装甲，具有较强的生存能力。

M——“布雷德利”步兵战车

美国陆军主力战车，主要用于协同主战坦克作战及输送步兵。该车乘员 3 人，载员 7 人，战斗全重 22.7 吨，最大时速 66 公里，水上时速 7.2 公里，最大行程 48.3 公里，爬坡度 31 度。主要武器为 1 门 25 毫米机关枪（可发射穿甲弹和榴弹）；一具双管“陶”式反坦克导弹发射架；1 挺 7.62 毫米并列机枪等。

M109 系列 155 毫米自行榴弹炮

美国装甲部队主要火力支援武器。该系列现有 A1、A2、A3、A4 等四种型号，火炮口径 155 毫米，最大射程 18100 米（火箭增程弹可达 24000 米），战斗全重 25175 公斤。该火炮配用弹种：榴弹、发烟弹、核弹、火箭增程弹、子母弹、布雷弹、激光制导炮弹和化学弹，供弹子式半自动，最大射速每分钟 4 发。

“民兵”战略弹道导弹

美国第三代洲际弹道导弹，主要用于打击方型面目标群。该弹采用五级液体火箭发动机，射程 9800—13000 公里，命中精度 185—227 米（弹头为 MK—12），弹头威力 3X17.5 万吨 TNT，在地下井发射。

“侏儒”战略弹道导弹

美国第五代战略弹道导弹，主要用于攻击导弹发射井等硬军事目标。导弹采用全封闭式加固的机动发射车牵引，能在美国西部军事基地 12 个区域 20 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公路动发射。导弹射程 12000 公里，命中精度 160 米，弹头威力 10X35 万吨 TNT，采用三级固体火箭发动机，可由地下井冷发射，也可由铁路机动发射。

“三叉戟 D—5”潜地弹道导弹

美国第四代潜射战略导弹核武器。该导弹是五级固体导弹，采用 MK—6 型星光惯性制导系统。装有 5 个 MK5 分导式多弹头，核装置代号为 W88，威力高达 47.5 万吨 TNT 当量，可以用于攻击导弹地下井和加固的指挥控制中心。最大射程大于 7400 公里，命中精度 130—185 米，威力 8X47.5 万吨 TNT。该导弹装备在“三叉戟”导弹核潜艇上，每艘艇装备 24 枚。

“战斧”BGM—109 反舰巡航导弹

美国海军舰对舰攻击核导弹，主要装备在攻击型核潜艇、现代巡洋舰、驱逐舰及战列舰上，用于攻击敌方舰艇。射程 463—556 公里，巡航高度海面上空 7.62—152.4 米，巡航速度最大 0.72 马赫，命中精度 30 米，可靠性大于 80%，弹头威力 20 万吨 TNT，由潜艇水下或舰艇水面发射。

“潘兴”地对地战术导弹

美国陆军第三代地对地战术导弹系统，主要用于攻击军事指挥中心，军

队集结地域、导弹发射场、海空军基地和其他重要军事设施。该武器系统由再入级、两级火箭发动机和地面支援设备组成。导弹弹重 400 公斤，发射重量 7200 公斤，最大射程 1800 公里，最小射程 160 公里，最大速度 12 万赫，精度设计为 37 米，可达 25 米，制导方式为惯性/雷达区域相关。

“爱国者”MIM—104 地空导弹

美国陆军第三代地空导弹武器系统，主要用于区域防空。该系统由发射架/导弹发射箱、指挥控制车、雷达装置、天线/天线杆组合的电源车五个部分组成。导弹弹长 5.3 米，弹径 0.41 米，弹重 100 公斤，战斗部重 68 公斤，最大速度 3 倍音速，作战半径 3—100 千米，作战高度 0.3—24 千米，杀伤方式为无线电近炸引信破片效应，发射方式四联装箱倾斜发射。该系统使用相控阵雷达，集搜索、监视、跟踪、制导于一体，能同时对 100 个目标进行搜索、监视，并制导 9 枚导弹拦截不同方向、高度的目标，毁伤概率 40%。

“陶”式反坦克导弹

美国陆军第二代反坦克武器，主要用于攻击坦克及装甲目标。该弹由发射架、发射筒导弹部分组成。导弹射程 65—3750 米、初速 65 米/秒、破甲厚度 1030 毫米、射速 3 发/分、命中率 90%（固定目标）或运动目标 75%、制导方式目视瞄准、红外自动跟踪、有线传输指令、控制方式气动陀螺。该导弹可以车载发射，亦可用直升机载发射，也可步兵便携发射。

四、美国总统的黑皮包

俄罗斯总统手里有一个核按钮，美国总统手上则有一个黑皮包。其实，核按钮和黑皮包是一码事，都是对人类社会的一种危险。

美国总统手里的黑皮包，能在美国一旦遭到核袭击时立即告诉总统如何采取应变措施。因为这个特殊的黑皮包装有四种重要文件：

一、认证卡。卡上有总统认证号码，此卡不被确认时，以总统名义下达的任何命令均属无效。

二、紧急广播程序。记载有被袭击后总统向全国广播的程序。

三、基地名单。记载有紧急状态时可供总统使用的机密基地。

四、黑色手册。上面列举了对各种攻击的报复措施，记载着世界上主要核国家的核武器运载工具，打击的目标及核弹从发射到命中目标的时间等详细情况。同时，还有美国的导弹数目，部署地点及预定的攻击目标等。

五、五角大楼探秘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波托马克河畔的五角大楼，初看起来，假乎毫无艳丽之处，但实际上是最奇特和最神秘的地方。它是美国最高军事统帅机关的所在地，在这里指挥着 270 万美国的陆、海、空三军官兵以及几万名文职人员。因此，五角大楼成了美国国防部的代名词。

五角大楼是一座由五幢五层楼连接而成的五角形建筑物，于 1943 年 1 月 15 日建成。大楼共分五层，国防部、总参谋部、导弹部队、北约司令部各占 1 层，国防部首脑人物的办公室设在第 3 层和地下室，大楼的主人不是身着元帅服的“武官”，而是一位文官，自从美国有了国防部长至今一直如此。在他的办公室里安有 4 部不同颜色的电话：粉红色的专用于与他的妻子通话，白色的直通白宫总统办公室，蓝色的用于同他的助手联系，红色的直通所有指挥岗位。

在这里，哨兵林立，戒备森严，楼内虽没有红绿灯，但随眼可见画在地上的黄线。如果没有特别通行证，不得跨越黄线一步。海湾战争前不久，楼内还增设了绝密电视新闻网，每天早晨 6 点多就开始向国防部的情报官员、作战军官和在美国的其他 19 个军事指挥部的少数观众播送关于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事情的绝密综述报道。这些报道有从高空飞行的照相侦察卫星发回的最新图像，有发自国家安全局在世界的监听网搜集到的新情报，有来自国防情报局驻外武官们作的实地估计的绝密文件。

在这个世界上最庞大的述宫里，交通四通八达，电梯到处林立，电话星罗棋布，电脑数目惊人，娱乐设施非常齐全，服务网点应有尽有。楼内走廊的总长度达 35 公里，而且很宽，可以在上面走电动车和三轮车。有通向大型停车场的高速公路网、1 个直升机停机场、1 个直通地下铁道的车站。设有 150 部电梯、13 部升降机、19 部自动电梯。3 个职工管理和维修着 4200 个电钟，电话总机的小姐们每天平均要接 20 万次电话。娱乐设施是非常阔气的，这里有蒸汽浴室、游泳池、降压室、操练室、按摩室、图书馆、小教堂和 280 个高级舒适的休息室。象卡车轮子似的圆浴他的大房间是最有意思的，它吸引着各种年龄的高级将领。服务网点更是尽善尽美，有银行、鞋店、首饰店、牙医、诊所，药房、糖果店，走廊里装有几百台自动出售热饮、冷饮、邮票、口香糖、香烟和报纸的机器，还有 685 处饮用蒸馏水的喷泉。

五角大楼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广播电视网，最大的出版系统和最大的占地面积 1300 万公顷的基地和军事设施。

六、神秘的美国国家侦察处

多少年以来，有关美国间谍卫星是如何地厉害常常见诸报端，但这些卫星的幕后操纵者美国国家侦察处却一直鲜为人知。

1960年8月25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秘密成立了国家侦察处(NRO)，由国防部各中央情报局共同管理。其中的工作人员大都从五角大楼中挑选，特别是从空军中选拔，一些是训练有素的非军人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另外还有许多空军人员协助他们工作。NRO工作人员的数量绝对保密，他们的工作地点也不为外界所知。NRO的卫星侦察在过去的30年里一直同每一个安全事件紧密相关。他们提供的卫星照片可以帮助战略空军司令部进行战略轰炸、作导弹发射准备，在战场上协助战术部队行动。另外，总统、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得到的不少最新情报都是对卫星照片的分析结果。

NRO的卫星操纵人员通过计算机向卫星传送指令，维持卫星正常的飞行轨道，帮助调整卫星的位置以利于拍照。与此同时，他们还负责管理地面上复杂的保障基地和物资器材。在美国空军管理的15个卫星地面指挥站中，就有许多设施是被用来帮助NRO工作的。

NRO虽然负责操纵卫星，但自己并不能决定拍什么，这项工作由一特别委员会——图像需求和探测委员会决定，由该委员会向NRO下达行动指令。NRO自己也不分析获取的照片，这些情报只能由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国务院以及其他军事情报机构的情报利用者进行分析。

成立伊始，NRO就在美苏争霸的冷战中取得了显赫的成绩。1961年，苏联对外宣称它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数量已超过了美国，顿时引起美国上下一片惊慌。然而NRO的卫星侦察表明，苏联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数量远没有美国担心的那么多。这一侦察结果揭开了当时苏美之间的“导弹差距”之谜。它们还揭露了当时所谓的扬基级潜艇不过是一支巨大的充气橡皮船，当苏联派真正的潜艇外出执行秘密巡逻任务时，就把它当做假目标以迷惑对手。

但凡看见过NRO的照片资料以及其他图像类情报的人，无不对其高超的技术手段表示惊讶。有人曾说，NRO的飞行器可以在150英里的高空清楚地拍摄到行驶于莫斯科红场上的汽车牌号。通过高分辨力图像，NRO的卫星甚至还可以分辨出地上的男人和女人。

NRO的卫星每24小时沿椭圆轨道绕地球一周。它的卫星照相具有双重用途：既可以对感兴趣的地区进行大范围的搜索，也可以对某一地区的具体目标进行侦察。

90年代以来，NRO除了继续执行一些传统的任务，如监视全球战略武器的发展情况外，又担负起了一些新任务。首先是环境监测。太空照相机不断地在提供有关森林大火、火山爆发、地震以及其它自然灾害等环境情况的数据资料。1991年，美国成立了中央情报局环境特别任务处。该机构的50名成员全都是政府或私人机构的专家，他们的任务是分析NRO提供的情报和其它全球信息，用于对环境的调查。其次是搜集政治情报，主要是监视世界上核、生、化武器和导弹的扩散情况，监视那些足以威胁美国利益的诸多地区性冲突。

随着美国战略的调整，越来越多的快速反应部队驻扎在美国本土以外，这就给NRO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旦有紧急情况发生，NRO必须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提供情报保障。NRO前主任费加先生曾表示，“一有战事，我们必须知

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谁在那里？我们如何取得联络？所有这些信息情报千头万绪，除了利用卫星以外，别无他法。”

随着任务的加重，新的困难和挑战也出现了。最近几年美国国防预算连年削减，NRO 也未能幸免，它每年的经费要减少 56 亿美元。但不管怎样，随着全球局势的不断变化，对情报的需求量也日趋增大。毋庸置疑，NRO 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七、全球美军部署概览

为了维护美国在全球的利益，美国政府的安全战略政策都是根据其任务和手段而制定实施的，那就是可靠而适当地对设想可能出现的各级威胁进行威慑。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美国四分之一多的军队部署在世界各地，与 41 个国家和地区订有双边或多边军事条约，在 30 余个国家和地区设有 1200 处军事基地和设施，向 40 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军事援助，与 94 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援外军事教育和训练计划。

美国所有战斗使用力量，按地区分为多军种联合司令部，按任务分力军种专业司令部，都隶属参谋长联席会议。除这些全国军事指挥中心以外，属于全国军事指挥系统的还有一个备用指挥部（备用全国指挥中心，在马里兰州里奇堡）和一个空中指挥所（全国应急空中指挥所），战略空军指挥部的一个空中指挥所常年工作不停。一个特别的全球军事指挥与控制系统确保战略通信畅通，它具有存活力的核心（最低限底必需应急通信网），包括全国应急空中指挥所和战略武袋力量之间的所有联络网。

六大司令部，分布于欧、亚、非、澳、美各洲。

联合司令部

总部设在斯图加特——法伊英根。总司令兼北约欧洲盟军司令。

联合司令部负责欧洲、地中海和远东的安全和北约欧洲地区的防务。美国本土的三十战备师中各有一个旅部署在美军驻欧司令部前线，其中一个旅是保卫美军北方集团军群属辖第三军的核心。一个坦克师、一个机械化步兵师和一个装甲输送车团的大型装备储存在德国。此外，其它两个师的装备储存在中欧盟军，一个海军陆战队旅的装备储存在北欧盟军。还有 6 个师的装备 10 天以内可以主运到欧洲。联合司令部的兵力有：驻欧美国陆军和美国第七集团军，辖有 2 个坦克师、1 个坦克旅、2 个机械化步兵师、2 个机械化步兵旅和 1 个步兵旅。

驻欧美国空军司令部设在原西德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第三航空队在英国，拥有 13 个歼击机/歼击轰炸机中队，1 个侦察中队，1 个战术运输中队，第十六、十七航空队在德国，共有 12 个歼击机/歼击轰炸机中队，1 个侦察机中队，1 个战术运输中队。驻欧美国空军总共有 120 架 F—4，76 架 F—15，144 架 F—16，150 架 F—111，108 架 A—10，现在，又新装备了一些先进飞机。

驻欧美国海军司令部设在伦敦。主要力量有第六舰队，共有 1 个航母战斗群，3 个歼击轰炸机中队，5 个海上侦察中队等。

太平洋司令部

太平洋司令部总部设在檀香山，司令兼太平洋舰队司令。太平洋司令部负责最大指挥区的安全，也就是美国西部海岸和非洲东部海岸之间及阿留申群岛和南极之间的太平洋及印度洋的安全，保护菲律宾、日本和南朝鲜，支持澳、新、美安全条约成员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1）太平洋舰队。包括第三舰队、第一海军两栖部队、第七舰队和第三海军两栖部队。共有 6 个航母战斗群、2 艘导弹核潜艇、38 艘猎潜艇、21 个歼击轰炸机中队、14 个歼击机中队、6 个反潜艇中队、2 个海军陆战师、1 个海军陆战旅军。

（2）太平洋空军，包括第 5 航空队（驻日本、韩国），拥有 3 个歼击机

/歼击轰炸机中队、1个侦察中队，第13航空队，有2个歼击机/歼击轰炸机中队、2个战术运输中队。此外，美陆军西部司令部还辖有1个步兵师。

大西洋司令部

大西洋司令部负责大西洋和加勒比地区的安全，司令部辖令大西洋舰队，包括第二舰队和第二海军两栖部队、舰队的兵力有：6个航母战斗群、31艘导弹潜艇、18个歼击/轰炸机中队、1个海军陆战队、1个海军航空师等，此外，还配备有陆军和空军部队。

美军南部司令部

主要负责巴拿马运河的安全，主要兵力有1个步兵旅、1个特种部队营。

美军预备司令部预备司令部掌管一支由陆、空军组成的干涉部队，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调遣的战略预备队，同时计划这支部队全球性的作战行动（紧急作战行动。）

美国中部司令部

负责为在中东作战而建立的快速部署联合特遣部队的作战任务。它的负责范围包括西南亚、东亚和波斯湾。

兵力：陆军有第三集团军，第十八空降军，第六骑兵旅辖1个特种部队群，2个骑兵营。海军有3个航母战斗群，5个陆上海军侦察中队，1支海军两栖部队等，空军有11个歼击机/歼击轰炸机中队，2个B—52远程轰炸机中队。

两大特种司令部 执行空战核威慑

战略空军司令部

司令部设在内布拉斯加州奥弗特空军基地。其任务是用工事里的洲际弹道导弹的随时准备起飞的轰炸机进行核威慑。

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兵力组成有：第三和第十五航空队，17个轰炸机联队，3个侦察联队，4个加油联队，4个指挥中队。另外，在阿拉斯加还有1个侦察联队，在太平洋区域有1个轰炸机联队和1个运输联队。

军事空运指挥部

军事空运指挥部保证战略和战术空中机动。为了确保指挥区和作战空间内大范围的战术机动，该指挥部给各海外航空队固定编配了C—130部队。

日前美国战略核力量分别直属空、海两个军种，共有战略导弹1640枚，其中陆基洲际导弹1000枚，潜射导弹640枚，战略轰炸机424架。

八、美军海外基地巡礼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海上霸主，同时在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周围建立了一系列军事基地。这些基地的建设到60年代肯尼迪时代达到高潮，仅较大的基地就达1000多个。以后随着国际风云的变幻，其海外基地数量逐渐减少。时至今日，美国在海外较大的军事基地仍有374个。

美军海外基地共分五大地区：

北美地区

以美国本土为中心，格陵兰和阿拉斯加为两翼，构成对原苏联的战略进攻态势。除美国本土871个军事基地（其中海军基地242个、空军基地384个）外，尚有：

——格陵兰：图勒、纳尔空军基地；纳萨赫什瓦克、昂马沙利克海军基地。

——加拿大：1个军事基地和50个左右的军事设施。

——百慕大群岛：3个海军基地。

欧洲地区

以原西德为中心，北欧的冰岛、挪威等国的基地为北翼，意大利、希腊、土耳其等地中海沿岸的基地为南翼，英国、西班牙为后盾，形成了两翼前伸的弧形态势。

——原西德：有188个美军基地，驻军21万人。

——挪威：平时不允许外国军队驻扎和储存核武器。

——冰岛：1个军事基地和2个雷达站。

——意大利：9个基地和40个左右的军事设施，驻军1.5万人。

——葡萄牙：1个军事基地，在亚速尔群岛的拉日什，驻军1400人左右。

——西班牙：4个军事基地和8个通讯站，驻军12500名。

——希腊：20个左右军事基地，驻军3000人。较大的基地有4个，即苏达基地、伊拉克翁基地、雅典基地、敦马科里基地。

——英国：103个基地和设施。21个空军基地中6个在使用，15个暂为保存。9个运输站、17个武器存放处、7个核武器仓库、38个通讯设施、10个情报基地、3个雷达和声纳监听站。

印度洋海湾地区

——迪戈加西亚：是美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唯一基地，驻有1500名海军，存有武器和可供修港口的7000吨设备。此外还与阿曼、肯尼亚、索马里、巴林、摩洛哥等国签订协议，规定美国在一定条件下面使用这些国家的下列基地。

——阿曼：锡戈空军基地、苏姆莱特空军基地、印度洋的马西腊岛。

——索马里：伯贝拉机场、摩加迪沙港。

——巴林：巴林机场。

——肯尼亚：蒙巴蒙及附近的纳纽机场。

亚洲太平洋地区

主要分布在菲律宾、日本、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具体分布情况是：

——菲律宾：有2个军事基地和4个军事设施。

——日本：有32个基地，其中陆军基地15个、海军基地14个、空军基地3个，驻军5万。

——南朝鲜：有 120 个基地和设施。较大的有 40 余个，其中陆军基地 36 个、空军基地 4 个，海军基地 2 个。

——土耳其：约有 20 个基地和设施。其中吉尔利空军基地是美国在土耳其最大的基地，首都伊斯坦布尔也是美国的一个大基地。

——澳大利亚：有 15 个军事基地和设施。

中南美洲

主要分布在巴拿马、古巴的关塔那摩岛、洪都拉斯等国家和地区。

——巴拿马：有 14 个军事基地，驻军 12000 名。较大的基地有 6 个，陆军基地 1 个、海军基地 3 个、空军基地 2 个。

——古巴：在古巴的关塔那摩岛有 1 个海军基地和 24 个左右的军事设施。

——洪都拉斯：2 个军事基地，18 个军事设施。

——安提瓜和巴布达岛：1 个海军基地。

